

货币革命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著
(Charles Eisenstein)
彭 哲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货币革命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要问世界在新轴心时代的转变究竟有多深，查尔斯·艾森斯坦的这本书将给出令你信服的答案。他是活跃在当今最具深刻整合思维的思想家之一。”

——迈克尔•鲍温斯（Michel Bauwens），P2P基金会创始人

“艾森斯坦知识渊博、满腔热忱、有责任心、做事勤勉、对事物体察入微，他俨然成为一座灯塔，为他人带来希望，这在当今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显得尤为重要。这本书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必将开启你的心灵，拓展你的思维。”

——卡莫兰•墨菲德（Kamran Mofid），经济学博士，“共有品全球化倡议”创始人

“本书精彩绝妙，文笔优美。如果你认为我们的经济系统已然病入膏肓，需要进行神圣的改革和优化，那么本书将是一本必读之作。我希望本书能够引发一场严肃的全球性讨论，探讨如何彻底改变我们对待金钱的态度。”

——安德烈•哈维（Andrew Harvey），《希望：神圣激进主义指南》一书作者

“我认为查尔斯·艾森斯坦是这个时代最有前途的思想家之一。他将哲学、宗教的精髓与敏锐的洞察力结合在一起，指出了现代社会机能失调问题的文化根源和制度根源，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办法。这样的人极为罕见。”

——戴维•科腾（David Korten），《大转折》一书作者

上架建议 经济/金融

ISBN 978-7-121-20727-3

9 787121 207273 >

策划编辑：郭景瑶
责任编辑：张　冉
封面设计：一克米工作室

定价：48.00元

货币革命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著
(Charles Eisenstein)
彭 哲 译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Copyright ©2011 by Charles Eisen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volver Editions/North Atlantic Books, Berkeley, California,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授予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65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美）艾森斯坦（Eisenstein,C.）著；彭哲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8

书名原文：Sacred Economics: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

ISBN 978-7-121-20727-3

Ⅰ. ①货… Ⅱ. ①艾… ②彭… Ⅲ. ①货币制度－研究－世界 Ⅳ. ①F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066号

书　名：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

作　者：[美]查尔斯•艾森斯坦　　译　者：彭　哲

策划编辑：郭景瑶 (guojingyao@phei.com.cn)
责任编辑：张　冉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3.25　字数：411千字
印　　次：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译者序
Preface

《货币革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博弈》（下称《货币革命》）是查尔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在2011年出版的一部思想性著作。查尔斯•艾森斯坦于198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数学与哲学学位。毕业后，他远赴中国台湾，进行中英文笔译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对中国文化颇有造诣。之后，由于他对当时的工作心生厌倦，还经历了离异、破产的危机，而这些经历促成了他在思想上的蜕变，以及对个人困局与整个社会迷茫、焦虑的痼疾的思考。

本书的英文名是“Sacred Economics: Money, Gif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ransition”，直译就是“神圣经济学：转型时期的货币、礼赠与社会”。本书题名中所用的“神圣”一词与宗教并无关联，而是侧重于不可替代、独一无二。当货币成为一种普世手段之后，它几乎能够用来交换任何事、任何物，因而与货币相关的事物也就脱离了唯一性。相应地，货币剥离了原始礼赠经济所带来的人际纽带，有了金钱以后，付清钱物，交易双方两不相欠。货币于是成了亵渎、罪恶的代名词。

作者认为，我们处于“旧世界”的末端，而危机四伏的今天为社会、文明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作者用了两个“故事”来概括“旧世界”的特征——“大众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eople）和“价值的故事”。而这里的“故事”一词来源于美国诗人和政治运动家莫瑞尔•鲁凯赛（Muriel Rukeyser）的诗句“构成宇宙的是故事，不是原子”（The universe is composed of stories, not atoms）。

“大众的故事”也称“飞升的故事”（The Story of Ascent），即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超越动物属性、建立理性世界的过程。在查尔斯•艾森斯坦早前的一部著作《人性的飞升》（The Ascent of Humanity）中，他对这一历程进行了思考与回顾。如果说《人性的飞升》是对自我

观的深刻探索，那么《货币革命》一书则是从货币的角度探索与新自我观相对应的一整套经济制度。第二个故事是“价值的故事”（The Story of Value），它指的是货币之所以具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相应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人们公认货币具有价值。而“货币的故事”促进了“飞升的故事”的演进。书中的大量篇幅都围绕这两个故事展开。

具体而言，“飞升的故事”中的个人观可被称为“离析的自我”（separated self）。这颇有些老子所谓的“寡民”的意味——在当前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对陌生人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对邻居的依赖程度，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等通信手段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交谈，却无法与距离咫尺的人正常交流。例如，本属于家庭的烹饪变成了大众餐饮，对子女的照料也逐渐社会化，家长需要付钱请他人照料小孩。而在原始社会，这种互相帮助的习俗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但是自从金钱产生之后，一旦付清钱款，提供货物或者劳务的人与购买货物与劳务的人便两不相欠，于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人情关怀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与这种自我观对应的货币也凸显了旧世界特征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缺失。

查尔斯•艾森斯坦同时认为，将之前免费的、不属于任何特定个人的“共有资源”（common）囊括进产权（property rights）的范畴，扩大了货币的疆域，加上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增长的驱策便随之产生了。为了积累更多财富，人们会为了一己之利伤害自然环境，而不考虑对他人、社会、子孙后代造成的消极影响。作者在第6章中引述了伯纳德•林特尔（Bernard Lietaer）的一则寓言来说明，借由这种生息的货币，人类追逐利益的本性如何导致了竞争、生存压力、自然环境的崩溃和人际关系的疏远。

为了解决“旧世界”的这些问题，在本书第二部分，作者概括他所认为的“新世界”的特征。在第17章，作者将之概括为七个方面：（1）负息货币；（2）消除经济租；（3）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4）经济和货币的本地化；（5）社会红利；（6）经济的负增长；（7）礼赠文化和

点对点经济。这七个方面相辅相成。而要进入“新世界”，必须采取新的“自我观”——“扩展的自我”、“联系的自我”，即考虑他人、考虑周围环境，以礼赠的方式提供服务的产品；同时，也必须进行货币的渐进式变革，而货币的变革也必将造成与“新世界”相对应的体制上的变革。为此，作者重提了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的思想，认为应对货币收取“滞留金”，这样既能促进流通，也能防止货币孳息，进而防止因为积累财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查尔斯•艾森斯坦本人也身体力行了互惠互利礼赠原则，他将其著作《人性的飞升》和《货币革命》两本书以免费的方式放在网络上，而读者可以在以下两个网站上免费浏览，并根据个人评价捐出认为合适的数额。

http://www.ascentofhumanity.com

http://sacred-economics.com

当然，崇尚人际联系的观点，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甚为有限。须知西方社会是从人情社会过渡到了契约社会，而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第一阶段的转变。此外“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意思是对地球资源的使用收费。这必然涉及将不可量化或者难以量化的“共有资源”进行量化，受到现有科学技术的局限，这部分资源无法探明储量，因此对为未消耗的共有资源定价仍然困难重重。此外，作者认为，瑞典等国的负利率是“负增长时代”到来的先驱，但事实上，这些政策的目的仍是为了刺激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希望读者对文章的观点加以鉴别。另外，文中一些尚待商榷之处和疏漏已尽量在“译者注”中标出。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查尔斯•艾森斯坦本人的悉心指导。例如，他建议，将The Age of Reunion一词译为“大同时代”。在此谨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彭　哲

2013年7月

前　言

Introduction

本书的目的是使金钱同人类经济体一道，变得像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神圣。

我们将金钱与亵渎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若问世间何物可谓神圣，此物绝非金钱。金钱似乎是我们良善本能的敌人，从“我负担不起”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每每都阻碍了仁慈或慷慨的冲动。金钱似乎是美丽的大敌，正如蔑称式的“大甩卖”所表现出的那样。金钱似乎是一切高尚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敌人，正如公司权力操纵立法，只为扩大利润。金钱正在破坏地球，我们掠夺海洋、森林、土壤、每一个物种，只为满足无尽的贪欲。

至少，自耶稣将兑换货币者从圣殿驱逐出去的那刻起，我们就感到，金钱包含了一些不圣洁的东西（见约翰福音2:15）。当政客追逐金钱而不关心公共利益时，我们称他们是“腐败的”。“肮脏的”和“污秽的”这样的形容词自然是用来描述金钱的。僧侣曾被寄望于与金钱无涉：“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福音6:24；玛门，意为金钱）

同时，没人能否认，金钱具有一种神秘的、神奇的特质，具有改变人类行为和协调人类活动的力量。自古以来，思想家们惊叹，仅仅是一个符号，就赋予了一块金属或一张纸片如此的力量。不幸的是，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很难不把金钱称作邪恶的魔法。

很显然，若要将金钱变成某种神圣的东西，非得有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不可，而这个变革则关乎金钱本质的转变。一些自救大师令我们相信，必须改变对金钱的态度，但仅有态度的转变仍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创造新型的金钱，体现并加强这种态度上的改变。《货币革命》描述了这种新货币，描述了新的经济体如何围绕这种新货币展开，还探讨了人类身份的蜕变，这种蜕变既是货币变革的原因，亦是其结果。改变

后的态度直击人类的本质核心：它们包括生命的目的、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色、个体与人类社群的关系，以及个体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乃至何谓个体，何谓自我。货币（和财产）毕竟是自我的延伸，因此，我们用物主代词“我的”来描述它，就像我们用这个代词来描述双手和头脑一样，如我的钱、我的车、我的手、我的肝。同样的道理，想象一下被抢劫或被“敲竹杠”的那种受侵犯的感觉，犹如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被剥夺了一般。

将金钱中的亵渎转换为神圣——它是我们身份中如此深刻的一部分，它对世界的运转如此关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金钱或者金钱以外的事物变得神圣，又意味着什么呢？与神圣相反之物，才决定了神圣的重要性。数千年来，神圣的、圣洁的神性越来越多地指从自然、尘世和肉体离析之物。三四千年以前，众神从湖泊、森林、河流迁移至天空，化为了自然的诸王之王，而非自然本身。随着神性与自然相分离，倘若涉足尘世之俗务太深，人也将变得污秽不堪。人类从鲜活的、有肉身的灵魂，变成了污秽的躯体，成了纯粹的灵魂容器。笛卡儿式的“意识的尘埃”（mote of consciousness）是它的顶点，它只是世界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而牛顿所谓的钟表匠一样的上帝也是如此。上帝曾经是超自然的、非物质的。若上帝有涉尘世，那么必是通过神圣的、违反自然法则或超越自然法则的神迹代祷。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离析的、抽象的、被称为灵魂的所在，却使得尘世间有了生气。若问一名宗教人士：人死之时有什么改变，他将答：灵魂已离开肉体。问他谁使雨落、使风拂，他将答：上帝。伽利略和牛顿似乎将上帝从世界每日的正常运转中移除了，却将世界的运转解释为非人为的力量和质量组成的钟表般的庞大机器。即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钟表匠在一开始就上好发条，为整个宇宙充满一种潜在的能量，而这种能量使得整个宇宙运转至今。到今天，我们仍然认同这种思路，正如我们认同宇宙大爆炸理论一样。宇宙大爆炸指的是原始时期的一个事件，它是“负熵”的根源，而负熵使得运动和生命得以产生（熵所度量的是系统的混乱程度，负熵衡量的则是系统的有序程度——译者注）。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中

对灵魂的见解是，灵魂是离析的、非尘世的，但它却奇迹般地干预了物质事件，这种干预甚至可以将物质事件引向某个神秘的方向。

这样看来，在这个星球上，与前文提到的神性最为相似的概念居然是金钱，这真是莫大的讽刺。金钱是一种无形的、不朽的力量，它与一切事物相关，引导一切事物，它是万能的、无限的，它是使得整个世界运转的“看不见的手”。然而，今天的金钱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只是纸上的符号或是电脑中的若干比特，它存在的疆域已远超物质范畴。在它的疆域内，它不受自然界中最重要的法则的制约，因为与其他事物不同的是，金钱不朽，不会归于土壤；相反，它可长久保存、恒久不变，无论是存于地下室或是存入计算机文件，都已远超自然。自然界里最接近这些性质的物质是黄金，它不生锈、不褪色、不腐坏。正是因为这些特质，黄金既可作为金钱使用，也用作神性的隐喻。

在21世纪早期，金钱的抽象性、金钱同现实世界相分离的神圣特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金融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有了自己的生命。华尔街的巨大财富与任何物质生产毫无关联，这些巨额财富似乎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疆域之中。

自奥林匹亚之巅俯瞰，金融家们称自己为“宇宙的主宰”。他们引领其所尊奉的神力，聚敛财富或致大众破产荡业，几如移山、毁林、徙移、主导国运盛衰之势。然而不久，金钱之神被证实是喜怒无常的。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为了满足金钱之神，金融界的祭司们采用的仪式虽越发疯狂，但已然徒劳。像步入穷途末路的宗教神职人员一样，金融家们劝诫其追随者做出更多牺牲，却将他们自己的不幸归为罪恶（贪婪的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或神（金融市场）的神秘无常。然而，有些神职人员已经开始自我责备了。

早期文化把衰退称作“上帝遗弃的世界”。金钱灭失，而它的另一精神属性——人类疆界内的生机之力也随之消失。在撰写本文时，世界各地都有机器处于闲置状态。工厂陷于停顿状态；建筑设备被弃置于庭院中；公园和图书馆正被逐一关闭；数以百万计的人无家可归，忍饥挨饿。同

时，大量住房闲置，仓库中大量食品腐烂。然而，建设房屋、分发食品、运营工厂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依然存在。某种非物质的东西，活活有生气的精神却逃掉了，而逃掉的正是金钱。这唯一缺失的东西，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计算机中的电子的形式），甚至很难说它是存在的，但它如此强大，以至于没了它，人类的生产力会戛然而止。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缺乏资金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从人们对失业者的刻板印象中可见一斑：失业者几近破产，穿着背心，懒洋洋地蜷在电视机前，喝着啤酒，醉得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看来，金钱与机器一样，可以使人变得有生气。没有了金钱，我们会萎靡不振。

我们并未意识到的是，我们所确立的神的概念，已经吸引到了符合这一概念的神，还赋予了这神在地球上的主权。通过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精神与物质的分离，神与自然的分离，我们已经置备好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疏离的、非神性的、非自然的统治权力。因此，当我提及“要将金钱变得神圣”时，我并不是要援引一种超自然的媒介，将神圣性注入惰怠的、世俗之物。相反，我期望返回早期的一个时间点，一个物质与精神尚未分离的时间点，一个万物皆神圣的时间点。

那什么是神圣的呢？神圣有两个方面：独特性和关联性。神圣的客体或者神圣的存在，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因此，神圣是弥足珍贵的、不可替代的。它没有等价物，因而没有有限的“价值”，因为价值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确定。与其他度量衡一样，金钱是一种比较的标准。

神圣之物虽然独特，但它不能同形成它的事物相分离，不能同它所属的历史相分离，不能同它在生命的宫腔中所占据的位置相分离。你也许会说，一切事物和一切关系都是神圣的。或许如此，虽然我们在理智上确信如此，但我们并不总能体会到神圣性。我们会觉得，一部分事物是神圣的，而另一部分不是。那些我们认为是神圣并称之为神圣的东西，其最终目的是提醒我们，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剥离了神圣的世界里，因而很少有事物能给我们带来生活在神圣世界中的感觉。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商品，按照模

板浇筑的房子，包装得一模一样的食品，与机构职员不具名的关系，都摒弃了世界的唯一性。我们事物的远祖、我们的关系的匿名性，商品生产和处置缺乏可预见的后果，都摒弃了相关性。因此，我们无法体验到神圣性。当然，在所有摒弃了独特性和关联性的事物中，金钱是第一位的。铸币的思想源于标准化，因此，每一德拉马克（drachma，原希腊货币单位——译者注）、每一斯德特（stater，古希腊、波斯的金银硬币——译者注）以及每一美元，其功能都是相同的。此外，金钱作为万能的、抽象的交易媒介，已经从其起源中分离出来，从物质性中分离出来。无论谁给你一美元，这一美元都是相同的。若某个人在银行存了一笔钱，一个月后将钱取出，并抱怨说："嘿，这跟我当初存的钱不一样，钞票不同"，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此人幼稚可笑。

于是，货币化的生活被默认为是一种堕落的生活，因为金钱和金钱所购买的东西都缺乏神圣的特性。邻居在花园里培植了土豆并把它赠给我，但这颗土豆和超市买来的土豆有什么区别呢？熟识我本人和我本人生活方式的人们和我一同修建了一幢房屋，但这幢房屋与预先建好的一幢房屋又有什么区别呢？其本质的区别在于，特殊的关系将施者和受者联系在了一起。通过一张故事网，这些事物就与我们熟悉的人物和空间联系起来了。若生命中充满了这样用心而为的特殊事物，那么生命将是丰富而滋润的。而今，我们生活在同质性、非人格性的狂轰滥炸之下。即使是定制的产品，只要是批量生产的，也无非是既定模块的有限组合罢了。这种同一性使得灵魂无趣，生命跌价。

神圣之物的存在，就像是回到一直存在的家，回到一直存在的真理一般。观察一虫一草，聆听鸟鸣蛙鼓之交响，感知趾间之泥，端详器物之玲珑，领悟细胞或生态系统精妙绝伦的复杂协调，见证生命中的共时与象征，观孩童嬉玩，感才华横溢之作，均可得此体验。这些体验虽然超凡，但它们并不独立于生命的其他部分而存在。事实上，这些体验的力量来自于对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一个我们自身的世界所植根的世界、一个潜藏并渗透我们自身世界的惊鸿一瞥。

“一直存在的家”是什么？“一直存在的真理”又是什么？它是天人合一或者万物相系的真理，它是参与构筑比自我更伟岸之物、但仍不失自我的感觉。在生态学中，它是相互依存的原则，即所有生命体的生存，都依赖于围绕它展开的关系网中的其他生命。这张网一直延伸，直至涵盖整个星球。任何物种的灭绝都会削弱我们自身的整体性、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及我们自身，于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缺失掉了。

如果神圣之物是一切事物潜在统一的门户，它同样也是一切事物独特性和特殊性的门户。神圣之物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性质独特，不能被简化为普遍的特性的集合。化繁为简的还原论科学似乎是在劫掠世界的神圣性，因为一切事物都变成了一堆通用模块的组合，这种观点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主要包含了标准化的通用商品、职位描述、流程、数据、输入和输出，它俨如一个独特、有生机的个体。然而，连岩石、云翳，看似类同的水珠，都被认为是有知觉的、独特的生命。人类的手工制品亦是独一无二的，其标志性的不规则性是制造者的个性签名。神圣性具有关联性和独特性这两个特质，而体现了这两个特质之间的联系的是：独特之物保留了它们的起源特征，保留了它们在伟大的存在母体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与它们的存在有关的他物的依存关系。标准化的物件、商品是同质的，因此也就脱离了这种关系。

本书将描述一个神圣的货币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愿景，这一体系体现了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独特性。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感知上，这种体系都不再是从它的自然母体中孤立出来的，它将重新弥合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割裂，它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扩展，它遵循一切发展法则，并传承了所有的美好。

我们的文明中的每一个制度，无论多么丑陋或腐败，都有美的萌芽：美和丑的音符相同，只是美的调门更高。金钱也不例外，金钱的最初目的只是将人类的礼赠和人类的需求联系起来，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加丰富。然而金钱没有导致丰富，却造成了稀缺；金钱没有形成联系，却导致了离析。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尽管金钱变得面目全非，就

金钱是礼赠的媒介这一最初构想而言，我们可以想见，有一天，金钱会重新变得神圣。交换礼物是神圣的，这就是我们由交换礼物而创制礼仪的原因。礼赠精神曾支配着部落和乡土文化，也支配着今天货币经济之外的人们的互助互利。神圣的金钱将成为赠予的媒介，它将把上述精神注入全球经济之中。

《货币革命》描述了这一未来，并且提出了实现它的可行办法。虽然一些书籍对我们社会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但它们并未提供积极的替代方案。很久以前，我便对这样的书籍心生厌倦。之后，对于“我们必须减少9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类虽然提供了替代方案，但方案并不可行的书，我也感到厌倦。接着，我对那些提供了貌似可行的手段却没有说明个人能够做什么的书籍，同样感到厌倦。而《货币革命》对四个层面都提出了见解：对于金钱产生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它描述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一种特别的货币和经济体的基础之上；它阐明，要创造上述世界，需要怎样的集体行动，以及怎样的手段可以导致这些行动；它探讨了世界转型期间的个人层面、身份的变化以及我称之为“礼赠中生活”的存在。

改造金钱并不是解决世间流弊的灵丹妙药，也不应具有比其他激进主义更高的优先权。在计算机中重排数码比特位，并不会抹掉那些蹂躏我们星球的物质和社会的毒瘤。然而，若没有金钱的相应改造，其他领域的改造将不能发挥其潜力，因为金钱已经植根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之中。我所描述的经济变化将是一种巨大的、全方位的转变，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能逃脱这种改变。

对于眼前危机的真实规模，人类才刚刚觉醒。若你认为我所描述的经济转型太不可思议，那必是因为，任何稍逊于奇迹的改变都不足以治愈我们的世界。所有领域，从金钱到生态复原、政治、技术、医药，都需要超出目前可能范围的解决方案。幸运的是，旧世界已分崩离析，我们对于可能性的认识也随之扩展，我们的勇气随之增加，采取行动的意愿也增加了。目前各种危机的汇合——金钱、能源、教育、卫生、水、

土壤、气候、政治、环境等方面——其实是分娩的危象（birth crisis），它迫使我们离开旧世界，进入新世界。这些危机会不可避免地侵入我们的个人生活，我们的世界分崩离析，而我们也在新世界中诞生，拥有新的身份。这就是为何很多人感知到了全球危机的精神层面，甚至经济危机的精神层面。“常态”将一去不返，而我们将诞生在全新的常态中：全新的社会、与地球的全新关系、对人类本性的全新体验。

我谨将本书献给我们心灵所能想见的至美世界。之所以提到“心灵”，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间或告诉我们，这至美的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头脑会怀疑与经验相悖的所有事情。当你阅读我所描述的神圣经济体时，你可能会感到有些玩世不恭、蔑视或绝望。你或许会排斥我的话，认为它理想到无可救药。事实上，我已经淡化了我的描述，使之更合理、更可靠、更符合我们对生命和世界的较低的期望，但这种刻意淡化的言辞并非真相。我将使用头脑中的工具直抒胸臆，在我心中，创造出如此美妙的经济和社会是可能的——事实上，哪怕这美妙减一分都配不上我们。我们居然如此消沉，以至于连这般神圣的世界都不敢希冀吗？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 iii

前 言 / vii

第一部分 离析经济学 / 01

第1章 礼赠的世界 / 03
第2章 稀缺的幻象 / 15
第3章 金钱与心性 / 27
第4章 产权的烦扰 / 39
第5章 共有资源的尸骸 / 55
第6章 高利贷经济学 / 73
第7章 文明的危机 / 97
第8章 时代的转变 / 109

第二部分 大同经济学 / 121

第9章 价值的故事 / 123
第10章 回报的法则 / 133
第11章 共有的货币 / 141
第12章 负息率经济 / 153
第13章 稳态与负增长经济 / 189
第14章 社会的红利 / 203
第15章 地方货币与互补货币 / 221

第16章 迈向礼物经济 / 241
第17章 结语与展望 / 251

第三部分 新经济生活 / 263

第18章 重习礼赠文化 / 265
第19章 非积累性 / 277
第20章 生活之道与神圣的投资 / 289
第21章 礼赠中的工作 / 307
第22章 社群和不可量化之物 / 321
第23章 新物质主义 / 329

结语 美丽新世界 / 337

附录 量子货币与储备问题 / 345

第一部分/PART 1

离析经济学

我们所处的时代，各种危机纷至沓来。这些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我们可称之为离析（Separation）。离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与自然的割裂，集体的解体，现实被划分成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离析交织于文明的每一个方面。离析同样是不可持续的，它产生的危机越来越广、越来越深重，这些危机迫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大同的时代”（The Age of Reunion）。

离析并非现实的最终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投射（projection）、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故事。如同在所有文化中，我们定义的大众的故事（Story of the People）有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自我的故事（Story of Self）以及世界的故事（Story of the World）。自我的故事是分离的自我，它是心理上的一个泡影，包裹于皮肤之下的灵魂，一个由基因驱使的、追求繁殖上自利的生物学表型，一个理性的、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一个客观宇宙的物理观察员，陷于肉身囹圄之中的一粒意识的微尘。世界的故事是“飞升的故事”（the Story of Ascent）：人类从无知、无力的状态开始，渐次驾驭自然之力，探寻宇宙之奥秘，决然走向掌控自然、超越自然的宿命。这是人类的疆域从自然的疆域中离析的故事。人类的疆域扩展了，而自然的疆域则被逐步转化为资源、货物、财产，最终变成金钱。

金钱是随着时间推移发展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协议、意义和符号。简

言之，它是一种与法律、国家、历法、时钟时间、宗教和科学等社会现实一道存在的故事。而故事承载着巨大的创造性力量，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协调人类活动、集中注意力和锻炼意志力，确定角色并认定何为重要之事，甚至何为真实之事。故事把意义和目的赋予生命，并激发行动。离析的故事（The Story of Separation）定义了我们的文明，而在其中，金钱起到了关键作用。

《神圣的经济学》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在离析的故事的基础上，经济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匿名性、去人格化、财富的两极分化、永续增长、生态掠夺、社会动荡，无力回天的危机，在经济系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解决这些危机，必须改革起决定作用的大众的故事。我的目的是，通过确定离析经济学的核心特征，构想一个大同的经济状态（an economics of reunion），将破碎的社群（community）、关系、文化、生态系统和星球重新复原成一个整体。

第1章

Chapter 1

礼赠的世界

时至今日
天未诘地
“汝负我心”
且观世变
爱意恒如
曦光满天

——哈夫茨

太初生礼。

我们出生时是无助的婴儿，只有纯粹的需求，却无任何可以给予之物，然而我们被哺育、被保护、被裹衣、被安抚。我们并未做任何应得之事，也未给予任何可作交换之物。每个人都有这种体验，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你得到的一切都不是你赚取或生产的，这完全是一份礼物，这种体验赋予了我们最深切的灵魂直觉。我们被赠予了生命，因此，我们的默认状态是感谢，这便是我们存在的真相。

想象一下，走出门，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你束手无策，无法自己吃饭穿衣，无法利用四肢，甚至无法区分躯体之末与世界之始。而巨大的生命向你走来，拥抱你、喂养你、照料你，爱你，你难道不会心存感激吗？

在清醒的时刻，或是与死神短暂擦肩之后，或是在陪伴心爱的人走向死亡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一件礼物。我们活着的时候，体会到了强烈的感激之情。我们惊叹于伴随生命而来的富足：呼吸之乐、声音色彩之悦、饮水止渴之乐、爱人脸颊之甘。这种敬畏与感激杂陈之感，是神圣存在的一个明显标志。

当我们领悟到了自然的宏伟壮丽，当我们领悟到了生态系统那奇迹般的复杂性和秩序性时，我们会产生同样的尊敬和感激之情。它们完美得不可思议，即便是微小的部分也远远超出了我们脑中最精巧的构思和创造力。它们确确实实地存在，我们从未参与它们的创造，但整个世界都供养并围绕着我们。即使在今天，生态系统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解之谜。我们无须计划，无须了解大自然的内部运作机制，却仍然接受了大自然的果实。当我们的远古祖先思索上天无偿的赠予时，你能想象出他们的惊讶和感激吗？

难怪古老的宗教思想家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将世界赐予了我们。前一句是表达谦恭，第二句则是表达感恩。可悲的是，后来的神学家扭曲了这一点，转而称“上帝将这个世界赐予了我们，任由我们拓殖、掌控、称霸。”这种解释与最初的现实截然相反。只有谦卑者知道，这件礼物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掌控力；只有懂得感恩的人知道，我们是否尊敬礼物的赠予者取决于我们使用礼物的方式。

现代宇宙学肯定了神话中将宇宙视为礼物的观点。宇宙大爆炸难道不是不予而得吗[1]？细看各种物理常数（光速、电子的质量、四种基本作用力的相对强度等），这种看法便会加强。这些常数不明缘由地拥有精确的数值，正是因此，才有了包含物质、星球、生命的宇宙。整个宇宙仿佛是为了我们而建，从而有了我们的存在。

太初生礼：礼物产生于世界的本初原型中，产生于生命的肇始之

1 《人性的飞升》一书的读者会了解，我倾向于非宇宙大爆炸的宇宙论，一如哈尔顿·阿普（Halton Arp）的动态稳态宇宙，在这个宇宙里，物质不断生发、衰老、死亡。在此处，这个概念如此自发地出现了，如同礼物一般。

时，产生于人类种群起步的阶段。因此，对我们而言，感激是自然的、原始的、基本的，甚至于难以界定。或许，感激就是对受礼的感知，对回礼的欲求。我们因此会想到原始人，他们与这种原始的感激相系，并在其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实现着这种感激。事实上，他们做到了。虽然对原始货币的记载大都始于原始的以货易货，但在狩猎采集者中，以货易货仍然相对少见。礼赠才是经济交易中最重要的模式。

感激虽然原始，但它却与发源于感激的慷慨以及其他令人不太愉悦的人类本质共存着。虽然我相信人类具有的神性是固有的，但我们与这种神性疏离已久，并且创造出了一个反社会之人占尽财富和权力的世界。本书并不伪称这样的人不存在，也不认为任何人身上都找不到这种倾向。相反，本书旨在唤醒潜藏在我们心中的礼赠精神，努力构建出鼓励并体现这种精神的制度，而今天的经济却对自私和贪婪大加褒奖。如果经济体制像某些古老文化中那样褒奖慷慨，那将会是何等光景？

首先，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动态的礼物。上文所指的经济交换（exchange），并不是对礼赠社会的准确描述。用流通（circulation）更为贴切。今天，我们经常交换礼物，但与以货易货相比，礼物交换已经更进了一步。在古代社会，复杂的习俗统辖着礼物的赠予，在那些尚未完全失掉与过去联系的社会中，很多风俗沿袭至今。通常，礼赠的网络与亲缘的网络密切相关。风俗决定了谁予谁受。对于某些亲属类别而言，你应是赠礼者；对另一些亲属类别而言，你应属受礼者；对其他的亲属类别，礼物是双向流动的。

礼物可以是双向流动的，也可以是循环流动的。我赠予你，你赠予别人……最后总有人再赠予我。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居民的库拉系统（Kula System）便是一例。其中，贵重的项链循着一个方向在各岛屿间传递，而手镯则循着另一个方向传递。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最早对库拉系统进行了深入描述。库拉的字面意思是“圈”，它是庞大的礼赠系统及其他经济交换的关键所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对库拉的介绍如下：

该系统通过交换进行礼赠，它渗透到了特罗布里恩人的血液中。特罗布里恩人的经济、部落和道德生活都被“灌注”进了这种系统，正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精妙表述那样。它是一种持续的“给予与取得”。这个过程的特点是：礼物的给予、接受和回赠在各个方向上持续流动[2]。

酋长们交换手镯和项链这一高度仪式化的交换，是库拉系统的顶峰；同时，礼赠的网络延伸到了所有的效用品上，包括食品、船只、劳役等。莫斯认为，纯粹的以货易货是鲜见的。“一般情况下，即便收受之物被一个人用易货的方式收入囊中——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作个人之用，除非此物对此人不可或缺[3]。”换言之，除非礼物遇到了真正的需求，否则礼物将继续流转。刘易斯•海德对礼物的这一原则做了如下的诗意描述：

礼物向空缺处流动。随着它的不断流转，它朝着那个两手空空历时最久的人流去。如果有人出现在其他地方，并且有更大的需求，那么礼物将离开原来的渠道，向他流去。我们的慷慨可能会使我们两手空空，但是我们空空的两手会吸引住整个礼物圈，直到流转之物中有东西返补给我们。社会的本质是憎恶真空[4]。

虽然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区分礼物和商业交易，但在过去，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显。在有些文化中，如托阿利皮（Toaripi）和拿茅（Namau），只用一个字来表示购买、出售、出租、借贷[5]；古美索不达米

2 莫斯《礼物》，29页。
3 同上，30页。
4 海德《礼物》，23页。
5 莫斯，《礼物》，32页。

亚的šám一词同时表示“买入”和“卖出”[6]。许多现代语言仍保有着这种模糊性。在汉语、德语、丹麦语、挪威语、荷兰语、爱沙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日语等语言中，没有单独的术语来表示“借出”和“借入”，这或许是古代借贷不分的遗迹[7]。英语中，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里，有时也会用“借入”来表示“借出”，如“我借入给了他20元钱”。这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何同一词汇可以表示两个截然相反的行为？

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在于礼物的流转机制。即便理论上存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所谓的“免费礼物”，实际中也是罕见的。除“免费礼物”外，礼物要么伴随着一种交易的象征，要么伴随着一种道德或社会责任感（或两者兼具）。现代的金钱交易是封闭的，它不产生未尽的义务。而这种交易则不同，它是一种开放式的礼物交易，它在参与方之间建立了持续的联系。换个角度看，礼物带有赠予人的特征，当我们赠送礼物时，我们也赠予了我们自己的某些特质。而现代的商品交易则相反，售出的商品仅仅是单纯的财产，是一种独立于销售者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察觉到其中的差别。你或许拥有一些来自他人的珍贵物品，从客观上而言，这些物品与你希望购买的东西毫无二致，但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因为它是赠送者赠予你的。因此，古代人认识到，与礼物一同循环流动的，还有一种神奇的特质、一种精神。

玛瑙贝壳、漂亮珠子、项链这样的无用之物是最早的货币。天真地说，用它们去交换具有效用价值的物品，只是为了方便礼赠——“以有易无”（something for nothing）。虽然它们变成了“以有易有”（something for something），但却并不减损它们的礼物属性，因为它们仅仅是为责任之感赋予了实体之形，它们是感激的象征。从这个角度

6　希福德（Seaford），《货币与早期希腊思想》，323页。

7　在中文里，买卖两词的发音几乎相同，相应的表意文字也类似。购买的汉字“買”最初用于描绘一种玛瑙贝，即一种早期形式的钱；售卖的汉字“賣”出现时期稍晚，表明在早期，买卖是分不开的。

看，买入和卖出、借入和借出的含义就很容易理解了。买入和卖出、借入和借出并不是截然相反的行为。所有的礼品都以另一种形式返回给赠礼者，买方和卖方的地位是等价的。

今天的商业交易则存在着不对称性。商业交易认定，买者是交钱拿货的人，卖方则是交货拿钱的人。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买方”在以钱易货，“卖方”则是以货易钱。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证据表明，这种不对称是新近产生的，远远晚于货币的出现。那么，是什么导致货币产生了这种不对称性？世上的其他商品都与金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对金钱的亵渎。

另一方面，我们直观地认为礼物是神圣的，这就是为何时至今日，赠礼时仍要举行仪式。礼物体现了引言中提及的神圣的关键特性。首先是独特性。今天的标准化商品，是在封闭的交易中用金钱购买的，它与其起源已经疏离了。与之不同的是，礼物具有赠予者的部分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讲，礼物是独一无二的。其次是整体性。礼物扩大了自我的圈子，这个圈子被一直扩大，直到涵盖了整个社会。今天的金钱体现了“我之增益，你之减损”的原则。然而，在礼赠经济中，“我之增益，亦为你之增益”，因为拥有者将礼物赠予了需求者。礼物巩固了这种神秘的参与，即参与到比个人更为重大、但未与自我分离的事情之中。理性自利的公理发生了变化，因为自我已经扩展到了“他者”（the other）的范畴。

对于金钱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教科书上可以找到传统的解释。以货易货被假定为金钱发展的起点。最开始，竞争的个体寻求理性自利的最大化。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并不被人类学的研究所支持。根据莫斯的研究，在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货易货是罕见的，在西北太平洋则更是闻所未闻。经济人类学家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同时强调，“从不涉及金钱交易的严格意义上讲，在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经济体制中，以货易货从未成为数量上占优或者起主

导地位的模式或交易行为。对此，我们有铁证[8]。”多尔顿称，以货易货的实例为数不多，且都是小规模的、不常见的，或者紧急的交易，这与今天的情况相同。除此之外，在不涉及金钱的交易中，极少有经济学家所幻想的那种不具人格的、效用最大化的交易，而往往“需要持久的（有时是仪式化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由风俗授意，以互惠为特征[9]。”这种交易不应被称为以货易货交易，而是一种仪式化的礼物交换。

今天，我们认为礼赠和购买是独立的、互斥的，可以肯定的是，礼赠和购买有各自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背景。但远古时代并不区分礼赠和购买，也不像今天这样，把业务关系和个人关系分开。在讲述货币史时，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现代的区别进行后向投射，并按照现行区别进行一些有关人性、自我、人生目的的假设：我们是离散的、离析的自我，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以便最大化我们自身的利益。我并不是说这些假设不正确。这些假设是我们所定义的文明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将近尾声的大众的故事（Story of the People）。本书是新的“大众故事”所讲述的一部分。金钱的转变是更大转变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转变建立在对自我、生命、世界截然不同的假设之上。

人类的经济活动与宇宙观、宗教、灵魂的距离从不遥远。不仅古代经济以礼赠为基础，远古的宇宙观和宗教亦然。今天也一样，我们的货币及其标准化、抽象化、匿名性的性质，与人类其他方面的特征如出一辙。在新式货币的背景之下，会产生怎样的新科学、新宗教、新心理范式呢？

如果货币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从刻意的、利益最大化的易货交易中产生的，那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认为，货币是作为一种便利礼赠、便利共享、促进慷慨的手段而产生的，至少它带有上述精神。要重新建立起神圣的经济，有必要将货币的精神恢复到它本初的状态。

就其核心而言，货币是一个美丽的概念。为了揭示货币的本质，货

8　道尔顿，“以货易货”，182页。

9　希福德（Seaford），《货币与早期希腊思想》，292页。

币灵魂的（若非历史的话）本质，容我暂时幼稚一下。我拥有你需要的东西，我希望把它赠给你。我将这东西赠给了你，于是你心存感激，希望给我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但是，你并不拥有我现在需要的东西。因此，你送给我你的感激之情的象征——一件无用的、漂亮的东西，如贝壳串珠项链或一块银片。这个象征之物意味着，“我已经满足了其他人的需求，并赢得了他们的感激之情。”随后，当我从他人那里收到一份礼物时，我便把这一象征赠给他们。礼品的流通可以跨越遥远的社会距离，对于赠我礼物之人，我虽不曾赠礼给他们，但这些礼物激起了我内心的感激之情，让我希望有所作为。

在家庭、氏族或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的层次上，货币并非是礼物经济体运转所必需的。在更大的社会组织层面上，如几百人的村庄或部落，货币也并非是必需的。如果我不需要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你要么会（因为感谢而有所行动）给我一些未来我需要的东西，要么会赠礼给别人，别人再赠礼给那些赠礼给我的人。这便是“礼物的圈子”，社群的基础。在部落或村庄中，社会的规模非常之小，小到那些赠我礼物的人亦能辨识出我赠给别人的礼物。而我们所处的大众社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夏威夷种植我食用的生姜的农人，在日本设计我所使用的移动电话显示器的工程师，不会知道我对你有慷慨的赠予。因此，我们不用去人为地识别礼物，而是用货币作为感谢的表示。社会对礼物的见证，于是变为匿名的了。

当礼赠的对象超出了我们个人所熟识的范围时，货币就显得必要了。这便是经济规模和分工超越了部落或村庄的层次时所发生的情况。事实上，最早的货币出现在第一批超越新石器时代村落的农业文明中：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和印度。传统的、分散化的礼物网络让位给集权化的再分配系统，而礼物流通的枢纽，也变成了寺院以及后来的皇家宫殿。这很可能是由冬季赠礼节（potlatch）这类传统发展而来的。在这类传统中，礼物流入首领和其他领袖之手，然后返回其亲族和部落。大规模的礼物流向了集权化的结点，随着贡献变成了强制的、量化

的，对外支付变得不平等，这些网络很快偏离了礼赠的思维模式。古代苏美尔人的文件已经提到了经济的两极分化、巨富与赤贫，以及仅能维持生计的工资 10。早期的农业帝国通过集权计划而非市场贸易来统辖货物流通 11，同时也使用了一些被称为货币的东西：以标准单位度量的农业和金属商品，被用作交换媒介、价值单位、价值储藏。我期望的是，货币能够便利礼赠和需求，为每个人创造出更大程度的丰裕。然而，四千年以前，金钱就无法满足我天真的期望了。

货币便利了贸易、促进了高效的生产，允许资本积累以承接大型项目建设，从而使生活更加充实了：它应该赐予我们纾缓、休闲、无虑，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传统的经济理论预测的正是这些结果。但事实上，货币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状况：焦虑、困顿和贫富悬殊——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悖论。

要使我们的世界拥有技术，拥有电影、交响乐团，拥有电信和伟大的建筑，拥有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文学，我们需要货币或与之类似之物，它们是协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所必需的。有一种系统会将金钱恢复到神圣礼物的状态。为了描述这一系统，我撰写了本书。之所以用“恢复”一词，是因为自最初那刻起，金钱就具有了神圣不可思议的内涵。最初，寺庙是农业剩余存储和再分配的场所：它是宗教生活的中心，也是经济生活的中心。有些作者声称，最早的象征性货币（与商品货币相反）就是由寺庙发行的，并且这种货币可以通过与庙妓发生神圣的性关系来赎回 12。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寺庙深入参与了早期铸币的发行，很多铸币都印有神圣的动物和神灵的形象。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

10　涅麦特·内扎特（Nemat-Nejat），《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日常生活》，263页。

11　希福德，《货币与早期希腊思想》，123页。对于这一说法，西佛德引用了有说服力的证据：早期的文件以列表名单形式描绘人们扛着牲礼进行宗教性游行的艺术品，等等。

12　伯纳德·利尔塔（Bernard Lietaer）在他所著的《货币的未来》中提到了这一观点。一种铜质的锡克尔（shekel）是已知最早的硬币，可追溯至公元前三千年。在我的研究中，我并未发现任何其他提及这种货币的记载。据我所知，最早的硬币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大约同时出现在吕底亚和中国。

天——被神化的总统的肖像被印在纸币和硬币之上。

或许有一天，在数十亿人规模的礼赠经济体中，我们不再需要货币；我在本书中描述的货币，或许只是过渡形式罢了。“原始主义者”主张放弃文明、技术和文化，主张放弃使我们被称为人的礼赠。我并不是原始主义者；相反，我预见的是，人性会恢复到神圣之域，承载狩猎采集时代里人与自然之间统一、和谐的状态，只是其组织形式的层次更高罢了。手和脑的天赋之礼使我们成其为人；我预见的是这种礼物的成就，而非其失责。

请注意，将我们人类独有的特性归为礼物，是如此自然。与礼物的普遍原则一样，人类的礼物也具有赠予者的部分特征。换言之，人类独有的特征是神圣的礼物。从普罗米修斯之火的礼物，阿波罗的音乐礼物，到中国神话中统治者神农的农业礼物，神话印证了这种直觉。在圣经中，我们不仅被赋予了整个世界，还被赋予了生命的气息和创造的能力——我们就是造物主根据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同样，我们都感觉到，在个人层面上，每个人被赋予的天分之礼是出于一种原因、一种目的的。我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发挥这种天分之礼的欲望，通过它们，我们将自身的礼物带到世间。每个人都体会到了给予的快乐和陌生人的慷慨无私带来的愉悦。在城市问路时，大多数人会欣然花时间帮忙。为陌生人指路并不符合人类理性自利的特性，它却清晰地表达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慷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金钱一开始是需求和礼赠的连接，是神圣礼物经济的产物，可它现在却阻止了我们赠予的愿望。因生计的需要，它将我们固定在了无趣的工作上，用“这么做我可负担不起”这样的言语，预先阻止了我们慷慨的冲动。我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焦虑中，忍受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金钱的稀缺性——这见证了“生存的成本”这句话。我们存在、发展、充分表达礼赠的意愿，都因为对货币的需求、维持生计和生存被抵押掉了。不管一个人多么富裕、多么安全、多么舒适，只要不参与礼赠，他的生命都不能获得满足。即使是薪水最高的工作，

如果它不涉及礼赠，很快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我们会觉得，“我活在世上，并不是为了做这种工作的”。

即使工作与我们的礼物无涉，如果工作的目为我们所不信任，同样的压抑感会再次萌生。我们会有“我们并未过自己的生活”之感，我们只是为了赚钱才过上这种生活。“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和“有趣的”工作仍是不够的。我们的礼物是神圣的，因而我们的存在亦是为了神圣的目的。

我们在地球有所为，本质上是一个宗教概念，因为传统的生物学认为，我们已经进化到具备生存的能力，任何生存繁衍之外的努力，都与我们的基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相违背。然而，人们可以提出有说服力的、新拉马克主义（neo-Lamarckian）的观点，即认为生物圈是由诸多离散的、离析的竞争个体（有机体或者“自私的基因”）所组成的，与其说生物学是对自然的精准理解，不如说是对当代文化的一个投射[13]。了解大自然的方式并不止于此，在不忽略显而易见的竞争的同时，首先要考虑合作、共生，以及有机生物体合并成的更大整体。这种对自然的新认识，实际上古已有之，它反映了将自然视为礼赠网络的原始认识。

每个有机体，每个物种都对地球的生命完整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标准的进化生物学的期望相悖的是，就生物体自身而言，这种贡献并不产生任何直接得益。固氮细菌不直接受益于固氮行为；它们为土壤供给氮，促进真菌生长，进而促进根系的生长，最终促进植物的生长；而土壤最终会为细菌提供营养。先锋物种（pioneer species）为基石物种（keystone species）铺平了道路，关键物种为其他物种提供了微环境（microniche），而其他物种又供养了其他礼物网络上的物种，兜兜转转，又反过来使先锋树种受益。树木为其他生物提供了水分，藻类制造氧气使其他动物能够呼吸。移掉任何生物，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都会岌

13　根据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布鲁斯·立顿（Bruce Lipton）、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伊丽莎白·沙托利（Elisabet Sahtouris）等人的工作，我在《人性的飞升》第7章中对这一论点进行了概括。

岌可危。

按照我的“如此……以致”这种推论，你或许会认为我幼稚可笑。你也许会说，万物运转得如此美好，只能归为运气：树木不会灌溉它周围的植物，它们只是为了自己而最大化地生存和繁衍着。它们滋养别的生物，只是无意为之的副产品罢了。藻类、固氮细菌、反刍动物体内分解纤维素的细菌也是一样。你也许会认为，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只为一己私利。大自然是一场残酷的竞争，经济体的竞争同样残酷，却也是如此自然。

我不认为这是自然的。这种经济体是一种异常情形，一个怪异但必由的阶段，它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并将让位给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自然界中，一味的增长和全面的竞争是生态系统不成熟的表现，随后，生态系统会出现复杂的交互关系、共生、合作，以及资源的循环。人类经济的下一个阶段，将会与我们对自然的新认识同时展开。这种新经济会唤起每个人的礼赠精神，它强调合作而不是过度竞争，它鼓励流通而不是囤积，它将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线性的。货币不会很快消失，但其作用会减弱，即便它将具有更多的礼物特性。经济将萎缩，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加丰裕。

对于一个表现出礼赠精神的经济体，我们所了解的货币是无益的。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使金钱助长了贪婪、邪恶、稀缺性，对环境的掠夺，有助于我们了解怎样的货币可以作为神圣的货币。

科学总是将文化投射到自然之上，经济学也将文化所决定的条件视为公理。我们生活在稀缺性的文化之中（因为我们体会到了稀缺性，“谋生”支配了我们的礼赠），我们假定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基础。在生物学中，我们已经看到，世间的个体为了有限资源而竞争。我们的货币系统从深刻的、结构化的层次上体现了这种信念。但是，这种信念是真实的吗？我们生活在稀缺性起到基础作用的世界和宇宙中吗？若不然，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丰裕和礼赠，那么货币何以变得如此不自然呢？

第2章

Chapter 2

稀缺的幻象

丰盈不减，英格兰的土地繁盛并不断扩张；金色的稻浪起伏；工坊和工厂林立，多达1500万的工人，是世上已知最灵巧、最欣然的；他们在这里；他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这里，他们实现的成果在这里，丰裕、热情盛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上：且看，某种施了魔咒的凶险法币已然产生，它说："不要触摸它，你们这些工人，你们这些工人头子们，你们这些闲人们；你们之中没有谁能触摸它，没有谁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好处；这可是施了魔咒的果实！"

——汤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古与今》

有人说，金钱或至少是对金钱的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为何如此？毕竟，金钱最基本的目的只是为了便利交易，换言之，金钱将人类的礼物与人类的需求联系了起来。是何种力量，是何等的穷凶极恶，使金钱适得其反，摇身一变而成了稀缺性的掮客呢？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里，大量的食物、能源和材料都被浪费掉了。世上一半人浪费掉的食物，足以养活另一半挨饿的人。在第三世界和贫民区里，人们缺少甚至买不起食物、住所和其他基本必需品。与此同时，大量的资源被投入战争、塑料垃圾，投入许多并不能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显然，贫困的产生并不是因为缺乏生产的能力。贫困的产生也不是因为缺乏帮助的意愿：很多人愿意接济穷人，喜

欢恢复生态平衡，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因为缺少资金而不能付诸实施。金钱全然无法连接礼物和需求了，这是为什么呢？

多年以来，按照传统观念，我认为答案是“贪婪”。血汗工厂为何要将工资压到最低？贪婪。人们为何要购买油老虎一样的多功能越野车（SUV）？贪婪。制药企业为何要压制研究，销售它们明知危险的药品？贪婪。热带鱼供应商为何要炸毁珊瑚礁？工厂为什么要将有毒废料排入河流？公司的蓄意并购者为何要掠夺雇员的养老金？贪婪、贪婪、贪婪！

我终于因为这个答案感到了不安。原因之一是，金钱起到了离析的作用，而离析是我们文明中流弊的根源。农业将世界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野生和驯化、人与自然、麦草与芜杂。早在彼时，贪婪这种老旧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这世界上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善与恶。通过消除恶，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世界和我们本身，都存在一些恶的东西，为了使世界变得安全和良善，我们必须除去这些恶。

与罪恶的缠斗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每一种制度中。在农业上，它消灭狼群，用草甘膦除去所有的杂草，杀灭所有害虫。在医学上，它与细菌作战，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斗争。在宗教上，它是与罪的斗争，或是与自我的斗争，或是与不忠或怀疑的斗争，或是与其外部投射的斗争，这些投射便是魔鬼、异教徒。这是净化和除秽的心态，是自我改善和征服的心态，是超越自然战胜欲望的心态，是为了善而牺牲自己的心态。最重要的是，它是对心性的控制。

一旦与邪恶的对决成功，我们将升入天堂。当我们消除了所有的恐怖分子，或为他们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时，我们便安全了。当我们发明出一种坚不可摧的抗生素，发明出对人体机能的人工调节机制后，我们将拥有完美的健康。当我们将犯罪变成不可能之事，用法律管制一切时，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社会。当你克服懒惰、冲动、嗜瘾，你将拥有完美的人生。在此之前，你必须更加努力。

同样，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由贪婪造成的。这些问题或在我们身

外，以贪婪者的形式存在，或在我们内心，以贪念的形式存在。我们喜欢将自己想象得不那么贪婪，或许我们有贪婪的冲动，但我们让这些贪婪的冲动处于掌控之中。不像有些人！有些人并不抑制他们的贪婪。他们缺乏一些你我皆有的重要品质，一些基本的礼仪，基本的善良。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坏”的。如果他们不能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将就于更少的欲望，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迫使他们屈从于更少的欲望。

很明显，贪婪的范式充斥着他人的判断，充斥着对自我的判断。我们对贪婪的愤怒和仇恨，隐藏着一种秘密的恐惧感，即我们的贪婪程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对邪恶的迫害中，伪君子往往最为狂热。将敌人外部化，为无处发泄的愤怒提供了发泄途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有必要的：强压怒火或将怒火转到自身，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的生活中也一度经历仇恨，经历了与自我的作战，经历了为善的挣扎，经历“我比他人混得好”的自吹。我坚信，人类和集体即将接近这样的时刻。贪婪最终会变成一个障眼物，它本身即是一种症状，而不是深层次问题的原因。通过强化自我控制控诉贪婪、与贪婪作斗争，即是强化与自我的斗争。这是与自然斗争的另一表现形式，以及与当前文明危机的其他根源进行斗争的表现形式。

在稀缺的背景下，贪婪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我们对当前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贪婪的假定：贪婪建立在“自我的故事”（Story of Self）之上。在宇宙中，受制于有敌意的或冷漠的力量，离析的自我始终处于灭绝的边缘，只是它可以控制这些力量时，才处于安全的状态。身处与我们自身疏离的客观宇宙，我们必须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根据离析的“自我的故事”，生物学和经济学都将贪婪写入了基本公理。在生物学上，贪婪是寻求生殖自利最大化的基因；在经济学中，贪婪是最大化金钱自利的理性行为人。若稀缺性的假设为假——它是对我们意识形态的投射，而非终极现实，那会如何呢？若如此，那么贪婪并未写生物学，它只是我们对稀缺性认知的一种症状。

贪婪反映了对稀缺性的感知，而不是稀缺性的现实。一个证据

是，富人往往没有穷人那么慷慨。根据我的经验，穷人常常会借给或者赠予对方一笔小数额的钱，按比例来讲，这相当于富人净资产的一半。这一经验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2002年，一个名为“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通过研究发现，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美国人将4.2%的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对于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这一数字是2.7%。最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皮傅（Paul Piff）发现：“与高收入的人相比，收入较低的人更慷慨，更有善心，更加信任他人，更喜欢助人为乐。”[1] 研究对象可以将资金匿名分配给他们自己或者一名同伴（同伴并不知道赠予者的身份）。皮傅发现，研究对象的慷慨程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是负相关的[2]。

虽然“贪婪的人会很富有”是个很诱人的结论，但“财富使人变得贪婪”的解释同样合理。为何如此？在富足的背景下，贪婪是愚蠢的；只有在稀缺的背景下，贪婪才是合理的。富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感知到稀缺性，他们比其他人更关心金钱。难道说，金钱本身也会产生对稀缺性的感知吗？难道说，几乎与安全同义的金钱，反倒带来了不安全感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均是肯定的。在个人层面上，富人在金钱上“投资”得更多，因此更难轻易地放弃金钱（轻易放手反映了对富足的态度）。在制度层面上，稀缺性已内嵌到金钱之中，它是金钱的创造和流通的直接后果。

稀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公理之一（第二个基本公理是，人们会自然地寻求理性自利的最大化）。二者皆伪，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仅在狭窄的范围内成立。我们却像井底之蛙一般，认为它们放诸四海而皆准。我们所认为的客观真实，实际上只是我们自身的条件在“客观”世界中的一个投射。我们沉浸在稀缺性之中，以至于将它认作了现

1 朱迪思•华纳（Judith Warner），“慈善的鸿沟”，《纽约时报》，2010年8月20日。
2 皮傅等，“拥有更少，付出更多：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展望》，2010年11月，99（5），771~784页。

实的本质。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我们体会到的、无所不在的稀缺性，只是生造出来的罢了，是我们的货币体系、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感知生造出来的。

我们的货币体系、所有权体系，以及一般的经济体系，都反映了同样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已经将稀缺性的认识包纳在其中。这是“离散的、离析的自我”，笛卡儿的自我：这个心理学的气泡被放逐到了冷漠的宇宙中，它寻求拥有、控制，独揽尽可能多的财富，但注定要遭受不幸，因为它无法体验到相互联系所带来的富足，因而产生了欲壑难填的体验。

在我的读者中，有些人认为，除非人口大规模减少，否则人类无法与其他生命建立起和谐的共存关系。因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中”的说法，有时会引发他们近乎敌对的不快。他们引述“石油峰值”（Peak Oil，由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提出，哈伯特认为，当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后，其产量就会下降——译者注）、资源枯竭、全球变暖、农田垦尽，以及我们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即要维持生存所需的地域面积），据此认为，若保持当前的人口水平，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地球将无法继续维持工业文明。

作为神圣经济体远景的一部分，本书为这种担忧提供了答案。更重要的是，本书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例如，如何从当前的状态过渡到神圣经济的状态。从现在起，我将给出部分答案，提供一个寄予希望的原因。

今天，人类活动已使地球不堪重负。化石燃料、地下蓄水层、土壤表层，吸纳污染的能力，使生态圈保持活力的生态系统，均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殆尽。当前的一切挽救措施实在太少，且为时已晚，相比所需要的量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人类的大部分活动要么多余，要么是不利于人类福祉的。首先想想军火工业和战争中的资源消耗：一年约2万亿美元，庞大的科研机构，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的生命，都消耗在了无谓的、我

们自设的需求之上。

想想美国的住宅产业。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巨大的独栋别墅并未满足人类的真实需求。在某些国家，独栋别墅这种规模的建筑可以容纳约五十人。洞穴一般巨大的起居室无人使用，因为这种非人性化的规模让人感到颇为不适，人们转而寻找舒适的休憩室和早餐角（一般设于饭厅一角吃早餐的地方——译者注）。于是用以建造巨型房子的材料、能源和保养成了对资源的浪费。郊区的布局或许更显浪费，它使公共交通无法开展，人们必须在开车上花费大量的时间。

想想食品行业。巨大浪费体现在各个层面。根据一项政府研究，农场到零售店的损失约4%，零售店到消费者的损失是12%，而消费级的损失则为29%[3]。此外，大片农田被用来生产生物燃料，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排除了劳动力密集型的间作（在同一块土地上间隔种植多种植物——译者注），排除了其他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密集型的生产技术[4]。

这些数字表明，即使是已有七十亿人的世界，仍大有潜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人均时间）在粮食种植上，这与过去的两个世纪的趋势相反。很少有人意识到，与传统农业相比，有机农业的产出可以每公顷而不是每工时[5]高出2~3倍，甚至更多。精耕细作的生产率甚至更高（劳动力密集程度更高）。如果你喜欢精耕细作，并认

3 布茨比等，“超市损失的估计”，《经济信息公告》，第EIB-44号，26页，2009年3月。

4 通过阅读F·H·金1911年出版的《四千年以来的农民：中日韩的永续农业》（Farmer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您可以对农业的潜力所有了解。《中日韩的永续农业》一书阐述了在没有机械化、农药、化肥的条件下，中日韩这些地区是如何用少量的土地维持庞大人口的。中日韩依靠的是先进的轮作、套种，以及农场作物、牲畜和人之间的生态关系。农业毫无浪费，包括人类粪便也被利用无遗。农业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作者认为，这种农业通常是以悠闲的步调进行。1907年，在食物上，日本的五千万人口几乎是几乎自给自足的；在某些地区，仅凭一个占地三英亩的农场，中国的土地便能养活四五十人的家族，到1790年，中国的人口便与今日的美国人口数量相当了！

5 拉塞勒等，《有机绿色革命》，第4页引用了许多支持该观点的研究。如果你有相反的看法，请留意，那些很多认为有机农业的收益甚少的研究，都是由一些缺乏有机农业经验的人操作的，而且进行实验的土地早就因为数十年的化学耕作变得贫瘠不堪了。有机生产方式不太容易经得起对照研究的考验，因为它涉及农民和土地之间的长期关系。只有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有机农业的好处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为大多数人会因为与土壤更加亲近而受益，那么这是个好消息。对于一个典型的郊区的花园土地，或许只有一千平方英尺，只需一周几个小时的劳动便能满足一个家庭大部分的蔬菜需求；将劳动的时间加倍，就能够提供大量的主食，如土豆、红薯和瓜类。相比之下，庞大的、横贯大陆的货运系统，将加利福尼亚州的生菜和胡萝卜运往美国其余地区。这个货运系统是否真有必要？它改善生活了吗？

另一种浪费来自于劣质的建设和许多制成品的计划性淘汰。目前，使得制造品经久耐用、便于修理的经济激励措施屈指可数，不利因素却不少，这导致的荒唐结果便是，购买新家电往往比修好旧家电更加便宜。这是由我们的货币系统导致的最终结果，而在神圣的经济体中，这一情况将得到扭转。

在我所住的街道，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割草机，只是为了每个夏天用上区区10个小时。每个家庭的厨房都配有搅拌机，只是为了每周使用不超过15分钟。约有一半的汽车停在街上，无人来开。大多数家庭都有自己的篱笆修剪工具、电动工具、健身器械。然而，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处于闲置状态，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多余的。如果汽车减半，割草机减至十分之一，整个街道只留两三台跑步机，我们的生活质量将保持不变。事实上，我们的生活质量将更高，因为我们将有机会交流和分享[6]。即使是消费率无端高涨的今天，世界上也有约40%的工业产能处于闲置状态。即便这一数字提高到80%，甚至更高，人类的幸福感也丝毫不会减少。我们会失去只是污染、只是工厂生产的单调乏味。当然，我们会失去大量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对人类福祉的贡献甚小。我们可以雇佣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在地面上挖洞又填洞而毫无损失。或者，他们可以投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照顾病人和老人、恢复生态系统，以及今天因为缺乏资金而不幸未得满足的需求。

6　不幸的是，我们许多人的心灵都受了伤，我们选择了不合作、不共享，但这却使我们在离析的地狱和独立的幻觉里陷得更深，直到其真面目被揭开。随着各种危机交汇收敛，这种情况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渴望恢复社群的呼声将越来越大。

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一个没有杂乱郊区、独栋别墅林立景象的世界，一个没有堆积如山的过度包装的世界，一个没有仅种植单一作物的巨型机械化农场的世界，一个没有高耗能超霸级商店的世界，一个没有电子广告牌的世界，一个没有堆积成山的一次性垃圾的世界，一个不存在过度消耗无人需要的消费品的世界，绝非是一个贫穷的世界。我不同意环保主义者所说的，我们将不得不消耗更少的资源凑合着过。事实上，我们会拥有更多：更多的美、更多的社群、更多的成就、更多的艺术、更多的音乐；实物的数量虽会减少，但其实用性和美观性将更为卓越。今天，廉价的商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它们虽然数量巨大，却只会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低劣。

神圣经济的所带来的部分治愈作用，会弥合我们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鸿沟。为与其他事物的神圣性保持一致，我主张拥抱唯物主义，而不是避之不及。我们对事物的喜爱只会增，不会减。我们会珍惜物质财富，尊敬其来源之所、将往之处。如果你有一只珍贵的棒球手套或一根钓竿，或者你的祖父拥有一套五十年来保存完好、他最为珍视的木工工具，你或许会知道我所言何意。这便是我们尊敬我们所珍视之物的方式。若将同样的关心和思量灌注到我们生产的一切物品上，那世界将会是何等光景？如果每一位工程师都将他的爱融入其作品之中，那会如何？在今天看来，这样的态度是不经济的；将事物视作神圣的，极少会成为与人们的财务利益休戚相关的事。既然你可以用低价够买一只新的棒球手套或一根新的钓竿，为什么要过于爱惜你的旧工具呢？我们生产的东西太过廉价，是它们贬值的一部分原因，它将我们置于一个廉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普通的、消耗性的。

在高度的富足中，即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也生活在无所不在的焦虑之下，渴望着“财务安全”，千方百计地躲避稀缺性。我们根据可以“买得起”的物品做出选择（即使那些选择与金钱无关），我们通常把自由与财富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我们追求财务上的安全时，我们发现金融自由的天堂只是海市蜃楼，我们接近它，它就退却，

而奴役便在这种追逐中产生了。焦虑永远存在，稀缺与焦虑之间只有一场灾难之隔。我们将这种追逐称作贪婪。诚然，它是对稀缺性感知的反应。

我们体会到的稀缺性是生造的、虚幻的。对此，我想提供另一则证据，虽然这则证据旨在抛砖引玉，而非盖棺定论。教科书上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条件下的人类行为。经济领域的扩张因此是稀缺性的扩张，即稀缺性侵入了曾经富足的生活领域。经济行为，特别是用货币交换商品的行为，扩展到了之前金钱交易并不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举例而言，在上个十年中，瓶装水是零售增长的主力军之一。如果说地球上有一种物品十分丰富，丰富到近乎无处不在，那么它便是水。但是今天，水变得如此稀缺，以至于我们必须付钱购买了。

在我的一生中，儿童护理一直是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领域。当我年轻的时候，朋友和邻居在其子女放学后，照看对方的小孩几个小时是常事，这颇具村庄或部落时期孩童们自由疯跑的遗风。我的前妻帕媞曾经动情地讲到了她在中国台湾的乡下的童年经历，那时，孩子们可以到任何邻居家中，晚饭时间在邻居家吃上一碗饭。社群照料着这些孩子们。换句话说，儿童护理是丰富的，而开设课后日托中心是不可能的。

要使某物成为商品，这种物品首先必须是稀缺的。按照定义，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会进入货币领域、商品领域和服务领域。通常，我们将经济增长与财富的增加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也可以将经济增长视为一种贫困、一种稀缺性的增加。我们未曾想象过要付钱购买的物品，今天却必须付钱购买了。用什么来支付呢？用金钱，当然是用金钱——它是靠我们的奋斗和牺牲所获得的。如果有一件物品是稀缺的话，那它必定是金钱。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低水平的（有时高水平的）焦虑中，恐惧没有足够的钱。而富人们的焦虑则说明，任何数量的钱都不会是“足够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对“超过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这样的事实表示愤慨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低收入可能

意味着某个人的需求在货币经济之外得到了满足，例如通过传统的互惠礼物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只是将非货币的经济活动扩展到了商品和服务领域，其结果是造成稀缺、竞争、焦虑的心态，对西方人而言，这种焦虑是如此熟悉；但对那些贫穷的狩猎采集者或是维持生计的农民而言，却又如此陌生。

几个世纪以来，生活和世界被货币化了，一切都被逐步商品化了。而后续章节将对其机制和意义进行探讨。当一切都受制于受金钱时，金钱的稀缺性就会使一切事物变得稀缺，包括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基础。这便是奴隶的生活——行动受迫于生存的威胁。

也许，奴役最深层的迹象是时间的货币化。与我们的货币系统相比，这一现象的根源远更深，因为它依赖于事先已被量化的时间。动物或孩子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石器时代的人民也是如此，他们时间观念通常非常宽松，他们很少会赶时间。原始语言往往缺乏时态，有时甚至没有“昨天”和“明天”这样的词汇。在乡村以及更加传统的文化里，原始人民对时间相对漠不关心的态度保留至今。生活在大城市里，我们总是在赶时间，因为时间是稀缺的。但在过去，时间总是充裕的。

一个社会的货币化程度越高，其公民就越焦虑、越着急。世界上一些地区仍然存在于货币经济之外，仅够维持生计的农耕依然存在，邻里互相帮助，生活节奏更慢，不匆促。在墨西哥的乡村，事情总是挨到明日。海伦娜•诺伯格•霍奇（Helena Norberg-Hodge）的电影《远古特征》（Ancient Futures）采访到了一名拉达克农妇。她在讲述她城里的姐姐时说：“她有一口电饭锅、一辆汽车、一部电话——各种节省时间的设备。然而，当我拜访她时，她总是那么忙，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聊天。”

对于动物、儿童或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们，时间是无穷的。今天，时间的货币化使其受制于稀缺性，其他万物也是一样。时间即生命。当我们体会到了时间的稀缺时，我们也体会到了生命的短暂与穷困。

在成年人的时间观念被强加给孩童之前，那时的孩子们欢心雀跃地

参与一个又一个活动。若你在此之前出生，也许你还记得主观上童年的永恒性，无限延伸的下午，以及遭受日程和时钟的暴虐之前，那永无止境的自由生活。约翰•泽赞（John Zerzan）写道："时钟，使时间稀缺，使生命变短。"时间一旦被量化，就可以购买和出售。与金钱有关的一切商品，其稀缺性都会被加诸时间之上。俗语道，"时间就是金钱"，这与隐喻"我耗不起那时间"所隐含的时间特质不谋而合。

如果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丰富的，那么更加丰富的则是精神世界：歌曲、故事、电影、思想，以及其他知识产权名下的一切人类思维的创造。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在几乎零成本的条件下复制和传播这些创造物。因此，我们必须将人为的稀缺性强加到这些创造品之上，以使它们停留在货币化的领域。行业和政府通过版权、专利和加密标准推行稀缺性，允许产权的持有人通过所有权获利。

因此，稀缺只是一种幻象，一种文化上的生造罢了。但是，我们几乎全然生活在一个被生造出来的文化世界里，我们对这种稀缺性的感触是真实的——今天，有近十亿人营养不良，每天有五千名儿童死于与饥饿相关的疾病。因此，我们对这种焦虑和贪婪的稀缺性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一件物品丰富时，人们都愿分享它。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虽然它是由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文化、我们深刻而无形的故事构成的。我们对稀缺的感知，只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罢了。在稀缺的幻象这一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化的过程中，金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钱将丰富变成了稀缺，滋生了贪婪，但这种情形并不是金钱本身导致的。只有我们今天使用的那种金钱，那种能够体现我们文化中的自我意识的金钱，体现了我们无意识的神话，以及几千年来与大自然形成的敌对关系的金钱，才是罪魁祸首。今天，这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且让我们审视，金钱是如何折磨我们的思想和行事方法的，如此，我们便可以想见，货币系统会如何随思想和行事方式一道改变。

第3章

Chapter 3

金钱与心性

当一切为利己主义隔离，四野惟尘；

风暴来临，万物滓淤。

——本杰明•康斯坦特

金钱具有引发集体性稀缺幻觉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影响我们认知的唯一途径。本章将探讨金钱对心理和精神的深层次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宗教、哲学，甚至科学的方式。金钱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观念、认知和身份之中。这就是为何，在货币引发危机时，现实的结构似乎也随之解体——世界正在分崩离析。然而，这也引起了乐观，因为货币是一种我们有能力改变的社会架构。什么样的新认知、新集体行动能够与新式的货币为伍呢？

然而，到了第3章这里，我仍未给出“货币”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按照金钱的功能为其下定义，如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因此，他们将货币的起源日期定得非常早，认为五千年前，当粮、油、牛、黄金等具有上述功能的标准商品出现，货币就产生了。但是，我所指的货币则完全不同。这种货币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希腊。可以说，这是金钱超越纯粹的商品，成为独特类别而存在的头一遭。自那以后，我们不仅可以说清货币作用何在，而且可以说清楚货币为何物了。

经济学家的民间野闻坚称，发明铸币是为了给商品金属以重量和

纯度上的保证。这些故事称，铸币的价值全部来自于铸造它们所使用的金或银。事实上，与货币的易货起源说和稀缺性假说一样，这种铸币起源说只是经济学家的妄言罢了。只是这种虚妄的说法起源于杰出人士罢了。亚里士多德写道：

> 由于各种生活必需品不易随身携带，因此，人们同意在与他人的交易中使用一种物品，这种物品本质上是有用的，并且很容易应用到生活之中，例如铁、银和类似物品。这种物品的价值最初是按照尺寸和重量度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省去称重和标称重量的麻烦，人们在其上加注了一些印记[1]。

这种解释看似颇为合理，但历史证据却与之相悖。第一枚硬币铸于利迪亚（Lydia），它是由金银合金制成的，但其品质差异非常大[2]。铸币迅速蔓延到了希腊，在那里，虽然硬币的重量和成色相当统一，但铸币的价值通常要高于铸造所用的银的商品价值[3]。事实上，一些城邦（包括斯巴达）用如铁、铜、铅、锡等贱金属铸造硬币：这些铸币的内在价值微不足道，但仍旧有货币的功能[4]。无论如何，冲压铸币的价值（按照历史学家理查德•希福德的说法，我们称之为“法定价值”）大于同样的、无冲压印记的金属片。为何如此？这种印记承载了何种神秘力量？它并不是重量和成色的保证，也不是统治者或宗教权威的个人力量的延伸。希福德观察到，“封印标记似乎体现了封印所有者的权力，然而铸币标记并没有将铸币与其来源之间用一种想象的附属物连接起来”[5]。相反，铸币标记

> 证明了这块金属具有一定的价值。铸币具有价值，并不是通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部分。
2 希福德，《货币与希腊早期思想》，132~133页。
3 同上，137页。
4 同上，139~145页。
5 同上，119页。

过将权力（魔法力或其他）传递给一块金属而完成的，而是将一种能够识别的形式强加于这块金属，赋予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事物类型，一种有据铸币的类型……这种铸币标记……实际上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志[6]。

标志并无内在的影响力，其影响力是从人类的诠释中推衍而来的。只要社会对标志的诠释是一致的，标志或符号便具有了社会影响力。出现在古希腊的新式货币，就是从社会认同中获得了这种价值。货币上的标记，是它获得价值的象征[7]。这种认同是货币的本质，这在今天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大多数货币都是电子形态的，货币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一方厕纸无异。早在古代希腊时代，货币便成为一种认同。希望进行黄金铸币改革的改革家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希望回归的过去，那段“真金白银”的好时光，除了短暂的、几近空想的历史时刻外，从未真正存在过。我坚信，人类货币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不会是返回货币的早期形式；相反，无意识地体现了人类认同的货币，将有意识地体现这种认同。

五千多年来，货币已从单纯的商品，演进为金属上印下的符号，最终发展成了今天纯粹的符号。神圣经济学并不是要撤销这种演化，而是要完成这种演化。使货币成为货币的一致协议是说，货币并不是独立于我们的文明所赖以运转的标志和符号系统而存在。货币体现了我们对地球、物种、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的一致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科技上的进展以及对自然领域的征服这样的“进步”是神圣的。我们货币系统也支持这些目标。现在，这些目标正在发生变化，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元故事”（meta-stories）：自我的

6 希福德，《货币与希腊早期思想》，119页。

7 唯一的例外是用于外贸的铸币——社会协议范围之外的铸币。这种铸币的确依赖于所用金属的内在价值。即使如此，就价值的赋予而言，社会对价值的广泛认知是必要的，因为作为金属的金银，本身用处不大。

故事、人们的故事和世界的故事。而被称为货币的一致认同，只是元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本书的目的是讲述新的“货币的故事”，同时本书将阐明这种法定符号应该体现何种认同，从而使货币成为美丽世界的盟友而非敌人。

古希腊是象征性货币的起源之地，同时，此地也诞生了个人的现代观念、逻辑和理性的概念，以及现代思想的哲学基础，这绝非偶然。理查德•希福德教授在其学术力作《货币与古希腊精神》中，理探讨了货币对希腊社会及思想的影响，阐明了使货币变得独一无二的特性。在这些特性中，货币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是均质、客观的，是一种通用的目的和手段，是无限的。这种新的、独特的影响力一旦进入世界，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影响已深植到了我们的信仰、文化、心理和社会之中，我们几乎习以为常，更遑论对它们提出质疑了。

货币是均质的，即便铸币与铸币之间有物理差异，但作为货币，它们是相同的（如果它们的面额相同的话）。或新或旧，或磨损或光滑，一德拉克马硬币都是等价的，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这是闻所未闻的。据希福德的观察，在上古时期，权力是通过独一无二的护符授予的（例如权杖据说是从宙斯那里流传下来的）；但金钱却相反：它的权力是由标准的、与纯度和重量不相干的符号授予的。品质并不重要，数量才重要。货币可以兑换成所有物品，它也因此将自身的特性传染给了这些物品，将其他物品变成了商品——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这些物品就被视为是相同的。重要的只是这些物质在数量上的多寡。希福德说，货币“增加了一般物品之间的同质之感。”所有的事物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都可以卖得货币，而卖得的货币又可以购买任何物品。

在商品世界里，所有的物品都等价于可以替换它们的金钱。物品的首要特性是“价值”，这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从“你总是可以再买一个”这句话中感受到疏远、失望。你能感受到价值如何促进了反唯物主义（antimaterialism），促进了一种同物理世界的疏离吗？在这个物理世界中，每个人、每个地点、每件物品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难怪这

个时代的希腊哲学家开始将抽象提到了比真实更高的地位。在柏拉图发明的、比感官世界更为真实的、完美的形式世界里，抽象达到了巅峰。难怪到了今天，我们对待物理世界的态度是如此傲慢。浸淫于货币的意识达两千年之后，对于每种事物都能被金钱所替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如果我们破坏了地球，我们只要买一个新的就好了”一样。

我将本章命名为“金钱与心性”。心性与货币的信托价值非常类似，是一种驾驭物质载体的抽象之物。与金钱的信托特性一样，心性的这种概念作为一种离析的、非物质的存在的本质，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它导致了无形的意识以及无形的精神。引人关注的是，在世俗思想和宗教思想中，这种抽象变得比物质的载体更为重要，正如一件物品的“价值”比其物理特性更为重要一般。

在导论中，我提到了这样的思想，即我们已经按照货币的形象塑造了一个神明：一个无形的力量，它移动事物，使世界变得有生气，是一只调整着人类的活动的“看不见的手”。它虽然是非物质的，但却无处不在。上帝和灵魂的这类属性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哲学家那里。金钱掌管他们的社会之时，便是他们的思想形成之时。据希福德所言，他们首次区分了本质和现象，以及具体与抽象——在荷马（Homer）时代，这个区别并不存在（虽然是隐含的）。从阿那克西曼德（Heraclitus）的“逻各斯”（logos，意为理性）到毕达哥拉斯学说的教条“一切皆数”，早期的希腊人强调了抽象的首要地位：一个看不见但却号令天下的原则。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文明的DNA之中。与金融部门相比，实体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形见绌的地步，金融衍生品的总价值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倍之多，社会最丰厚的回报都归于了华尔街的巫师们，而他们做的仅仅是操纵符号罢了。对于坐在电脑前的交易员而言，确如毕达哥拉斯所说：“万物皆数。”

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导致了精神胜于物质，其表现形式是，“经济改革当然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但更重要的是人类意识的转变。”我认

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依据的是意识和行动的错误二分法，其根源是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在更深的层次上，金钱是与意识交织的，二者水乳交融。

货币的抽象性是在巨大的“元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若没有文字和数字形式的抽象作为基础，货币就不会发展起来。数字和标签将我们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让我们的头脑事先学会了抽象思考。使用名词意味着许多事物被归为了一个物类，“一式五份”意味着每份都是一个单位。我们开始将事物作为一种物类的代表，而非独一无二的存在。虽然货币并不是第一种标准的、通用的物类，但是它大大加快了抽象物类在概念上的压倒性。随着标准化商品贸易的开展，货币的同质性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这种标准化尚且粗糙；然而今天，制造品几乎完全相同，以至于货币的谎言变成了真理。

在考虑未来货币的形式时，应该认识到，金钱具有将它触及的一切事物同质化的本领。也许，货币的使用应仅限于标准的、可量化的、通用的事物；也许，不同形式的货币甚至非货币应该参与到私人的、独一无二的物品的流通中去。我们只能根据标准的数量来比较价格，因此，当我们得到的不止是数量，还有一些不可度量的特质时，我们就得到了额外的、我们并未支付的奖金。换句话说，我们收到了一份礼物。我们可以购买艺术品，但如果艺术品是纯粹的商品，那么我们已经花了太高的价钱；如果它是真正的艺术，那我们付出的钱实在是太少了。同样，我们可以买来性爱，但买不来爱情；我们可以买来卡路里，但买不来真正的营养。用无法度量的、无价的事物来衡量，我们太贫穷了。我们的贫穷源于我们无法购买不可度量的物品，而对于金钱能够购买到的东西，我们已经买得太多了（分配是如此不均衡，很多穷人买不起这些金钱能够买到的物品）[8]。

正如货币均质化了它触及的一切事物，货币也同质化并非人格化了

8 过量体现在持续的“产能过剩”上。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困扰着几乎每一个行业，这正是为何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中通常会包括对需求的刺激。

其使用者："它促进了脱离其他关系的那种商业交易。"9或者说，人成为单纯的交易参与方。给予和接受礼品的动机是多样化的；与这种多样化相反的是，在纯粹的金钱交易中我们都是相同的：我们都希望能得到最好的买卖。人与人之间的同质化，是货币产生的结果，但经济学却认为它是货币的起因。从易货交易开始，货币演进的整个故事一开始便假定货币要最大化自利。于是，人们被假设成为是相同的。若没有价值标准，那么不同的人会需求不同的物品。当金钱可以交换任何物品时，所有的人都想得到一种东西：钱。

希福德写道："金钱剥去了所有的私人联系，是一种滥交，它能够同任何人交换任何东西，对所有非货币的人际关系漠不关心。"[10] 与其他物品不同的是，货币不会留有其来源的痕迹，那些货币的经手人已经无据可查。金钱看似具有礼物的部分特征，但每个人获得的金钱都是一样的。如果我在银行里存有两千美元，一半来自我的朋友，另一半来自我的敌人，我不能够选择花掉敌人的一千元而存下朋友的一千元。每一美元都是相同的。

很多人拒绝把业务与友谊混为一谈，警惕着金钱和私人关系之间的根本冲突。金钱去掉了关系中的人格，受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两个人仅是"交易双方"的关系而已。如果我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以你为代价，那我们如何能成为朋友呢？在高度货币化的社会中，钱几乎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还有什么样的私人礼物能够建立起友谊呢？

追求利润的动机与追求慈善的个人动机是对立的，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有了"这无关个人恩怨，只是生意而已"这句话。今天，一场商业伦理运动和投资伦理运动展开了，它旨在解决爱与利之间的对立。然而，即便其动机是真诚的，这种努力往往会异化为公关活动、"绿洗"（green-washing，为了提升形象而进行的环保宣传——译者注）

9　希福德，《金钱和希腊早期思想》，151页。

10　同上，155页。

或自以为是。这绝非偶然，合乎道义的投资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对此展开讨论。现在，你只需要注意到你对此油然而生的怀疑，以及对“行善者，百事遂”这种宣称的怀疑就好。

当我们遇到看似利他主义的企业，我们会想，“这会有什么收获呢？”他们会通过这个偷偷赚钱吗？他们会不会向我要钱？“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钱”，这样的怀疑普遍存在。我们快速窥探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金钱动机，当有人行事慷慨、天真大方，金钱动机显然不存在时，我们会被深深地打动。有人居然予而不求！这似乎是非理性的，甚至如奇迹一般。像刘易斯•海德所说的那样，“在高利贷的统治下，柔心之人的多愁善感，感动着我们，因为它触及了那些我们已然失却的东西[11]。”

对这种背后利润动机的怀疑近乎普遍，它反映的是金钱成了一种普世目标。想象你回到了学校，与职业顾问交谈，讨论你有何天分，如何靠天分谋生（即将它们转换成金钱）。这种习惯的思想流弊颇深：当我十几岁的儿子吉米向我展示他创作的电脑游戏时，我发现自己有时会思考他该如何商业化这些游戏、他要如何提高编程技巧使游戏的销路更好。任何时候，当有人冒出了令人兴奋的创意时，“我们如何从中赚钱”这一想法都会紧随其后。当利润变成了艺术创作的目的，而非单纯的副产品时，创作便不再是艺术，而是对艺术的背弃了。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将这一原则扩大到了一般的生活中，并警告说，“你工作是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你选择休闲是为了将宝贵的业余时间奉献给你的女神。你会问，我是谁，我凭什么提醒你，女神要么要求你的整个时间都为她效劳，要么不为她效劳？”[12]

金钱作为一种普世目标，已经深植于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谈论如何将创意“资本化”，我们使用“无偿”一词作为“无用”的同义词，而它的字面意思是带着感谢接受（而不是要付钱）。金钱也被根植于经

11 海德，《礼赠》，182页。
12 格雷夫斯，《白色女神》，15页。

济学之中，根植于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利等同于金钱的假设之中。金钱甚至根植到了科学之中，它是寻求生殖自利的密码。至此，金钱作为一个普世目标的概念已经确立了。

世间竟有一种作为生命的普世目标而存在的事物（无论是金钱或别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想法大致与金钱同时起源，也许正是金钱让哲学家明白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曾用金钱的隐喻明确提出，智慧是一种普世的目标："我们应该与其他物品（快乐与痛苦）交换的，只有一种通货——智慧[13]。"在宗教中，这对应于一种对终极目标的追寻，如救赎和启蒙，而所有的良善之物皆源于此。这与金钱的目的是何其形似！如果我们放弃追求单一的、抽象的、我们自认为是解决其他问题之钥的目标，会对我们的心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如果停止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无休止的自我改进，那将是何种情形呢？只是嬉玩，只是存在，又如何呢？与财富一样，启蒙是一个无止境的目标，追求财富和启蒙都会造成奴役。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追求之物，不过是人们真正心仪的、多样化的物品的一个虚妄的替代品罢了[14]。

在完全货币化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是商品或服务。金钱将多重的世界转化为一个整体，一个"单一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度量，可用来交换几乎所有物品。"[15] 阿派朗（apeiron，意为无限）、逻各斯（logos，意为理性）以及类似的概念，都是孕育万物的统一体（unity）的各种版本。一生万物，万物归一。它与中国古代"道生阴阳，阴阳生万物"中"道"的概念近乎相同。有趣的是，道教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宗师老子的在世时间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大致相同——这大约是中国首次产生铸币之时。无论如何，今天的情形是"钱

13　柏拉图，《斐多》（Phaedo），69页，a部分。

14　联系是今天未满足的最大需求，既包含与他人的联系，也包含与自然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钱的抽象性和非人格性削弱了上述两种联系。如果把灵性看作一种远离世界便可做到最好的个人追求，那么它也会削弱上述两种联系。我们能够想出一种起相反的作用的货币吗？

15　希福德，《货币与希腊早期思想》，150页。

生万物”。不论你要在这世上创造什么，你都得从拿钱投资开始。当你完成项目后，再将项目卖掉。钱生万物，万物归钱。

因此，金钱不仅仅是一种普世目的，它同样是一种普世手段。金钱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既是一种普世手段，也是一种普世结果，而人们无法拥有太多的金钱。至少我们就是这样看待金钱的。我亲历了创造出特殊社群或者筹划其他项目的研讨会。令人沮丧的是，这些事永远无法付诸实施。“我们资金从何而来呢？”金钱是决定我们将要创造何物的关键因素，这不难理解：毕竟，金钱可以买到任何物品，可以诱发人们做任何事情。“万物皆有价。”金钱甚至能够购买无形资产，如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和神圣的商誉（金钱至少可以买来宗教权威的青睐，当然，这是次优之选）。我们习惯于将金钱视为我们所有欲望的关键。当（且仅当）你有拥有金钱时，你认为你可以实现多少个梦想呢？至此，我们把梦想抵押给了金钱，将金钱从手段变为了目标。

我并不主张取消货币。但货币已经超出了适当的范围，变成了达到目标的手段。但是，达到目标本不应受到货币的均质化和去人格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货币已经成了普世手段，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于是变成了遥不可及的，不管我们有多少钱，我们只能买到这些东西的赝品。解决的办法是恢复金钱的功能。确实有一些物品，它们只能用金钱创造出来，或者只能用等价的手段，通过协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就其神圣的形式而言，货币是故事的展开，是分配角色、汇聚意志的实体协议。在描述了神圣经济中货币的特征之后，我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因为对金钱的购买范围没有明显的限制，我们对金钱的欲望往往是无限的。对货币欲求无止境的情形，在古希腊人那里比比皆是。在货币出现的早期，伟大的诗人和改革家梭伦（Solon）发现，“富有对人而言是无止境的，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希望加倍富有。”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写道：货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东西（如面包、性爱等）终有餍足，而金钱独无。

“多少钱才算够？”某个亿万富翁的朋友问他，亿万富翁被难倒了。

究其原因，再多的钱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用金钱来满足的需要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与其他使人成瘾的物质一样，金钱虽然减轻了欲壑未平的疼痛，但却不能填平欲壑。要减轻痛楚，需要加大剂量，而剂量的增加没有尽头。今天，人们用金钱作为交际、激动、自尊、自由等的替代品。“如果我有一百万美元，我会拥有自由！”多少才华横溢的人牺牲掉了自己的青春，希望提早退休过上自由的生活，可是临到中年才发现，他们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交易媒介虽是货币的主要功能，它却以可交换的货物为限，而我们对这些货品的欲望终有餍足。只是当货币拥有了价值储藏这一额外功能时，我们对金钱才有了无尽的欲求。因此，我要探讨的一个想法是，将货币的交换媒介功能与价值储存功能区分开来。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获得财富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积累，一种是为了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16]。他认为，前一种获取财富的方式是“不自然的”，而且没有止境。

与实物不同的是，货币的抽象性使我们能够拥有无限多的货币。在指数式的增长中，区区一个数字代表了整个经济规模，而经济学家很容易轻信这样的增长是可以永久持续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量被加总为一个数字，而数字的增长极限是什么呢？我们迷失在了抽象之中，忽略了与发展相适应的自然和文化的极限。按柏拉图所说，这种抽象被我们构造得比现实还要真实，即便实体经济一蹶不振，华尔街也岿然不动。“价值”是物品的货币本质；这种抽象的、均一的本质，降低了世界的多元性。所有的一切都被简化为了价值，便产生了“世界与数，皆为无限”的错觉。在某个价格上，你能够买到任何东西，甚至是濒临灭绝的动物的毛皮[17]。

隐含在无限的货币之中的，是另一种无限性：人类疆域的无限性，

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部分。

17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一个悖论，正如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但我们正在耗竭有限的生物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部分的超额生产和消费并不是为真实需求服务的，而是由稀缺性的感知、存在的寂寞感驱使的。对稀缺性的感知和存在的寂寞，源于自我与自然和社群的离析。

属于人类的那部分世界的无限性。买卖什么样的物品能够换得金钱？我们买卖产权、买卖我们拥有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属于我们的东西。科技不断扩大了人类的疆域，制造出可供拥有的产品，而这些物品是过去从未得到的或想象不到的：深埋于地球深处的矿物质、电磁频谱的带宽、基因序列等。技术扩展了我们能够企及的领域，产权意识也同时发展——土地、水权（water rights）、音乐、故事都被纳入了可供拥有之物的疆域内。金钱的无限意味着可供拥有之物的疆域可以无限增长，于是人类的命运成了征服宇宙，将所有的一切都纳入人类的疆域之中，使整个世界为我们所有。这命运便是我所描述的飞升的神话（The Myth of Ascent）的一部分，它是大众的故事（Story of the People）的一部分。如今，这个故事倏然过时，我们需要创造与新故事相适应的新货币体系，以取代旧的货币体系[18]。

我已经探讨过，货币的特质并不一定是坏的。货币作为一种普世手段，将它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均匀化或标准化，从而使人类能够创造奇迹。货币在科技文明的崛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许与技术一样，这一强有力的创作工具从未以真实面目被使用。货币促进了标准化事物的发展，如机器零部件和微芯片的，但我们希望我们的食品也是同质的吗？货币的非人格性促进了遥远社会距离的合作，助我们协调了以百万计的人类劳动，而这些人大多相互陌生，可是我们希望与四邻街坊的关系也是不近人情的吗？货币作为一种普世手段，几乎能够使我们为所欲为。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它成为唯一手段，以至于没了它，我们几乎什么都干不了吗？随着人类涉足了一种刻意的、有意识的新角色，掌握金钱这一工具的时刻已经来临。

18 对于界定我们文明的其他故事——“孤立和离析的自我”，这同样适用。通过打碎私人联系，我们的货币体系体现了这个故事，它将我们投入到竞争当中，将我们与社群和自然割裂开来。

第4章

Chapter 4

产权的烦扰

倘若首先到达天堂的一群人像我们在地球上一样，在天堂里设立产权，并瓜分这种绝对的所有权，那天堂会是何等景象？

——亨利•乔治

人没有创造地球，但却拥有占有地球的自然权利，他无权将地球的任何部分作为他的永久财产；地球的造物主未曾开设土地管理局，第一张土地所有权证也不是由它签发的。

——托马斯•潘恩

占有的驱策

我们生活在一个离析的年代。我们与社群、自然、地缘的联系相继解体，我们被贬谪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这些联系的缺失不仅是财富的减耗，更是存在的减损。我们体会到的贫弱——与社群和自然的割裂，是我们的灵魂的贫弱。与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哲学、心理学、制度性宗教的假设相反，本质上，我们并不是拥有关系的、离析的个体。我们就是关系。

我曾经听说，马丁•普莱西泰尔（Martín Prechtel）如此讲述他在危地马拉的村庄："在我的村庄，如果你带着生病的孩子去巫医那里，你一定

不会说‘我很健康，但我的孩子生病了’。你会说，‘我的家病了’。如果那孩子是你的邻居，你会说，‘我的村子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社会里，说“我很健康，但森林病了”，会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若一个人的家、村子、土地、水、星球出了状况，而他认为他自己是健康的，会与“我的肝脏得了致命疾病，但只是肝有问题，而我本人很健康！”一样荒谬。我的自我意识里包含了我的肝脏，一如危地马拉村民的自我意识里包含了社会和自然社群。

相反，现代的自我是宇宙中孤立、离析的主体，是“他者”（other）。这种自我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Economic Man），是具有肉身的宗教灵魂，是生物学中的自私基因。它是当前危机汇集的肇源。这些危机是离析的变体——与自然的离析、与社群的离析、与我们失掉的那部分的离析。它通常被归咎为生态和政体（polity）持续毁灭的原因，被归咎为人类或资本主义贪婪的根源。我们的自我意识导致了“我之增益，你之减损”，以利息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体现的正是这一原则。而在古老的、以礼赠为基础的社会里，情况恰好相反。

异化意识形态（Alienating Ideology）切断了感知的联系，将我们孤零零地扔在了宇宙中。占有的驱策不断增长，是我们对异化意识形态的自然反应。我们将世界排除在了自我之外，留下了微小落寞的身影，为了索取失掉的存在性，提出了许多贪婪的要求。若整个世界、整个生命、整个地球不再是“我”，作为补偿，我至少可以将它们变成“我的”。世间“离析的自我”纷纷如法炮制。我们于是生活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一个焦虑无处不在的世界里。这已经内化到了我们的自我定义之中，这是存在的亏蚀、灵魂的亏蚀，我们便是在这种亏蚀之中诞生的。

陷于“我”和“我的”的逻辑囹圄，我们竭尽所能恢复失掉的财富，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其方式是扩大和保护离析的自我及其延伸部分：金钱和产权。缺乏经济手段扩大自我的人们，通常会扩大肉身的自我，这就是为何穷人罹患肥胖症的比例更高。购物成瘾、嗜钱成瘾、强占成瘾，都与

嗜食成瘾有着相同的来源。它们都源于寂寞，来源于与我们存在延伸部分相割裂的苦痛。

看看露天矿、皆伐区（clear-cuts）、死亡区、种族灭绝、庸俗消费文化吧，这种吞噬美好而吐出金钱的巨大机器从何而来？孤立和离析的自我，审视着本质上是“他者”的宇宙，自然而然地将人类世界视为一堆工具般的意外之物。外部世界的本质是非自我[1]。既然外部世界不在可预见的效用之内，我们为何要关心它？笛卡儿，这位现代意义上自我的先锋发言人，清楚地说明了成为自然的“领主和占有者”的野心。“占有者”一词暗示对于离析的自我，产权概念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是僵化的、狭隘的。这一区别即将终结。正如神秘主义所教谕的那样，离析自我的状态只能保持短暂的时间，而且代价巨大。我们保持离析的状态已久，并以离析为基础创建了一种文明，寻求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征服。当前危机四聚，保有离析这一目标徒劳无益。它预示着文明的终结，人类存在之新状态的更始，人类将具有更为灵活、更具包容性的自我意识。

有一种产权起源理论将产权与自治（automony）或自主（self-sovereignty）的概念联系了起来。自治缓慢诞生于过去的村社部落之中。查尔斯•阿维拉（Charles Avila）对自治的逻辑进行了如下描述：“如果我是自主的，那么我应当拥有我的劳动权，而我生产的东西也属于我自己”[2]。任何产权概念的意识形态，其先决条件都是“我是自主的”，但这绝非人类各个社会的普世信条。在其他社会——氏族、部落、村庄，甚至是所有生物构成的社群，它们的优先权都可以高于自我的个体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劳动权并不属于你，而是属于

1　上行，下效（As above, so below）。自然变成了敌人或一堆“资源”，于是我们体内出现类似的关系，也毫不奇怪了。我们时代的流弊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我们自我–他者混乱的肉身化。村庄、森林、地球，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却错误地将其作为“他者”（other），我们的免疫系统因而开始排斥自体组织。我们待自然之道，已不可避免地返诸吾身。

2　阿维拉，查尔斯.（2004），《所有权：早期基督教教义》，5页。

级别更高的人[3]。因此，这种产权制度并不是我们目前流弊的根源，只是我们疏远与隔离的症候。本书寻求的并非是产权的废止（这样做治标不治本），而是产权的转变，将其作为人类存在性的更大转变的一部分。

其他思想家，尤其是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吉纳维夫•沃恩（Genevieve Vaughan），将产权的起源归为男权至上和父系社会的出现[4]。这些论点虽有可取之处，但我并不打算在这里探寻货币和产权的性别层面；这个论题值得撰文专述。在我们所处的离析时代，每个制度都与其他制度相关联；当产权使万物变成了可拆解的商业对象时，同自然、肉体、神圣母性的异化，反映了同产权背后的世界相异化。

随着我们对关联和感激的感知增长，占有的驱策降低了。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劳动权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生产的东西也不为我们所拥有。我们劳动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件礼物呢？由此，我们希望把创造之物赠给那些对我们的存在有所贡献的事物，赠给那些赐予我们生命之礼的事物。

受到感激的驱使，某些社会主义哲学家们把这种赠予的欲望变成了义务，变成了国家征用个人劳动的理由。我们“欠了社会的债”，国家也成了追债人。它为所得税提供了依据——这同样是对劳动力的征用，只是形式没有那么极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赠予都是被迫的。对于这种生俱来的占有的驱策，能否建立一种经济体制来解放、表扬并奖励它呢？这就是这本书所描述的：一个奖励流转而非积累、奖励创造而非拥有、奖励给予而非取得的制度。

---

3 即便今日，我们仍能感觉到，我们的劳动并不属于我们自己。这源自于我们为高于自身之物工作的欲望，也就是说，将我们的劳动献给超出理性自利的事业。宗教人士将之形容为“将生命献给上帝”。另一种说法是，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劳动与其产品，连同赋予它活力的所有的技能和才华一道，制成一件礼物。由此，我们会感到心满意足，安于使我们在地球上实现目的知识中。直观地说，我们知道了解到我们的礼物必须返还，而不是窖藏起来，为了短暂和虚幻地夸大离析的自我。

4 参见威廉•赖希的《性别政治》和吉纳维夫•沃恩的《作为女性原则的礼赠与宗法资本主义》。

原始的劫掠

个体的主权是现代财产概念的第一步，因为地球上的大多数事物，都并非是人类劳动的结果。按照“我生产的东西属于我”这种逻辑，任何独立于人类努力而存在的事物，都不属于任何个人。对这样的物品——土地、河流、动物、树木等要求所有权，无异于盗窃。就像我窃取了你制造的东西的所有权之后，我就变成了贼。

认识到了这一点，经济思想中的一派便应运而生。蒲鲁东（P. J. Proudhon）、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西尔维•盖赛尔（Silvio Gesell）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宣称：“产权即劫掠”对于任何产权，通过追溯一系列“合法”转让，我们最终会找到产权的第一个主人——那个轻易将其攫取，将它从“我们的”或“上帝的”变成“我的”的人。这通常靠武力完成，与三个世纪前北美地区发生的土地强占如出一辙。几千年来，这一幕以各种形式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别忘了，在罗马时代之前，根本没有契据这样的东西。土地就像空气和水，它不能被拥有。土地的第一个拥有者必然是靠非法手段获取它的，他们一定是把它抢走了。

人们常常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农耕的自然结果。虽然狩猎采集者在土地上的投资微乎其微，但农民却投入劳动使土地的生产力（为人类出产的食物）更高。农民终年劳作，到了丰收时节，这些收获却被“采集者”并尽收囊中，这明显有失公允。私有财产是应该给人以激励，激励他们改良土地。可是，如果能够拥有这些改良，拥有土地本身岂不是更有失公允？

最初，土地权几乎一直是共同拥有的，受益者是村庄或部落而非个人。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的周朝这些伟大的农耕文明中，土地产权私有概念几乎不存在。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王是地球上神的代表，所有的土地都是王的产权。

拥有土地本身与有权享有土地上的劳动成果，二者在概念上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在西方国家，土地所有权是个绝对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可能发源于罗马，其兴盛则可归功于希腊的个体概念。在罗马，土地首次被列入了所有权（dominium）目下，“这一最终权利背后，没有任何的权利；这一权利使得其他权利合法化，它本身却无须合法……这种‘使用、享受和滥用’的权利——ius utendi, fruendi, abutendi（拉丁文，意思是使用、享受和滥用——译者注）”[5]。

在东方世界，土地所有权开展的时间更早，至少在观念上如此。在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商鞅治下。虽然土地所有权出现之前的时代只存在于历史记载中，但儒家已有记载，售卖土地在“古代”是不合宜的[6]。在印度，土地私有权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虽然这个证据有些自相矛盾[7]。不管怎样，直到英国统治时期，印度的绝大多数土地都是共同所有的[8]。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量的土地要么共有，要么为封建领主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意味着，土地是一种可让渡的、可自由买卖的商品。封建领主对土地的“拥有”与现代意义有所不同。他们对土地拥有特定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让渡给封臣，以便交换各种仆役、佃农粮租，最终兑换成货币。在英国，直到15世纪，土地的免费让渡都是不可能的[9]。此后，因为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英国庞大的公地迅速转为私有。非洲大陆也产生了同样的进程，农奴的“解放”是其诱因之一。刘易斯•海德写道：

> 过去，溪流任人渔，森林任人猎。可现在，却有人声称是这

5 阿维拉（2004），《所有制：早期基督教教义》，20页。

6 许绰云，《转型中的古代中国：社会流动性分析》，112页。本书从批评产权集中的角度来解释儒家的立场。邓锋，《中英土地所有制比较研究》，12页。邓锋认为，在此之前，土地的让渡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土地是王的财产。邓锋还指出，至少到中世纪宋朝，土地一般不准让渡，也不能作为偿债的替代品。

7 阿特卡（Altekar），《古代印度的国家和政府》，273~274页。

8 库西（Kuhnen），《人与土地》，2.1.1节和2.1.2节。

9 邓锋，《中英土地所有制比较研究》，10页。

> 些公地的主人。土地使用权（land tenure）的基础于是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的农奴几乎处在产权所有者的对立面上：土地拥有他。他无法自由迁徙，他对他依附的土地，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在的人则声称自己拥有土地，并以一定费用将土地租出去。农奴无法从他的土地上迁走，但是房客却可以被房东逐出，原因未必是他们没能支付租金，而仅仅因为房东的心血来潮[10]。

就诸多社会改革而言，农奴的解放促进了既得权力者对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进一步整合。曾几何时，人们世世代代自由放牧、收集薪柴，在周围的土地上狩猎，但是，通过各种手段，人们却无法再延续以往的生活了[11]。这些土地曾经是共有的，所有权归于大众，个人无权拥有。然而，此后的岁月里，共有之物变成了私产。

若“产权即劫掠”，那么一个致力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会使犯罪永续存在。财产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之前的行为与盗窃无异，这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法律是盗贼制定的，那么他们会将自己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事实正是如此：在罗马等地，有权有势的人一手攫取土地，一手制定法律。

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是马克思式的谩骂。为避免误解，容我补充一下，我并不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其一，废除私产会将一种激烈的、突然的、不和谐的变化强加给不情愿废除私产的人们。其次，私有财产不过是更深层次的流弊（离析）的症候，如果我们按照离析、征服、战胜邪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这种症状，我们同样会罪孽深重，只是形式有别罢了。最后，即使是在经济水平上，问题的关键也并非私有财产本身，而是拥有产权带来的不公平优势。有人因为拥有了一度属于共有的东西而

10　海德，《礼物》，121页。

11　当然，农民对共有物的剥夺进行了抵制，并挑起了被称为德国农民战争的血腥斗争。类似的斗争在全球各地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其原因都是人们抵抗产权对人类关系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入侵。正如海德所说的那样，“农民战争是与美洲印第安人抵抗欧洲的性质相同，都是对抗市场化之前不可让渡的产权的战争。”

受益，即便这是错误的，但最会利用资源的人拥有了资源，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这些共有资源包括土地、土壤、矿物、含水层，以及大气吸收废物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经济体制，它不允许因拥有而得利，但是鼓励“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的企业家精神，允许这种精神自由挥洒。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虽然消除了独占稀缺资本资源的得利，但它同样消除了有效使用资源的得利，其结果是效率低下和经济停滞。能否奖励那些最懂得利用资源的人，而不是奖励所有权呢？本书就描述了这样一种货币系统，它保留了私有财产带来的自由，却不让其主人累积不公平的优势。

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土地私有化很快导致了所有权的集中。早在古罗马时代，除了住宅地之外，农庄的土地是共有（而不是个人）产权：“玉米地为公权所有。”[12] 罗马帝国通过征服而不断壮大，新的土地成为“公有”的时间不久，很快便流转到了最为富有的家族——贵族阶层，从而为此后几个世纪的规范奠定了基础。贵族的地产同样增长，代价是牺牲掉了平民对土地的终身保有权（plebeian freeholds），这些土地的所有者通常被征入军团，因而在经济上，他们已无法同贵族庄园的廉价奴隶劳动竞争。平民积累了难以偿清的债务，因为土地变成了可让渡的商品，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以乞讨、抢劫为业，稍幸运些的平民则会在城市从事手工业工作。

随着罗马帝国江河日下，奴隶的来源枯竭了。许多大地主转而雇佣佃农（tenant farmers），即佃户（coloni，英文含义为settler）耕种田地。最终，这些债务缠身的佃农沦落成为中世纪的农奴。想象一下，如果你欠我的债务难以偿清，你至少应该支付你力所能及的一部分。从此以后，你的劳动所得都将属于我。这与美国的破产法、颁行于2005年的破产“改革”法案（Bankruptcy Reform Act of 2005）何其相似！这一法

12 阿维拉，《所有制：早期基督教教义》，16页。转引自古代H·F·基洛维茨（H. F. Jolowicz）和巴里·尼古拉斯（Barry Nicholas），《罗马法的研究的历史介绍》，139页。

案强迫人们宣布破产，承诺将未来的一部分工资收入交给债权人[13]。这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困境何其相似！这些国家被迫调整其经济结构，并将其经济盈余贡献给永久性债务，它们都是现代农奴的对应。为金钱的拥有者工作，与农奴为土地所有者劳作如出一辙。他们的情况被称为“奴役偿债”（debt peonage）。

古罗马和当世惊人地相似。与当年一样，财富迅速集聚于少数人手中。与当年一样，为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人们必须背负终身无法还清的债务。在古代，偿债必须获得土地，而今天，偿债必须获得金钱。过去，奴隶、农奴、佃户用一生的劳动换来了土地所有者的富有；今天，我们的劳动所得都进了货币所有者的腰包。

历数激进思想的历史，“产权即盗窃”的意识通常伴随着愤怒以及报复盗贼的渴望。当然，事情远非那么简单。无论财富是否来源于继承，财富的拥有者必须承担一种与生俱来的角色。我们文明的伟大故事创造了这种角色，并使之变为必然，它迫使我们把世界变成产权和金钱，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切莫浪费精力去仇富或是去仇恨那些最初的盗贼。若处于他们的情境，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会与之无异。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共有品的盗窃。让我们放下仇恨吧。除非我们希望延长离析的时代（The Age of Separation），像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那样，触斗蛮争而深刻不足，结果只会是以扭曲的形式重建了旧秩序。请不要忽视无意识产权犯罪的性质和影响。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恢复到世界本初即有的、潜藏至今的丰饶。

将权利化为收益，化为赤裸裸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变，它以出售土地换得金钱告终。记住，这是一个概念上的转换（土地并不认为自己被拥有），是人类对现实的一个投射。土地所有权（乃至

13　此外，许多类型的债务，如税收债务、赡养费债务、学生贷款，并不受破产的影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美国的学生贷款债务已经超过了信用卡债务，这对即将毕业的学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各种所有制形式）所主张的，与其说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如说是对拥有之物本质的认识。早期，拥有土地与拥有天空、太阳、月亮一样荒谬。而今，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所有权，只是我们自身相对于宇宙之关系的故事发生了转变。

乔治主义传统

使用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区别，反映了经由人类努力所制造之物和不劳而获之物之间的原始区别，这种区别延续至今，它体现在“真实”产权和“个人”所有权的区别上，它是几千年来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

自罗马帝国制定了产权的法律基础以来，最早对产权的批评也就产生了，这不足为奇。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教会的早期领袖就已经认识到，世间万物应该为所有人所共享。安布罗斯（Ambrose）写道：“穷人和富人都欣赏宇宙美丽的装饰物……上帝的居所是富人和穷人共有的”，“耶和华吾神授意，地球是所有人的共同财产，它的果实应供养所有的人。”[14] 在另一处，他写道，私人产权

> 并非自然而定，因为自然将万物献给了所有人。因而，万物皆共有，上帝创造了一切。因此，自然是共有权利之母，是对私人权利的虢夺[15]。

其他基督教神父，特别是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奥古斯丁（Augustine）、圣巴西勒（Basil the Great），以及克莱门特（Clement），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鼓励追随者遵从耶稣的教导，将他

14 见《118首诗讲解》（Psalmum CXVIII Expositio），8，22，PL 15:1303，转引自阿维拉，《所有制：早期基督教教义》，72页。

15 阿维拉，《所有制：早期基督教教义》，74页。

们的所有财产捐给穷人。他们的观点并不是一种超然的哲学，这些宗教领袖中的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成为神职人员之前，安布罗斯、巴西勒和奥古斯丁已经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他们将所有身家悉数捐出。

尽管其创始人的教谕如此，教会最后仍然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财产，并与皇权结盟。耶稣的教谕成为了超凡脱俗的理想，并未被严肃地推及世人，于是，神的国度（The Kingdom of God）从地上移入了天庭。灵魂与物质观念的离析也因此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物质性，特别是金钱，变成了世俗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大多数承认自己奉行基督教教义的人，已经将教义做了天翻地覆的改动，社会主义同无神论联系了起来，私有财产同上帝的青睐联系了起来。

早期的教会神父们常常提到，人类通过自己的奴役所制造出来的物品，同上帝赐予人类共同使用的物品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几个世纪中产生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批评，反复表达了对早期公共拨款的愤慨，并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建议来纠正它。早期批评家之一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写道：

> 将耕种产生的改良与被改良的土地本身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土地产权的概念即源于这种寓意上的联系。然而“改良的价值而非土地本身，构成了私有产权”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因此，所有的耕地主对他拥有的土地都亏欠社群一笔地租（ground-rent，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表达）[16]。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第一位充分发展这一思想的经济学家，其思想参见他在187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乔治的出发点与潘恩及早期的基督徒相比，在本质上是

16　潘恩，《农民的正义》，第11～12部分。

相同的：

> 但是，谁规定地球上的任何人可以索要整个地球或地球一部分的所有权，或拥有赠予、出售、遗赠它的权利呢？既然地球并不是我们的创造，那么它只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临时居所；既然我们皆身处此地，那么造物主赋予了我们同等的权限。很明显，没有人能够拥有排他的土地所有权，所有的人对土地的权利必须是平等的、不可让渡的。必须存在拥有土地的专属权利，以便拥有土地的人能够安全地持有土地，收获自己的劳动所得。但是，他所拥有的权利必须与所有人的权利平等，所有者应向整个社群支付费用，这笔费用应与授予他的所有特权等价[17]。

若所有权是古代不公正的产物，为何有人会因为拥有土地而获利？为此，亨利•乔治提出了著名的单一税（Single Tax）。大体上，这种税收百分之百来源于土地的“经济租”。通过对土地的价值征税，土地的价值与土地改良的价值被区分开来，例如，土地会被征税，但土地上的建筑物或农作物不会被征税。之所以被称为“单一”，是因为乔治主张取消其他税种，理由是：对合法的私产征税，与靠共有资源谋利一样，皆无异于盗窃。乔治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几乎让他当选为纽约市长，但金钱的既成力量每每使他功败垂成[18]。他的思想零星地被世界各地采用（我一生中已经逝去的岁月，大部分是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度过的，这两地都对土地的潜在价值征税），并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尔维奥•盖塞尔是乔治的一名仰慕者，他提出了与土地税近乎相似的税种：所有土地的产权公有，私人可以按照一定费率租用，这个费

17 亨利•乔治的“单一税”。

18 乔治在政治上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过于教条，他拒绝与无法坚定支持单一税的人组成政治联盟。

率与经济租大体相当[19]。盖塞尔的推理是令人信服的，他对生态和“联系着的自我”（connected self）的理解颇具先见之明。让我们阅读他写于1906年的这段不平凡的文字。

> 我们对这样的话时有耳闻：人对地球拥有天然的权利。这是荒谬的，否则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拥有对他的四肢的权利。就上文提到的权利而言，我们同样可以说，一棵松树有权把根埋在地下。人可以在气球中度过一生吗？地球属于人类，是人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想象地球上的一个人无头或无胃。地球与人类的头脑一样，是人的组成部分、器官。人的消化器官自何处开始，到何处结束？它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而是形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封闭系统。人类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就其原初状态而言，是无法被消化的，它们必须经历一个预消化过程。这个预备工作并不是由嘴巴完成的，而是由植物完成的。植物收集和转化物质，使之变为可以被消化道所吸收的营养物质。植物和植物所占用的空间，如同人的嘴、齿、胃一样，都是人的一部分……

单个的人，将地球的一部分籍没为他们的专属财产，设置障碍，并在看门狗和训练有素的奴隶的帮助下，让我们远离地球的这一部分，远离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将我们的肢体从我们的躯体上撕裂开来。这叫我们如何忍受？这种进程与自残有何异[20]？

盖塞尔用华丽的辞藻继续写着，这种自残甚至比截肢还要糟糕，因为身体的伤口总会愈合，然而

> 遗留下的伤口……因为截留一块土地产生的伤口，永久地溃

19　经济租是指所有权的收益，例如租金、版税、红利和利息等。

20　盖塞尔，《自然经济秩序》，第2部分，第5章，“土地国有化的案例”。

烂了，伤口永不愈合。在支付每期租金之时，在每个季度的结算日，伤口撕裂，金黄色的血液涌出。人被榨干了血液，颤颤巍巍地前行。从我们身体截掉一块土地，是最为血腥的勾当。它留给我们一道巨大的、持续溃烂、无法愈合的伤口，除非被盗截的肢体被再次续上。

我认为，所有人都体会到了这个伤口，不仅因为租金已经渗透进了我们购买的一切物品之中，而且因为精神上的权利被虢夺了。前段时间，我与一名法国来的女子一同驾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乡间小道上。温柔的山脉和宽阔的山谷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决定步行前往。大地似乎在祈求我们的来临，希冀我们的踩踏。我们决定找个地方将车泊在路边，然后步行。我们开了一个小时，却无法找到没有悬挂“非请勿入”指示牌的牧场或森林。每当看到这样的牌子，我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一阵惆怅。任何一只松鼠，任何一头鹿儿，都比我自由。那些标志只适用于人类。这里存在一个普遍的原则：产权的管理、无主之土的圈禁，使我们变得更贫困了。广袤、苍翠的风景所许诺的自由只是海市蜃楼罢了。伍迪•盖瑞瑟（Woody Guthrie）所言不虚：

有一堵高墙，试图阻挡我。
墙上的标志，说它是私产。
标志的背面一字也未写。
那一面才是为你我造设[21]。

经过三百年的经济扩张后，我们依然贫困，我们的财富和自由竟不如一只松鼠。在欧洲人到达美国之前，在此居住的土著人曾自由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有简单的自由，“高山任我攀，湖水任我泳，小河

21 摘自“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这段通常被歌曲集所遗漏。

任我渔。”即使我们当中最富有的人，也不曾拥有如此的自由。即使是一块价值十亿美元的土地，也比狩猎采集者掌控的范围小得多[22]。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情况大相径庭，例如，在瑞典，公共区域使用权（Allemansrätt）允许个人在私人土地上（只是不能太靠近住宅）散步、采摘花朵、野营一两天、游泳、滑雪。我遇到的一名骑马爱好者说，在爱尔兰，私人农场的车道和牧场的大门都是不上锁的。“侵犯”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土地是向所有人开放的。骑手严格遵守在农场外围活动的规定，以免惊扰到动物和牧场，这也为他们赢得了农民和土地的尊重。得知此事之后，我并不认为每个美国人都可以凝望这个国家的广袤土地，而不带一丝拘禁和怅然之感，因为这个国度门户紧闭，围墙紧锁，处处挂着“禁止非法闯入”的指示牌。这片土地已经与我们隔断，你能感受到盖塞尔的“伤口”吗？

盖塞尔超越乔治的巨大贡献是，他将土地的思想拓展到了货币上，发明了一种新的货币体系，这是神圣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叙述了神圣经济学基本的原理之后，我稍后会对这种货币体系进行描述。

在同时代的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中饱受争议。他坚持对土地征税，而这在今天更加难于实行，因为其他类型的共有资源都被纳入了私有产权的范围[23]。海德（Hyde）所指的“买卖之前不可让渡的财产”，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的范畴，几乎所有对人类生存和人类幸福至关重要之物，都被囊括在内。我们与自然、文化和社群的联系早被割裂，这种联系被拆解下来，又返销给我们。虽然我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但几乎所有

22　读者或许会联想到动物的属地性，即很多动物并不是自由迁徙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动物都拥有属地，即便有，也通常表现为群体属地而非个体属地。因此，人类存在的大部分世界里，都与属地性相关。最起码，每个人享有部落的领土上的自由。今天，我们必须将领地收缩到核心家庭的水平吗？还是我们应该扩大部落，将整个地球纳入其中？

23　乔治的计划还存在着另一些严重问题。具体而言，它很难将土地的价值及改良的价值区分开来，特别是因为土地的内在价值不仅取决于其物理特性，还取决于它与其他人类改良土地之间的相对位置。在土地上树立建筑物，你会吸引他人在周边建房，从而提升了你自己的土地价值，并对首先建房有抑制作用。因此，我推崇用西尔维奥•盖塞尔所提出的租赁方式来解决经济租问题。

公共资源都遭受了同样的厄运。知识产权是最明显的例子，拥有知识产权所取得的版税，其作用与土地租金类似。（如果你认为知识产权与土地不同，因为知识产权是人类创造的，请继续看下文。）但是，有一种所有制形式包含并取代了其他所有制形式：对金钱的所有权。在金融领域，利率发挥的作用与版税、租金相同，它确保人类创造力是财富的源泉，确保劳动会被拥有货币的人收入腰包。就其来源而言，金钱同其他形式产权的一样罪恶——这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抢劫，它驱使并体现了对共有资源的剥夺。

若要恢复经济体的神圣性，我们需要纠正这种劫掠，因为它根本上是一宗盗窃，是神圣礼物的减损。它将一度神圣、独特、私人的物品转换为了商品。靠拥有金钱而获利的权利，与靠拥有土地而获利的权利一样，都是非法的。但是，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与土地不同的是，金钱是人为创造的。我们通过人类的天分、精力、时间、创造力赚取金钱，而这种劳动所得应属于劳动者，难道不是吗？金钱的根本来源并不都是非法的，难道不是吗？

这种看法是幼稚的。事实上，在将公地转换为私有财产的过程中，金钱深涉其中，罪孽深重。在这一转换过程最后的、也是关键的阶段，金钱的地位被削弱，成了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因此，我们自然和文化的遗产中的其他部分，也被警戒线封锁了起来，变成了私有财产，最终作为“商品和服务”变成了金钱。这并不是说为钱而工作是不道德的；相反，让金钱为你工作，才是不道德的。租金之于土地，一如利息之于金钱。金钱是共有资源的尸骸，它曾是一切共有、免费之物的化身，然而现在，它却变成了最为纯粹的财产形式。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里，我将证实这种说法，阐明计息货币的本质是对共有资源的侵犯，是对星球的毁灭，它将大多数人变成了债务的奴隶。

第5章

Chapter 5

共有资源的尸骸

我们指责封建男爵可耻。他禁止农民翻动土块，除非农民将作物的四分之一交给他。我们称之成为野蛮时代。即便形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关系依然如故，在契约自由的名义下，工人们被迫接受封建义务。就爱翻动哪里就翻动哪里而言，农民找不到更优厚的条件。一切都变成了私有财产，农民必须接受，否则会死于饥饿。

——彼得•克鲁泡特金

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罪恶。

——巴克扎克

土地的存在，显然不依赖于人类的努力，但土地与其他形式的财产并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首先考虑物质财产，即任何由金属、木材、塑料、植物或动物、矿物等制作而成的物品，这些物品难道不是通过人类努力而改变的、地球的一部分吗？土地与土地改良之间的区别，即已经存在之物与人类创造之物的区别，对土地或其他物质产品同样成立。我们使用并拥有的一切，都包含了被改造的那部分地球，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自然资本”——自然赠予我们的财富和良善。最初，这些自然资本并不是财产，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们扩展了我们的支配力，扩展了对离析的认识，加强了我们想要

拥有的意志[1]。今天，各种形式的自然资本都被转换成了产权：电磁波谱、DNA序列、生态多样性、地球吸收工业废料的能力等。

无论是成为直接的财产对象（如土地、石油、树木），还是成为创造其他产权的共有资源（如公海），最初的“大公物”（Great Commons）都被售卖掉了：它首先被转换成了产权，接着被转换成了金钱。正是这最后一步，证实了向产权蜕变的完成。能够自由地买卖一件物品，意味着这件物品已经脱离了它原始关系的母体，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可让渡的”了。这就是为何金钱成了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代理人，为何收取租金（利息）与古代收取地租一样，带有不公正的特性。

文化资本与精神资本

自然资本是四大共有财富中的一类，其他三类共同财富包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精神资本。每种资本都包含一度免费的物品，它们曾是自给自足经济体或者礼赠经济体的一部分。现在，它们却需要支付费用了。抢掠的对象不再是自然之母，而成了文化之母。

在其他三种资本中，文化资本最为人们所熟悉。在经济语境中，它通常被称为“知识产权”。在过去的岁月里，大量的故事、创意、歌曲、美术图案、图像，以及技术发明，形成了一种共有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它得到乐趣及富足，或将它进一步并入到其他创作之中。在中世纪，音乐家们聆听彼此的歌曲，借鉴他们所欣赏的新曲调，对它们进行修改，然后歌曲被传唱，成为共有音乐的一部分。今天，艺术家及其企业赞助商纷纷通过版权来保护每一首新歌，不遗余力地指控试图将这些歌曲融入自己创作的人。在任何一个创作领域，

1 污染信用证以及类似的计划，旨在将地球的吸收能力转换成产权。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它也成了一种无形的元素，嵌入到了每一件工业产品之中，而限量供应是这些工业产品必需的投入之一。即使没有明确的产权，这种吸收能力也不再是共有品了。

同样的情况都有发生[2]。

在道义上，知识产权的理由是，“如果我是自主的，我的劳动力属于我本人，那么我创造的东西也属于我自己。”但是，即便前提条件“我是我自己”为真，它也隐含了这样的假设：艺术和智力创作是从创造者的脑中凭空生造出来的，与文化背景毫不相干。这是荒谬的。任何智力创作（包括本书）都来源于我们周围文化海洋中的点点滴滴，来源于深深烙印在人类心灵中的图像、音乐和思想的宝库，这种影响甚至是与生俱来的。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的那样，“专利是一种工具，它使得一个人能够主张特殊的经济回报，只是因为在生产这一创造物的复杂的社会过程中，他是最后一环[3]。”对歌曲、故事，以及所有文化创新而言，都是如此。通过把它们变成私有财产，我们隔断了一些不属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我们是在从文化中偷窃。与土地一样，文化的共有资源本身也会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这种持续的犯罪盗窃，加剧了富人与穷人、业主和租用者、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立。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如是说：

> 每台机器都有相同的历史——一长串无眠之夜和贫困的记录，幻灭和欢乐的记录，几代无名工人进行局部改进的记录。这些工人仅在原始的创造上加了一些无谓的小玩意，然而没有这些改进，最丰硕的想法也只会无果而终，更重要的是，每种新发明都是一种综合，是此前广袤的力学领域和工业领域中无数发明的合力。

2　举例而言，电影制片人需要从法律部门获得整套“权利许可”，以确保他们的电影没有无意使用受到版权保护的图像。这些图像包括名品家具、建筑、品牌标志和服装——建筑环境中的所有物品。其结果是扼杀了创意，将许多有趣的艺术品归为非法。（为了表现主题，艺术会借鉴我们周围的生活元素，然而这些元素已经属于产权的范畴了。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3　芒福德，《技术和文明》，142页 。当然，在发明过程的最后阶段，发明者应该因为他的智慧和辛劳获得回报，但也必须感谢社会环境。然而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因为专利和版权期大大延长，它从原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延长到了一个世纪。

> 科学与工业，知识与应用，发现与应用，导致了新的发现；脑与手的灵巧，脑与肌的苦役协调运作。每一次发现，每一次进步，每一次人类财富总和的增加，都应归功于过去和现在身心交瘁的苦役。
>
> 个人有什么权利擅用这个巨大整体最微薄的一小块，并称这是我的，不是你的？[4]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自愿将本书免费上传到了网络上，并放弃了版权的一部分。若脱离了思想的巨大有机母体，我是无法写出这本书的。这种文化资本的共有财产是我无法想当然地圈闭的[5]。

精神资本则更加微妙，它指的是我们的精神和感官的能力，例如，集中精力的能力，创造想象世界的能力，从生活体验中获得乐趣的能力。当我年轻的时候，电视和电子游戏尚未占据美国人的童年，我们用错综复杂的故事线创造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实践了成年人用以适应生活及集体现实的心术：造成一种幻象，围绕这个幻象叙述故事，为这个幻象赋予意义，分配角色、扮演这些角色，等等。今天，这些想象的世界已经被电视演播室和软件公司预制出来，孩子们漫步在由遥远的陌生人创造的廉价、俗气、暴力的世界之中。新的世界伴随着预先编制好的图像而来，形成自己图像的能力（这种能力被称为想象力）却萎缩了。若孩童无法想象出一个新的世界，那么他们长大后，只会被动接受任何传递给他的现实[6]。这会加剧美国公众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吗？

另一种精神资本的枯竭，来源于电子媒体强烈的感官刺激。例如，现代动作片的节奏是如此之快，声效是如此嘈杂，刺激是如此激烈。

---

4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章。

5 对知识产权的详细讨论已超出本书的范围。当然，对于这类思考，我已做出贡献（至少我认为我有所贡献），我值得在我的作品中被鼓励。但是，阻止他人将我的文字和其他创作融入他们自己的感受并进行新的创作，就有些吝啬了。实事求是地讲，我主张将“公平使用”的信条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并支持大刀阔斧地削减版权和专利权的期限。

6 或者，她全然拒绝接受现实，认为一切只是一堆无关的图像和符号。一方面，这使她“看穿蠢话”。另一方面，留给了她玩世不恭和腻烦厌倦。

与之相比，老电影就显得枯燥，更不要说书籍或自然界了。尽管我尽了最大努力不让我的孩子们过多地观看现代电影，可孩子们对1975年以前的电影，几乎提不起兴趣。一旦习惯于强烈的刺激，在没有强烈刺激的情况下，我们便会出现被称为无聊的“戒断症状”（withdrawal symptom）。我们变得依赖，对于那些只要活着就能拥有的东西，也需要付费才能得到了。婴儿或狩猎采集者会迷恋自然缓慢的进程：一根嫩枝浮在水面上，一只采花的蜜蜂，以及使得现代成年人恹恹无神的东西。为了生存，罗马的佃农不得不支付土地使用费；而今天的大多数人，为了产生使他们有活着之感的感官刺激，必须向工艺、媒体、资本的所有者付费。

精神资本是一种公有资源，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被挪用的是“关注的场所”（locus of attention）。被我称为精神资本的人脑的能力，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哺育、我们的文化环境，而它们培植并引导了精神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想象的能力，获取感官满足的能力是一种集体的能力。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免费使用思想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必须从其新主人那里购买它们。

人类集体专注于土地和空气这样的共有资源。和土地和空气一样，集体的注意力是人类创新的原料。制造工具，做任何工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人将注意力放在任务上。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告和媒体无处不在。这是拉拢人类集体注意力的结果，它表明，我们神圣的遗产已经耗尽。在街道上，我们目光所及之处，都竖立着广告牌。在地铁里、在互联网上、在大街上，商业信息处处“捕捉”着我们的注意力。它们渗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叙事，我们的内心对话，并借此渗入我们的情绪、欲望、信仰，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和利润的制造源。我们的注意力几乎不属于我们自己，它是那么容易被政治力和商业所操控。

在我们的注意力被长久地操控、隔断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于强烈的刺激，习惯于被一个又一个荒谬而空泛的东西耍弄。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注意力保持的时间太短，短到若不借助我们周围

的程式，我们无法创造出任何东西。我们失去了维持思想、了解细微差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我们容易受到简单化的、带有强烈情感诉求的叙述的影响，不仅容易成为广告的目标，更容易成为宣传、蛊惑、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它们都以各种方式为金钱的权力服务。

社群的露天开采

就当前的讨论而言，社会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它主要是指关系和技能。在礼赠经济体中，人们为自己和对方提供“服务”，如烹饪、照顾孩子、医疗保健、款待、娱乐、咨询、粮食种植、制衣、房屋，建造等。在最近的一两代人以前，这些功能中被商业化的屈指可数。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我所熟悉所的人里，极少有人在餐馆吃饭；放学后，邻里会互相照顾对方的孩子。在将人类关系移入“服务”领域的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它将地球更深入、更晦涩的部分带入了商品的领域一样。例如，留声机和无线电技术将音乐从人们自娱自乐之物变成了他们需要支付的东西。储存和运输技术对于食品加工的作用亦然。在一般情况下，劳动的精细分工使得我们在大多数用品上，都必须依赖陌生人，而我们的邻居则不依赖于我们生产的东西。至此，经济联系与社会关系脱离开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予邻人，也就无从了解他们了。

社会资本的货币化像是对社群进行露天开采。对于社群的解体，金钱难辞其咎，因为金钱是非人格化之物的典型。这并不令人惊讶。将两片不同的森林换为金钱，它们便成为相同的了。在文化方面，这一原则迅速创造出了全球单一文化，每项服务都成了有偿的服务。金钱调节着我们的一切关系，我们同样失去了独特性，成为标准商品和标准服务的标准消费者，成为提供服务的标准小职员。个人的经济关系变得无足轻重，因为我们总是可以“付钱让别人来做”。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建立社群仍旧困难重重。我们有不安全之感，有可以被替换之感，也就不奇怪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利息所驱使的转换导致的，它将独

特的、神圣之物变成了货币化的、通用的东西。在《人性的飞升》中，我写道：

> “我们并不真的需要彼此。”……对于今天世上社群的缺失，还有什么更确切的描述呢？我们不需要了解那些种植、装运、加工我们食品的人，制造我们衣物的人，修建我们住房的人，创作我们音乐的人，制造或修复我们的汽车的人；我们甚至不需要了解，在我们工作的时候照顾的我们婴孩的人。我们依赖于这种角色，但只是偶尔依赖于扮演了这种角色的人。不管这种角色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花钱雇佣某人来做（或雇佣其他人来做），只要我们有钱。我们如何得到钱？通过扮演其他特殊角色，这相当于某个人雇佣我们为他们做一些事……
>
> 生活的危难已交由专家处理，于是我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在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可做了，只能自娱自乐。同时，属于我们自己的、仅剩的日常功能，大多却起到了孤立的作用：开车去某地、买东西、付账单、烹调方便食品、做家务，这些需求不需要邻居、亲戚或朋友们的帮助。我们希望与我们的邻居更亲近；我们认为自己是友好的人，乐于助人的人。但是，我们没什么可帮的。在盒子一般的房子里，我们是自给自足的。或者说，相对于我们熟悉的人，我们是自给自足，但是，我们对居住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完全陌生的人们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

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使我们除了消费之外，无事可做。公共消费（joint consumption）并没有建立起社群，因为它不需要礼赠。大多数社交聚会常被叹为空虚，源于对“我不需要你”的初步认识。我不需要你帮我消费食品、饮料、药品或娱乐。消费并不需要任何人进行礼赠，不需要任何人的真真切切的存在。公共消费不能够带来社群和亲密感，但同创（cocreativity）可以。自由意志论者虽然鄙视大政府，但却在援引

私有产权的神圣性时，无意间造成了对大政府（Big Government）的需求。因为缺乏与社群的联系，孤立的个体会依赖于远程的权威——一个依法成立的国家——它履行之前由社群履行的许多社会功能：安全、争端的解决，以及集体社会资本的分配。用一个生造出来的短语来讲，经济领域的产权化和私有化留给我们的是“无依无靠的独立”（helpless independent）——独立于我们认识的任何人，依赖于非人格化的、高高在上的强制性管理机构。

当我问人们，他们的生活中最缺少什么时，答案通常是“社群”。但如何才能建立社群，当其建筑材料——我们为彼此做的事情——已经转换成了金钱呢？社群是由礼物交织而成的。对于金钱交易或易货交易，交易完成后，不遗留任何义务。与此不同的是，礼物意味着未来的礼赠。我们接受了礼物，便又欠下了礼物。感激是对收到礼物的认可，也是赠送礼物的渴望。可现在，我们能够给予什么呢？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是食物、住所、衣物，不是娱乐，不是故事，不是保健：每个人都已经购买了这些东西。至此，我们有了摆脱这一切的冲动，回归自给自足生活的冲动。在自给自足的生活里，我们在社群中建起我们自己的房子，种植我们自己的食物，缝制我们自己的衣服。虽然在这场运动颇具价值，但我怀疑，不会有太多人会为了拥有社群而再次筚路蓝缕。除了扭转现代劳动分工和以机器为基础的高效外，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源于一个事实，即资金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的诸多需求。今天，许多重要的需求都未能被满足。而金钱，因其非人格的本质，是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金钱无法满足的需求将是未来的社群的肇始。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为何我将金钱成为“共有的尸骸”。理查•希福德描述道，将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精神的资本转换成金钱，实现了金钱将触及的一切同质化的力量。希福德说：“通过将个性约化为同质的无个性，金钱具有与死亡类似的力量。”[7]的确，当每一片森林都被制成板材，当每一个生态系统都被铺平为道路，当每一桩人类

7 希福德，《金钱和希腊早期思想》，157页。

关系被替换为服务，地球的生命和社会的生命也就行将就木了。留下的只是冷酷、没有生命的金钱，正如几个世纪前可以点石成金的迈达斯国王的神话所预先警告的那样。我们终会死去，但死时会非常富有。

需求的创造

经济学家们会说，留声机、推土机等技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和服务。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些东西满足的人类需求，人类的需求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得到了满足——一种需要付费的方式。

想想通信业吧。对于远距离通信，人类并无抽象的需求。与我们分享情感和经济联系的人，我们有与之保持联系的需要。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些人通常与我们比邻而居。狩猎采集者或十四世纪的俄国农民，几乎没有使用电话的需要。只是当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传播到了距离颇远的人当中，使得大家庭、社群分崩离析之后，电话才成为了一种需求。这些事物满足的需要，并不是全新的需求。

再想想技术吧。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对我的孩子们而言，大型多人在线奇幻角色扮演游戏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它们满足的需要也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青春期之前的孩童和青少年有着强烈的探索和冒险的需要，在探索和冒险中，他们与同龄人互动，建立起身份感。过去，探索和冒险发生在户外。当我还是个孩童时，我们的自由早已不若前几代人，正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描述的那样。但是，我仍然可以和我的朋友步行数英里，到达小溪、废弃的采石坑、未开发的山顶、火车轨道。而今，每寸土地都被栅栏圈围，立起了“禁止穿越”的牌子。整个社会过分执迷于安全问题，孩子们的时间被占满，被迫练习乐器演奏。于是，一群孩子恣意漫步的场景很难看到了。技术和文化抢夺了孩子们急需的东西，随后又以电子游戏的形式销售给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我意识到了这点的那天。我碰巧观看了宠物小精灵

（Pokémo）电视节目中的一幕。宠物小精灵讲的是三个孩子神奇冒险的故事。荧屏上虚构的、商标化的冒险人物所进行的冒险，是现实中的孩子们曾经拥有的奇幻旅行。而今天，他们必须为此付费（通过看广告），才能获得观看的特权。结果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新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根据定义，货物是货币经济的一部分）替换了曾经免费实现的功能。

略微思考你会发现，今天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所满足的需要，曾经都可以免费被满足。那么医疗技术呢？与渔猎采集者和原始农耕者的健硕相比，很明显，我们糟糕的健康是花了高昂代价购买的，只是发挥了生理的作用而已。托儿服务呢？食品加工呢？交通呢？纺织行业呢？因篇幅所限，对于这些从我们身上偷走，又卖回给我们的必需品，我无法逐一进行分析。我将提供更多证据佐证我的观点：假使技术和文化上的需求真能驱动货币增长，那么我们的满足感会比祖先的更强烈。难道不是吗？

电影替代了部落中讲故事的人，MP3播放器替代了围着钢琴的聚会，那么现在人们有没有更加快乐，更加充实呢？吃着大规模生产的食品，而不是邻居的土地或我们自己的花园生产出来的食品，我们更加幸福了吗？与生活在旧新英格兰的石头农舍或棚屋里的人们相比，居住在拎包入住的单元房或者独栋别墅中的人们，更加幸福吗？我们更加幸福了吗？新的需求得到满足了吗？

即使我们没有变得更加幸福，即便技术对自然和人类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我也不会放弃技术的尸骸。事实上，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满足了重要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正是神圣经济的关键驱动力。它们包括探索、嬉玩、求知的需求，创造新经济运动中被称之为“真正酷的东西”（real cool stuff）的需求。在神圣经济体中，科学、技术，以及伴之而来的劳动分工，将继续作为中介，满足于这些需求。虽然商业化是永无止境的，但科学和技术中的更高层次的目标已经显现，正如隐性基因的出现是不可控、不经意的。它存在于真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心目中：那

种奇异、兴奋和新奇的快感。旧世界里的每个机构在新世界都有对应，音符一样，只是调门更高了。我们并不是呼吁进行彻底的除旧、从头创新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被尝试过，革命的结果并无改观。这种彻底除旧的心态，本身就是旧世界的一部分。神圣经济则是一种不同的、全面的革命，而非一种肃清。在这场革命中，失败者甚至不会觉得他们有所损失。

直至今日，经济和技术的产品都无法满足上述需求。不仅我们所需要的游艺、探索、猎奇的需求未被满足，即便是生理需求的满足，也伴随着不堪忍受的焦虑和挣扎。这与经济学家的说法相悖。经济学家认为，即使新的需求未被满足，技术和劳动分工也能使我们更有效地满足现有需求。一台机器可以代替一千名工人的劳动，一台计算机可以协调上千台机器的运转。照此，从18世纪起，未来学家就预测休闲时代（age of leisure）即将到来。然而，这个时代并未到来，而且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它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很明显，某些事物并未发挥作用。

人类通常按照理性自利行事，是经济学的两个主要假设之一，而这种自利与金钱相对应。只有当交易双方都受益，交换才会发生（例如，为了赚钱而购买）。交易越多，受益也越多。因此，经济学家将金钱与边沁（Bentham）的“效用”——即良品（good）联系起来。于是经济增长成了经济政策中毫无疑问的圣杯（holy grail）——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的所谓良善水平上升了。哪个政治家不想因为经济增长而受到推崇呢？

经济逻辑告诉我们，当新产品或新服务产生时，如果有人愿意为它付费，那么它必会使人受益。在狭隘的意义上，这是成立的。如果我偷了你的车钥匙，你从我这里买回钥匙，你可能会受益。如果我偷走了你的土地，你从我这里租回去，你也会受益，因为这样你才能生存。但是，称“金钱交易是整体效用提升的证据”则是荒谬的，这种观点假定，货币交易满足的需求，原本是未被满足的。如果我们支付的物品，曾经是由自给自足的经济或礼赠礼经济所提供的，那么经济增长

的逻辑便是错误的。用霍布斯（Hobbes）的话说，这里隐藏着一个意识形态的动机，它假设原始的生活是“孤独、可怜、肮脏、粗野以及短暂的”。这样的过往会证明现在的合理，而今天的世界从各个方面，都体现了霍布斯所提到的特质。若生活在郊区巨大的室内（The Great Indoor）不算孤独的，那什么是孤独呢？若赤道附近非洲的生活不算短暂，那什么算短暂呢？[8]上个世纪的各个年代，不是一个比一个污秽残暴吗？霍布斯认为，过去是一场残酷的生存竞争。他的观点或许是我们自身状况在意识形态上的投射。

要使经济增长，以货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必须同时增长。货币必须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毕竟，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和。只有用货币进行的交易才被计算在内。

如果我免费照看你的孩子，经济学家并不将它算作一种服务，它并不被列入到国内生产总值之中。它不能用来支付金融债务，我也不能去到超市，宣称“今天上午我照看了邻居的孩子，所以请给我食物”。但是，如果我开设一家日托中心，收取费用，那么我就创造了一项“服务”。于是，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了。经济增长了，世界的良善水平增加了。“货物”指的是你付钱购买的物品。金钱等于良品，是这个时代的方程。

这同样适用于砍伐森林并售出木材的情形。虽然森林仍然存在，但它并不是商品。只有建立起一条运木材的小路，雇用劳动力，将树木伐倒并运送到买方那里，它才变成了“良品”。将森林转换成了木材这种商品，国内生产总值便上升了。类似地，即便我创作了一首新歌并免费分享它，GDP也不会提高，社会也不会被认为更加富裕；但是，如果我为它取得版权并出售它，那么它就成了商品。假设有一个社会，它使用草药和萨满教方术医治病患。我们可以摧毁这个社会的文化，使其依赖、购买药品，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土地，他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农

8 现代生命同样是短暂的，虽然寿命更长了，但对匆匆碌碌的人，生命似乎更加短暂了。

民，而必须购买食物、清理土地、受雇于香蕉种植园，如此，世界变得更加富有了。各种功能、关系、自然资源都被带入到了货币的领域。

只要有人为他一度作为礼物而拥有的东西付费，世界的“良善”水平便上升了。每棵树被砍下来做成纸张，每种想法被记录下来化为知识产权，每个孩子都玩视频游戏，而不是创造想象的世界，人类的每一层关系都变成了一种有偿服务，都是一点一滴地损耗了自然、文化、精神和社会的公共资源，都是将共有资源转换成了金钱。

与留在家中照看孩子的父母相比，日间护理专业人员照顾三十余名孩子的效率（按劳动工时计算）要高得多。与用手工工具耕种一百块小面积土地相比，用大型拖拉机和化学品耕种一千英亩土地更为高效。但是，效率的提高并未带给我们更多的闲暇，也没有从根本上满足任何新的需求。效率只是无止境地满足了旧的需求，并且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它最终导致了这种极端：壁橱被衣服和鞋子塞满，未曾穿坏便扔进了垃圾填埋场。

自工业时代之始，人类需求的有限性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问题。这首先出现在纺织业。毕竟，一个人会需要多少件衣服呢？要解决即将到来的生产过剩危机，必须让人们过度地满足对服装的需求。时尚界以一种惊世骇俗和愤世嫉俗的方式，鼓励爱时髦的人们与时尚相伴。人们接受时尚界的一部分原因是，在所有的文化中，服装占有着特殊的地位。服装满足了各种神圣的、快乐的、忧郁的、俏皮的需求，满足了对更深层次的社会认同的需求。点缀身体与在食材中加上佐料一样自然。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任何新的需要被满足。越来越多的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相同的需求，只是这个需求被无限精细化了。

此外，在带来了大量的纺织品的同时，工业化也造成了社会分化，导致了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这导致了社群的分裂，使人们更容易受到时尚界的影响。《人性的飞升》一书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描述。

> 将消费主义引入早先孤立的文化中，首先要消除身份感。如何为之？从外部引入消费品，扰乱该文化的互惠网络。树立西方世界的光辉形象，侵蚀该文化的自尊。通过传教士的布道及科学教育，贬损该文化的神话。引入外部的全套课程进行教学，消解该文化传递本土知识的传统模式。教学上采用英文或另一种全国性语言或世界性语言，毁灭该文化的语言。进口廉价食品，使本地农业不再经济，斩断该文化与土地的联系。这样，便能创造出垂涎于合适帆布鞋的人民了。

当一种需求普遍得到满足时，生产过剩的危机产生了。解决危机的办法是，向有需求的其他地方出口。另一种等价办法是，将自然、社会、文化和精神的共同财产一个接一个地转换为产权和货币。制衣的社会资本（即制衣的技艺和传统，以及传承的途径）变为商品后，货币经济体之外的制衣就消失了；通过毁灭保持身份的社会结构，就可以卖掉更多衣服了。身份于是变成了一种商品，衣服和其他消费品不过是其代理而已。

礼物的社会生态——共享的技巧、习俗，以及满足彼此需求的社会结构都只是摇钱树，是埋藏了宝藏的矿脉。自然生态和承载生态的大地亦然。问题是，若这些资本都被使用殆尽，该怎么办？当无鱼可供捕捞，无林可供造纸，无土可产黍浆，无人为他人免费服务时，该怎么办？

表面上看，这并不是危机。我们为何要持续增长？如果所有的需求都能通过效率的提高来满足，为何不减少工作时间呢？曾经信誓旦旦宣称的休闲时代，为何仍未到来？我们会看到，在当前的货币制度下，休闲时代永远不会到来。所有的新技术产品都不够。这种货币制度会永远不停地迫使我们选择增长，放弃休闲。

有人会说，货币满足了之前不曾满足的需求，满足了人类种族的增长，以及在百万、甚至数十亿的规模上繁衍的需求。我们在食物、

音乐、观念、医药方面满足的需求，并不比石器时代的多。但是我们石破天惊第一次地创造了需要全球几百万名专家共同努力才能够创造的事物。货币促进了这一拥有七十亿细胞的“元人类有机体”（metahuman organism）的发育，促进了这一人类种族的集合体的发展。金钱像信号分子（signaling molecule）一样，协调着个人和组织的贡献，使之实现小群体无法实现的目标。金钱创造的需求，因为金钱而从私人需求转化成的标准、通用的需求，已经成了这个有机体发育的一部分。金钱是一种跨越社会距离、创造身份和归属感的手段，时尚产业也成了它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集体的存在，人类与多细胞有机体类似，都需要器官、子系统，以及协调它们的手段。金钱与符号文化、通信技术、教育等一道，在人类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金钱同样类似于一种生长激素，在刺激生长的同时，也调节着生长的表达。我们即将达到生长的极限，达到人类童年的终点。我们所有的器官都已经充分发展，有些器官甚至已经老化无用，将退化为残留形式。我们正在走向成熟。数十亿人的创造力被重新发现，我们或许会将它用在成熟的目标上。或许我们需要另一种货币，这种货币虽然会继续协调复杂的“元人类有机体”，但却不会再强迫它继续生长了。

货币的威权

各种形式的产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可以用金钱来买卖。所有产权都与金钱等价，因为只要拥有了金钱，就拥有了围绕这笔金钱的资本和生产力。这些产权都起源于共有资源，而个人一度是不能独占共有资源的。然而，它们最终被剥去了公共资源的外衣，而被制成了产权。土地如此，所有事物都难逃此运。财富和权利于是集中到了产权拥有者的手上。早期基督教奠基人普鲁东（Proudhon）、马克思、乔治认识到，抢夺某个人的财产，然后让此人为此支付使用费是不道德的。然而，在收缴土地租金和货币利息时，这种不道德行为屡屡发生。几乎全

世界的宗教都对高利贷加以禁止。这绝非偶然。“人们不能靠占有而获利”，这种观点在所有制产生之前就产生了。今天的货币则是所有制前身的化身，是产权的精华。

然而，本书介绍的、反对利息的货币系统，并不是受了这种道德激励。利率不仅是罪责的孳息，也不仅是来源于已经犯下的罪行的持续收入。它是持续抢掠的引擎，它是逼迫我们所有人的力量，无论我们的意图有多么温和，这种力量都强迫所有人自愿或非自愿地参与到对地球露天开采的共谋之中。

我的心路历程始于内心的旅程，然后才是作为一名演说家和作家的经历。我常常会体会到一种深刻的痛彻，吞噬世界的机器无处不在，而我只能无助地承受，而不被卷入这机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例子有千千万，我只举一例。那些愤然抵制沃尔玛的人，仍旧在沃尔玛或其他商店购物，可那些商店同样是世界劫掠链条的一环。人们感到，他们虽然不能支付双倍的价钱，但也不能不购买。为我的住所提供能源的电力，来自于从山顶开采的煤炭。这能避免吗？即便我“未并入电网”（off-grid），那么将我载到各地所耗的汽油，为我投递物品而消耗的汽油，能避免吗？对于这架吞噬世界的机器，我可以尽我所能与之无涉，却无法置身事外。人们注意到，生存在世上意味着助长世间的邪恶。人们通常要经历一个阶段，希望找到一个完全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社群——但当巢焚原燎、世将倾覆，找到这样的社群，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污染已经积重难返的地球，如果你不打算贡献你的绵薄之力，那又如何呢？无论你是住在森林里，以草根野果果腹，还是在郊区居住，吃着用卡车从加州运来的食物，这污染都会迅速蔓延。[9] 个人企图逃脱集体社会的罪责，是一种盲目的迷信，这与指望楼顶上的太阳能板为四千

9 尽管如此，人们仍在努力降低他们在倾覆世界中的共谋，在仪式层面上，这种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包含了对符号的操作，其目的是影响现实——甚至金钱也是一种仪式的工具——因此有巨大的实际影响力。所以，别让我的话劝阻了你对沃尔玛的抵制。更深入的讨论请参阅我撰写的在线文章“地球爱人的仪式”（最好在读过本书第8章之后）。

平方英尺的大房子供电一样荒唐。

抵制沃尔玛的运动，以及改革医保、教育和政治的运动，尽管值得称赞，但都迅速化为徒劳，因为它们妄图对抗货币的威权。要使这些冲动产生效果，与费力地逆流而游一样。一旦停下来休息，新的暴举、新的恐惧，因货币而产生的自然、社群、健康、精神的抽离，就会再次淹没我们。

那么，“货币威权”究竟是什么呢？通常人们认为，靠“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Council）和“三极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以及其他“先觉者”的工具，整个世界被一小撮邪恶的银行家操纵着。事实并非如此。然而在旅行和通信中，我不时会遇到大卫•艾克（David Icke）等人的读者，他们提出了有力证据，认为古代即有“新世界秩序”的共谋。这种共谋的象征是权力金字塔顶无所不见的天眼，是它控制着所有的政府与机构，其幕后操纵者是一小撮神秘、求权若渴的人，即便是罗斯查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也不过是它的傀儡。无奈我太天真，不能够理解这种阴谋论的真正本质。

虽然我承认我的天真，但我并不无知。这类说法我听过太多，但无一使我满意。虽然“9•11”和肯尼迪遇刺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虽然金融界、组织犯罪、政治权力的关系千丝万缕，但就一般而言，阴谋论过于高估人类成功管理、成功掌控复杂系统的能力。神秘事件确实持续发生，大卫•艾克等人所认定的“巧合”，也确实否定了常规的解释。但是，且沉浸在形而上学中一小会儿吧。最终你会发现，深层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及其无意识的幻影，会产生一个共时性的宫腔，这看起来非常像一场阴谋。这恰是无共谋者的共谋，每个人都是傀儡，但是傀儡的操纵者并不存在。

此外，阴谋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在心理上和实证中都是无法证伪的。阴谋论有一种阴暗的吸引力，它们吸引了我们最根本的愤怒，并找到了发泄这种愤怒的途径，找到了可恨可憎的对象。不幸的是，正如推翻了寡头执政者的革命家们所发现的那样，我们的愤怒误入

歧途了。真正的罪犯藏匿得更深，蔓延得更广。真正的罪犯是来自外星的霸主，在他们的飞行茶托（flying saucer）上统御着整个世界。开个玩笑。[10] 真正的罪人、幕后操控精英的傀儡操纵者是货币体系本身。这种货币体系以信用为基础，受到利息的驱动。它来源于旧时的离析，而这种离析日渐高涨；这一离析产生了竞争、贫富分化、贪婪；它产生了无止境的指数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为增长添柴加薪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精神资本的耗竭，这种离析将在我们这个时代画上句点。

随后的章节将描述这一过程以及利率的作用机制，阐述当前的经济危机如何成为积聚了几个世纪的趋势的顶点。这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何构建一个更好的货币体系。这种新的货币体系会产生与今天的货币体系相反的效果：它带来分享而非独占，它带来平等而非分化，它会丰富共有资源而非虢夺共有品，它产生可持续性而非增长。同样，这种新货币系统将体现当前正在发生着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人类身份向“联系的自我”的转变，它将礼物圈中的所有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任何隶属于这种大同，隶属于这种伟大转变（Great Turning）的货币，都可被当之无愧地冠以神圣之名。

10 并不完全如此。将邪恶的控制归罪于外星人或恶魔，象征性地传达了一个站得住脚的见解：这个世界的罪恶之源，超越了人类的能动性。傀儡操纵者是存在的，但他们是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不是人。至于外星人，我很难回答我是否“相信外星人的存在”。或许，外星人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偷偷夹杂了本体论的假设，然而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从客观上讲，事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所以我通常会回答：“是的，我相信。”

第6章

Chapter 6

高利贷经济学

尽管人们庄严承诺要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尽管数千万人哭泣着说“再也不要战争”，尽管所有人都希冀更美好的未来，我却要说：目前的货币制度依赖于利息及复利，只要这种制度还在运行，我敢预言，不出25年，就会发生新的、更恶劣的战争。我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当前技术进步的程度会导致工业业绩迅速打破纪录。虽然战争会带来巨大的损失，资本仍会快速积累，通过（货币的）过度供给，利率将下降（直至货币投机者拒绝进一步降低价格）。货币会被窖藏起来（导致可预见的通货紧缩），经济活动将减少，大街上游荡的失业者将增加……在这些不满的群众中，狂野、革命性的想法会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所谓“超级民族主义”的激增。国与国之间无法相互理解，最后的结局只会是另一场战争。

——西尔维奥•格塞尔（1918年）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货币是感激和信任的象征，是将礼物与需求相连的代理品，是交易的推动者，使得原本无法交易的人们能够进行交易。照此，货币理应使我们更加富裕。可事与愿违，相反，货币带来了不安全感、贫困，它消除了我们文化和自然的共有资源。为何会这样呢？

这些问题与当今的货币体系密切相关。它们根植于当前货币创

造和流通的方式，而这一货币体系的核心是高利贷（usury），即通常所说的利息。高利贷是礼赠的对立面，它并不是将需求之外的东西赠送出去，而旨在行使所有权所带来的影响力，以便获取更多利益——从他人手中取得，而不是给予。稍后我们会看到，高利贷的效果和动机均与礼赠截然相反。

自创生的那刻起，高利贷即已深植于货币之中。当联邦储备委员会（或欧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附息证券（传统上是国债，现在也可以是各种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他金融垃圾）时，货币就产生了。美联储或央行只需大笔一挥（或电脑键盘一敲），便凭空创造了新资金。例如，2008年美联储从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那里购买了价值29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联储并未使用既有货币进行购买，而是创造了新的资金：这笔钱是美联储在德意志银行账户上的一条会计分录。这是货币创造的第一步。只要美联储或央行进行购买，货币就是计息证券。换言之，货币创造会带来相应的债务，且债务的数额始终大于创造的货币数额。

刚刚提到的货币被称为“基础货币”或M0。它以银行准备金（物理上的现金）的形式存在。银行贷款给企业或个人，是货币创造的第二个步骤。这里，新创造货币同样是借款人账户上的一笔会计分录。当银行贷给一家公司一百万美元时，它并不需要贷记其他账户，只需将这一数额变为现实，一百万美元的新资金便被创造出来了——而债务要多于一百万美元[1]。这种新货币被称为M1或M2（取决于账户的类型），它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资本设备、劳务，等等。

以上是对货币创造的描述。虽然这种描述被广泛接受，但它并不完全准确。我将在附录里讨论其微妙之处。就目前而言，这种描述已经足够了，它足以准确描述高利贷的影响。

1 我故意留下了一些问题，如保证准备金要求、资本要求等限制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的举措，因为它们与本章对利率的讨论并无直接联系。

一则经济学寓言

高利贷既产生了当今特有的稀缺性，也驱动着永续增长的、吞噬世界的引擎。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将以一则寓言开始。这则寓言是非凡的、具有经济学远见的伯纳德•林特尔（Bernard Lietaer）写就的，题目是为“第十一块圆片”，摘录自他的著作《货币的未来》。

很久以前，在内陆的一个小村庄里，人们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每逢赶集的日子到来，人们便带着鸡、鸡蛋、火腿和面包四处走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交换彼此所需。在一年中的关键时刻，譬如收割或者暴风雨后某个人的谷仓需要大规模修缮时，人们从古老村镇带来的互助传统便被唤起。人们知道，如果某天他们遇到了困难，作为报答，其他人会帮他们渡过难关。

一个赶集日里，一位脚穿锃亮黑鞋、头戴优雅白帽的陌生人，带着嘲讽的微笑观察了整个过程。一名农人四处奔跑，只为将六只鸡赶到畜栏里，换取一只火腿。看到这一幕，陌生人不禁大笑起来：“可怜的人们居然如此原始”。农人的妻子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话，便反驳陌生人：“你认为你更会侍弄鸡吗？”“侍弄鸡？当然不是”，陌生人回答，“但有我有个好办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麻烦。”“哦，此话怎讲？”女人问。“看到那棵树了吗？”陌生人回答道，“我去树那儿等，你们中的某个人备好一大张牛皮，然后让每户人家都到我这里来，我会把这个好办法说给你们听。”

就这样，事情发生了。陌生人拿到了牛皮，剪出了圆皮片，在每块皮片上盖好了精致优美的印记。然后，他交给每个家庭10块皮片，并解释说，每张圆片代表一只鸡的价值。“现在，你们可以用圆片进行交易、讨价还价，不必再用笨拙的鸡了”，他解释说。

有道理。对这个穿着锃亮鞋子，戴着优雅帽子的人，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个家庭得到10张圆片后，他补充说："哦，顺便提一下，一年后我会回来，坐在这棵树下。我要你们每个人给我11张圆片。这第11张圆片是为了感谢我所做的技术改进，它是感激的象征。"但是，这第11张圆片从哪儿来呢？"提着六只鸡的农夫问。"你会知道的"，那男子宽慰地笑了。

假设下一年的人口与年生产力不变，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记住，这第11张圆片并没有被创造出来。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为了把10块圆片变成11块，每11个家庭中将有一个失去所有的圆片，即使大家都照管好了自己的农事。

所以，当暴风雨威胁到其中一户家庭时，面对灾难，人们开始吝啬时间，对这户人家的帮助也不像之前那么大方了。赶集的日子里，用圆片进行交易而不是用鸡，显得更方便了。但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产生了。村庄里传统的自发合作受到了阻碍，新的货币游戏产生了一股暗流，所有参与者都暗自竞争起来。

这个比喻表达的是，因为利益之争，竞争、不安全感、贪婪如何交织到了我们的经济体之中。只要生活必需品是按照计息货币计价的，竞争、不安全感、贪婪就永远不会消除。但是，让我们续写这个故事，看看利率如何为经济的永续增长制造无尽的压力。

林特尔的故事有三种结局。默认的结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或财富重新分配。每11个家庭中有一个破产，将他们的农场抵押给戴帽子的男子（银行家）；或者，他可以设法得到另一张牛皮，创造出更多的货币；又或者，村民们在银行家身上涂上焦油和羽毛以示惩戒，拒绝偿还圆片。每个以高利贷为基础的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选择。

想象一下，村民围着戴帽子的男子说："先生，可否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圆片？这样就没有人破产了。"

这名男子说："好吧，但我只给那些保证偿还的人。既然每张圆片的价值是一只鸡，如果鸡的数量超过欠我的圆片数量，我就把钱借给他。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不偿还圆片，我还可以抓走他们的鸡。不过我是个好人，如果鸡的数量不足，他们可以说服我未来他们会饲养更多鸡的话，我会为他们造一些圆片出来。所以，让我看看你的商业计划书吧！证明给我看，你是值得信赖的（村民可以建立"信用报告"帮你证明）。我的借款利息是10%。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饲养员，你的鸡群会以20%的速度增长。这样，你既能偿还我的欠债，也会使自己变得富有了。

村民们回答，"这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已经在以10%的利息创造圆片了，最后仍然不会有足够的钱还给你啊。"

"这不是问题，"男子说，"那个时候我会造出更多的圆片。旧的圆片到期时，我会造出新的圆片。我会很乐意借出新的圆片。当然，前提是你有更多的鸡，只要你不断增加鸡的数量，一切都不是问题。"

一个小孩走过去，对这名男子说："对不起先生，我的家人生病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圆片可以购买食品。你能借给我一些新的圆片吗？"

"对不起，"男子说，"我不能借给你。我只为那些能够偿还圆片的人创造圆片。如果你家有几只鸡可以抵押给我，或者你能够证明你努力一点能够繁殖出更多的鸡，我会很乐意把圆片借给你。"

除掉少数不幸事件外，这个系统运作了一段时间。村民们的鸡群增长得很快，足以获得额外的圆片，支付给戴帽子的男子。有些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遭受厄运或能力不济——确实破产了；更幸运、更高效的邻人接管了他们的农场，并雇佣他们劳作。总的来说，鸡群和货币供应量较上一年增长了10%。这个村庄和它的鸡群已经过于庞大，很多人加入到了戴帽男子的行列，他们都忙着为拥有好商业计划、繁育出更多只鸡的人们切割出新的圆片。

问题时有发生。很明显，没有人真正需要所有的鸡。"我们吃鸡蛋吃腻了"，孩子们抱怨说。"家里的每一个房间有羽绒床了"，主妇们颇

有微词。为了保持鸡肉产品的消费量增长，村民们发明了各种设备。每月购买新的羽绒床垫已成为时尚，为了放下这些床垫，必须购买更大的住房；院子也要更大，以便养下满院的鸡仔。与其他村庄产生纠纷，也用大规模投掷鸡蛋的方式解决。“我们必须创造对鸡的更大需求！”村长大喊，“这样大家都会继续发财。”而村长其实是戴帽男子的连襟。

有一天，村里的一个老前辈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村庄周围曾经苍翠肥沃的田野，现在已经变得肃杀和恶臭。植被遭到破坏，只为改种粮食喂鸡。曾经满是鱼儿的池塘和溪流，已经变成了污水池，满是臭烘烘的鸡粪。她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继续扩大鸡群，我们很快就会被淹没在鸡粪里！”

戴帽男子将她拽到一边，用宽慰人的语调告诉她，“别担心，路那边还有一个村子，有大量的沃野。村里的人们正计划将养鸡场迁到那里。如果他们不同意……不过，我们人数上比他们多。要说停止增长，你肯定是开玩笑。你的邻居如何还清他们的债务呢？我如何创造新的圆片呢？就连我，也会破产的。”

就这样，村庄一个接一个变成了臭烘烘的污水坑，村庄周围鸡仔成群，但没有人真正需要它们。村庄与村庄争抢着已经所剩无几的绿地，虽然这些绿地仅能维持数年的增长。尽管村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经济增长，增长的步伐开始放缓。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债务占收入的比重上升，最后，很多人花光了所有的圆片来偿还欠戴帽男子的债务。许多人破产了，只得受雇于人，领着仅能维持生计的薪水。雇主们自己也只能勉强偿还欠戴帽男子的债务。能买得起鸡肉产品的人越来越少，维持需求和增长已难以为继。面对鸡群过剩带来的环境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勉强过活，从而陷入了“丰而不足”（scarcity amidst abundance）的悖论之中。

而这正是目前的情况。

增长的迫切

这则寓言是对实体经济的反映。因为有了利息，在任何时刻，欠款的数额都大于现有的货币数额。为了创造新的资金从而保持整个系统正常运作，我们必须饲养更多的鸡。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创造更多“商品和服务”。售出更多商品与服务的主要途径是，将曾经免费的物品变成需要付费的物品。将森林转化成木材，将音乐转化为产品，将思想变成知识产权，将社会互惠变成有偿服务。

受到技术的唆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非货币性商品和服务的商品化突飞猛进，以至于到了今天，几乎没有什么物品未被货币领域所接纳了。诸多公有资源，无论是土地或文化，都已被圈围起来出售，只为与货币的指数增长并驾齐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森林化为木材，把歌曲化为知识产权的深层次原因。这是为什么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选择外卖点餐。这就是为什么草药偏方已经让位给医药制品，为什么照料儿童已经成为一种有偿服务，为什么饮用水跃居饮料销售增长的榜首。

以利息为基础的货币隐含了永续增长的迫切性，它驱使将生命、世界、精神转化为货币。这个恶性循环完成之后，随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被转换成货币，我们对货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众所周知，高利贷而非货币，它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容我详述。与戴帽男子一样，只有能合理预期你能够偿还贷款，银行或其他贷款者才会把钱借给你。这种期望的依据可以是未来的预期收入、抵押物或良好的信用。违约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强化了这种预期。债务的偿还不仅取决于偿债的能力，还取决于各种社会、经济、法律压力。为了履行约定的债务义务，法院可以下令没收资产[2]。虽然债务人监狱已经消失，但违约的债务人仍会受到催账公司无休止的骚扰，他们会被剥夺入住公寓、就业的权利，无法通过忠诚度调查。在道义上，许多

2　事实上，这在美国的一些州秘密重现了。人们被因为不回应拖欠债务的法院传票而被关入监狱。见玛莎·怀特，“美国的新型债务人监狱”，《每日财经》，2010年7月15日。

人觉得有义务偿还债务。这是很自然的：在礼赠经济中也是一样，那些收到礼物的人，会有道义上的赠予压力。

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货币来自于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或者继续举债。事实上，每次使用货币时，你都在保证，“我已经提供了服务，或为购买的物品支付了等价物。”每次借钱时，你都要说，你将在未来提供等值的产品或服务。从理论上讲，这对各方都有利，因为它跨越了空间和行业，将礼物与需求联系起来了。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是用今天的货品来兑换未来的商品。这与礼物原则是一致的。现在，我收到了礼物；将来，我回赠礼物。

问题始于利息。由于计息债务与新资金如影随形，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债务数额都会超出既有的货币额。资金不足驱使我们相互竞争，并带来长久、根深蒂固的稀缺状态。这好比“抢椅子”游戏，椅子从来都是不够的，没有谁是安全的。债务压力是这个系统所特有的，虽然有些人会偿清债务，但从整体上讲，整个系统的债务水平会不断增长。

持续、潜在的债务压力意味着，总有人没有安全感，总有人感到绝望——在生存压力之下，人们已经准备好伐倒最后一片森林，捕捞最后一尾鱼，向他人兜售帆布鞋，清算任何可用的社会资本、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和精神资本。我们永远无法达到“足够”，这是因为在以利息为基础的债务制度下，信用交易并不只是“用当前的物品兑换未来的货品”，而是“用当前的物品换取更多的未来物品”。为了偿还债务或生存，你要么从别人手中取得财富（因此需要竞争），要么通过抽取共有资源创造“新的”财富。

下面举例说明上述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假如你去银行，称：“银行家先生，我想贷款一百万美元，这样我就可以保护这片森林不受砍伐了。我不会从森林中得到任何收入，因而我无法支付利息。但是，如果你需要我偿还这笔钱，我可以卖掉森林，还给你一百万美元。”不幸的是，银行会拒绝你的提议，即使它有意接受。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借一百万美元购买这片森林，租赁推土机，伐光树木，将木材以200万美元售出，

然后付给你12%的利息，我自己也略有盈利。”精明的银行家会同意你的建议。前一种情况并没有被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因而也不会产生资金。货币会流向那些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人。这就是为何有那么多的带薪工作，旨在将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货币；而收回共有资源、保护自然和文化宝藏的工作少之又少。

笼统地说，债务人背负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压力，这对经济增长（其定义是，以换取金钱为目的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产生了整体压力。换一个角度看，债务始终大于货币供给，货币创造因而产生了对未来资金的更大需求。货币的数量必须随时间增长，新的货币属于那些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人，因此，货物和服务量必然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增加。

自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货币的无限性，这让我们相信永续增长是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的货币制度使增长成为必须，并推动了增长。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固有的增长压力是件好事，认为它产生了革新、进步的动机，通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满足了更多的需求。以利息为基础的经济体是增长的经济体，这在本质上是不可动摇的。除了一些激进的小派别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所有政策制定者都将经济增长视为成功的表现。

只要以换取金钱为目的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率与利率并驾齐驱，整个付息货币系统就会正常运转。若不然，会出现何种状况？换言之，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利息率，会发生什么呢？与寓言中的人们一样，在这个即将到达增长极限的世界里，我们必须顾及这一点。

财富的集中

经济增长几乎总是低于利息率，因而在这种条件下所发生的事情，并无神秘感可言。如果债务人无法用新创造的财富支付利息，他们必须拿出更多的现有财富交给债权人，并（或）保证把当前和未来的收入的更大一部分用来还本付息。当资产和可支配收入都耗尽时，他们只好违

约。当投资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投资的平均利率时，别无他法。对于借款人而言，一定比例的债务违约是不可避免的。

债务违约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对于不能带来普惠的决策——不能有效地生产大众所需商品的决策，债务违约会带来负面影响。贷款人会更加谨慎，以防把钱借给了不大可能对经济有所贡献的人。在压力之下，借款人会采取行动，对经济做出贡献。即使是在零利率的体制下，如果人们做了愚蠢的决定，也会发生违约，但违约不再有体制上的必要性了。

除了经济学家外，没有人喜欢债务违约——至少债权人都讨厌违约，因为他们的资金灭失了。借给借款人更多的钱，让他能够继续偿还最初的贷款，是防止违约的一种举措，至少也是一时之举。如果借款人面临暂时的困难，或者生产率的提高指日可待，借款人马上就能偿清借款，那么这种做法是合理的。贷款收回无望后，贷款人也常常会奉上资金，因为他们不想因为违约而记下一笔坏账，而记下坏账后，或许他们自己也破产了。只要借款人仍在付款，贷款人便可假装天下太平。

就本质而言，这正是过去几年里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状况。几年甚至几十年以来，利率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但违约并未报复性上涨，于是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威胁。在金融业（即债权人，货币的拥有者）的授意下，政府尽了最大努力阻止违约，在账面上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希望增长恢复以便继续得到债务利息收入[3]。他们希望我们“冲出债务的重围继续增长”（grow our way out of debt）。

在个人或企业的层面上，存在着创造“经济增长”的压力。在政治层面上，也存在同样的压力。为了得到偿债的资金，债务人承受着售出物品的压力，他恨不得出卖他的劳动。这正是倾向增长的政策所要做的——它们使这种“出卖”更加容易，也就是说，它们便利了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及其他资本向货币转换的过程。放松对污染的管制，等于

3 即使这些以债务为基础的资产都是垃圾，债务永远无法偿还，当局却尽了最大努力掩盖这一事实，并将债务的价值维持在面值的水平上。

把维持生命的大气层换成了金钱。对延伸到了古老的森林中的公路给予补贴，等于把生态系统转换成了金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私有化社会服务、削减开支，等于推动了社会资本向货币的转化。

这就是为何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样渴望“开拓新的市场”，渴望“推行知识产权执法”，等等。这也就是为何任何一项共有品，如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受关税保护的地方粮食产业、非洲的自然保护区，会不断受到来自政客、大公司或偷猎者的攻击。如果货币的疆域停止扩张，债务违约和贫富悬殊的缓冲带就会消弭，社会动荡产生，最终导致革命。在这个债务成指数增长的有限世界里，除了经济增长，别无选择。

这种增长是共有财富向货币的转变。如果其增速超过了利率，那么一切安好（如果不从人类或生态的角度看，至少从财政角度而言）。如果对鸡群的需求充足，并且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喂养鸡群，那么为了使鸡群增加20%，村民们愿意按10%的利率贷款。用惯常的语言来讲，即资本投资的回报超过了资本的成本；因此，除掉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借款人还获得了额外的财富。这与拓荒时期的情形一样，大量无主的果实成熟待采。在社会关系尚未被货币化的社会里，情况亦然——用经济术语来讲，这个社会被称为“欠发达市场”。只有经济增长才会导致“水涨船高”——债权人越发富有，借款人亦得小康。

但是，即便是好年景，增长也很少能赶上利率。想象一下，村民的鸡群只能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之前，他们只需要将新增长的部分交给银行家，而现在，他们必须交付全部增长（平均而言），外加部分现有财富和（或）未来盈利。当债务的增速超过货物和服务时，势必会产生财富（收入和资产）的集中。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经济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货币是“不育的”（即它不会像如牛或小麦

那样留下后代），按照利率借出货币是不公正的。到公元前350年，财富集中已不鲜见，随后也时有发生。在古罗马时代，财富集中故态复萌。只要帝国能够迅速扩张，获取新的土地和新的纳贡，那么一切将运转正常，极端的财富集中并不会发生。只有增长放缓，才会加剧财富集中。作为军团骨干的小农户一度多如牛毛，但他们很快沦落为债务奴隶。不久，整个帝国都受奴隶经济的统御了。

对于罗马和今天世界的相似之处，我无须赘言。随着增速放缓，当今很多个人和国家已经沦落到了类似于罗马债务奴隶的境地。收入用于偿债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果仍然不够，就得用既有资产作为抵押，直到无资可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房屋净值（home equity，即房屋总价减去未付清的房款——译者注）不断下降，从1950年的85%一路降到了今天的40%（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付清了房款，拥有自己的房屋）。换句话说，人们不再拥有自己的住房。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汽车，基本上靠银行汽车贷款租借汽车。大型企业的杠杆率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的收入的很大比例都交给了银行和债券持有人。对很多大国，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膨胀。在各个层面上，我们越发成了债务的奴隶，我们的劳动成果都交给了债权人。

哪怕你没有负债，利息成本也几乎会对所有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例如，美国政府支出（及税收额）的约10%都花在了偿还国债利息上。如果你租房居住，租金成本的大部分会用来偿付房东的最高花费——财产抵押。当你在餐厅吃饭时，餐费部分反映了餐馆老板的资金成本。此外，餐厅的电力成本、食品供应成本、租金成本，同样包含了供应商所支付的利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钱是一种纳贡，是对购买的物品征收的税款，它流入了货币所有者的腰包。

利息由六部分组成：风险溢价、贷款成本、通胀溢价、流动性溢

价、到期溢价以及无风险利率溢价[4]。对利息影响力的进一步讨论，可能会对这些成分加以区分，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后三个部分，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才具有高利贷的性质。如果这三个部分不存在，那么财富集中就不是必然的，因为这部分钱并未留在贷款人手中。（然而，增长的压力仍然存在。）在目前的体系中，这六个部分都对现行利率有所贡献。仅凭拥有资金，货币拥有者便能增加自己的财富。除非借款人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他们的财富，但这只出现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体中；否则，财富将集中在贷款人的手中。

一言以蔽之，利率的一部分隐含的是“我拥有资金，你需要资金，那么我要对你收取资金费用。我能够收取费用，是因为我有资金，而你没有。”为了避免贫富悬殊，这部分利率必须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否则，仅凭拥有资金，一个人就可以增加财富，并且财富增加的速度会高于生产性资本投资的平均边际效率。换句话说，快速致富靠的是拥有资金，而不是生产。在实践中，情况总是如此。其原因是，当经济增速加快时，当局就推高利率。虽然推高利率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但这使得货币所有者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越来越大[5]。若无再分配措施，经济形势的时好时坏会加剧财富的集中。

一般情况下，你拥有的资金越多，你花掉它就愈发不紧不慢。自从古希腊时代，人们就有了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偏好”：一种认为货币胜过商品的偏好，除非商品是迫切需要的。当金钱成为一种普世手段和普世目的后，这种偏好也就为不可避免的了。利息强化了流动性偏好，

4　其实，利息并非由“组成部分”构成——这只是解构式的杜撰——但我们可以假装事实如此。大多数货币当局只列出了三五个组成部分。除了最相关的零风险利率溢价外，其他成分的定义并未列出，您可自行查找。零风险利率溢价相当于美国政府短期债券（国库券）的利率，其风险基本为零，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有人会认为风险仍然存在，但如果真到了美国政府连印钞机都无法开动的地步，那么没有什么资产是安全的了。

5　美联储为银行准备金提供利率。这是将利率维持在增长率水平之上的新手段。目前的利率已接近于零，美联储计划在经济开始增长后提高利率（参见凯斯特（Keister）和麦克安德鲁斯（McAndrews）的作品“为什么银行持有如此多的超额准备金？”）。这确保经济增长创造的新财富归属于银行和债券持有人，他们曾从美联储的流动性融资中收益。

鼓励那些已经拥有货币的人继续持有它。那些需要资金的人，必须付钱给那些提供资金的人。这种支付——贷款利息——必须来自未来的收益，这是了解富人如何用利率压榨穷人的另一种方式。

人们或许能够证明，为期限长、流动性差、风险大的投资支付利息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利息实际上是对放弃流动性的补偿。这与礼赠的原则相一致。而礼赠的原则是说，当你送出礼物时，你收到的回礼通常会更加丰厚（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也没有百分百的保证；缺乏保证导致了风险的产生）。在目前的制度下，政府担保的活期存款及短期无风险政府债券也是付息的，在允许“投资者”获利的同时，也将资金掌控在了自己手中。这种无风险的成分作为隐性溢价被加进了所有的贷款中，它确保货币持有人拥有的资金会越来越多[6]。

我所描述的双重压力，一是向金钱的领域扩张，二是向着财富的两极分化发展，不过是同一力量的两个方面。货币增长无非是吞噬未被货币化的领域，或者它可以吞噬自身。当前者已被耗尽，后者的压力便陡增，财富集中便加速恶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另一种拯救这个体制的力量便出现了。毕竟，财富的两极分化、苦难的日益深重，是不可持续的。

财富再分配和阶层冲突

若没有财富的再分配，在以计息债务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社会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经济增长放缓时。然而，财富再分配总是遭到来自富人的阻力，因为重新分配的正是富人们的财富。因此，经济政策反映的是财富再分配和财富保持之间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趋

6 近年来，形势愈发严峻。无风险投资已扩大到了各种金融垃圾上，政府已经决定为其担保。通过保证承担风险的金融机构具有偿付能力，保证其金融产品具有流动性，政府有效地增加了拥有货币的无风险回报，加速了财富的集中。联邦基金利率或国库券利率不再是无风险利率的基准。在金融机构“大到不能倒”的背景下，出现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的概念，而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存在风险时，高利率的赌注实际上并无风险，那些出钱下注的人（以牺牲他人财富为代价），其财富增加的速度将远远快于其他人。道德风险是达到极端财富集中的捷径。

于进行最低限度的、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再分配。

传统上，自由党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来改善财富集中的状况。再分配政策包括：累进税、房产税、社会福利计划、较高的最低工资、全民医疗保健、免费高等教育，以及其他社会计划。这些政策之所以具有再分配的特性，是因为富人的税负较高，而支出和福利计划惠及全民，甚至对穷人有利。在以利率为基础的体制下，财富有集中的自然倾向。而这些政策中和了这种倾向。至少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与富人的利益相悖，这是为什么在目前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这种政策以阶层冲突为特征。

保守党政府反对再分配政策，认为财富的集中是件好事。如果你是富人，你或许会有同样的感觉，因为财富集中意味着“你之增益，他人之减损”。雇佣劳力会更加便宜。你的相对财富、影响力、特权将更大[7]。因此，为富人（短期）利益服务的政府会提出与上述分配政策相反的主张：固定所得税率、降低房产税、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医保，等等。

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国家面临抉择：要么通过社会支出、对富人征税，温和地进行财富再分配，要么听任财富集中，直至革命和暴力化的再分配出现。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罗斯福新政（New Deal）所缔造的社会妥协：富人依旧高高在上，但他们必须缴纳一定的税款，抵消资本所有权带来的利润。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妥协就会运转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

即使是如此温和的解决方案，也造成了大量不良后果。高额的收入税惩罚的是那些赚得多的人，而不是坐拥可观财富的人。税务机关与公民被拖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征战，而最终的解决办法却是，人们依靠律师和会计师，千方百计地偷逃税款。如此使用人力资源真的合理吗？此外，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一手向货币所有者交钱，一手从他人

7　保守观点认为，只有当资本回报率超过无风险金融投资利率时，富人持有资金才会刺激投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导致普遍繁荣。然而，在缺乏再分配的情况下会出现财富集中。这说明，上述情形是非常罕见的，并且会越发难于实现，直至消失。原因是我们已接近增长的极限了。

手中夺钱。

在以利率为基础的系统中，阶层冲突不可避免，无论其形式是明是暗。财富持有者的短期利益与债务人阶层的利益相冲突。20世纪30年代以来，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推行了各类社会再分配计划，但在写作本书时，天平倾向了富人一边，因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已经拆除了这些再分配措施。二战后，高增长一度掩盖了固有的阶层冲突，但那个时代已经落下帷幕。在货币体系经历根本性变革之前，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阶层冲突将更加激烈。本书的目的则是改变基本规则，并完全根除阶层冲突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缔造的社会契约已经被打破，债务水平已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更加激进的措施势在必行。在古代，某些社会通过定期免除债务来解决贫富悬殊。相应的例子包括梭伦（Solon）的Seisachtheia（希腊语“摆脱负担”）和古代希伯来人的豁免年（Jubilee）。前者意为“摆脱负担”，即取消债务，废除劳役偿债；后者则是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申命记15:1-2）。这些古老的做法比破产更为激进，因为债务人保住了他的财产和抵押品。在梭伦治下，甚至连土地都交还给了最初的主人。

免除贫困、灾难深重国家的部分外债，是更近的一个例子。例如，在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免除了海地的外债。而普遍取消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运动虽然声势更加浩大，且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但至今收效甚微。

破产是再分配的另一种形式。通过破产，债务人的大部分财产被没收，转移给债权人，而债务人的还款义务也被免除。但这只是在名义上将财富从债权人转移到了债务人那里，因为没收的财产价值要低于所欠的债务。在美国，个人宣布破产变得更加困难了。现行法律（在信用卡发行机构的授意下改写）迫使债务人签署一项付款计划，将其未来收入

的一部分交给债权人[8]。债务变得愈发不可逃避，成了一种终身的劳动索赔，于是债务人沦落到了债务劳役的地步。与“摆脱负担”和“豁免年”不同的是，破产使得资产转移到了债权人那里，债权人因此可以同时控制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债务人别无选择，只能再次债务缠身。破产只是财富集中的短暂中断罢了。

更为极端的是彻底的债务抵赖——拒绝向债权人偿债，或者拒绝转让抵押物。通常情况下，债权人可以起诉，并且动用国家权力没收债务人的财产。只有当法律制度和国家的合法性开始瓦解时，个人才有可能抵赖债务[9]。这种瓦解揭示了金钱和财产作为社会惯例的本来面目。若将金钱和财富这些符号上所附加的传统解释剥离掉，沃伦•巴菲特并不比我富裕，虽然他的房子更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即便这房子是他凭契约所有的，这也只是惯例问题。

在本书写作期间，公民个人并不能抵赖债务。对于主权国家，债务抵赖似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能够立即恢复，并且它有资源与邻国进行交易，那么该国可以拖欠主权债务。在实践中，很少有国家如此。统治者，无论民选与否，通常会与全球性金融机构结盟，并借此获得丰厚的回报。如果公然抵赖债务，它们将面临各种敌对行为。媒体会声讨它们，债券市场会与之反目，它们会被归为“不负责任的”、“左派的”或“不民主的”，政治上的反对派会得到全球势力的支持，它们甚至会成为政变或入侵的目标。任何政府，只要它抵制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被转换成金钱，都要面临被惩罚的压力。在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Aristide）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在1991年、2004年的两次政变中被推翻。2009年，这一幕在洪都拉斯上演了；而放眼全球，这一幕已经重演了

8　此外，某些类型的债务，如学生贷款和欠税，不能通过破产解除。

9　在2010年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记录危机（mortgage documentation crisis）中有迹象表明，这种解体已经开始。构成了抵押的协议网络受到了质疑。抵押贷款被分拆成小份，因而很难证明究竟谁拥有这些财产。大卷大卷的合同、法规、单据管理规范，在其自身的复杂性的重压下，开始崩溃。

成百上千次。（古巴和最近的委内瑞拉没有成功，不过到目前为止，两国脱离了被侵入的阶段。）2008年，厄瓜多尔拒绝偿还价值39亿美元的债务，随后进行了债务重组，按照1美元兑35美分的价格进行债务回购。2010年，厄瓜多尔发生了政变，且几近成功。任何抵制债务制度的国家，其命运皆是如此。

前经济学家约翰•帕金斯（John Perkins）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一书中描述了基本策略：首先贿赂统治者，随后威胁他，接着发动政变，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失败，就进行侵略。其目标是使该国接受并支付贷款——债台高筑，万劫不复。无论是对个人或是国家，债务通常始于大型项目——机场、公路系统，或高层建筑、家庭装修，或大学教育——对可观未来回报的承诺，实际上却喂肥了外部势力，栽进了债务陷阱。旧时，军事实力和被迫纳贡都是帝国的工具；今天，这种工具变成了债务。债务迫使国家和个人将他们的生产力贡献给货币。个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去做能够跟得上债务的步伐的工作。维持生计的农业以及地方性的自给自足，因为不能产生外汇，国家便将它们转换为了可供出口的农作物的生产，以及血汗工厂式的生产[10]。自1825年起，海地便深陷于债务之中。当时，海地被迫补偿法国在1804年奴隶起义中的财产（即奴隶）损失。何时能还清债务呢？永远不能。[11] 第三世界国家何时能还清债务，将其产出还诸本国人民？永远不能。你何时能还清助学贷款、信用卡和抵押贷款？永远不能。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主权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抵赖债务的时机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近。现状的合法性越发站不住脚，当几个债务人拒

10 世界银行的政策只允许将农业贷款用于出口经济作物的开发，这绝非偶然。原因是国内所消耗的农作物不产生偿还贷款所需的外汇。

11 本章写成之后，对海地在地震之后的悲惨境遇，世界各国深表同情，免除了其外债。目前，海地拥有了未指定用途的收入和资产，这可用于延长债务的理想抵押品。

绝履行债务时，其余债务人将纷纷效仿。抵赖债务甚至具有合理的法律基础：恶债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odious debt）。这个原则是说，由欺诈行为产生的债务是无效的。对独裁者带来的债务，国家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独裁者与贷款人相勾结，养肥了他们自身及其亲信，建设了对国家毫无意义的大型项目。个人可以对消费贷款和抵押贷款提出异议，认为它们是通过欺诈性借贷行为卖给他们的。或许，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些负担了。

通货膨胀

财富重新分配的最后一个途径是通货膨胀。从表面上看，通货膨胀是一种变相的、部分的债务废止，因为它允许用贬值的货币偿还债务。通货膨胀是一种均衡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减少了货币和债务的价值。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其一，通胀通常伴随利率的上升。一方面，货币当局通过加息来“对抗通胀”；另一方面，潜在的贷款人会投资于不受通胀影响的商品，而不是以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借出资金[12]。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当货币供应量增加，而商品数量并未相应增加时，通货膨胀就产生了。那么，如何增加货币供应量呢？2008年至2009年，美联储将利率下调到了接近于零的水平，并大大增加了基础货币，但这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是银行没有增加贷款，而借款会使有花钱意愿的个人和企业手中的钱增加。相反，所有新资金或者转化为了超额准备金，或者被投入股市；因此，股价从2009年

12 此外，当今的很多贷款都是以浮动利率计息的，利息往往与通货膨胀挂钩（现在甚至有与通货膨胀挂钩的国债）。

8月开始上涨[13]。

由于缺乏信誉良好的借款人，经济增长并无起色，低利率无法刺激借贷，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即使美联储购买了市场上的所有国债，将基础货币扩大十倍，通货膨胀仍然不会发生。要产生通货膨胀，资金必须在有花钱意愿的人手中。没有人花的货币仍是货币吗？守财奴埋在孔洞中、被他遗忘了的货币，还是货币吗？[14] 牛顿加笛卡儿式的机械哲学在直觉上认为，货币是一种物品；而实际上，货币是一种关系。当它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我们的联系便不那么紧密了，我们与维持、充实生命的物品之间的联系，也就淡漠了。

美联储的救市计划主要是把货币投放到银行系统中。然而货币也就一直滞留在银行那里了。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让货币流入有花钱意愿的人之手，有必要绕过私人信贷创造过程。私人信贷创造过程意味着，“只有当你能够产生更多资金时，你才能得到资金。”要做到这一点，主要的方法是依靠财政刺激，即政府开支。这种支出会导致通胀。为什么通货膨胀不好呢？因为没有人喜欢看到价格上涨。可是，若收入的增长与通胀一样快，那通胀会有什么危害呢？它只会对储蓄者造成损失；对负债的人而言，通胀是有益的。普通人害怕的是价格上涨而工资不升。如果价格和工资同时上涨，那么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资金闲置税，它将财富从富人手中夺走，进行再分配，抵消利率的影响[15]。在讨论了

---

13 从2008年7月到2009年7月，基础货币增加了一倍，从8380亿美元增加到了1万6千亿美元，但M1的增长低于20%，M2的增长不到10%。M1和M2实际上是比较狭隘的货币供应量的度量，但是美联储不再公布M3了（美联储于2006年3月停止公布M3的相关数据——译者注）。美联储之外的一些经济学家试图跟踪M3，如www.shadowstats.com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他估计M3同期增长了5%左右。截至写作本章之时（2010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供应量将增长（事实上，危机发生后，美联储还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增加货币供给，即在利率接近零时，通过回购债券间接投放货币；从2008年9月到2012年12月，美联储一共进行了4次量化宽松——译者注）。

14 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在附录中，仔细考察下会发现，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

15 通货膨胀具有另外一些负面影响，如“菜单成本”（来自于记录不断变化的价格）、记账困难，等等。在通胀水平高于商品持有成本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商品囤积。这些考量在负利率货币系统中发挥了作用。

负利息的货币系统之后，我们再对通胀的这一有益之处进行讨论。

标准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或赤字支出（deficit spending）为通货膨胀融资。靠税收融资的支出为何会引起通货膨胀呢？毕竟，通胀只是将一部分的钱夺走，给了另外一部分人。只有当取之于富人，予之于穷人（那些需要快速花掉资金的人）时，才具有通胀的特性。同样道理，如果资金流入了那些有花钱意愿的人之手，而不是大银行之手，那么赤字开支同样会具有通胀的特性。在这两种情况下，与其说通胀是财富再分配的结果或症候，不如说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手段[16]。

因此，通货膨胀并不是独立于其他财富再分配的基本形式。政治保守派，即传统上的富人守护神，是最敏锐的“赤字鹰派”，这绝非偶然。赤字支出往往是把资金放在负债者的手中，而不是放在拥有者的手中。因此，政治保守派是反对赤字支出的。一旦发生赤字支出，他们就要求紧缩，提高利率、偿还公共债务，而这些都与财富的再分配背道而驰。即使没有迹象显示通货膨胀的发生，他们也在为通货膨胀召灵。

原则上，任何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均可创造无限量的货币而无需征税。政府只需要将货币印制出来，或迫使央行购买零息债券。这的确会引起通胀——工资和价格上升，累积财富的相对价值下降。政府使用附息债券的机制创造货币，是我们货币体系本质的关键指标。政府主权权力的核心，乃是向货币所有者纳贡。

政府已经拥有了发行主权货币的特权，为何还要付给富人利息呢？自古以来，发行铸币的权利被认为是神圣的，并且具有建立社会权力中心的政治功能。很显然，这就是今天的权利来源。梅耶•罗斯柴尔德（Meyer Rothschild）说：“若允许我发行并控制一国的货币，我才不会关心谁制定了法律。”今天，货币为私人财富效力，这正是高利贷的基本原则。然而，高利贷的时代即将结束；很快，货币将为另一个主人效劳。

16　唯一一种并非由财富再分配导致的通胀，来源于战争或者禁运导致的物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时有发生。由于富人会囤积保值商品，因而这种通胀并未达到均富的效果。

你之增益，我之减损

当今，无处不在的贪婪、竞争以及焦虑的系统性原因，与我通常遇到的“新时代”（The New Age）的教谕相矛盾。新时代的教谕说：“货币只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如果人人都采取富足的态度，人人都可以拥有货币上的富足。”“新时代”的老师告诉我们：“捐弃我们对金钱有限的信念”，“抛开稀缺的姿态”，“迎接富足的涌流”，或者通过积极思考富有起来。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想法源于：世间的稀缺性是我们集体信念的产物，而非根本现实；然而，他们的思想与今天的货币系统并不适应。

林恩•退斯特（Lynn Twist）在其所著的《货币的灵魂》一书中，给出了这种思维的一个清晰例证。

> 货币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货币本身并无有权和无权之别。我们对货币的诠释，我们与货币的互动，造成了真正的荼毒。我们从中找到了自我发现和个人转变的契机[17]。

林恩•退斯特是一名颇有卓识的慈善家，他激励人们把钱用在正途上。但是，对于求钱若渴的人，这些话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记得，几年前我遭受破产之痛时，我的朋友告诉我，我的问题是“一种稀缺的态度”。虽然朋友本无恶意，但我对此颇为恼火。当拉脱维亚和希腊经济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人破产时，我们能将此全然归咎于他们的态度吗？那些贫困、饥饿的孩子们也有稀缺的心态吗？

在书的后半部分，林恩•退斯特如此描述这种恶毒的稀缺性姿态：“这就像孩子们的抢椅子游戏，座椅数总比玩游戏的人数少一个。你的重点是不要失去座位，不要成为争抢过后得不到座位的人[18]。”

---

17 林恩•退斯特，《货币的灵魂：开拓我们内在的资源财富》，2006年，19页。
18 同上，49页。

货币体系便是一场抢椅子游戏。在这场疯狂的争夺中，有些人必然会离开。在更深的意义上，退斯特是正确的。货币体系是稀缺心态的延伸，这种心态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文明的基本神话与意识形态，即我所谓的“自我的故事”以及“世界的故事”。但是，单单改变对货币的态度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改变货币本身，这毕竟是我们态度的体现。最终，自我之为与世界之为会变得密不可分，它们相互映射，彼此都是对方的媒介。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也会随之改变。我们在世上行事时，当我们必须面对，否则会被认为无能时，内心便会产生问题。就这样，我们从全球危机中嗅出了精神的层面，寻求安德鲁•哈维（Andrew Harvey）所说的“神圣激进主义”（Sacred Activism）。

几个世纪以来，稀缺心态一直主宰着我们的文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货币体系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当这种心态发生变化，货币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体现一种新的认识。在目前的货币体系下，将少数人的富足扩展到更多人身上，这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货币的创造过程会使系统性的稀缺持续下去。此之顺遂，彼之困窘。

释放罪恶感是“繁荣规划”的原则之一。这种罪恶感来源于“仅当别人穷困，你才能富裕”以及“我之增益你之减损”的信念。问题是，在今天的货币体系下，上述信念并不假！“我之增益”确是“你之减损”。货币化领域的扩张以自然、文化、健康和精神为代价。我们围绕货币产生的负疚感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金钱去创造美的事物、有价值的组织、高尚的事业，但如果我们带着这些目标去赚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无异劫此济彼。

我不会阻止你迎接富足的涌流，恰恰相反，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时，货币系统就会发生改变，以迎合新的观念。离析，是当今货币体系建立的基础。我们认为，我们是孤立、离析的主体，身处作为“他者”的宇宙之中，这种认识既是因，又是果。只有我们放弃这种身份，迎接真实、联系着的存在，才能真正迎接富足。而这种新身份，则完全摒弃了高利贷。

下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说明“繁荣规划”是有缺陷的，并间接说明目前的货币制度是有瑕疵的。几年前，一名女子推荐我加入一个名为“馈赠”的特殊组织。这个组织的运作方式是，首先“馈赠”一万美元给邀请你加入组织的人，然后找到四个人，让他们每个人“馈赠”给你一万美元。这些人外出交际，将馈赠的理念带给更多人，并从每人那里得到一万美元。这样，每个人最后都能得到三万美元。该组织的宣传品将其解释为普遍富足的表现。实现这一切，需要的只是慷慨的心态。不必说，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开个玩笑。相反，我问那名女子，“那你不是拿走了你朋友的钱吗？”

“不是啊”，她回答说，“他们最后会得到三万美元，只要他们充分信任馈赠的原则。”

“但他们要从朋友手中得到这些钱啊。最终，不再有人入会，最后加入的人将损失一万美元。馈赠的甜言蜜语是假，劫掠这些人才是真。”

您可能会惊讶地得知，从此我再无那名女子的消息。她的愤怒和抵赖，反映了整个货币经济中受益者的态度。而这个货币经济体，在结构上与传销何其相似。为了认识其本质，想象一下，每人一万美元的入会费以付息债券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你必须将更多人收入麾下，否则将失去你的财产。那些“底层下线”能够避免困窘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更多的人，将他们吸引到货币经济中来，例如，通过殖民（我的意思是“开放新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和通过经济增长，将关系、文化、自然等都转换成货币。贫富悬殊加剧仍然不可避免，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贫富悬殊就再次抬头。上述举措只是延缓了这一进程。背负债务的人对于还清债务一筹莫展：再无一人可夺金，再无一物可沽钱。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正是我们的文明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

第7章
Chapter 7

文明的危机

房子更大了，家庭却更小了；
便利更多了，时间却更少了；
学位更多了，思考却更少了；
知识更多了，判断却更少了；
专家更多了，问题也更多了；
药品更多了，健康却更少了。
我们可以一路畅通登月而后返，
却无法逾越一条街的距离，与新邻居相见；
我们制造了更多的电脑，存储的拷贝多得前无古人，
但真正的交流却更少了；
我们不缺数量，
缺乏的是质量。
这是快速餐饮与缓慢消化相伴的年代。
身材高大魁梧，人格矮小卑劣。
利润深不可测，关系浅尝辄止。
这是个橱窗盈满，而室中空空的年代。

——佚名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金融危机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可供转换为货币的社会、文化、自然和精神资本已几近耗竭。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货币创

造，留下的只是贫穷、无物可沽的我们。森林的破坏已经无法修复，土壤耗尽并被冲入大海，渔业资源捕捞殆尽地球回收废料的恢复能力也已经饱和。歌曲和故事、图片和影像的文化宝库也被劫掠一空，受到了版权保护。你能想到的俏皮短语，都已成了注册在案的口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能力被从我们身上夺走，又卖回给我们。食品、住房、服装、娱乐、托儿、烹饪，这些人类从未支付过的物品，现在却不再是免费的了。现在的我们必须依赖陌生人，进而依赖货币。生命本身已变成了一件消费品。

今天，我们卖掉了神圣禀赋的最后残余：我们的健康、生物圈和基因组，甚至我们自己的头脑。毕达哥拉斯的名言“万物皆数”，已近乎成真：世界已经化为了货币，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行将终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几近完成，特别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世界。在“发展中”世界（请注意，这些术语假定美国的经济体系是其他社会的目标），人们很大程度上仍然生活在礼赠文化中，自然和社会财富尚未成为产权的主题。全球化则剥离掉了这些资产，用以满足货币机器贪得无厌、既存的增长需求。然而，对土地的露天开采也即将耗竭，因为可供掠夺的东西所剩无几，小规模的抵制愈演愈烈。

其结果是，几十年来，货币供应量以及相应的债务额都超过了它承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与古典经济学的产能过剩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式的资本危机是利润下降、工资下降、消费低迷、成熟工业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为了将这一危机延至未来，我们不断开发出新的、高利润的产业和市场。资本主义的延续，有赖于新产业的无限供给，必须将社会、自然、文化和精神领域无限地转化为货币。然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愈接近枯竭，开采它们就会愈发痛苦。因此，与当前金融危机并行的，还有一场生态的危机和一场健康的危机，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命基础本身受到威胁之前，我们不能再继续将地球转换成货币了，正如我们不能进一步将健康换成货币了。

中国古代的一则神话说明了这一点。传说有一种怪物名叫饕餮，它

的食欲永不餍足。它吃掉了周围的所有生物，却仍然饥肠辘辘。最终，它转向自己的身体，吃掉了胳膊、腿和躯干，只剩下头。

头若离开躯体则无法生存。面对非货币性共有财富的耗竭，金融资本将吞噬它自己的躯体：金融资本所服务的工业经济。如果来自于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那么债权人会扣押资产。这是发生在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情况。例如，抵押贷款原本是偿清房款、拥有自己住房的一条途径，首付为房产净价的20%。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指望偿清抵押贷款，却只得不断进行再融资，其实质上是向银行租借住房。第三世界国家发现，他们的情况与之类似。他们被迫变卖国有资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紧缩计划，掏空社会的公益服务。你可能会觉得，你的整个生产劳动都在偿还债务；类似地，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个经济，都被引向商品货物的生产以便偿还外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措施类似于法院的强制债务还款计划。这二者都意味着："你必须节省开支，更加努力地工作，将收入的更大一部分拿来支付债务。把你所拥有的一切交给我，把你未来所有的盈利交给我！"退休金、教师工资、矿产、石油，都要拿来还债。这些年，奴役的形式虽然改变了，其本质依旧如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紧缩措施（austerity measures）甚至对债权人也是有弊无利。通过减少消费、需求和商业投资机会，这些措施将减缓经济增长。工作岗位蒸发，商品价格回落，作为债务人的国家和人民，其付款能力只会减，不会增。

因为短视，货币的利益方偏爱紧缩。债务人实际上是在说，"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来偿还债务。"这只是将不良债务拖延得稍久一点罢了。这是本章写作期间发生在欧洲的事（2010年）。为了偿付债券持有人，政府削减养老金，同意将社会公益服务私有化。在美国，财政紧缩的传言随处可闻，这引发了紧张气氛和骚乱。从债券市场和预算赤字的内部逻辑来看，财政负担的增加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外部逻辑来看，这是荒谬的：我们真要受到这些单纯的数字、比特位的驱使，蚕

食大多数人的生活标准，只为维护少数人的财富吗？

债务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可掠夺资产终将耗竭。眼下正在发生的崩溃，本应发生在很多年之前。各种虚假夸大的资产被创造出来，新债掩旧债，只为金融饕餮残食自身的时间再久一点。强撑这座辉煌楼阁的努力毫无效果，因为它必须维持增长——这些债务都需要支付利息。然而，当局故伎重施。当你听到“拯救金融系统”这样的话，请把它理解成“让债务留在账簿上”。当局试图找到一种方法，让你（和债务国）继续付款，并使债务不断增长。债务的金字塔无法持续增长，因为债务人的所有资产终将消解，他们的所有可支配收入都会用来偿债。债权人别无选择，只能借给债务人资金用于还款。不久，未偿还的余额会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债务人需要借钱付息。这意味着，资金从债务人向债权人的流通无法持续，甚至将永远切断。这是终结的阶段，通常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只是华尔街的金融“妖术”将它延伸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贷款以及以贷款为基础的衍生品开始失去其价值，债务型通货紧缩随即产生。

究其本质，最近的金融危机与更深层的文明危机通过两种方式相联系。计息的债务资金驱动了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债务危机这种症候就赫然出现。

当前的危机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最终阶段。根本的问题是，货币按利率增长，而经济增长必须跟上货币增长的步伐。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层出不穷。第一种有效解决办法是战争，而自1940年以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不幸而又万幸的是，核武器和人类意识的转变，限制了无休止的军备升级，大国之间不再发生战争。其他的解决方案——全球化、由技术支持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取代了之前未被商业化的人类功能，由技术支持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一度超出限度，最终将是金融饕餮式的自噬。除非存在我们尚未考虑过的、创造财富的新领域存在，除非我们陷入更深的贫困、苦难、疏离，难以逃脱的灾祸终将发生。

信贷泡沫被指责为目前的经济危机的来源，但它并不是经济危机

的原因，它只是一种症候。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投资回报的下降使得资本开始拼命寻找其他方式来维持其扩张。20世纪70年代末的商品、20世纪80年代储蓄贷款协业（S&L）的房地产投资、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公司股票、21世纪初的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接连出现，资本也从一种商品转移到另一种，维持了经济扩张的幻觉。但是，实体经济裹足不前。没有足够的需求以消耗过剩的产能，也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可换成金钱。

为了保持货币的指数增长，货物或服务的数量必须跟上货币增长的步伐，否则帝国主义和战争必将无限期升级。一切都已达到极限，积重难返。

今天，我们将自然转换成商品和关系的能力，已然处于停滞状态。但这并不是暂时的。我们可以转换的资源尚余一点。技术进步和工业改进方法，无助于我们从大海中捕鱼——已无鱼可渔；它无助于我们增加木材采伐——森林资源已近枯竭；它无助于我们能够泵出更多的油——石油储备即将开采殆尽；我们无法扩大服务部门——我们为彼此而做的、无需支付费用的事情，已经不再有了。经济增长的空间也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将生命和世界转换成金钱，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了。因此，为了点燃新的经济增长之火，即使按照左派人士的激进政策行事，撤销债务，停止收入再分配，我们也只会将所剩无几的神圣的自然遗产、文化和社群统统耗尽。经济衰退期间，随着各项脱离货币的功能被重新货币化，经济刺激计划充其量只会带来小规模的短暂扩张。例如，迫于经济形势，我和几个朋友替对方照顾幼儿，而在经济繁荣时期，我们将孩子们送入幼儿园。我们的互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机会：我们为彼此免费所做之事，都可以被转换成货币化的服务。将此推及整个社会，这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使经济增长回原来的水平，在这一刻，同样的危机将再次出现。“以紧缩促增长”——战争和通货紧缩的本质，只是一种维持现状的行为，随着未被货币化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新领域被逐一耗尽，其有效性正在不断降低。

因此，当今的传统思维尚不足以认识到当前问题的严峻。看看从一本金融杂志上摘录的例子吧：

> “[保罗]沃尔克是正确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担保抵押支持证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以及其他由电脑产生的复杂体和玩物，并不能解决经济体中的基本需求，只能满足华尔街的贪欲。没有了它们，银行将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投入资本和人才满足企业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危机便不会产生，崩溃不会产生，萧条也不会产生了。”[1]

这只是对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肤浅描述。担保债务凭证（CDO）等，仅是金融危机问题的症候，而非原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真实需求”可供银行投入资本，只有这些需求才会产生超过利率的利润，才构成了有效的贷款机会。在受到产能过剩困扰的经济中，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有的。因此，金融业玩的是数字游戏。担保债务凭证等，只是金融危机的一种症状，而非其原因。经济增长不可能跟上利率的步伐，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

学者们注意到，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与抵押支持衍生品和其他衍生工具堆砌成的金融业金字塔式传销，并没有什么差别。与麦道夫的骗局一样，后者形成的泡沫只能通过不间断的、指数式增长的货币流入才能维持。它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并超乎人们的想象。华尔街的赌场经济并不是唯一的、不可持续的金字塔式传销。规模更庞大的经济系统，有赖于持续不断地将有限的共有财产转换成货币，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像是愈燃愈高的篝火，不到燃料耗尽不会熄灭。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在燃油供应有限的情况下，火可以一直燃

1 唐•考克斯（Cox），“金融海洛因”，《案例策略》杂志，2009年11月12日，13页。

烧。将这一隐喻推而广之，最近经济中的非工业化和金融化，无异于用热量来产生更多的燃料。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创造的热量是总低于消耗的热量。显然，借入新资金偿还旧债本息的做法不能持久，但是，整个经济已经如此行事达十年之久了。

即使放弃这个愚蠢的念头，我们仍须面对燃料的枯竭（记住，我指的并不是字面上的能量来源，而是任何可以被转换为商品的、自然或文化的纽带）。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大多数提议都等同于寻找更多燃料，无论是钻探更多的油井、铺设更多的绿地、刺激消费者支出，其目标都是重新点燃经济增长之火，即扩大商品和服务的领域，这意味着寻找付费的新物品。我们的祖先很难想象，今天的我们会为水和歌曲付费。还剩下什么可以转换成货币的呢？

据我所知，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是第一位认识到这一根本问题及其与货币体系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他同时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原子核化学的先驱人物。20世纪20年代，索迪将目光转向了经济学，他是首先揭穿无限指数经济增长意识形态的人之一，他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推理从人口学推广到了经济学之中。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索迪的观点：

> “人们靠互相放贷收取利息过活的想法……只是另一个永动机式的骗局，一个规模宏大的恶俗妄想。索迪似乎是说，每个人靠利息过活，对社群而言是显然不可能的，为了公平起见，应对个人加以禁止。即使不加禁止，也应该加以限制，否则，债务持有人在有限收益上的留置权会持续增加，到某个时点，会超过这一收益的未来生产者愿意支付或能够支持的水平。此时，冲突便产生了。冲突将以债务抵赖的形式发生。债务以复利增长，作为一个纯粹的数学量，它不会遇到任何增速放缓的限制。财富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增长，但是，因为财富具有实体，其增长迟早会遇

到限制。”[2]

这种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联系，普遍见于峰值石油（Peak Oil）理论家。他们预测，随着石油生产开始“长期下行”，经济将崩溃。他们的批评者争辩说，由于技术、小型化、效率改进等缘故，经济增长能够独立于能源使用而存在。事实也确实如此，自1960年起，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超过了能源的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趋势更是加快了（参见图1）。德国甚至做得更好，自1991年以来，虽然经济增长显著，但其能源消耗基本处于平稳态势。然而，这种反对的理由只是片面的。的确，通过消耗一部分共有资源来代替对另一部分共有资源的消耗——用天然气代替石油、用商品化人类服务或知识产权代替鳕鱼捕捞业，是可以维持经济发展的。但是，若将社会、自然、文化和精神的共有资源视为一个总体，石油峰值论的基本论点仍是有效的。我们面临的并非峰值石油，而是“峰值万物”（Peak Every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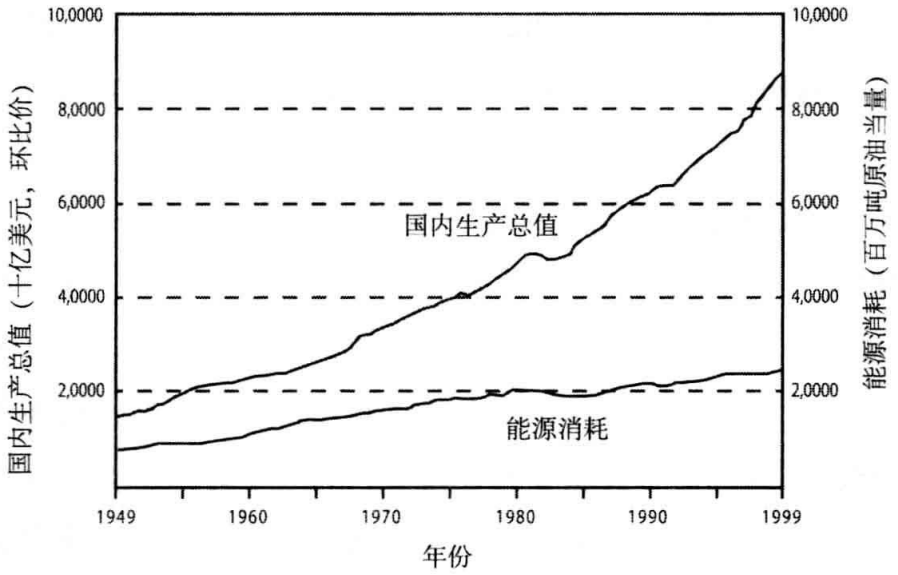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1949—1999）
（来源：美国能源部，2000）

2　赫尔曼·戴利（1980），“弗雷德里克·索迪的经济学思想”，《政治经济学史》，第12卷，第4期，475页。

在2008年，当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救市，出台货币刺激政策。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维持高筑的债台。债累债的高台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基础。其成功是暂时的，它只是拖延了不可避免的事态。一些华尔街人士将它调侃为“假装与拖延”（pretend and extend）。刺激经济的另一种方法，注定因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失败。它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我们已“达到最高限”：在不损害文明的生态基础的前提下，我们已经达到了自然能够吸收污物的最高限；我们已经达到了社会能够承受的社群和联系的损失的最高限；我们已经达到了砍伐森林的极限；我们已经达到了身体能够在一个资源耗竭、充满毒物的世界中生存的极限；我们同样达到了信用的最高限，我们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转换为货币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道路和桥梁吗？[3] 我们可以养护更多的路桥，维持与之相伴的工业经济吗？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充其量只会将目前的经济体制延长两到三年，随着我们完成了对自然、精神、身体和文化的劫掠，或许会有一段短暂的增长期。当这些共有财富的遗迹都消失之后，货币体制的“大解体”（the Great Unraveling）将势如破竹。

虽然“大解体”的细节和时间表无法预料，但我认为，首先会出现持续的通缩、滞涨、贫富分化，接着是社会动荡、高通胀、货币崩溃。在那一刻，我们今天正在探索的替代模式将成为现实，它会为新神圣经济的建立创造机遇。崩盘愈发深远，本书提出的建议就愈发引人入胜。

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人们会问，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购买黄金？囤积罐头食品？在偏远地区建立军事营地？”我的提问则与此截然不同：“你能够做的、最美好的事是什么？”四汇的危机提供了良机。若货币创造是至善之物，那么通货紧缩、货币的毁灭是至恶之物。但是，从我列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货币的创造使我们变得

3　有些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需要更多道路和桥梁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世界银行投资的典范，是将曾经自治的经济体整合到全球商品经济中的关键。或许第三世界国家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道路和桥梁，或许他们需要的是保护，使其免受全球商品经济的掠夺，而道路和桥梁正是全球商品经济的中介。

更加穷困了。相反，货币的毁灭却有赐予我们富足的潜力、它让我们有机会从货币和产权的疆域中收复失去的共有财富。

每当经济衰退，便可看到如下情况：人们不再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必须依赖于朋友和邻居。若缺乏达成交易的货币，礼赠经济就会再度出现，新型的货币便被创造出来。通常情况下，个人和机构会尽可能地因循守旧。对于经济危机，习惯性的第一反应是赚更多的钱和持有更多的钱，加速把事物转换为货币。在系统层面上，债务激增对共有财富的商品化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从对阿拉斯加进行石油钻探的呼吁，以及对商业性深海钻探的呼吁，我们知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不过，与之相逆的过程——将物品从商品与服务的领域移除，将它们放回到礼物、互惠、自给自足、社群共享的疆界之中，发生的时机已到。请注意：在货币崩溃之后，随着人们失去工作或者变得太贫穷而无法购买所需，这种情况会真真切切地发生。人们会互相帮助，真正的社群将重现。

即使你最关心自己的前途安全，社群也会是最好的投资。金融体系瓦解后，大部分投资会成为一张废纸或无用的电子数据文件。它们只能从包含它们、解释它们的社会协议网络中获得价值。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即便是实物黄金，也不能带来多少安全感。在极端的危机中，各国政府通常会没收私人持有的黄金——希特勒、列宁和罗斯福皆然。如果连政府都分崩离析了，那么持枪的人会劫走黄金或其他储存的财富。

我经常阅读金融网站“零度对冲”（Zero Hedge）上的文章，因为它对金融权力精英的欺诈手段及阴谋论有着深刻的洞见。以该网站的悲观态度看来，除了实物黄金和其他实物商品，其他资产都不安全。就目前而言，我同意其逻辑推理，但其深刻性仍嫌不足。如果系统崩溃，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临界点，那么产权制度——与货币一样，都是一种社会习俗——同样会崩溃。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没有什么比持有数百盎司黄金更危险的事情了。唯一的安全感在社群之中：你身边的人们的感激、联系和支持。如果您拥有可观的财富，作为您的投资顾问，我建议，您应该用它持久地丰实你身边的人。

在当前的系统崩溃之前，保护某些自然或社会资源、防止它们被转化成金钱的努力，都将加速这种崩溃，同时减轻其严重程度。你每拯救一片森林免受开发，每阻止一条道路免受开挖，你每建立一个合作性游戏组（cooperative playgroup），以及你每教授一个人自愈之法、建房方法、制衣方法，你创造或者投入公共领域的任何财富，你对吞噬世界的机器所做的任何限制，都将有助于缩短这台机器的寿命。在货币体系崩溃之时，如果你的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乐趣已经不必靠金钱来获得，那么对你而言，货币崩溃造成的严酷性要小得多。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层面，任何形式的自然财富，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肥沃的土壤，还是干净的水，抑或社群和社会机构，只要它不是将生命转换为货币的媒介，都将在货币崩溃之后，维系生命、充实生命。

我指的是通常所说的货币。稍后我将描述一种货币系统，它并不会将所有的真、善、美都转换成货币。它将演绎出人类的新身份、一种与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自我意识截然不同的自我意识。“我之增益，你之减损”将不复存在。在个人层面上，我们能够启动的、最深刻的变革，是自我意识的变革。笛卡儿和亚当•斯密所谓的孤立、离析、离散的自我，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即将形同枯槁。我们正在实现与彼此、与所有生命的总体的不可分性。高利贷掩盖了这种融合，因为它寻求的是离析自我的增长，以某些属于外部、某些属于他者之物为代价。或许，无论是从精神还是生态的角度，读到这本书的每个人，都会赞同相互联系的原则。实践它的时代已经到来。礼赠的精神体现了非离析性（nonseparation）的感觉，现在到了拥抱礼赠精神的时刻了。“你之减损，亦为我之减损”（在各个方面）已经再明显不过。永续得益的思想导致了我们贫穷的状态。我们是如此贫困，甚至因为缺少空气而喘不过气来。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思想，今天正在崩塌。

抗拒或推迟这种崩溃，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寻找实现经济增长的新方法，只会消耗我们仅剩的财富。别再抗拒人性的革命了，若要在危

机四伏的当下活下去，我们就不能以熬过危机为目标。这是离析的思维定式；这是负隅顽抗，抓住将朽的过往不放。相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大同”，想想我们能够奉献什么。我们每个人该怎样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呢？这是我们唯一的责任，也是我们安全感的唯一源泉。

稍后，我会在本书中进一步阐释这一主题——谋生之正道与投资之正道。我们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参与货币的毁灭，取代经济崩溃中无意识的货币毁灭。如果你还有资金进行投资，那么把它投资到以建立社群、保护自然、保护文化共同体为明确目的的企业中吧。对你的投资，期望它们的财务收入为零或为负吧——这是一种好的迹象，表明你不会无意识地将更多的东西转换为金钱。无论你是否有钱投资，你都可以离开货币经济体，将卖掉的东西收回。你为了自己或他人学会的、免费的事情，对回收和废弃材料的利用，你自己制作而非购得的东西、送出而非卖掉的东西，你教给你自己或他人的新技巧、新歌曲或者新艺术，都会降低金钱的主导地位，都有助于礼赠经济体的壮大。这个礼赠经济体能使我们安然渡过即将到来的巨变。礼物的世界与原始的礼赠社会、生态网络、世世代代的灵魂教谕遥相呼应。它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唤醒了我们的慷慨之心。在地球剩余的美丽被耗尽之前，我们应该听从它的召唤吗？

第8章

Chapter 8

时代的转变

至少百年之中，我们都必须自欺欺人——公平是违规，违规即公平；违规有用，而公平无用。贪婪、高利贷和预防措施，是我们能够苟延残喘的神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年）

货币：故事和魔术

随着经济的崩溃进展到下一阶段，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所认为真实确凿的，实际上只是虚幻缥缈的。两代人所认为的真理，变成了不确定性，尽管回归常态指日可待的希望仍旧挥之不去——“到2012年中期”或“比预期缓慢”——然而现实初显，那正常状态永远回不来了。

在面对个人生活的剧变，无论是爱人离世，还是盖世太保进城，人类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排斥。当悲剧突临，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无法相信这一切！”当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拖了很久否认经济危机时，我一点也不奇怪。想想2007年的一些话语吧：“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小布什如是说；“我不认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有什么严重问题”，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如是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正在经历房地产行业的调整”；“美国经济没有衰退”；“到2009初，房价才会恢复”。今天，当局“预测”（事实上，政府是想尽力实现它）

2010年至2015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将超过5%。[1]

当然，这类言论只是妄图实现认知管理的不实之词罢了。当局希望通过控制公众对现实的感知进而控制现实本身——通过操纵符号来操纵符号所代表的现实。其本质正是人类学家所谓的“巫术宗教思想”（magico-religious thinking）。金融精英们被称为神职人员，并非毫无道理。他们身着仪式般的华服，讲着晦涩的语言，手执神秘的铭文，仅著一字，仅挥一笔，便致财富起落、国家兴亡。

巫术宗教思想通常是有效的。无论是萨满教的仪式，还是拨款法案的签署，抑或账户余额的公布，当仪式被嵌入了人们都相信的故事，人们就会依此行事，扮演故事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对这个故事所认定的现实做出反应。过去，当萨满教仪式失败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件大事，它意味着世界的终结，意味着真实与虚幻的转变，意味着旧的“大众的故事”之终结，新故事的开始。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仪式加速失败的意义何在呢？

穴居的原始人在洞穴上画出象征动物的符号，期望对狩猎产生魔法般的影响。有些人因此对原始人冷嘲热讽。然而今天，我们造出了我们自己的护符，造出了我们自己的魔法符号系统，通过他们，我们确实影响到了现实。只需几个数字的零星变化，上千工人便以可立起一幢摩天大楼；只需改变另一些数字，备受尊崇的企业便关门大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不过是电脑中的数字，却导致国民遭受无尽的奴役，生产出运往国外的货物；大学生们思虑缠身，背弃自己的梦想，迅速加入劳动力大军，只为还清学生贷款。他们每月都会收到一张写满魔法符号的纸（对账单），一如伏都教里的魔法字条[2]。这些被我们称为货币的纸条，这些电子的光点，却有强大的魔力！

---

1 美国财政部，“公共债务年度报告”，2010年6月。

2 这并不是诋毁伏都教，也不是将伏都教作为原始巫蛊术的一例。事实上，我无意诋毁巫蛊。无论是现代金融体系还是伏都教仪式，符号魔法产生效果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现代仪式制度与原始的仪式制度几乎没有差别。

魔法是如何生效的呢？仪式和符咒确立并且巩固了我们参与的、一致认同的故事，即现实的故事，它协调我们的劳动，组织我们的生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大众的故事”处于崩溃的时代，它们才会失效。我们正在步入这样的时代。为了遏制始于2008年的危机而采取的经济措施，深入得并不够，其作用也只是短暂的。唯一有效的改革，必定会体现、肯定并延续新的“大众的故事”。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本质，让我们看清失败的现实及其与货币的关系吧。

政府对2008年的危机的第一反应是——否认，这被证明是徒劳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尝试了另一种认知管理。他们散布神秘的咒语，暗示说，政府不会准许房利美等主要金融机构破产。他们希望这种保证会维持对这些机构资产的信心，而这些资产有赖于这些公司继续拥有偿债能力与繁荣。如果这些象征性措施没有失效，房利美等金融机构便不会破产。然而不幸发生了。具体而言，破产的原因是，价值被赋给了抵押支持证券以及和以无法偿还的贷款为基础的其他衍生品。这与骆驼或数蒲式耳的粮食不同。与所有现代货币一样，这些衍生品具有价值，仅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具有价值。这种信念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各种信仰、传统、习惯、协议和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一步是将大量现金注入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中，无论是通过股权交换（有效地国有化这些机构，如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美国国际集团（AIG）），还是白白投入不求回报，正如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那样。在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美国财政部担保或购买了银行的不良资产，以改善其资产负债表，使银行能够再次放贷，但却使信贷泡沫继续扩大。这一计划并未见效。银行只是用资金（除了给高管作奖金外）对冲了不良资产的风险，或者用这些资金收购了规模较小的、资金状况更好的银行。他们并不打算贷款给已经刷爆信用卡的消费者，也不打算贷给危机中过度杠杆化的企业。资产价值持续下跌，信贷违约率持续上升，建立在衍生品之上的大厦继续倾颓。消费和商业活动暴跌，失业率直线上

升，欧洲开始发生街头骚乱。为何会如此？仅是因为电脑上的数字改变了。这确实令人称奇。只有当你看到这些符咒一样的数字所包含的协议，你才会理解到这一点。供应商将矿物挖出地面，将它们运送到工厂，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换来一些小纸条或者一些电脑里的比特位，而且只有得到银行许可，这些才能发生（即“提供信贷”）。

富人接受了数十万亿的馈赠，这让我们惊慌失措。在此之前，让我们再次讨论货币的现实。送出了这么多钱，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几乎无事发生。只是计算机里的比特位发生了变化，为数不多的、知道这些比特位意味着什么的人宣布，货币已经被转移了。这些比特位用符号的形式表达了某个故事的协议。这个故事涉及富者和贫者，拥有者与亏欠者。有人说，我们的子孙们将为这些救市和刺激计划背负债务，但他们也可以宣布，这些债务并不存在。债务只是一种认同，包含了债务的故事亦然。只有这个故事，这个定义了债务符号的系统依然存在，我们的子孙才会支付这些债务。但是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联邦债务、美国联邦外债，以及私人抵押债务和信用卡债务，将永远不会清偿。

那些华尔街大鳄们卷着十亿美元潜逃掉了，但这些资金又是什么呢？它们同样是计算机中的数字，理论上可以通过法令删除。美国欠中国的钱，或第三世界国家欠银行的钱，也是一样。只需一纸声明，这些钱就灰飞烟灭。因此，各种金融援助计划中的大量馈赠，不过是意识管理的又一次运用，虽然这种运用是下意识的。这些馈赠是一种仪式行为，旨在维系一个故事、一系列的协议，以及围绕着它的人类活动。它们试图维持伏都教灵符的魔法力量，将大学毕业生牢牢钉在晋升之路上，将中年人变为抵押贷款的奴隶——赋予少数人移山之力，却将大多数人深锁桎梏之中。

在谈到中国时，看清贸易不平衡背后的现实，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中国输送给了我们大量的货品——服装、玩具、电子产品，沃尔玛卖场里的几乎所有商品——作为回报，我们只是在电脑里重排了一些比特

位。中国劳动者与我们一样辛勤工作，然而他们的工资比我们少得多。若在帝国时代，中国会被称为“诸侯国”，它运送给我们的东西被称作“贡品”[3]。中国也将竭尽所能，熬过目前的“货币的故事”，其实质原因与美国的情况相同：精英能够从中受益。正如古罗马一样，首都和各省的繁荣，都建立在大众的苦难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苦难有增无减。为了安抚民众，让他们保持温顺和愚朴，帝国为大众提供了面包和马戏：廉价的食品、低俗的惊险刺激、名流的绯闻八卦，以及超级杯球赛。

无论我们是否宣告“货币的故事”的终结，还是它自顾自地终结，货币的故事都将拖垮一大堆国家，这也是美国不能直截了当地进行债务违约的原因。在这个故事下，中东的船为我们运来石油，日本为我们运来电子产品，印度为我们运来纺织品，中国为我们运来塑料制品。如果美国违约，那么上述美事将告一段落。不幸而又万幸的是，这个故事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其根本原因是，它有赖于有限世界下债务的指数增长。

在当前的债务通缩周期中，货币蒸发掉了，物理世界却没有任何改变。成堆的货币并未被焚烧，工厂没未被引爆，引擎并未停止运转，油井并未枯竭，人们的经济技能并未消失。我们赖以生存的食、住、行、娱乐等，都建立在物料和技能在人类的经济体中进行交换，而这种交换依然如旧。消失的只是我们协调活动的能力，以及我们对共同努力的关注。我们仍然可以规划出一个新机场，但却无法将它建造出来了。这神奇的魔力，把“机场应建在这里”这样的宣言化为现实的魔力，已经消失了。人类的双手、头脑、机械，保留了它们的能力，但前事已往，不复可为，唯一的改变是我们的看法。

于是我们看到了救市、量化宽松，以及其他挽救经济的金融措施。

3　有时，当霸权消减，达到自身失去创造财富能力，需要输入财富的地步时，权利会转移到诸侯陪臣那里。这似乎是当今的中国的经历。或许，中国的陪臣角色只是暂时的，它追求的是另一种目的。

它们仍然属于认知管理，只是一种深层次的、无意识的认知管理罢了。因为这是货币的本质，不是吗？货币只是一个社会协议，一个分配意义、分配角色的故事。货币的经典定义是：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价单位，这说明了货币的目的，但并未说明货币的属性。从物理的角度看，货币是万万不能的；从社会的角度看，货币却是万能的：它是协调人类活动、聚集人类集体意志的首要媒介。

政府投放数万亿美元的货币，跟先前连篇累牍的空话没什么两样。二者无非是对不同类型符号的操纵，它们失败的原因也相同：它们试图维系气数已尽的故事。被我们视为常态的常态，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不可持续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常态”是债务金字塔，即货币的指数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在这个层面上，解决的方案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通常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提议：财富再分配、财政刺激、有意降低债务的账面价值（write-down），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他们希望重燃经济增长之火——行将结束的第二个“常态”。

人类劫数迫近眉睫

这个故事即将画上句点，它比货币的故事深刻得多。我将这个故事称为“人性的飞升”。这个故事涉及无休止的增长，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货币系统是这个故事的化身，它使自然的疆域被转换成了人类的疆域。几十万年前人类首次驯服火种、学会制造工具，便是它的开始，当我们使用这些工具驯化动物和植物、征服荒原时，这一进程便大大加快了。在机器时代，它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我们建造了一个巧夺天工的世界，驾驭着自然的力量，将自己想象成了自然的主宰和主人。而现在，现实证明了这个故事的虚妄，这个故事也就必将接近尾声了。虽然我们佯称“世界并非我们所有”，虽然我们幻想是世界的主人，我们并未控制世界。技术扩散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后果，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健康、文明

的生态基础，都发生了恶化，随着痛苦、暴力和异化的加深，我们进入了这一故事的最后阶段：危机、高潮和尾声部分。故事讲述者的仪式徒劳无功。结局之后，故事将永久消亡。没有哪个故事能够摆脱这一命运。

生命不因青春期的结束而结束，文明也不会因为增长结束而停止演化的进程。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它与青少年到成年的过渡相类似。物理的生长停止了，重要的资源转向内部，促进其他领域的增长。

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种群层面，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都有两个关键的发展标志。首先，我们坠入爱河，这种恋爱关系不同于母子之爱。在童年时代，爱主要是接受。我很高兴将我的全部都交给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孩子们有权利为了心理和生理成长的需要去做任何事情。好的家长会提供有益于这种成长的资源，就像地球母亲为我们的成长所做的那样。

到目前为止，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仍然只是母子关系。在地球的宫腔中，我们最早以狩猎采集者的姿态存在，我们并不区分人与自然，因为在宫腔中便是如此。婴儿无法区别自我和他者，他需要花时间形成身份、形成自我，了解到世界并非是自我的延伸。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狩猎采集者并不单独区分“自然”和“人类”，相比之下，农人的生计依赖于对自然的物化与操纵，他认为，自然是不同于人类的一种类型。农业文明有如人类的童年，在此期间，人类具有了离析的个性，并不断成长。工业增长引发了青春期的窜高，在精神层面上，通过笛卡儿式的科学，我们将离析推到了极端。正如科学时代（The Age of Science）的人类一般，自我和少年的超理性得到了充分发展，完成了被称为“形式运算”的认知发展阶段。形式运算包含了对抽象物的操纵。然而，“阳极生阴”，离析之极端，将是下个一阶段的种子。这下一个阶段，被称为“大同”。

在青春期，我们坠入爱河，随着自我延伸到了我们所爱的人，充分理性和充分自私的世界瓦解了。新形式的爱出现了：它不单是接

受，而是给予、同创（cocreate）。同“他者”完全分离后，我们坠入爱河，并且体会到了一种大过于原始融合的再融合，因为这个更大的再融合，包含了离析的整个旅程。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运动的诞生，对这种全新之爱的大规模觉醒便产生了。在离析的巅峰状态，我得意洋洋地检视被征服的自然时，我们开始留意自然母亲的给予；我们开始注意到她的伤痛、她的伤疤，我们开始思考，我们不仅要向她索取，还应该回馈她、保护她、珍惜她。我们正在与地球恋爱。在那十年里，当轨道卫星传来了地球的第一张照片时，我们被地球的美丽所感化了。从外部俯瞰地球，是与自然离析的倒数第二步；最终的一步是宇航员的登天，他们将自然抛到了身后。他们也爱上了地球。宇航员拉斯基•施韦卡特（Rusty Schweickart）如是说：

> 从月球望去，地球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只是宇宙中一个珍贵的小点，只需一根手指便可以盖住它。然而你会意识到，这个小点，这个蓝白相间的小东西，对你来说意味着一切——所有的历史、音乐、诗歌、艺术，生死、爱恨、眼泪、喜悦、欢乐，所有的一切都在凝聚在那个用一根手指就可以盖住的小点上。你意识到，你的观点永久地改变了，一些新的东西冒了出来，我们与它的关系不再是当初那样了。

向成年过渡的第二个标志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古老的部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成年仪式和考验，通过有意识的隔离、疼痛、斋戒、致幻植物等，小的身份被打碎，然后被重塑，被重新整合成一个大的、超个体的身份。虽然我们本能地通过酗酒、毒品、友爱和军事欺侮等形式来寻找这种仪式，但现代男女对于成年过程的体验是不完整的，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青少年状态。只有当命运将我们与世界撕裂开时，这种状态才会结束。如此，我们便步入了更为广阔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我们一面

奉献，一面接受。向成年的过渡完成之后，男人或女人便完全拥有他（她）的天分之礼了。作为一名正式的社群成员，他们寻求为大众的福祉做出贡献。

人类正在经历类似的考验。积聚到我们身上的多重危机，是挑战我们身份的考验。在这个考验中，我们甚至无法确信是否能够生存下来。它召唤着未实现的能力，迫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世界联系起来。敏感的人们对危机产生的绝望，是这一考验的一部分。[4] 就像刚刚加入部族的成员一样，当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出现时，我们便加入了所有生物组成的社群，成为一名正式的“部族”成员。用我们独特的能力、技术和文化，我们将为整个社群的福祉做出贡献。

在人类的童年，体现增长、驱策增长的货币系统，从地球索取的越来越多，也许是合宜的。这是“飞升的故事”的组成部分。今天，这些即将过时。它们与成年人的爱情不相容，与同创的伙伴关系不相容，与人类成年阶段的赠予者身份不相容。若不创造出新式的货币，任何金融或经济的改革都无法获得成功。新的货币必须体现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自然不仅是母亲，也是爱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会有对货币的需求，因为我们需要魔法符号使“大众的故事”具体化，将它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模式，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来。货币的本质特性不会改变：无论是物理货币还是电子货币，货币仍然是神奇的护符，我们用它来指定角色、关注意图，协调人类活动。

本书的下一部分将对这种货币体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和心理进行探讨。我们将要到来的转变包含了个人的——有些人称之为精神的——维度。今天的高利贷货币是“离析的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故事说的是“我之增益，你之减损”。这也正是利息的本质：只有当你能够用我的资金赚得更多资金时，我才会与你“分享”资金。在系统的层面上，利息产生了竞争、焦虑，以及财富的两极分化。同时，那句“我之增益，你

4　其实，一切安好：危机正在实现其演化功能。但是，不要让它纾缓了你的惶恐。一切安好，只是因为我们对一切的认识都错了。

之减损”也是自我的座右铭，是现代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中离析的自我所信奉的陈言套语。

只有当自我意识扩展了，包纳了他人，“我之增益，你之减损”的陈言套语才能被“你之增益，亦为我之增益”所取代。世间真正的精神教义都包含了这一真理，从耶稣的黄金法则，到佛陀的因果报应。耶稣的黄金法则曾一度被误解，但其真实意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仅仅理解、赞同这些教导是不够的，很多人信仰一套，处事又是另一套。有必要彻底转变我们体验生命的方式，与集体的转变一样，这样的转变正在发生着：旧的“自我的故事”和旧的“世界的故事”会消亡，新故事将产生。自我的故事，也将有始有终。你有没有过一种体验，它留给你的是“不知己为谁”的感觉？

成熟的、联系着的自我、交互存在的自我，在给予和接受之间达到了平衡。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单个个体或是整个物种，你都尽力给予，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你会按需索取。

我只是复述了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这并非巧合。“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很好地描述了礼赠网络，无论这个礼赠网络是一个人的身体、一个生态系统，还是一个部族的礼赠文化，它也很好地描述了神圣的经济体。礼赠网络的货币构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大众的故事”、“自我的故事”、“世界的故事”，而非高利贷货币的故事。它并不是按指数增长的，而是周期性的，总会回到其起点；它鼓励保护自然、丰富自然，而不是耗尽自然；它重新定义了财富，将它作为慷慨的函数，不是积累的函数；它是富足的表现，不是稀缺的表现。它有潜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建立起原始社会的礼赠机制，提倡人类的礼赠，并引导这些礼物去满足整个地球的需求。

犹记得弱岁时阅读艾恩•兰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书中黑白相间色的字符、超理性和道德专制主义，深深地吸引了我年少的心灵。那本书是对孤立、离析、图利的自我的宣言，它对青少年的吸引力至今不衰。这本书用大部分篇幅嘲笑了“各尽

其能，各取所需”这一短语，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人们竞相摆出一种需求的姿态，希望分得更多资源，而生产者却毫无生产的动力。在某些方面，这一图景与共产主义阵营发生的事情如出一辙，它反映的是，在受制于稀缺条件时，现代人的极大恐惧——假如我予而不得，该如何是好？这种希望得到确定回报的愿望，是对慷慨的风险补偿，是利息的根本思维定式，是一种青少年式的思维定式。它将被豁达、成熟的成人自我所取代，将正式成为生命社群的一员。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赠予我们的天分之礼，它是我们最深切的愿望之一，否则我们的生命将不会完满。

大多数需求已经被货币化，而满足这些货币化需求所需的劳动量却在下降。因此，为了让人类的礼物得到充分的表达，多余的人类创造力必须转向他处，转向那些不利于离析的货币性需求或目的。毫无疑问，货币制度已经毁灭、且正在毁灭很多美丽的东西——所有不能私有的公共物品。下面是几个例子：一片不受光污染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没有公路噪音的宁谧乡村，一个充满活力、文化多元的地方城市经济体，未受污染的湖泊、河流和海洋，人类文明的生态基础。很多人都有可以贡献给这些美好事物的天分之礼，但是，没有人会因此付钱给我们，这是因为货币最终依赖于将共有品转换为私有品。而新式的货币则鼓励天下为公，从而结束了理想和金融现实之间的冲突。

高利贷货币是增长的货币，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的增长阶段，对于飞升的故事、主宰和控制的故事而言，它再完美不过。人类的下一个阶段，是与地球协同创造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人类的故事”，当下正在形成。其缔造者是永续文化（permaculture）、整体医学、可再生能源、真菌除污（mycoremediation，通过真菌等吸收污染——译者注）、地方货币、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与传统的报复性司法repudiation justice相对应，是由罪犯主动承担对受害人的补偿，旨在修复社会关系、促进罪犯早日回归社会的司法理论——译者注）、亲密育儿法（由美国人威廉•希尔斯提出，提倡父母与幼儿建立紧密关系，以

便为以后的融洽关系打下基础——译者注）等。要消除高利贷时代对自然、文化、健康、精神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如此苛刻，我们必须将这些礼物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似乎太过天真、太过模糊、太过理想主义，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特别引述了《人性的飞升》一书中的一些逻辑，这些会在本书的第二部详细讨论。现在，请衡量一下你内心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声音，自问："我能忍受更少的欲求吗？"你能忍受万分丑恶、且丑恶不断增加的世界吗？你能忍受"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的信念吗？你不能。这样的信念，会慢慢地吞噬你的灵魂。我们的头脑钟爱犬儒主义，钟爱其舒适和安全，却不愿相信超凡特殊之事；我们的心灵则不然，它鼓励我们追求美好，只有听从它的召唤，我们才敢于构建一个新的大众的故事。

我们来到世上，正是为了创造美好的事物，我将它称为"我们的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随着对这一真谛的领悟愈发深刻，随着危机四汇推动我们脱离旧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会理解这一真谛。它意味着："我之增益，并非你之减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生命乃是"以力之所及施与，以心之所欲求取"。现在就开始实践吧，虽然心有畏惧，但当真的做到这一点后，世界就会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然后我们会发现，离析的故事在货币中的体现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从未真实存在过。然而，过去的一千年没有白费。有时候，我们必须在谎言中活到极致，才能准备好迎接真相。高利贷时代离析的谎言已被揭穿。我们已经达到了离析的极致、极端的极致，看到了集中营和战事，看到了对真、善、美的挥霍浪费。现在，我们在漫长的飞升过程中习得的能力，将在迫近眉睫的大同时代发挥作用。

第二部分/PART 2

大同经济学

随着漫长的利息时代的终结，我们将重新与自然相融合，而源于自然法则的“人类卓异主义”（human exceptionalism）也行将终结。几十年来的环境保护运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超越自然规律。”我们对这一现实的感悟愈发痛彻。孩子从母亲那里索取幸福，却未曾注意到母亲的牺牲和痛苦。同样，在人类种族漫长的幼年时期，我们向地球索取，却没有注意到地球的牺牲与痛苦。我们的货币系统，我们的经济思想，无论好坏，都是索取的中介罢了。现在，我们与地球变成了爱侣关系，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伤害。在浪漫的结合中，你如何对待你的爱侣，她就如何对待你，她的痛苦，你应感同身受。

因此，目前的危机和向成年人的过渡，为人类带来了成年的考验。与地球处于一种同创的关系中的、联系着的自我，将是人类的新身份。新的经济系统即将出现，并将体现这种新身份。我们的经济系统和货币系统将不再是索取、剥削，不再是强化“离析的自我”的中介，而是给予、创造、服务和富足的代理人。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对这一神圣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叙述。这些要素已经再明显不过，只是潜藏在旧制度之中，甚至由旧制度中孕育而生。这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革新，而是对陈风旧俗的彻底净化、清扫。在离析的制度下，大同的时代已经孕育了太久。现在，它即将出世了。

第9章

Chapter 9

价值的故事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不再是真实的……你知道，故事可以脱离真实性。真相可以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变成谎言，因为真相已进入了另一个故事。泉水发源于此处，却涌流于彼处。

——厄休拉•K•勒奎

金钱与定义了我们文明的故事——自我的故事和人类集体的故事，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金钱是增长的意识形态和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对于这个星球的统御者而言，是“人性的飞升”，在我们与自然和社群解体的过程中，金钱发挥了核心作用。随着这些故事的崩溃，故事中的货币因素也分崩离析，于是我们有机会，可以有意识地把新故事的内容灌输到货币之中了。这些内容包括：联系着的自我，与地球以一种同创的关系共生。但是，如何将故事植入到货币之中呢？

在货币存在的数千年中，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加速演化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商品货币——谷物、油料、牲畜、金属——货币的功能是交易媒介，它虽然具有内在价值，但不具有法定价值。这个阶段持续了数千年之久。接下来是铸币阶段。金银的金属价值构成了其内在价值，在此之上，货币又被赋予了法定价值。从此，货币由材料和符号两部分共同组成。

信用货币出现在中世纪甚至更早。随着信用货币的出现，符号与金

属最终脱离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公元九世纪，中国首次出现了纸币（实际上是一种银行汇票），这种纸币甚至流通到了波斯[1]。同时，在阿拉伯世界，支票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早在12世纪，意大利商人便开始使用汇票，这种做法迅速传播到了其他地区，而16世纪和17世纪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便来源于此[2]。这是一项重大创新，它将货币供给从金属供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于是货币额度可以根据经济活动增长了。货币脱离金属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在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的部分准备金时代，银行汇票仍然是由金属支持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今天，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已经结束，货币已经变为由纯粹信用所支持。不过这并未得到广泛认同。许多权威，包括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本身[3]，仍称储备是货币创造的一个限制因素，但在实践中从未如此[4]。银行的总资本、借款意愿、借款人的信用资质——那些未实现的盈利潜力、可作为抵押品的资产，才是货币创造的真正约束。换句话说，是一系列的社会协议限制着货币的创造。这些协议中，利息的箴言至为重要，即货币应该归属于那些能够创造更多货币的人。今天的货币是由增长所支持的，若增长放缓，整个金融的大厦就开始倾颓了。现在便是如此。

与技术平行发展的货币，也有类似的缺陷。二者都受到无限增长的驱使：技术的无限增长源于“技术修复”（technological fix）的意识形态，即用更多的技术来解决现存技术产生的问题。货币不断增长，原因类似，即用发行的新债偿还旧债务欠下的利息。这种类比相当精准。另

1 罗伯特·坦普尔，《中华英才：三千年来的科学、发现和发明》，117页、119页。
2 保罗·瓦利，“伊斯兰发明如何改变了世界”，《独立报》，2006年3月11日。
3 参见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现代货币机制”，可在互联网上下载。
4 如果一家银行的保证金储备未满足规定，银行可以从美联储或货币市场借入必要的现金。如果储备不足是系统性的，那么美联储会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扩大货币基础。这就是为什么M0的增长通常要滞后于M1和M2数月，这与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人们由乘数效应所期望的正好相反（见史蒂芬·基恩，“漂泊骑士似的信贷”，《债务观察》，2009年1月31日）。这也是为何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最近的“量化宽松”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毫无帮助。

一个相似之处是，二者都僭越了本来属于其他关系模式的领域。对于技术也好，货币也好，我都不主张除新复旧。我相信，技术和货币发展了到目前的形式，是有原因的；信用货币是自然货币向纯粹法定性、纯粹的协议进化的、自然的终点。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自由挥洒，将货币这种认同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就像青少年一样，通过孩童时代的玩耍，我们已经获得了身体和心智的能力，现在是时候将这些能力用于它们真正的目的了。

一些观察家看到了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主张回归复古，用看得到的东西（如黄金）来支持货币。他们的理由是，商品支持的货币不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或许会消除无尽增长的驱策。这些“硬通货”或“真金白银”的倡导者，提倡的是一种返祖式的愿望，希望回归简单的岁月，回到事物的本初状态。他们将世界划分为了客观现实世界和传统世界两类，并认为信贷资金是一种幻觉、一个谎言，在每个周期的萧条阶段，它必然崩溃。事实上，这种二分法本身就是一种假象，是一种反映了更深层次神话的虚构——有如物理学中的客观论（doctrine of objectivity）——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们即将土崩瓦解。

有支持货币和无支持货币的区别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大。从表面上看，它们截然不同：有支持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实际的物品，而无支持货币具有价值，仅是因为人们认同它具有价值。这种区别是错误的：在任何情况下，最终赋予货币价值的是“货币的故事”，即一系列社会、文化和法律惯例。

在这一点上，主张“真金白银”或者赞同有支持货币的人可能会反对说，“不，重点是：有支持货币从其潜在商品中获得价值，而不是从协议中获得价值。”

大错特错！

首先，让我们考虑支持者所说的“真金白银”的标准例子：纯金银铸币。支持者认为，这些铸币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由有价值的商品制成的，这是其价值的来源。铸币上的标记则是一种担保，赋予了它

重量和纯度的保证。虽然很多人对往昔的真金白银有深切的恋旧之感，然而，历史上的大多数金银铸币却不符合这种描述，它们的价值要超过其商品价值（参见第3章）。它们与纸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无本质上的不同。纸币和电子货币并非对金属货币的背离，而是金属货币的延伸。

这种“商品价值”是什么呢？与货币一样，产权是一种社会架构。占有某物意味着什么呢？只有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占有是合法的，实体占有（physical possession）才构成所有权，只要合法，实体占有甚至不必是所有权的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在今天的商品市场，大多数投资者从未触摸到他们所购买的东西。他们的交易是一系列象征性的仪式，是通过共同信念进行的、承载着威权的符号操纵。所有权的虚构性并非最近才有。雅浦岛（Yap）上的居民用巨大的石轮作为货币，这种石轮货币笨重到无法搬动，但是，只要所有人同意某块石轮属于某个新主人，它就易主了。作为货币支持的黄金，并不需要离开金库。事实上，黄金甚至不需要离开地面。即使是在金本位制度下，大部分交易仍然会使用纸张或数字符号，只是将价值授予给这些符号的故事有所不同罢了。

此外，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协议。对黄金尤其如此，与牛、骆驼这样的商品货币相比，黄金几乎没有什么效用价值。黄金虽然可以做成漂亮的饰品，但与银或铂金等其他贵金属相比，它的工业效用微不足道（这里有待商榷，例如黄金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只是因为产量的缘故，其应用不如铜——译者注）。这意味着，黄金的价值只是源于惯例。有些人期望选择具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这些货币不依赖于惯例而获得价值。对这些人来说，选择黄金作为货币颇有些怪异。

黄金如此，其他商品亦然。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与货币一样，大部分商品的效用取决于社会协议的网络。铁锭对你有何用处呢？一桶原油呢？一吨工业级氢氧化钠呢？一蒲式耳大豆呢？只有在很多人使用它们执行特定的、相互关联的职责时，这些商品才具有不同程度的价值。换

句话说，商品与货币一样，除了内在价值之外，还具有法定价值。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商品与货币毫无二致。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有支持的货币意味着什么。从表面上看，这是不言自明的。以美元为例，1972年之前，“你可以用一美元向美联储赎回1/30盎司黄金”。但是，即便是如此简单的图景，也复杂无比。对于美元的使用者而言，即便到最近的美联储金库换取黄金，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这样做是被允许的。据我所知，银行间的给付结算并不涉及黄金的实际运输。银行的黄金储备存放在美联储的银行里，银行对黄金的所有权只是账簿中的分录，而非实体上的占有。即使没有实体的黄金存在，银行系统也会照常运转。除外国银行外，从未有人用美元兑换黄金。那么，为何要用美元作为货币，而不用黄金呢？我们认为，美元（在金本位时代）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为黄金；反之，“黄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被兑换成美元”，难道不是更对吗？

我们倾向于认为，在一个有支持的纸币系统或电子货币系统中，储备支持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不过是其表征罢了。但事实上，纸币才是真正的货币，纸币与黄金的联系，只是意义的投射。这个近乎神奇的方案，让我们相信了“价值的故事”。事实上，用纸币赎回黄金从来都是不可能之事。如果尝试赎回的人太多，央行可能（而且经常）会宣布不再赎回[5]。“纸币可以兑换x单位的黄金”这一无可动摇的事实，只是一种构想、一种合宜的虚构罢了，它取决于社会协议和共同认知构成的网络。

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废除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前，世界货币皆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如果一个国家拥有美元储备，那么该国可以通过美联邦储赎回数吨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汇兑黄金

5　事实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大萧条时期，几乎各国都有这种现象发生。货币的持有人先是从银行赎回黄金，然后从央行赎回黄金，导致央行最终无力招架。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6102号行政命令规定，持有超过某一限额的黄金属于非法。然而，由于美元的价值取决于黄金，美元并未变得一文不值。

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美国黄金储备都已运往海外，美联储因此濒于破产。于是美国宣布不再赎回美元，而在四十多年前，美国即已宣布，国内不再赎回美元。这表明，金本位只是一个合宜的虚构罢了。

宣布货币是有支持的，与从人类集体的信念中汲取力量的仪式性咒语相比，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对货币如此，对最近的、更为复杂的有支持货币更是如此。这样的例子有：伯纳德•林特尔的“特拉货币”（terra currency），以及最近的修订后的IMF特别提款权提议，它由反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一篮子商品所支持。这种方法有它的优点，事实上这也是本书所构想的。但是，这种支持很明显是一种虚构：没有人会用“特拉货币”在自家门口交换实体的石油、谷物、碳排放许可证、猪腩肉、铁锭的组合。没有人会将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种作为其个人财产。这种货币的价值是集体性的，只存在于巨大的经济关系网中。这没什么不妥！可赎回性并不是界定有支持货币的必要条件。可赎回性只是一则虚构之作、一个故事，但是故事也具有力量。一切货币皆是故事。除了在故事的宫腔中创造货币外，我们别无选择。我并不是要废止有支持货币。如果我们一定要选择有支持货币，也应该明白选择它的原因。与无支持货币相比，有支持货币之所以“真实”，并不是因为它由实物支持。它之所以真实，是因为我们将“价值的故事”灌输给了它。

“支持的故事”（the story of backing），可以用来限制、指导货币的创造。今天，创造货币的权利只限于银行，并且受到利润动机的驱使——货币属于那些能够创造更多货币的人。公正地讲，以及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神圣的职权，不能被轻易放弃。货币蕴藏着符号标志的神奇魔力，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协议。社会灵魂的一部分蕴含在货币中，因此，创造货币的权力应被小心翼翼地守护，就像萨满教徒守护他的药囊一般。若落入坏人之手，货币可被用作奴役的工具。我们能够否认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吗？我们能够否认，人民和整个国家已经沦落成了放债人的奴隶吗？

我们很自然地把货币同神圣之物联系起来。不仅如此，货币所到之处，都会变得神圣："因为你们的财宝在那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路加福音12:34——译者注）。自那时起，人们便开始崇拜黄金。当然，人并未明言拜金，但事实胜于雄辩。他们梦寐以求的正是黄金，他们甘愿为之牺牲的正是黄金，他们所崇拜的正是黄金，赋予了他们超自然的力量、特殊的神圣地位的，正是黄金。在以牛进行交易的文化中，牛的地位也是如此；在用小麦和橄榄油作为商品货币的文化中，小麦和橄榄油的地位也是如此。这些物品都具有神圣的地位，从而与其他商品区分了开来。

过去的一百年，是无支持的货币愈演愈烈的时代，是一切皆非神圣的时代。正如我在导论中所言，如果至今仍有堪称神圣的东西，那它必定是货币。与二元论中无实体的神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货币的特性：无所不在、抽象、非物质性，然而却具有干预现实事务、创造或毁灭的能力。将神性完全从实体性中移除，会使一切事物不再神圣——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是可触碰到的。然而神圣的缺位是一种幻觉：配上宇宙起源的故事，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对世界如何运转做出神秘的解释，配上牧师及其翻译者、层级结构、入会仪式（例如博士论文答辩）、价值体系等，科学俨然成了新的宗教。同样，货币的无支持也是一种幻觉。信用货币（虽然不是明确的有支持货币，但它仍是一种社会协议）的支持是整个经济体的商品与服务，从更深的意义上讲，是增长[6]。信用货币从创生之初起，就是一种计息债务，其价值的持续取决于商品和服务领域的无限扩张。无论用什么物品来支持货币，这种支持品都变成了神圣之物，因此，许多世纪以来，作为支持品的经济增长已经占据了神圣的地位。在各种以"飞升的故事"为名目的故事中（飞升意味着进

6　银行发行的信贷是由贷款抵押品所支持的，或者，在无担保抵押的情况下，信贷是由借款人的未来盈利所支持的。对整个经济而言，货币发行是由经济体中现有和未来的全部产品和服务所支持的，因此，信贷的总和是由经济增长的承诺所支持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增长，违约率将上升，货币供应量将萎缩。

步、利用自然的力量、征服最后的边界，主宰自然），我们发动了以多产、增殖为目的的圣战。然而对我们而言，增长不再是神圣的了。

本书具体描述了如何用今天的神圣之物来支持货币的发行。这些神圣物有哪些呢？通过人们创造、保护神圣之物的利他性努力，我们可以识别出这些神圣之物。未来的货币将被我们培育、创造、保护的物品所支持：未开发的土地、干净的水和空气、伟大的艺术品和建筑、生物多样性的基因、未使用的开发权、未使用的碳排放额度、未收取的专利使用费、未转化成服务的关系，以及未转化成商品的自然资源。甚至可以用仍然埋藏在地下的黄金。

与货币挂钩（因此用抽象的“价值”）不仅会将事物提升到神圣的位置，还会敦促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事物。黄金与货币的关联，促进了对黄金的继续开采（这严重破坏了环境）。在地上挖洞，再将洞填好，可视为无谓工作的一个缩影。然而金矿开采本质上与此无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金矿石挖出地面，运输矿石、提炼黄金，并最终把它放到地面上的所谓金库的洞穴中。其间所耗的精力，以及黄金的稀缺性，是调节货币供给的一种（随意的）方式。但是，为何不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协议，或者更为系统的过程，来避免这种无谓的苦工呢？

上述问题可由黄金推及其他商品。在以牛作为货币的地方，牛所承担的价值要高于牛奶和牛肉带来的效用价值。其结果是，人们豢养的牛群要比所需要的数目更为庞大。而黄金开采浪费了人类劳动，产生了环境负担。恐怕用任何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都会招致同样的效果。如果以石油作为货币的基础，那么人们有激励泵出的石油——燃料所需的油量，再加上作为货币的额外一部分。推而广之，这一原则是：“任何物品，一旦具有货币地位，其供给都会增加。”

利用这一原则，第11章提出了这样的货币系统，它会增加对人类和地球都有正面作用的物品的供应。如果货币由清洁的水、未受污染的空气、健康的生态系统、文化共有品所“支持”，会如何呢？黄金的社会协议驱使我们挖掘更多的黄金，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鼓励我们创

造更多的有益物品呢？黄金的货币化使我们嗜金如命、疯狂淘金，仅当满足真实的、迫切的需求时，我们才会放弃黄金。类似地，使用上述有益物品换得货币，会激励我们创造出更多的有益物品，建立起一个更加美丽的星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有为了响应真实的需求，为了创建美好的事物，我们才会牺牲它们。为了获得金钱，我们已经毁灭了太多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情愿毁灭货币本身。因此金钱应被毁灭。

货币支持的问题将我们引向问题的本质：谁有权创造货币？通过怎样的过程创造货币？应该用何种限度来约束创造的货币数量？货币体现的协议是什么？更为一般的问题是，我们赋予货币价值的故事是什么？

自古希腊时代起，货币一直体现着一种协议。通常情况下，这种协议是无意识的。人们认为黄金具有价值，却很少停下来思考，这种价值其实来源于惯例。法定纸币具有价值，显然是因为惯例，但据我所知，除了提供交易媒介外，没有人会在纸币发行上附加特定的社会目的。没有人提出“我们正在创造怎样的世界的故事？什么样的货币会体现并强化这个故事？”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带着扩展人类的疆域的目的，去创造一个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今天，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有机会将意识注入货币的选择过程中。现在，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希望在这地球上实现什么样的集体的故事”了，是时候选择与这个故事相匹配的货币体系了。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中，我将勾勒出这一货币体统的大体轮廓。这种货币体现了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的新关系，这个货币系统将带来、并丰富即将变成神圣的事物。我从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展开，阐述从当前出发，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这一神圣经济体将具有以下特点。

它将恢复以礼赠的心态对待职业和经济生活。

它将扭转货币引起的同质化和社会的去人格化。

它将是对生态系统的扩展而非侵犯。

它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振兴社群。

它将鼓励主动性并奖励企业家精神。

它将与零增长相一致，但会促进我们人类独有的礼物的持续发展。

它将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

它将推动视世界为神圣的新唯物主义。

它将与政治上的平均主义和人民的力量相一致，不会招致更多的集权控制。

它将收复失掉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精神资本的疆界。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创建它了！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本书将讨论并综合这个新的“价值的故事”的各个论题，而这个新的“价值的故事”将确定未来的货币体系。将上述内容合并在一起，一张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经济画卷便展开了。

第 10 章

Chapter 10

回报的法则

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于它不了解经济的本质；资本主义或许会失败，因为它不了解生态的本质。

——莱斯特•布朗

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将资源不断变成废料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这毋庸置疑。而资源消耗、货币、人口以指数级增长，更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增长不仅不可持续，更是非自然的。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物种的排泄物都可以被其他物种所利用，于是产生了“废物即食物”的格言。没有哪个物种会产生出像二恶英、印刷电路板、核废料这样会毒害其他物种的东西。经济的线性或指数级增长，明显违反了自然界的回报法则，违法了资源循环利用的法则。

神圣经济是生态系统的延伸，它遵循着生态系统的一切规律，其中也包括回报的法则。具体而言，工业过程或其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一切物质，最终都会以一定速率返回生态系统，为其他生物所用。[1] 这意味着工业废料的消失。万物皆归本源。同自然界的情形一样，我们的废料也会成为另一个物种的食物。

为何我要将这样的经济称为“神圣的”，而不是“自然的”或者

1 这意味着，即使是可生物降解的特殊物质，如果过量生产，也会违反回报的法则。

“生态的”呢？这是因为，礼物具有神圣的属性。遵循回报的法则，也就是崇尚礼赠的精神，因为在接受了赠予我们的礼物之后，我们会从这一礼物出发，给予回礼。礼物就是应该被传递下去，我们或是暂时持有礼物，然后传递给他人，或是利用它们、消化它们、吸收它们，将它改换形式之后继续传递下去。显然，无论信奉的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都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所在。

请从有神论的角度，想想世界赠予我们之物的源头。福音派教徒告诉我，破坏性地利用自然并无关系，因为上帝将自然赐给了我们。这大错特错。浪费礼物或者用之不当，都贬低了它的价值，都是对施予者的冒犯，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将你赠予他的礼物毁掉，你会感到失望、被冒犯，你绝不会再赠礼给他。我认为，任何真正信奉上帝的人，都不会对造物主如此不敬；相反，他们会尽生命、地球、万物之至善、至美。这意味着，我们应将万物视为神圣的礼物，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善待它们，并且回赠以礼。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零废料经济”（zero-waste economy）称为神圣经济的有神论原因。

对于无神论者而言，“零废料经济”从经济上实现了一切生物的相互联系。它体现了“惠己之心，推之及人”的真理。就同一性的实现而言，我们希望传递礼物、永不贻害、爱人若爱己。

现实一点说，这样的神圣经济要求去除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外部成本是由生产者以外的人所支付的成本。举例来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中央谷地的蔬菜价格之所以比宾夕法尼亚本地的蔬菜价格要低，原因之一就是，种植者并不需要支付外部成本，诸如地下水的减少、杀虫剂对周围生态的破坏、土壤的盐碱化等由种植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莴苣菜头的价格并没有反映这些成本。再比如，国家为农场产品的运输提供了大量的补贴。一桶燃油的价格不能反映它对环境的污染，不能反映为了保护燃油供应所支付的战争成本，以及燃油泄漏可能带来的生态损失。一旦所有成本都被计入莴苣菜头的价格，那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莴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价格就会高得离谱。我们也就只会购买

极少量的、来自远方的商品了。

许多现代工业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很多成本都被外部化了。譬如，法规对原油泄漏和核泄漏的庇护，使得远洋石油开采和核电站的建设变得有利可图，即使它们对社会的净效应是负面的。即使英国石油公司（BP）不惜以破产为代价，也无法挽回墨西哥湾泄漏的原油所带来的全部损失。成本由社会大众负担，财富实际上从公众那里流入了公司投资者的腰包。[2] 有可能带来潜在灾难的工业，实际上都是在把大众的财富转移给私人，把多数人的财富转移给少数人。他们盆钵皆满，我们自吞苦果。金融行业亦是如此，那些巨头们之所以甘冒风险，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便失败，政府也会对他们施以援手。外部成本将非经济的事物，如深海原油钻探和核电站，也变得有利可图了。

“吾得其利，人偿其费”的商业计划已经实行了数百年，而外部性的消除则使会这种计划受挫。我用氮肥为我的农田施肥，而下游水域富营养化的成本则由捕虾的渔民承担。我燃烧煤炭发电，但汞中毒带来的医疗成本，以及酸雨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却由大众来承担。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共有资源被货币化的变体。地球上的许多事物都有吸收废料的能力，它们都是公共资源，肥沃的土壤、海洋、含水层亦然。社会总的休闲时间，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公共资源，但它们即将耗竭，污染者造成的破坏，需要所有人花时间去清理。

“吾得其利，人偿其费”的做法是“离析的自我”的思维定式，它认为，他人的福祉与自己的福祉毫不相干。你的遭遇与我何干？只要我自己能够远离社会上和环境上的毒害，你的贫穷、疾病甚至牢狱之灾，我又何必关心呢？我为何要关心墨西哥湾的原油泄漏污染？我只需迁走便可。虽然太平洋上的塑料废物足有一千英里之长，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从离析的角度看，这确实无关紧要——理论上，我们可以置身事外。靠外部化成本来盈利是这种观点的核心，但是，从联系的角度看，从与他人、与地球相联系的角度看，你我的福祉息息相关，因为你

2　即使该公司破产，偿清了股东和债权人的资金，也改变不了过去的投资者已经盈利的事实。

我原本是不可分割的。内部化所有成本是“惠己之心，推之及人”这一原则在经济上的体现。

成本的内化也体现了礼赠文化的理念。在礼物的圈子里，你的财富即是我的财富，你的损失即为我的损失。财富增加，则你的回馈会增加；产生损失，你的回馈会减少。从这种世界观出发，将社会和自然的损害纳入到公司的资产损益表中，便是常事了。如果我依赖于你的馈赠，那么靠你的贫弱造成我的富足，便不合逻辑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最佳的商业决策是让所有人都变得富足，这包括社会的富足和自然的富足。神圣经济必须体现同样的原则，将商业利润与公共财富结合起来。

在理解了上述原则之后，通过“三条底线”和“完全成本核算”等概念，一些富有远见的商人们尝试将神圣的经济体变为现实。公司不再只是最大化自己的利润，而是要最大化人类福利、地球福祉和利润的总和，即“三条底线”。问题是，这些公司必须与只关心自己利润的公司竞争，而后者会把自身成本的一部分转嫁给他人和地球。因为“三条底线”和“完全成本核算”是衡量公共政策得失的有效方式（因为它们不仅包含经济利益）。当私人企业面临抉择时，三项基本原则的前两条往往会让位于第三条——利润。假设我是一名希望可持续捕捞的渔民，那么我会严格限制自己的捕鱼量。但是，低产量所带来的高成本会使我无法与工业化巨网捕鱼的企业竞争。这也是为何，需要一些强制措施，将三条底线整合一条包含三者的底线。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人们“明白”这些原则，而必须通过机制设计来调和自利和大众的福祉。

总量限制交易机制以及其他可交易的排放许可，是使外部性融入资产负债表的一种方式。[3] 尽管这些机制在实践中毁誉参半（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限制十分成功，但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许可交易机制却失败了），从原则上来讲，它们使我们在污染上限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个上限取决于地球或周边生物圈对有害物质的吸收能力。为了降低酸雨

3 这样的体系中，会设定一个总的排放上限，并将排放权分配给各个国家或企业。污染许可可以进行买卖，如果一家工厂的排污量降低，它可以将未使用的配额出售给其他工厂。

的危害，欧洲和美国设定了不同的上限，洛杉矶会设定自己的臭氧和二氧化氮的排放上限，作为一个整体，地球有它所能容忍的二氧化碳和氟氯碳上限。虽然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指出，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消费的减少，反而可能导致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商品价格更低，被解放出来的资本被用于生产，从而令消费更高了。而综合排放上限的执行有望改变杰文斯悖论。[4]

人们对现今的总量限制交易机制颇有微词。总体来讲，我同意他们的批评。真正的可交易排放许可机制应该是一种拍卖机制，它没有额外补偿、没有免费信用、没有“祖父条款”（即保留条款，即当新规定与旧规定相抵触时，仍可按照旧规定行事——译者注），并且严厉惩罚违规国家。即便真的如此，价格波动、投机性的衍生品交易、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执行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排放限制未被严格执行的地方，相对于严格执行排放限制的地方，企业生产者将获得巨大的优势，结果往往导致现有机制下排放的有害物质更多了。[5] 另一个问题是，在总量限制交易机制中，某项限制会使成员感到一种个体的无力感，因为原本属于他的资源或限额被转让给其他成员了。

总量限制交易机制的诸多问题，催生了另一种解决办法：直接对污染物征税，例如保罗•霍肯（Paul Hawken）的碳排放税。政府可以对化石燃料征收进口税，并将所得的收入用于公共支出。这是另一种内化成本的方法，特别适用于污染物对社会和环境的损失可被量化、损失可被修复的场合。但是，同总量限制交易机制一样，在国际上执行，是直接征税面临的一道难题。在那些拒绝征收排放税或拒绝严格征收排放税的国家，制造业获得的利润会更大；另外，为使污染总量达到预期水平，可能需要不断调整税率。

4　例如，因为引入了氯氟碳（CFC）灯泡而使照明的成本下降，某些便利措施会因此增加室外照明；当电脑内存更加便宜时，开发者会编写需要更大内存的程序；当某一资源的使用更加高效时，对该资源的需求会暂时降低，从而价格下降，最终导致需求上升。

5　在执行不严的国家中，污染者可以将限额卖给执行严厉国家的污染者，这导致后者以低成本进行污染，而前者的污染水平会超过两国总的污染上限。

对开征新税种颇为反感的读者，请仔细分析一下我刚刚提出的两种机制，总量限制交易机制和环保税。实际上，它们并不是对社会开征的新税种。某些人终会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埋单。在现有体制下，“某些人”或许是无辜的旁观者，或许是我们的子孙。这种税收机制实际上是让制造污染、并靠污染获利的人来承担成本。

无论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当污染成本被内化时，最佳的商业决策便与最佳的环境决策相协调了。假设你是一名发明家，你想出了个好办法，使得工厂在不减少产量的条件下，污染减小了90%。但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发明感兴趣，因为工厂不需要为污染埋单。一旦污染的成本被内化，你的发明将变得炙手可热。成本内化将带来许多全新的经济激励。我们内心的良善，希望不惜成本减少污染的愿望，从此不再与人类逐利的本性相抵触了。

总量限制交易机制和环保税，都有助于内化成本。我们也可以考虑，将它们一并融入货币系统中，创造出一种新型货币。这种货币有意识地体现了我们对地球的敬畏，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角色和目的的逐步认识。它将成本内化和产权不公的纠正（见第4章的讨论）结合了起来，在将公共资源还诸大众的同时，使得企业家精神自由驰骋，它实现了第9章所提到的原则：通过向货币注入神圣之物来神圣化货币。这些神圣之物包括环保税等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举措。虽然总量限制交易机制和货币发行的细节颇有“技术官僚制”之感，但其中蕴含的思想却简单明了：将货币与我们认为神圣的事物合为一体。这些会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

无论是通过传统的税收，还是总量限制交易机制，抑或是将它们融入货币，我们都将建立与地球的新关系。在“飞升”的岁月里，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在人类的疆域不断扩张的时期，在征服自然的故事里，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增长空间，我们不必为该捕多少鱼、该砍多少树、该挖多少矿、该排多少废气而达成一致协议。如今，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环境的极限已不再

是可以忽略的了。渔业、森林、清洁的水源、清新的空气，都即将耗竭。我们具有毁灭地球的能力，至少具有让她极度伤痛的能力。在我们面前，地球是脆弱的，就像坠入爱河的女子在爱人面前一样。把地球视为母亲已不合时宜了。孩童在向母亲索取时，不会考虑母亲的能力。恋人之间则不同。这亦是为何我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对当地、地方，以及全球的各种资源规定使用上限。渔业捕捞、地下水的利用、碳排放、砍伐树木、表层土壤的耗竭，都要加以限制，甚至严格监控，以便维持在可持续使用的水平上。这些资源——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矿物、生态圈等都将被认为是神圣的，以至于我们不会称之为“资源”，就像我们不会将自身的重要器官称为资源，也不会考虑将它们耗尽一样。

事实上，我们的确耗竭了我们自身的重要器官，原因与我们耗竭了地球的主要器官（这里的器官即资源——译者注）一样。对于希望从“联系的自我”这一角度来理解的人而言，我们对待地球之道，亦是我们待己之道。这种等同关系具有深层次的含义，简言之就是：我们抽干了地球了亿万年来所储存的化石燃料，就如通过化学和心理刺激耗尽了人体的肾上腺素一样。从传统中医的观点来看，肾上腺是“肾”的一部分（中医里中的“肾”是一个功能学概念，与西医中的肾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原文作“肾脏系统”——译者注），它被认为是“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也是“纳气”的重要关口。当我们与生命的目的相调和时，生命力的大门就会敞开，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当这种和谐被打破时，我们就需要借助外力（例如咖啡、激励机制、威胁等）强行从肾上腺中汲取生命力。与之类似，我们获得化石燃料的方法日趋极端，例如液压劈裂法、山巅移除法、油砂开采法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燃料，却被我们用在了无意义的或者破坏性的活动中，这与人类种群在地球上的目的背道而驰。个人活动与地球的活动相互印证，它们之间的联系不止是类比，我们通过咖啡和金钱这样的外部激励，强迫自身进行的活动，恰恰造成了对地球的掠夺。我们不会希望如此折磨我们的身

体，我们也不希望如此折磨地球。

在同地球的关系中，我们不应只是接受者，同时也应该成为赠予者。记住了这点，我将介绍回报法则的另一个方面，以及索取和给予的“天人合一”（cosmic unity）。有些物质无法被生态系统所循环利用，有些物质持续进入生态系统却永远作为废料存在。这看似是对回报法则的公然抗告。这种物质便是能量。能量由太阳辐射开去，被地球所吸收，循着食物链，从一种生物流向另一种生物，不可逆地变成其最终形式：废热（waste heat）。从太阳发出的所有低熵电磁辐射，迟早要变成高熵热量从地球辐射回去（在物理学中，“熵”是无序的度量。“高熵”对应的系统是无序的、低能的，“低熵”对应的系统是有序的、高能的——译者注）。[6]

古人崇拜太阳，这并不奇怪。因为太阳是已知的唯一只知给予而不求回报的事物。太阳是慷慨的象征，通过化石燃料、光电、风电、水电，它为整个生命王国提供了能源，也为科技领域提供了能源。有感于这种无限免费的能源，我体会到了古代太阳崇拜者们原始、纯粹、近乎赤子般的感恩之心。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与精神的传统一脉相承的是，我们也要回报太阳的恩惠，因为我们的感恩，太阳永久地照耀着。[7] 古代的祭日仪式不仅是为了感谢太阳，也是为了让太阳永远闪耀。太阳能是反射到我们身上的尘世之爱。如此，礼赠的圈子便运作起来了。我们甚至是与太阳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为何有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内心的阳光，它用温暖和慷慨之光，照耀着每一个人。

---

6 “迟”可以是数千万年之后，例如燃烧煤炭的情形（煤炭是由几千万年前吸收低熵太阳能的植物形成的，几千万年之后，它通过燃烧产生了高熵热量——译者注）。

7 有趣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不感恩的年代已经达到了巅峰。很明显，太阳的辐射已经发生变化，太阳圈（heliosphere）的强度已显著减弱。这或许是我个人的想象，但我记得，与我童年时期相比，太阳的颜色更显金黄了。2008年到2010年，太阳黑子的运动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见克拉克，“缺位的太阳黑子”）。有没有可能，作为慷慨的象征的太阳，正在进入一个暴风骤雨似的阶段，这个阶段反映了地球上的金融危机，而这危机是一场给予与索取的危机呢？

第11章

Chapter 11

共有的货币

一切货币皆是信念。

——亚当•斯密

我们生活在一个天然富足的星球上，它是我们赖以维持生命之礼的源泉。诚如第4章所言，这个星球的财富——土壤、水、空气、矿物质、基因组，并不是由人类创造的，因而不是任何人的私产，而是所有生物共同照管的财产。人类技术与文化的积累也是如此。它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的遗赠，是财富的源泉，任何活着的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份额。

但是，我们该如何对待将共有资源转换成产权的行为呢？这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产权的批判息息相关，但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生产资料由国家管理——这种办法既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也未解决真正的问题[1]。真正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中，权力精英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做出决策，并从决策中获益。产权的惯例——无论是共有还是私有——都被用来为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正名，为这种分配提供便利。

当下，人类经济的演化发展正在发生。它将比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更

1 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将国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但是马克思说，最终国家将消亡，产权的概念或许也会随之消亡。

加深入，因为它植入的“人类的故事”不仅仅是产权的新故事，也是对其虚构、惯例本质的认同。产权是一种社会协定，特定的人有特定权利按照特定的方式使用某物。除此之外，产权又是什么呢？产权并不是现实的客观特征；为了将产权具体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将产权变成了某种基本物品，不自觉地运用产权的概念奴役我们自身。我不认为神圣经济学可以从所有权开始。作为一种基本产权，所有权这一概念收买了一种世界观，一个自我和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客观宇宙中孤立和离析的自我，并不是真实的，也不再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然和文化的遗产应归集体所有。然而，让我们停止将产权的概念用于共有资源，而是想想，在经济体系中，我们该如何公正、有创造力、美好地体现其价值吧。

通过信用，只有那些能够扩大商品和服务领域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货币。在神圣经济体中，货币则属于那些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人们。对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或许莫衷一是，但许多重要的共同价值观正在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在我与各种政治派系人物的互动过程中，我十分欣慰地发现，有一种对社群、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的美妙产物的普世崇敬。通过分割强加在我们共同的人性之上，政治语言往往会模糊共同的价值观。而神圣经济体的货币则是围绕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展开的。

本章中，我将在货币发行的背景下讨论“政府”。但记住，与所有机构一样，政府也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巨大的变化。最终，我预见会出现分散的、自我组织的、新兴的、点对点的（peer-to-peer）、生态综合的政治意志表达。与此同时，我设想了一个货币的生态圈，这个经济系统具有多种互补的流通模式和交易模式。这些模式中会产生礼物的新扩展，它会将工作从受迫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保证所有人获得生活所必须的物品。

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目——或许是根本目的——是作为共有资源的受托人而存在。共有资源包括地球表面、地下矿产、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的肥沃、电磁频谱、地球物种的基因组、地方和

全球生态系统的生物群、大气、千百年长期积累的人类知识和技术，以及我们祖先遗留下的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宝藏。正如两百年来社会改革者所注意到的，没有任何个体可以合法要求这些东西的任何一件。

在过去，我或许会说，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管理好这些财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今天，我们与地球迈入了爱侣关系，政府体现了我们作为地球的代表，对这些财富的集体管理权。人类是地球的最新器官，我们不能再将人类视为地球上的另一种生命形式了。因为我们有能力改变甚至毁灭地球，而别的物种不能。

除了这些如此珍贵、稀有、有价值的共有资源之外，货币系统的基础——“价值的故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神圣货币的一部分供给可以用我们共同管理的物品来支持。让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首先，通过集体的政治协商，达成一项协议，确定用作人类目的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这些自然资源包括：海产品、土壤和水，大气吸收和转化废物的能力，土地从矿业采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化石燃料、金属矿石等其他财富，因为机器噪声而牺牲掉的宁静，因为城市灯光而牺牲的深邃夜空。这些决定往往需要科学的理解，并体现出价值判断。二者皆有助于我们就自然资本的消耗量达成集体协议。

这一决策是全新的。今天，虽然政府使用法规和税收来阻止或减缓对某些共有资源的消费，但是我们尚未一齐发问：“消耗多少才算够？”古代的村落通过传统、习俗和社会压力来保护他们的共有资源（“共地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2]，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需要参与政治协商过程来达到并实现这种共识。这个过程会同时考虑科学共识和社会共识。科学共识解决的是，如何使用共有资源才是可持续的；社会共识则是衡量内燃机等节省劳力的便利品与享受宁谧秋日乐趣的相对重要性。

2　共地悲剧是一个伪历史故事，旨在说明搭便车问题。在共地悲剧中，村庄里公共草地的植被破坏殆尽，因为对每个村民而言，放牧的羊群越多，好处就越大。当每个人都追求一己之利时，就会导致过度放牧，所有人都将受损。

一旦决定了每种共有资源可供使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用它们作为“支持”，发行货币。例如，大气每年可维持两百万吨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我们可以使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作为货币的支持。其他共有资源亦然。我们会得到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列出了我们同意用作经济目的的所有公共资源。这张清单可能具有如下形式。

> 货币的价值来自于从纽芬兰（Newfoundland）的鳕鱼捕捞业收获的30吨鳕鱼、每月从奥加拉拉（Ogallala）的含水层抽取的30万加仑水、10亿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从地下抽取2亿桶油的权利、使用x微赫兹频带的电磁频谱……

这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呢？一种方法是：政府创造货币，并花掉这些货币，正如今天政府花掉税收收入一样。当生产商用货币，赎回支持货币的物品时，这笔钱便在经济体流通了，并最终回到政府那里。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拍卖，或者预先设定支持品的相对价格，然后根据二级市场上的实际价格进行调整。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用货币赎回支持品，与对资源和污染征税具有同样的效果。

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地方政府发工资给警察、消防队员和当地的生态清理船员。其中一人将他的薪水花在食品、电力，以及他的汽车变速器上。食品来自当地农场，农场开支一部分来自于从当地的含水层泵出30万加仑的水。支付的数额归当地政府所有，而当地政府正是这些共有资源的管理者。

与此同时，花在变速器上的部分资金流入了某家工厂，而工厂运转需要支付污染许可费。这种成本体现在变速器的价格上，它反映了运送变速器所消耗的汽油污染许可费，冶炼钢铁所需要的铁矿石采矿许可费，等等。这些款项归属于不同的公共资源管理机构，有些管理机构是地方性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全球性的。任何公司，只要想出了消耗更少公有资源的办法，例如使污染减少或者使用古老废物堆积场的

再生金属，都会降低成本，赚取更高的利润。利润动机不再是我们治愈地球创伤的大敌，而是我们的盟友。

记住一个原则，无论使用何种商品作为货币，这种商品都会变成有价值的，我们因此会求取更多这种商品。当黄金是货币时，我们挖掘黄金，拥有的数量远超实际所需；在以牛作为货币的社会里，人们豢养的牛群亦远超其所需；如果我们使用石油或能源作为货币的支持品，我们会生产并囤积更多的石油。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依旧埋藏在地底的石油，使用依旧深藏于山中的黄金，使用依旧处于原始状态的森林作为货币的支持，那会如何？我们不也会提升其价值，寻求创造更多这样的物品吗？这种机制一点儿也不神秘。如果你必须支付石油开采造成的所有环境成本，你会努力尽力使石油封存于地下；如果你必须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埋单，你会努力减少污染。

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向央行以零利息借款从而创造信用货币，然后卖掉它作为信托品持有的共有资源，偿还央行的贷款。政府也可以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央行则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出售数额不等的债券，由此实施货币政策。重要的是，这些债券的利息为零（或为负）。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将对其可能性做出解释。若利息为正，那么对共有资源的需求将一直增长下去。

无论用何种方式，生产商都会有财务上的激励，尽量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当今却不存在这种激励，即便存在，也只是偶然罢了。这种体制将社会和生态成本充分内部化了。今天，当一家矿业公司抽干含水层，或者一支拖网捕鱼船队使渔场无鱼可渔时，他们对社会和整个地球造成的成本相对于生产者的财务状况而言，是外部化的。这个系统则不然。今天的消费者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对社会和环境的损害较多的产品，是最为廉价的，而公平贸易型、环境友好型产品却是非常昂贵的。若这些成本最终通过下游产业转嫁给了消费者，消费者将不再面临上述的两难境地。相反，在制造过程中避免污染的商品会更加便宜，因为污染配额将花费大量的资金。产品的价格将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自然共有

资源的量成正比。

有些人会反驳说，该系统将产生大量官僚作风和文案工作，因为它需要跟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每一种污染物、每一笔社会成本。我的回答是双重的。首先，该系统体现了对环境负责的新态度，它渴望知悉并承担我们的行为对其他生物造成的后果。想想我们忽视原油泄漏及核灾难对地球造成的严重后果吧。我们越来越渴望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了解我们的行动导致的一切后果，并对这些后果承担责任。对于“联系的自我”，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我，这种求知的态度再自然不过了。

其次，我所描述的情况，较之今天诡谲、不经济的管制体制，要简单得多。当今的管制体制将环境责任置于金融利润的对立面上。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它只不过将课税对象由销售和收入转为了原材料和污染。私人生产者必须为现在“免费”的东西付费了。可以将这种费用看作一种间接税，但是从另一角度看，生产者仅需支付他们索取的共有资源，仅需支付从所有人那里索取的东西，这才是公平的。这种税收实践了这样的原则——那些受益于生命社群的人，必须为生命社群做出贡献；那些索取了共有财富的人，必须为共有利益做出同等程度的贡献。

今天的税收是对共有利益的贡献征税，这与我们所希望的正好相反。我们可以索取共有资源，没有谁应当拥有共有资源而无须支付费用，但有一点是我们拥有的——我们自己的生产性劳动——是收入税的课税对象。同时，我们被迫缴纳流转税——销售税是其中一种——而并不用于交易目的的财富积累则不需要纳税。我们应当扭转这一状况。下一章所描述的货币体系与逆向的销售税类似，它将成本从支出转移到了窖藏上。

我成长在一个政治上倾向于自由党的家庭，他们认为，收入更高的家庭承担的税负也应更高。尽管如此，我对收入税一直抱有一种原始的愤慨：收入税是不公平的。为何生产力最高的人或者勤奋的人要缴纳更多的税？让人们为他们的索取付费，才是更加有意义的。

对于不熟悉非正统经济思想的读者，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建议与一段重要历史背景相契合，这一建议是几个要素的综合。A•C•庇古在20世纪提出了将税收转移到污染者和资源消耗者上的想法，随后，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保罗•霍肯（Paul Hawken）以及诸多环保主义者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消除利润的想法可以追溯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参见第4章中的讨论[3]。最近的一些思想家们提出了用能源和其他资源作为货币的支持，但据我所知，他们没有考虑使用仍在地底的能源和资源来支持货币。本章描述的则是亨利•乔治和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思想的扩展，它是两三种传统思想的融合。

共有财富中最重要的一项，无疑是土地本身。它也是财产制度最初的批评对象。这种批评源于乔治和格塞尔的建议，它完全适用于我所描述的货币体系。为什么乔治的“单一税”不是共有资源（土地）的使用费呢？这种税适用于土地的潜在价值，与土地上的任何改良无关[4]，它也可以以租赁费或使用权费的形式存在。很明显，对土地的改良是无法转移的，而且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努力，因此，承租人应当享有续约的优先权利。为了将公地收为公有，很多渐进、温和的方案应运而生，它们不需要没收既有的房地产资产，只需要执行既有的“地球属于每一个人”的原则[5]。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靠拥有土地获得财务利益。

对于电磁频谱、地下矿藏、基因组、人类知识累积的宝库，也是一

3　经济租的不公平、缺乏经济效益为古典经济学家所承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也对经济租提出了批评。见迈克尔•哈得逊（Hudson）的“赤字委员会的愚蠢”。

4　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土地的价值和土地上“改良”的价值，并不总能区分开来。首先，人类活动可以永久地改变土地及其“潜在价值”的。其次，改良可以吸引其他人到这片土地上来，推高土地的价格，而忽略其上的改良。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改良土地可以提高潜在的、未改进的土地的价值，创造了不改良的激励。我认为，这些困境是可以解决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本，但对其详述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5　例如，可逐步从私人那里逐步购入土地，设定既有财产净价3%的土地价值税，从而土地拥有者在拥有土地33年后才需要缴纳税款。

样。它们不应为个人所有，但可供租出，只是租金应归公众所有。或许，那些可以使这些资产物尽其用的人，恰是最渴望租赁它们的人。企业家精神仍有发展空间，甚至比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资源的获得不再以之前的所有权为基础，而是以最为高效的使用为基础。从“我有而你无”中获利，不再是可能的了。

以上对货币发行的叙述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认为创造出大部分货币的是联邦政府。这并非我的本意。很多作为货币支持品的共有资源，最好按照生物区域进行管理。例如，许多污染物会直接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影响，但它们对地球的影响是间接的。若对人类和树木的危害源于区域性的臭氧浓度过高，那么在全球范围内限制臭氧排放，并无太大的用处。发行以臭氧排放配额为支持的货币，可能是加利福尼亚州，也可以是规模较小的政府部门。在某些情况下，同一污染物对本地和全球的影响会有所重叠，因此污染者可能需要支付两种不同的限额费。

土地是最重要的共有资源，本质上，它也是一种地方性共有资源，事实上，土地提供了“本地”的定义。总体而言，以共有资源为基础发行货币，会导致财政权甚至政治权下放到地方。当然，也有一些共有财富或人类行为，需要整个地球的参与。然后，必须有政治力量在全球的层面上协调人类活动，这种协调有可能会通过货币的使用来实现。但是，全球或国家政府不应该管理本质上属于区域或地方的公有资源。如此多的共有资源——土地、分水岭、矿产、渔业，以及生态系统处理各种污染的能力都是本地的，因而我所描述的货币系统，对应着集权政府政治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将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力，而这些货币是由真实的财富所支持的。

如上所述，通过以信托方式持有的社群、人类和地球的自然财富，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发行货币。但是，并非所有的财富都来源于共有资源。对产权的批评可追溯到基督教教父们，他们认识到，一个人至少拥有他的时间、劳动和生命。毕竟，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世

上，也应该了无牵挂地离开。如果非要说我们出生时拥有某物的话，那么我们只拥有自己的生命。个人难道不能发行货币，个人难道不能得到由他们自身的生产性资源所支持的信贷吗？

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民营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创造货币。我们确实是我们的时间、精力，以及我们心中的创造力的管理人。是否可以说，我们“拥有”了我们的生活呢？如果国家政府以信托形式持有的生产性财富，可以用作发行货币的基础，为何私人实体不能呢？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货币改革者不以为然，他们的整套经济哲学都是围绕黄金或法币系统展开的，而部分准备金制度和私人信贷货币则遭到禁止。我将深入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它代表了新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思想路线。最近，货币历史学家斯蒂芬•赞林嘉（Stephen Zarlenga）的提议得到了美国边缘政治派别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国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废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是一些社会信贷运动的追随者、奥地利经济学派哲学信条的一部分。一开始，他们的逻辑对我颇具吸引力。20世纪中后期，货币与黄金脱钩后，债务增长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对此，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考量。这种观点称，100%的储备制度会防止债务超过货币，但是，在存在利息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财富的集中呢？

除了奥地利学派外，大部分支持100%准备金的人，也支持某种经济再分配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例如，政府用法定货币进行政府支出，直接将法币注入经济体，使债务人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偿还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是最早认识到无限指数增长的不现实、货币和财富是有区别的现代经济学家之一。索迪提出，应对银行设定100%的准备金要求，将银行排除在货币创造的业务之外。但他同时提出，政府应该支出足够的货币以防止通货紧缩。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是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建议，即他所谓的“100%货币”。梅

杰•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甚至进一步主张，应该支付一种社会红利给所有公民。

部分准备金制度或完全准备金制度是否与神圣经济学相一致呢？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与该问题的复杂性角力，我阅读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论文，有一天我认输了。我躺在沙发上，却豁然省悟。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一样，这两个系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这种疑惑在互联网上颇为盛行，一方面，它源于对部分准备金储备银行制度的一种过分简化的、不正确的观点；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它来源于一种人为的、不相干的、对惯例和真实的区别。在附录中，我会提出另外一种观点。

在这里，我只想说，无论是对部分准备金制度还是完全准备金制度，本书的建议同样适用。总体来说，我对包含了私人信贷的制度更有好感，因为它使得货币创造成为一个有机的、内生的、独立于中央政权的过程；第二，它更容易将经济合作的新模式纳入其中，如商业性的易货圈和互惠信贷体系；第三，它使金融中介和资本形成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第四，它简化了银行同业信贷结算。就像欧文•费雪的支持者所意识到的那样，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要阻止隐蔽形式的部分准备金存款，几乎是不能可能的[6]。我在附录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你可以试想：即使你写了一张欠条给朋友，你的朋友也可以将欠条交给另一位朋友，用它代替现金，于是你增加了货币供应量。

不论私人通过信贷创造货币有何优缺点，无论政府是否与央行合作

6 1934年，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在给费雪的信中写道："储蓄存款、国库券，甚至商业票据，与活期存款非常接近，就像活期存款非常接近于法定货币一样。现在，我们认为整个问题是由商业银行制度造成的，但是，通过其他形式的财务安排，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如果对活期储蓄账户收取100%的准备金引发了现金持有意愿的增加、现金持有便利的增加、以定期存款形式存在的流动性'现金'的增加、那么这种政策是毫无益处的。这类存款不能作为流通媒介的事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它们是现金余额有效的替代媒介。定期存款的扩张将流通媒介从"窖藏"中释放了出来，与活期存款一样，它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定期存款的紧缩，也可能造成通货紧缩。"引自威廉•R•艾伦（William R. Allen），"欧文•费雪和100%准备金提议"。

发行法定货币或创造信用货币，来源于私人银行系统外部的货币所占的比例都会增加。原因很简单：今天被用作私人信用创造基础的共有自然资源，都会变成公有的。不久以后，公司就无法靠耗尽含水层所得的未来收益来获得商业贷款了。含水层耗尽的成本将被内部化，并通过使用权费交还给公众。获利的机会仍然存在，例如，有人可以发明一种更高效的或产量更高的用水方式。这些物品是私人信贷创造的合法基础，而夺走本应属于大众的物品并用之创造货币，将是非法的。

如今，共同财富的所有权十分集中并且为私人所有，由此产生的利润，也是高度集中的。全部成本，包括能源、原材料，以及土地和其他公有资源的公平租金价格，都由生产商（最终是消费者）支付，那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会归共有资源的管理人所有。这种情况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油田类似。外国生产商仍然运营油田，但他们的利润来自于开采石油的服务，而不是油田的所有权；来自于所有权的利润归国家所有。这些钱如何使用，由政治制度决定，它可以被一小撮贪官攫取，或者用于建造公共工程项目，也可以作为一种补贴（在阿拉斯加，每个居民每年可获得几千美元的支付）直接支付给人民。从石油推及所有共有资源，这种使用费将取代目前的税收，为各级政府带来可观的资金，特别是在当地和生物区域的层面上。

以公共资源为基础的货币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会花大量金额购买今天的廉价商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体现了我们传递给他人或子孙后代的成本。与服务相比，商品会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人们有了维修、再利用、回收的激励，使得新电视比维修旧电视更便宜的扭曲经济，将一去不返。计划淘汰（planned obsolescence）的财政激励也将一去不返。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在一些行业中繁盛了起来：极其耐用、容易维修的机器被租赁出去，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

两代人以前，连烤面包机这般简朴的家用电器，坏掉之后也会被送去维修，甚至鞋子和衣服也会进行织补。这些服务具有与生俱来的本地性，因而有助于振兴当地经济。不仅如此，通过将重要性

（materiality；也有物质性之意，这里是个双关语——译者注）扩展到一般物品上，这些服务有助于形成一种关怀物质的态度。充满一次性产品的生活，并非丰饶富足的生活。如果我们对神圣经济的对象——人们创造并交换的东西并无崇敬之感，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神圣的经济呢？就个人层面而言，建立在对自然的保护性敬畏之上的货币系统是令我欣慰的，它会让我们以同样的崇敬态度对待用天然原料制成的物品。

就集体层面而言，在这种崇敬之下，政府支出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通过将共有资源收归公有而得到的大量资源，都可以用来弥合过去几个世纪对共有资源的劫掠而造成的损害。生态灾害会迫使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森林、湿地、海洋、大气上，转移到所有在工业时代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上。这种迫切性将使我们远离消费和战争。

对于有增长驱策的经济体系而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通过殖民地还是对人民的镇压，我们需要不断地将新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投入到货币机器之中。战争同样会增加消费，减轻前面描述的产能过剩危机。资源竞争因而成为20世纪里战争的主要动力，既有大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战争。资源消耗的限制是稳态经济或负增长经济的基石之一，它将绕过战争这一主要驱动力，将大量的资源解放出来，用于地球创伤的治愈。

我所描述的货币系统扭转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产权不公，扭转了少对多的掠取，扭转了非法利用共有资源所体现的对未来的掠取。当然，仍有一大块内容缺失掉了：正如第5章所述，同样的不公既包含在产权中，也包含在货币中。虽然我已经对新的“价值的故事”进行了叙述，叙述了如何在货币中体现它，但我尚未触及它驱动增长或致财富集中（或二者兼有）的强迫性。这种强迫性与“价值的故事”无关。货币能否像土地或大气那样被作为共有资源呢？它能否像征用共有资源那样扭转利息机制，让拥有它的人们通过所有权获利呢？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进入下一章。

第12章

Chapter 12

负息率经济

债务可以永续，财富却不能，因为它的物理维度受制于熵的破坏性力量。

——弗雷德里克•索迪

假使我有12条面包，而你饥饿难耐。我无法吃掉这么多的面包，因为它会坏掉，所有我很乐意借一些面包给你。“来，给你六条面包”，我说，“以后你有面包时，再还给我六条吧。”现在，我给了你6条新鲜面包，今后某个时候，你再还给我6条吧。

在这世上，我们需要及使用的东西会变质，分享便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囤积者只会得到一堆变质的面包、一堆生锈的工具、一堆烂掉的水果，没有人愿意帮助他，因为他从未帮助过任何人。然而，今天的货币与面包、水果以及任何自然对象都不相同。它是自然回报法则的例外，也是生命、死亡、重生法则的例外。这些法则是说，一切事物将回归其本源。但金钱已从物理性中抽象出来，它不随时间衰减，保持不变，甚至由于利息的力量，会随时间增长。

我们将货币与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我的”一词所隐含的那样，我们将金钱视为自我的扩展。这也就是为何从我们身上拿走金钱时，我们感到被“割裂了”。货币，因此违反了“回报的自然法则”，也违法了精神的非永续法则。将一件永续、随时间增长之物，与一个会衰

老、死亡、归于尘土的自我联系起来，只是在维持虚无的幻想罢了。虽然这道理众人皆知，但我们仍然幻想可以通过增加财富，获得金钱那样的永续性。我们为衰老而储存金钱，仿佛这样可以防止我们自身的衰老。若金钱也与其他事物一样衰老、归于其本源，那么这会对货币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将指数增长的金钱与自我和世界联系了起来，这一自我和世界，既不按照指数增长，也不按照线性增长，而是遵循周期性的增长。它造成的结果是竞争、稀缺、财富集中。前面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美好的、名为金钱的想法，这个能够连接人类礼物和人类需求的东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利息，是高利贷。但高利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不会因为我们做出了更明智的选择而不同。它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客观宇宙中，这个孤立、离析的自我，会与货币一道演化发展。这并不是偶然的。古希腊是第一个高度货币化的社会，也是现代的个体概念的发源地。

金钱与存在有着深刻联系，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人类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身份的演化发展。什么样的货币会与新的自我、联系的自我相一致，会与相互联系之感越发强烈的世界相一致呢？即与"你之增益，亦为我之增益"相一致呢？既然利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新的货币系统应该在结构上消灭货币，或者具有与利息相对立的一面。如果导致了竞争、稀缺型和贫富分化的是利息，那么利息的对立面岂不是会产生合作、富足和社群？如果利率代表了从古至今劫掠共有资源所得的收益，那么它的对立面岂不是会填补这种劫掠的创伤？

利息的对立面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将是一种货币，像面包那样，其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换句话说，它可以是衰减的货币，这种

货币的利息为负，这种负利息被称作滞留金（demurrage）[1]。衰减的货币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在我阐明它的历史、应用、经济理论和后果之前，我想谈一下“衰减”这个术语，并会避免提及其负面含义。

为什么“衰减”具有负面含义，而“保持”却是一种美德呢？这种态度来源于“飞升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人类的命运是超越自然的；战胜熵、混乱和衰减；建立一个有序的疆域：科学的、理性的、洁净的、可控的。精神的离析是“飞升的故事”的补充，一个无常的、凡人的、亵渎的肉身中，却住着一个非物质的、永恒的、不朽的、神圣的灵魂。我们试图征服身体，征服世界，抑制衰减的过程。不幸的是，我们这样做，抑制了更加宏伟的过程：更新、再生、回收，螺旋式朝着复杂性演化的过程，而衰减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离析和飞升的故事接近尾声。现在到了重拾思想和经济中的衰减之美，重拾其必要性的时刻了。

历史与背景

早期的商品货币（如粮食、牛等）会自然衰减，粮食会腐烂，牛会衰老和死亡，若照管不周的话，即便是农田也会退化成荒原。在某些金属货币制度下，负利率是内化的，它产生了与衰减类似的现象。中世界欧洲的“布拉克哈特系统”（Brakteaten system）大致上是这类系统的一

1　滞留金原指存储货物的成本，例如除货运成本外的成本。这个词适用于衰减的货币，因为它符合金钱作为“价值储藏”的用途。可兑换商品都有维护成本，借贷成本和储存成本，货币也应如此。使用滞留金一词的缺点是，它并不为大众所熟悉，显得有些拙劣。贬值的货币（depreciating currency）体现了货币价值随时间推移而减小的思想。不幸的是，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成货币本身的购买力减小，而不是货币每单位的价值减小。通常情况下，贬值指的是货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降低。“负利息”（negative interest）有效地表达了这一基本思想，尤其是在描述整个系统时。但是，由于利息通常用于贷款资金而非货币本身，负利息一词也会引起混淆。在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上述词汇以及西尔维奥·格塞尔的术语“免费货币”（free-money）。

个例子。在该制度中，硬币被定期召回，以一定的折旧率重铸[2]。在英格兰，撒克逊国王每六年就重铸一次银便士，用四颗旧银币铸成三颗新币，年折旧率约为4%[3]。这对货币窖藏施加了有效的惩罚，它鼓励了货币流通和生产性资本的投资。如果你拥有的钱比你能够花掉的多，你会很乐意借出资金，甚至在零利率的情况下，因为若持有的时间过长，你的资金会贬值。注意，在这种制度下，货币供给并不一定缩水，因为领主会将这一差值重新注入到经济中，以弥补他的铸币成本。因此，这种负利息实际上是一种税。

负利息货币的先锋理论家是德裔阿根廷商人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他将这种货币称为“免费货币”（Freigeld）。为了纪念他，我将沿用这一名称。在他1906年的经典之作《自然经济法则》中，他提到了一种纸币。这种纸币被定期贴上印花票，印花票将消耗货币面值的一小部分，货币财富于是被附上了维护成本。与实物商品一样，这种货币会“腐烂”（这个比例取决于印花票，印花票是货币有效性的保证）。例如，如果一美元的钞票每月需要一张一美分的印花票来保证其有效性，那么它会以每年12%的速度贬值[4]。

对于这种需要缴纳滞留金的货币，虽然格赛尔的出发点与我不同，但殊途同归。在格赛尔著书的年代，几乎没有人质疑经济增长的合理性。虽然格赛尔颇具远见，但他并未怀疑（据我所知）地球或技术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5]。他关心的是如何补救财富分配的不均和不公，补救前所未有的富足中隐含的前所未有的贫困。他将其归结为巨大的不公平优势：他们占有一种“可窖藏的商品，这种商品同时是货币媒介。”与黄金或其他货币相比，商品（或许除了土地之外）不能被窖藏起来：它们会腐烂、生锈或者衰减；它们或许会遭遇盗窃或者会过时；它们会

2 马吉特•肯尼迪（Margit Kennedy），《利息和无通胀货币》，40页。
3 斯蒂芬•赞嘉林，《货币科学拾遗——货币的神话及权力的故事》，253页。
4 若无贴花票，它的价值将为88美分。
5 格塞尔只有少量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我对他是否在其大量德文著作谈及生态话题十分感兴趣。

产生存储、运输等成本。他写道：

> 黄金与商品的特性并不协调。想想黄金和稻草、黄金和石油、黄金和鸟粪、黄金和砖块、黄金与生铁、黄金与兽皮的差别吧！只有虚妄的念头、可怖的幻觉，只有“价值”学说才能弥合这一鸿沟。只有当每个人对于持有货币还是持有商品无差异时，稻草、汽油、鸟粪等一般商品才能被安全地交换。当且仅当货币具有商品的缺陷时，货币才可能与商品无差异。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商品会腐烂、衰减、断裂、生锈，只有当货币同样令人不快时，招致损失的特性才能够迅速、安全、廉价地影响交换。因为相对于商品，没有人会偏好这样的货币。
>
> 只有当货币像报纸一样会过时、像土豆一样会腐烂、像铁一般会生锈、像乙醚一样会挥发，它才能作为一种交换报纸、土豆、生铁、乙醚的工具经受住考验。买者与卖者都不会更偏好这样的货币。我们抛弃商品选择货币的原因是，我们需要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而不是希望通过持有货币获得好处[6]。

与格赛尔的时代一样，今天人们对货币的偏好甚于商品。因为持有了金钱这种交易媒介，资金持有人能够收取利息；与持有真实资本的人相比，他们占据了优势地位（与出卖时间的人相比，他们的优势更为明显，因为出卖时间的人一旦卖不掉，时间会100%消失）。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不断增加，因为每个人都要向资金的拥有者纳贡。

从格塞尔的观点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为了交换而支付费用是不公平的。格塞尔认为，有交易的意愿已经足够。如果我可以提供你需要的物品，那我们要为给予和接受该物品的手段付钱吗？你为何要对收取礼物的权利付费呢？因此，格塞尔提出的货币可被冠以“免费”的绰号。以

6 西尔维奥·格塞尔，《自然经济秩序》，4.1章。

“贬值的货币”（缩减货币的同义词——译者注）为基础的信用体系，使人们能够以零息贷款。虽然贷款仍要偿还，但利息却无须支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钱成了免费的。

格塞尔主张将货币的衰减作为一个工具，将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区分开来。与实物资本相比，人们不再偏好货币。格赛尔预见到，这会终结人为稀缺性和经济危机。而之前，当有大量商品可供交换但是货币不足时，经济危机就产生了。格赛尔的提议则会强迫资金流通。除了以经济活动为目的，货币的拥有者不再有激励能将货币抽离出经济体，坐待稀缺性累积，直到真实资本回报超过利率。这就是为何这种货币被称为“免费货币”的第二个原因：货币从财富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货币可以自由流通，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凝滞在巨大、停滞的资金池中。

格塞尔将货币的计息特性（interest-bearing property）视为繁荣的制动器。只要商品足够丰富，资本投资的回报低于最低利率，货币持有者就会持有货币而不进行投资。执行交易功能的货币于是从流通中消失了，伴随着自相矛盾的商品稀缺性，产能过剩危机卷土重来。

1906年的货币体系与今天的货币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大多数货币仍由贵金属支持（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今天这样的基础货币信贷的大幅扩张并不存在。事实上，格塞尔将信贷视为货币的替代品，将其作为缺乏货币时进行交易的手段。而在今天，信贷和货币几乎是等价的。目前的经济理论将信贷与货币的等价，视为一个积极的进展，其部分原因是，货币供给可以根据对交易媒介的需求相应扩张或收缩。然而，计息信贷不仅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同时也迫使货币经济不断增长。此外，与格塞尔的时代一样，计息信贷受到稀缺性的制约。

20世纪下半叶，格赛尔的思想已经无人问津，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却享有广泛的簇拥，并影响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杰出经济学家。费雪曾在美国大力宣扬格塞尔的思想，凯恩斯也对其赞赏有加，将格赛尔称为

“被过度忽视的先知”，并称其作品“深刻而新颖”[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动荡时局中，格塞尔被任命为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但巴伐利亚命运多舛，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宣告解体。20世纪20年代，格赛尔的一名朋友发行了印花票货币——瓦拉（wara），它曾在德国境内流通。经济萧条导致了瓦拉的发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无论是集体生活还是个人生活，没有危机，就没有真正的变化。

1931年，一家德国煤矿运营商决定用瓦拉来支付工人工资，重新启用一度被关闭的矿井。煤矿同时赎回瓦拉，因而每个人都乐于使用瓦拉，本地商家和批发商也被说服接受瓦拉。以采矿业为生的小镇蓬勃发展起来，年内，全德国至少有一千家商店愿意接受瓦拉，银行也开始接受以瓦拉为面值的储蓄[8]。但是，将瓦拉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德国政府感到了威胁，企图由法庭宣布瓦拉非法，当这一举措失败之后，政府通过了紧急法案，瓦拉被严令禁止了[9]。

翌年，受到格赛尔的启发和瓦拉的鼓舞，处于萧条之中的奥地利小镇沃格尔（Wörgl）发行了自己的印花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沃格尔的货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道路铺设了，桥梁建造了，税款补缴了，失业率大幅下降，经济蓬勃发展。这吸引了附近镇子的注意，来自世界各地的市长和政府官员开始造访沃格尔。然而与德国一样，中央政府废止了沃格尔的货币，小镇又重回萧条。

瓦拉和沃格尔每月的滞留金率是1%。当代观点将此归结为货币的高速流通。财富积累不会产生利息，不会导致财富增长，而是成了一种

7　凯恩斯在《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第23章讨论了格塞尔的思想。他发现，格赛尔的推理虽然有理，但并不完整，“可惜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在后续章节，我会讨论凯恩斯的主要批评，即格塞尔没有考虑到其他形式货币的流动性溢价。

8　根据当代新闻的解释（参见科赫森的“瓦拉”一文）。

9　欧文·费雪，《印花票》，第4章。

10　托马斯·格列柯援引了1934年的《集体经济年鉴》上的三种解释：亚历山大·冯·莫拉特（Alexander von Muralt），“货币贬值的沃格尔实验”，M·克劳德·波戴特（M. Claude Bourdet），“从法国视角看沃格尔实验：新的经济麦加”，以及迈克尔·昂特古登伯格（Michael Unterguggenberger），“沃格尔试验的最终结果”。格雷科（Greco）认为，沃格尔货币的成功应归功于滞留金。

负担，就像对于游牧狩猎采集者而言，财产是一种负担一样。格塞尔认为，就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而言，衰减的货币不再优于其他商品。这些货币振兴经济的功效来自滞留金，而不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者说，它来自于沃格尔这样的本地货币所产生的经济本地化效果。然而，这一点无法被证实。

瑞士的WIR大约出现于这一时期，并一直沿用至今。WIR由一家合作性银行发行，系格塞尔理论的支持者们所设立，由接受它作为支付手段的成员签署的双边协议所支持。这种货币最初是收取滞留金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高增长时期取消了[11]。正如我接下来要解释的，在高增长的环境下，负利率并不是必要的，随着我们进入稳态经济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滞留金的吸引力将再次凸显。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发行了多种“紧急货币”。在银行倒闭潮中，国家货币大量蒸发，于是人民与地方政府创造了自己的货币，其结果毁誉参半。这些货币在设计上并未体现格塞尔的理念，相反，他们对每笔交易征收费用，而不是按照每周或每月征收[12]。这种设计与滞留金的效果截然相反，因为它惩罚的是流通而不是囤积。然而，在1933年，至少有上百个城市准备推出自己的印花票货币，许多是按照格赛尔的构想设计的[13]。此外，凭借欧文•费雪的支持，一项法案被提交给了众议院和参议院，它提出，应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十亿美元的印花钞票。这个提案，以及许许多多的全国性和地区性货币的提案，规定的滞留费率更高——每周2%，相当于货币会在一年内完全作废。这与沃格尔货币和大多数现代的提案完全不同，但它表明，负息货币这一基本概念确实被严肃地考虑过。下面是“班克海德-佩滕吉尔修正案”（Bankhead-Pettengill amendment）的摘录，它是对1933年“科斯提根-拉佛莱特失业救济法案（S. 5125）”（Costigan-LaFollette Unemployment Relief Bill）的

11 W•维特里希，“全球化的替代品：合作原则和互补货币”。
12 布鲁斯•强普，《印花票：有偿使用的货币》。
13 欧文•费雪，《印花票》，第5章。

修订。

> 财政部长必须以贴花货币证书的形式刻制并印刷美利坚合众国之货币。上述证书每张面额为1美元，发行总额应限于1,000,000,000美元。上述证书应具有适当大小，证书背面应为加附之印花票预留空白……上述证书之正面应当载明如下内容："此证书乃支付1美元公私债务及应得权益、关税、税款之法定货币；讫至让与日，依照背面附录所载之规定，应加附2%之印花票。"

参议院5125号法案并未进入表决。一个月后，罗斯福推行新政，通过行政法令禁止了所有的"紧急货币"。根据伯纳德•林特的记载，罗斯福此举的原因，并非是地方货币和国家货币不能有效疏解大萧条，而是因为此类货币的推行意味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削弱[14]。

今天，我们处在类似的危机边缘，面临着类似的选择：要么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暂时巩固旧世界，要么跨入新世界。毫无疑问，免费货币制度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深远的，它涵盖了经济、社会、心理和精神层面。货币是如此基本它对我们的文明是如此重要，想要不涉货币而实现真正的文明的转变，只是天真的妄想。

现代应用及其理论

免费货币背后的思想，虽一度流行于20世纪早期，却已沉睡了长达60年之久。随着经济危机摧毁了过去半个世纪的保障，开始召唤诞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思想，免费货币的思想正处于复苏之中。这种思想包括了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因为货币主义者降低利率、购买政府证券以刺激经济的处方，已经达到了极限——"零利率"下界，央行无法进一步

14　伯纳德•林特，《未来的货币》，156～160页。

降低利率了。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其依据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知半解）是财政刺激——用政府开支来代替疲软的消费者支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个经济刺激计划，便是一项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尽管在零利率的条件下，这一措施不够有力。

零利率下界的问题使一些主流人士开始对负利率进行思考：本章中，我发现了一篇由美联储经济学家撰写的、刊载于《纽约时报》的文章[15]，该文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6]；另一篇文章发表于《经济学人》杂志[17]。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失败时（其最终原因与我讨论过的、共有资源枯竭的原因一样），衰减的货币这一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便赫然出现了。当前，经济正在温和复苏中，复归正常的黄粱梦仍然存在。但是，各种形式的共有资本已几近耗竭，经济复苏依旧缺乏活力，回归“正常”遥不可及。

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首次失败发生在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重燃经济增长之火。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而言，经济继续增长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至少20年来，解决增长问题的办法是从发展中国家输入增长，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自然共有资源货币化，以此来支持发达国家的债务金字塔。它采取的形式有：债务奴役，强制发展中国家由维持生计和自给自足，转为以偿还外国贷款为目的进行的商品生产；通过美元霸权为美国的公私债务融资，即便中国这样的高生产力国家也别无选择（除了花掉贸易盈余美元外别无他法）。最终，输入增长的解决方案也必会失效，因为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地球也会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增长极限。

官方经济统计数据隐藏了长达20年之久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有可能一直处于零增长的阶段。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这种增长在很大

15 布鲁斯·强普，《印花票：有偿使用的货币》，联邦储备银行克利夫兰分行研究论文，2008年4月1日。

16 格里高利·曼昆（Greg Mankiw），“美联储实行付利息或正当时”，纽约时报，2009年4月18日。

17 佚名，“贬值的货币：货币的旋转木马”，《经济学人》，2009年1月22日。

程度上来源于房地产泡沫、监狱工业、医疗保健成本、保险和金融服务、教育费用、兵器工业，等等。这些东西愈发昂贵，经济增长就越甚。在出现了增长的领域，如互联网，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一种形式隐蔽的输入增长。互联网收入很大一大部分来自销售及广告，而不是新的生产。对于中国到西方的商品输出，我们不过是为它添砖加瓦，使之更有效率罢了。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并不能使增长的机器永远运转下去。增长的机器运转得越慢，解决零利率下界问题就愈发必要。

在货币上附上印花票的想法显得有些老古董。不过最近，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它的现行替代品。由于大部分货币是电子货币，设置某种流动性税（正如欧文•费雪在1935年提出的那样）是问题的关键，等价的做法是，为美联储的存款设定一个负利率。后一项措施由威廉•布艾特（Willem Buiter）提出，他时任经济学教授首席经济学家。这一思想发表在2003年《经济学杂志》以及2009年的《金融时报》上（见参考文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和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罗伯特•霍尔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8]，美联储经济学家甚至就负利率问题进行了讨论[19]。我希望这些人名能够说明，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提议。

当然，与准备金一样，实物货币应受制于相同的折旧率。折旧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用格赛尔的方法，为货币设定一个到期日，可以将它替换成（或重新将它定义为）不记名的负利率债券，也可以使用与官方计价单位不同的现金货币，或者允许银行储备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上下波动[20]。另一种办法是完全禁止官方的实物货币，这会大大增加政府的权力，因为所有的电子交易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对监视保持警惕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会认为这是令人恐惧的，但我对此的反应是，“太迟了”。今天，除了非法毒品交易之外，几乎所有的重要交易都是通

18　罗伯特•赫尔（Robert Hall），苏珊•伍德沃德（Susan Woodward）“美联储需要做出政策声明”。

19　伊万•柯尼希（Evan Koenig），吉姆•多尔玛斯（Jim Dolmas），“零息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西南经济》，第4期，2003年7—8月刊，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

20　后面两个观点见于威廉•布伦特的讨论，见“负利率：它们何时降临你附近的央行？”

过电子交易完成的。现金被广泛地应用于非正规经济部门，帮助人们逃税。如果课税对象从收入转为资源，那么这种逃税动机也就消失了。

非官方的货币应该与官方的、负息的电子货币一道蓬勃发展。非官方货币是采用电子形式还是纸质形式，取决于实践：商业性的易货贸易圈和信用结算合作社会使用电子货币，而地方性的、以社群为基础的交易会偏好纸币。无论用何种方式，使用非官方货币进行交易，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使用货币的社群将决定了货币的记账方式。那些只在地方经济中活动的人，如嬉皮士、回归土地者（back-to-the-landers；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号召人们自己种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译者注）以及其他我崇敬的人们，他们会过一种不受中央权威控制的经济生活。公开所有交易和财务记录，不仅包括政府的记录，还包括所有人的记录，还有另外一些原因。这曾被作为监视的解决办法提出过。随着摄像机、手机、手持式游戏机和其他设备的普及，监控技术的公开、无处不在已经实现。一旦政府的活动对公众公开，就像大众的活动对政府公开一样，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

我想强调的是负利息提议在当代的可行性。格赛尔的贴花票货币似乎是个不合时宜的白日梦，会引来大规模的经济混乱。相比之下，对准备金征税则不需要任何新的金融基础设施。事实上，货币政策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展开，负利息不过是它的延伸罢了。同样的美联储，同样的中央银行，同样的基本银行系统，足矣。当然，深刻的转变会接踵而至，它们将是革命性的变化，它们将不遗余力地粉碎金融体系，从头再来。正如我在第5章中写道，“神圣经济是一种不同的、全面的革命，而非一种肃清。”

一些中央银行已经开始试水负利息。2009年7月，瑞典央行的利率变成了负数，准备金存款需要缴纳0.25%的费用，这一水平一直保持

到了2010年2月[21]。它与零利率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既然利率可以如此之低，那么降至更低亦无不可（事实上2012年，丹麦的贷款利率是0.2%，折现率为0，信用存款利率为-0.2%——译者注）。瑞典央行、布艾特、曼昆，以及其他负利率的主流倡导者，将负利率视为一种迫使银行重新放贷、提供廉价信贷的临时措施，其目的是促使经济重新增长，使利率回升至正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正在迈入永久的零增长或负增长经济，那么负利率就会变成永久的了。

利率是正是负，取决于经济是增长还是收缩。按照旧的思维，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或将其约束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按照新的思维，货币政策会使基准利率与经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相匹配。凯恩斯估计，印花票的费用应“大致与货币利率（不包括印花票费）除掉资本边际效率之后的值相等，这一资本边际效率对应于充分就业下的新增投资量。”正如我在第14章所建议的，我们应该对这个公式进行修改。全薪就业不应再被作为社会有益品（全薪就业是稳态经济的必然结果，在社会红利的情况下，它并不那么可怕）。当然，凯恩斯建议，生产性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与利息之差，应该能用流动性税收来弥补。换言之，它必须被设定在持有财富和使用财富无差异的水平上。

布艾特和曼昆都不是自由党人，他们的建议与保守派所代表的、债权人阶层的利益截然相反。一部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支持滞留金的等价物：通货膨胀。在数学上，通货膨胀的影响与衰减的货币非常相似，因为它鼓励货币流通，不鼓励囤积，并会使债务的偿还更加容易。无论如何，衰减的货币具有几个重要的优点：它会消除典型的通胀成本（菜单成本、皮鞋成本等），不会使固定收入者陷入贫困。下面是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迪恩•贝克（Dean Baker）支持通胀的言论。

21　数据来源于瑞典央行官方网站，见www.riksbank.com/swedishstat/

如果扩大财政赤字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货币政策就成了提振需求的第二个潜在工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超越量化宽松政策，采取盯住一个温和通胀目标（如3%～4%）的政策，从而使实际利率为负值。房地产泡沫崩溃后，数以百万计的房主面临着巨额抵押贷款债务的沉重负担。而此举有利于减轻他们的负担[22]。

现在的问题是，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下，银行不再贷款。那么，美联储是如何创造通货膨胀呢？在过度杠杆化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这是采用通货膨胀手段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量化宽松政策是用高流动性的资产（基础货币、准备金）交换流动性稍差的资产（如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如果新的资金并没有流入花费资金的人手中，那么量化宽松并不会导致价格或工资的通胀[23]。即使美联储将所有的公私债务都货币化，无法制造通胀的问题仍然存在。由于存在零利率下界，在深陷于债务危机无法自拔的2008年和2009年，美联储无法启动通胀。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免费货币的原始动机：让货币流通起来。

在负利息准备金制度下，银行将急于抛出储备。如果负率约为5%～8%（即格塞尔、费雪和其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么银行会以零利率贷出资金，甚至以负利率贷款也是合意的。你会问，银行如何赚钱呢？他们会延续今天的做法[24]。存款也会是负利率的，只是比准备金的利率略小。银行可以按-7%的活期存款利率吸纳存款，或者按-5%或-3%的利率吸纳存款，按-1%的利率或零利率贷出。（现在你就能意识

22 迪恩·贝克，“没有出路：复苏之路的路障”。

23 事实上，量化宽松可能会导致价格通胀，原因是在缺乏生产性投资机会的条件下，会有人投机性地抬高大宗商品的价格。

24 更有智识的读者无疑会抗议说，认为银行赚取息差是一种误解，他们说，银行贷款借出的钱，并不是储户的钱，而是创造了新的货币——信贷——通过简单的会计分录。不幸的是，这也是对货币创造的扭曲。我将在附录“量子货币与储备问题”中做出进一步解释。就目前而言，负利息的银行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今天的银行制度基本相似（至少在“赌场经济”占上风之前）。

到，为何现金同样需要贬值了，若不然，谁会在负利率下存款呢？）

对准备金收取负利率，与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相容的：商业票据市场，银行间同业货币市场，甚至证券及衍生工具，都无须做出任何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利率。每种制度都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像隐性基因一样潜伏着，等待时机来表达性状。对于大多数备受非议的机构如此，对金融系统的“心脏”——美联储（以及其他央行）也是一样。

与正统信仰相反，“心脏”并不是机械地将血液泵到各处，而是接受血液、倾听血液，然后再将血液送回全身各处[25]。心脏是一个感知的器官，根据对血液的感知，心脏会产生大量的荷尔蒙，这最近才被发现，它们与身体的其他部分通信，就如同自己的细胞受到了外源荷尔蒙的影响一样。心脏的这种倾听、调节的作用，为看待中央货币当局的作用提供了一种视角：货币当局应该倾听并响应资金的需求，而不是通过系统泵入资金。美联储应该了解经济的脉动，调节货币供应量，将利率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26]。为经济注入新的资金，可以沿用今天的方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通过政府支出法定货币，这取决于对何种形式的共有品收取使用租金。一般来说，因为滞留金而损失的货币，必须被重新注入经济体中，否则储备水平将逐年缩减，无论经济活动需要的货币是多少，其后果将与威胁到我们今天生活的债务违约、稀缺性、财富集中相类似。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一颗金融的心脏，倾听血液的流淌，发出制造更多（或更少）血液的信号。

警觉的读者可能会提出异议，一旦货币和银行存款的利率为负，人

25　大多数对心脏的生理描述都把心脏比喻成一台泵，但心脏并不提供促进血液循环的推动力。对于这个300克重的器官，要将黏性的流体泵到数千公里长的小血管中，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胚胎循环开始于心脏形成之前，甚至拥有自己的内源性动力，通过与整个循环系统和整个身体相联系来维持。心脏暂时停止流体的流动，使心房扩大，然后将流体释放到心室中。相比水泵，心脏更类似于液压油缸，它多了扭转功能（twisting function），从而保持了血液的螺旋运动。

26　事实上，美联储已经尝试了这种聆听、调节的功能。前美联储经济学家梅雷迪思·沃克（Meredith Walker），曾经描述了她为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这包括与各种商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联络，从而倾听经济的脉息。货币政策是对聆听的自然反应，除非政治干预阻碍了这种自然反应，或者美联储倾向于扮演泵那样的控制角色。

们会换用其他交换媒介作为更好的价值储藏手段，例如黄金或商业票据。如果你已经提出了这个异议，那么英雄所见略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撰文赞扬了格塞尔的思想，但却提出了如下警告："若通过印花票制度来虢夺纸币的流动性溢价，一系列替代品就会纷至沓来——银行票据、即期债券、外国货币、珠宝和贵金属等。"[27] 这种反对意见体现在多个方面（凯恩斯并未将其看作不可逾越的障碍，认为它仅是格赛尔"没有面对"的"困难"）。如上所述，银行货币将受制于与实际货币相同的折旧率；即期债务要求风险溢价，以便抵消流动性溢价[28]；商品、珠宝等受制于高昂的持有成本。最重要的是，货币是一种社会协议，我们可以通过法定货币的立法、风俗，以及其他形式的共识，有意识地选择并应用它。最终，凯恩斯判断，"贴花货币背后的想法，是有道理的。"

实际问题是，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中，每一件物品都有持有成本，正如格塞尔列举的报纸、土豆的例子那样。机械和设备会坏掉，需要维护保养，最后被淘汰掉。即使有极少数的物质不会氧化，如黄金和铂金，它们也需要被转移、被看管，以防被盗；贵金属铸币也会被刮掉或截掉。对于这个普遍适用的回报法则，货币倒是个例外，它是更宽泛的、人类优于自然的卓见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衰减的货币并不是纯粹的噱头，它是对现实的确认。古希腊人不自觉地汲取了被称作"货币"的新事物的特性，创造出了灵魂的概念，它与自然法则——永恒、抽象、非实体的特性相类似，这种将世界划分为精神和物质的做法即将终结了，与它一起结束的，还有将精神和物质首次区分开来的货币。货币将不再是永恒法则的例外。

凯恩斯的"困难"强调的是，不应该生造出与现今货币一样的、违反了自然法则的财富储存手段。土地产权，便是这类财富储藏手段的一

27 J•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纽约：哈克特、布雷斯和霍威出版社，1936年：第4册，第23章，第4节。

28 除此之外，在这个系统中，流动性较高的即期债务的利率接近于滞留金。

个例子。历史上，土地是财富集中的载体，正如今天的货币是财富集中的载体一样。对货币收取负利息的同时，也必须对土地征收乔治或格赛尔式的土地税。对“经济租金”的其他来源也应如此。实体的公地、基因组、生态系统、电磁频谱，以及文化上的共有资源，如思想、发明、音乐、故事等，也必须收取持有持本，否则凯恩斯的担忧将成为现实。值得庆幸的是，对价值储存的替代品征收的流动税，使得正确性和逻辑意外地融合了，因为使用共有资源而产生的社会责任加倍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货币还是共有资源，自然法则都同样适用：只有按照对社会有益的方式使用它，我们才能够持有它；如果我们只是保有它，那么我们终会失去它。

不是每个人都会从免费货币中获益，至少在短期内。与通货膨胀一样，货币贬值对债务人有益而对债权人无益。下面的评论对通货膨胀的总结简明扼要。

> 这种维持低通胀意愿的根源，来自于债券持有阶层，他们希望无风险投资和银行存款能够获得真实的回报……人们居然因为把钞票借给了印制它的银行而得到真实的回报，这真是令人反感……富人的税负应该更轻，因为他们能够承担风险，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增长。如果他们希望将资产组合的一部分投在无风险存款上，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指望这部分投资能够保持其相对价值[29]。

这个论断探讨了我所提到的乔治和格塞尔的悠久传统，即人们不应该靠所有权而盈利。财富的持有者是它的照管者、它的管家，如果他们不把财富用在对社会有益的地方，那么，财富最终会流向能够为社会造福的人们。

29　匿名评论，见http://blogs.ft.com/maverecon/2009/05/negative-interest-rates-when-are-they-coming-to-a-central-bank-near-you/

过去的革命家认识到，大多数财富的积累都是非法的，他们试图通过没收和再分配重新来过。我则主张更为温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其中一种方法是对持有货币征税，确保风险投资成为保持财富的唯一途径，或者说，在引导人类的创造性上，做出明智的决策。当然，这种引导力应该得到奖赏。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缺少的，因为它忽略了企业家在资本分配上起到的作用。

我所提到的大胆、但仍属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将负利率视为一项临时措施，它能够促进借款，摆脱通货紧缩的流动性陷阱。负利率的现实意义则要深刻得多。流动性陷阱并不是由泡沫崩溃所造成的暂时偏离，它源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这一永恒的状态[30]，它本身是技术进步和竞争的结果。正如凯恩斯指出的：

> 一开始其边际效率至少与利率相等，随着资产存量增加，它的边际效率（其原因已经给出了）趋于下降。因此，到某一点，增加资本不会产生更多资本，除非利率同时下降。如果不存在边际效率等于利率的资本，资本资产的生产将陷于停顿[31]。

正如我刚才所述，随着技术以及帝国主义将商品和服务从公共领域转到了货币经济中，这种可能性已经延迟了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公共资源被耗尽，废除利率的阻力却加剧了。凯恩斯预见，“因此，那些改革者的补救方式是，要求法定货币周期性地附上一个预先指定的成本，人为地为货币创造了携带成本，以保持其货币的属性，或者用类似的方式。这算是走对路了，他们提议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32] 这一措施（以及我所讨论的现代的等价方法）允许在边际效率为负的情况下进行资本可投资，换言之，银行会心甘情愿地把钱借给投资回报率为零或

30 资本的边际效率是指每一美元新投资带来的预期回报。
31 J·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17章，第2节。
32 同上，第3节。

小于零的企业。

经济增长的放缓无可避免，是我们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鉴于此，既然我们正在向一个生态的、稳态的经济过渡，货币衰减这一提议，提供的不仅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它会为永恒非增长的经济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永久的基础。从历史上看，经济收缩或增长停滞意味着人类将遭受痛苦：经济两极分化，激化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化。免费的货币则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货币流通无须用依赖借贷的增长来推动。

结合本书提到的其他改变，免费货币将对人类的经济和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太习惯于高利贷货币的世界，我们将它误认为是经济或人类本性的基本规律。正如我将要阐明的，一种体现了全新的自我意识、体现了新的“大众的故事”的货币，将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其中，新的“大众的故事”是指与地球处于同创的爱侣关系中的、联系的自我。演化发展了几百年之久的直觉，将发生改变。贪婪性、稀缺性，一切物品都被量化、被商品化，即时消费的“时间偏好”，为未来牺牲现在的折现，金融利益和公益的根本对立，安全与积累的等价，都将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公理了。

欧债危机：转型契机

2008年的“债务炸弹”几乎拖垮了全球经济。这为过渡到负利息货币制度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债务炸弹包含了大量的主权债务、抵押债务、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等永远无法偿清的债务，这一炸弹从未被拆除，只是其爆炸延迟了。为了让借款人偿还旧贷款，新的贷款被发行出来。当然，除非借款人增加他们的收入，否则这只是将问题推到未来，只会将情况变得更糟。但是，只有在经济增长下，收入增加才可能发生。在某个时点，债务违约是不可避免的。有没有出路呢？

有。答案是2600年前梭伦的经济改革的现代版：减免债务，改革货

币和产权的传统惯例。在某个时刻，有必要面对现实：债务永远不会被偿还了。要么保持债务，使债务人和债务国永远保持奴役的状态，要么解除债务，从新来过。后一种选择的问题是，储蓄和债务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一旦解除债务，无辜的储户和投资者会立马蒙受损失，整个金融体系将崩溃。突然的崩溃会导致大面积的社会动荡、革命、战争、饥饿，等等。为了防止混乱，折中的办法是逐渐减少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向负利息经济的过渡提供了一个线索。当危机肆虐，威胁到了主要金融机构的清偿时，美联储的反应是货币化这些坏账，这意味着美联储用现金购买了有毒的金融工具。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计划，继续将政府债务货币化（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为了避免彻底的崩溃，总有一天，与负利息类似的措施会被大规模实施。

问题是，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并没有提高，债权人的借款意愿也并未增加。美联储的行动引发了激烈的批评，因为它实际上是在为掠夺性的金融机构注资，换回的只是不负责任地创造和交易的垃圾投资，这些面值一美元的债券，其市场价值仅值区区几便士。更令人痛心的是，金融机构在收回面值之后，却用现金去投资无风险债券，为执行官发放高额奖金，或者买下较小的机构。这一救市计划对于缓解贫富分化毫无益处。

如果将债务货币变成免费货币，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虽然债权人不会像在债务违约或系统性金融崩溃中那样，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资金，救市计划也不会使他们变得富裕起来，因为他们的资产会不断贬值。至于债务人，货币当局会减少或取消一部分债务，只要货币当局认为合适（很可能会通过政治进程来确定），这可能包括将利率降低到零，甚至减少本金。举例而言，可以将学生贷款的利息降低到零，将贷款的本金减少到金融泡沫前的水平，完全免除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债务。

虽然债务货币化可以大大增加基础货币，但货币会受到滞留金的约束，随时间缩水。货币当局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重组后的债务，使货币量迅速缩减。

如果没有负利息和债务免除，对于拥有了大量“自由货币”（不是免费货币）的人而言，美联储的救助金将与“自由货币”无异。如果允许大银行和金融家保留他们的不义之财，作为交换，他们至少应该接受一个反对进一步积累的系统。这个提议的确会导致金融利益的丧失，即便这种丧失是渐进式的。但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日益增长的贫富悬殊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的转型契机将再次出现，因为债务危机不会消失（如果没有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话）。每一次债务危机的解决，都是靠引入更多的债务，债务从个人转移到企业，再转移到国家，周而复始，不断增长。例如，到2010年，爱尔兰的银行系统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政府为了救市，将债务转移到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为了避免灾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向爱尔兰新增贷款以偿还旧债，利率为6%。除非爱尔兰的经济以超过6%的速度增长（在苛刻的紧缩措施下，这很难实现），在未来几年内，债务问题会卷土重来，并且会更糟。我们只是将问题踢给了未来。

债券持有人并不想承担损失，他们只想得到更多的资金[33]。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个愿望，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当社会中的其他人愿意接受日益恶化的条件，只有更多的紧缩政策、更多的贫困，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债务人的财富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整个社会迟早会说，“够了！”政府救市仍然是必要的，因为突如其来的系统性违约将来带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当灾难发生时——可能同时发生在多种债务类别上——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财富的集中，及其背后的高利贷必须停止。除了拯救富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全球经济的各部分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让这种拯救付出代价吧：将社会逐步从债务中解放出来。

---

33 当利息超过经济增长时，他们夺走的社会财富的比例越来越高了——由于政府救市，他们不承担任何风险。

对未来的思考

在货币和金融的所有技术细节中，别忽视了“心脏”的作用：恢复货币作为礼物和需求的连接职能，将货币作为一个护符，协调人类的创造力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努力。说货币是我的心灵认为可能的、更加美丽的世界的一部分，感觉有些奇怪，因为长期以来，我对货币有一种反感，认为货币是诸多毁灭和邪恶的源头。

然而，我们对金钱的反感依据的是它的过往，而不是它的可能性。在生态经济中，由神圣之物所支持的负利息货币，完全扭转了高利贷时代的直觉。它绝对是革命性的，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体验。这种转变贯穿各个层面，由外到内，从经济到精神。

在第9章“价值的故事”中，我解释了为何货币创造的社会协议是“能孳利者，钱之所属”，最终，这促进了商品和服务领域的扩张。社会的能源被引导到了能够扩大货币和产权疆域的地方，即能够扩大人类的疆域、扩大拥有的疆界。它是人类统御自然的“飞升的故事”的一部分。将利率降到零以下，会使人们投资于获得零或负资本回报率的项目。这种想法违反直觉吗？它违背了整个“投资”的概念吗？它是违反了直觉，但是，我们的直觉是在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文化下产生的，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几乎不敢想象，货币竟然还有另一种功能，竟然有不依赖于利润的商业模型！（当然，我们有非营利性组织，但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相比，它们有着本质区别。这个区别将会逐渐消失。）

下面这个例子会让你明白，它是如此有悖直觉。想象一下，你去银行，说：“我想为我的企业贷款，这是我的计划。如果你能借给我一百万美元，四年内我将获得九十万美元。我希望你以负利率借给我一百万美元，而我将在四年内将这九十万美元分期还给你。”

“我们很喜欢你的商业计划书”，银行说，“给你钱。”他们为什么会同意呢？原因是，若以现金的方式持有这一百万美元，它将以更高的速度贬值。假如贬值速度是7%，那么四年后，一百万美元只剩约74万美元。进

行如上的贷款，银行是受益的。

与通货膨胀一样，衰减的货币颠倒了未来现金流的折现过程。在《人性的飞升》中，我提出了下面的例子。

> 利息促进了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而滞留金则鼓励进行长期思考。考虑一片森林，如果进行可持续采伐，每年可以产生100万美元的收入，如果一次性伐光，可以获得5千万美元。在当前的会计制度下，后者的价值更高。（以5%的折现率计算，可持续采伐森林的“净现值”只有2千万美元。）这种将未来收益折算到现在的做法，使企业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短视行为，以牺牲（甚至是他们自己的）长期福利换取短期（甚至是财政季度）的好结果。在一个以利息为基础的经济体中，这种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如果存在滞留金，从纯粹自利的角度来看，保留这片森林得到的价值更高。贪欲也无法激励“劫掠未来换取目前利益”的做法了。将未来的现金流进行指数贴现意味着“兑现”整个地球；滞留金则不然，它的这一特性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试想，你是世界的总统，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如下报价：“无上的领袖，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生产总值（gross world product, GWP）是每年10万亿美元。我们愿意出600万亿美元买下整个地球。诚然，我们计划提取全部资源、破坏表层土壤、污染海洋、将森林变为荒漠、放置放射性废物。但是有600万亿美元哦！你发财了！”当然，你会说“不”。但本质上，人类集体答应了这一报价。我们正在一步步实现外星人的计划，未来十年我们可能会获得高达600万亿美元的价值（目前全球的年生产总值约为60万亿美元）。通过每天的一百万个小的决策，我们正在用地球套取现金。

这是相当经济的。按现行利率，600万亿美元每年会产生20万亿美元的收入。在《人性的飞升》中，我引用了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

他们认为，既然农业只占3%的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变暖或农业产量下降50%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至多会下降1.5%（记住，GDP是整个“有益品”的总和）。这看似荒谬，但按照高利贷货币的逻辑，这是合理的。在《自然》杂志1997年的一篇文章里，生态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对全球生态系统的估值是33万亿美元，仅比当年的世界生产总值高出20%。他的本意是好的，希望为保护地球提供经济依据（而不只是道德依据），但按照同样的“价值”逻辑，如果我们收到更优渥的报价，我们肯定会接受。

此外，保护生态系统是因为我们会省钱，你不觉得这种说法令人沮丧吗？这个论点想当然地援引了下述基本假设：货币是一个合适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而且应当被度量并量化；通过加总数字，我们可以更好地决策。正是这些假设造成如此多的麻烦。

“可持续发展”成为流行语已经许久。现在，它几乎成了老生常谈。尽管每个人都认同可持续发展，但在与利润的缠斗中，可持续发展必败无疑。森林死亡、湖泊干涸、沙漠蔓延、雨林消失到了皆伐的状态，尽管四十年来，环保主义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毁灭的步伐几乎没有减缓。他们每每需要与货币的威权作战，而货币无可救药地追求短期利润，甚至不惜牺牲其长期生存。正如列宁所写，虽然背景略有不同，“资本家会把绞杀他们的绳子卖给我们。”在利息的土壤里，资本的短视生了根，进一步说，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于是成为注定的了。

随着利率降到了低于零的水平，另一种思想便占了上风。想象一下，你是世界总统。外星人的报价现在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在负利息下，再多的钱也不能换取地球，因为未来的货币的值会比现在更高，其未来价值会随时间成指数增长。你会对外星人说：“我们不卖地球，任何价钱也不卖。”

当经济体强制对文明的生态基础和生命本身定价时，今天的我们，不也应该这样回答吗！对于任何能够换取无限金钱的东西，我们不也应该这样回答吗！我认为，是时候停止“兑现”美丽、生命、健

康以及我们子孙的未来了。

我意识到，兑现地球的例子有些牵强，你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提出论点来驳斥它。不过我的意思是，负利率会在根本上改变所谓“经济的”行为。那些会带来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好处的活动——确实会给后世带来好处——将会得益于与今天截然相反的经济动机，而在今天，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若有了负利息和衰减的货币，我们的理想将不再与我们的经济自利发生冲突。

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假设你正考虑是否要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为你的公司供电。初装成本是10万美元，安装后，你每年可以节省1000美元。就目前而言，安装并不符合经济原则，因为每年1000元产生的净现值远低于10万美元（即使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但是，如果利率为零或为负，这一决定便是经济的了。今天，即便它们是不经济的，人们也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因为我们心中的真理与经济的逻辑发生了冲突。在我们心中，将金钱等同于有益品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将金钱和有益品摆在相容的位置上。

再举一例，假设你拥有自己的森林，你可以将它伐光，把它卖给采石厂。森林消失掉，你会立刻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利润，或者你用可持续的方式砍伐它，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然而，一百万美元产生的利息收入至少是可持续采伐的两倍，你或许会选择将森林伐光。但如果利率为负，上述逻辑将不再成立。

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会与衰减的货币产生协同作用，使得货币变成一种良性的力量。前者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后者则是侧重长期思维而非短期思维。它们都是对当前系统的改进，但只用一种，无法保证世界的可持续性，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将经济决策与社会和地球的长远利益融合起来。

当然，长期思维有时候的是不合宜的。我们更喜欢立即实现需求，而不是在未来实现它们。如果我们正在挨饿，我们宁愿每天吃上一顿饭，也好过一年后吃上一百顿饭。奥地利经济学派，或者说新古典经济

学派从这样的例子推测出：人的本性是尽可能多地即时消费。在他们看来，利息是对延迟消费的补偿，是对延迟满足的奖励。换句话说，你，亲爱的读者，会花掉所有的钱来最大化你的效用。但是你并未这样做，因为有了利息之后，你会在未来拥有更多的资金。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时间偏好假设”。在贴现效用模型中，时间偏好——我们对即期消费的偏好假设，是至关重要的。该模型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它是今天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这也是当代对凯恩斯主义的“驳斥”之关键。此外，仅有的一篇讨论滞留金的数理经济学论文认为，这样的货币会损害公共福利[34]。但在构造（似是而非的）证明时，时间偏好假设是关键的因素。

我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逻辑，将时间偏好的作用最小化了。凯恩斯并没有放弃时间偏好，但他说，当收入上升时，人类花掉的钱会比收入增加的比例小。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当你饥饿难耐时，你会花光所有的收入购买食品；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满足所有的迫切需求，你或许会用剩余的钱购买书籍或者娱乐；当这些欲望都被满足时，你或许会买一辆劳斯莱斯。收入越高，你花钱的迫切感就越低。因此，凯恩斯认为，即便没有延迟消费的激励，人们也有储蓄的倾向。事实上，他认为，储蓄倾向可能是破坏性的，它会导致财富的集中。这就是为什么他认同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

在阅读了20世纪30年代末及40年代的一些文献后，我发现，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激动溢于言表。我感到颇为震惊[35]。当正统理论凭直觉察觉到，一种新的理论挑战了这一领域的核心认知时，这种典型的侮辱性辩论便会出现。凯恩斯的理论至少提出了两个深刻挑战。首先，他对储蓄的自然倾向的认识实际上是在断言，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拥有的货币越多，额外的一美元增

34 格哈德•雪思勒，“区域货币在德国：与欧元的本土竞争？”德意志联邦银行丛书1：经济研究，第43期，2006年。

35 见G•R•霍顿，“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时间偏好假设”，《经济学季刊》，第52卷，第2期，1938年：281~296页。这篇文章阐述了被称为“心理规律”的关键思想原则。

加的效用就越少[36]。虽然对我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对古典经济学家，它并非昭然若揭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和个人及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线性方程式。事实上，他们不仅如此定义，还假设人类会通过最大化金钱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我们拒绝金钱和效用之间的线性关系（效用即“有益品”），我们也拒绝了“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来最大化共同利益”的思想。我们同样否认了效用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财富最大化的论断，为强调财富公平分配的思想敞开了大门。在数学上，如果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那么资金的最优分配必须尽可能公平。这样，凯恩斯主义思想为均富的再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了对支持富人的思想家的诅咒。

但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有更深的意味。考虑相反的观点，即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人类的本性是挥霍无度。19世纪经济学家N•W•西尼尔（N. W. Senior）说：“放弃我们能力所及的享受，寻求遥远的、不能立竿见影的结果，都是人类意志最为痛苦的努力。”[37]下面给出了最近的一个例子，由范•米塞斯（von Mises）的一个追随者所写。

> 若没有之前的积蓄，可贷资金供给就不会存在，也就是说，若不放弃当前商品的消费（超过当前消费的超额生产）……利息或者时间偏好率就不会存在。或者说，利率会变得无限大，在伊甸园之外的任何地方，人们都像动物一样活着，即是说，只能靠双手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欲望来面对现实，为基本的生计操劳[38]。

---

36 通常用施肥来阐明边际效用递减。第一吨肥可使产量加倍；再增加一吨肥，只会增加10%的产出；再增加一顿肥只能增加1%的产出，以此类推。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为什么不将它应用在货币上呢？

37 N•W•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转引自乔恩•D•嘉旺（Handon），大卫•约思芬（Yosifon）的引述，“情境特征：从批判现实主义视角看人类的动物性”，《乔治敦法律杂志》，1993年，第1期，76页 。人们不禁注意到，朝意志痛苦地努力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美德。

38 汉斯-赫尔曼•霍普（Hoppe），“米塞斯诉凯恩斯案”，《凯恩斯的异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性评价》，马奇•斯高孙，圣巴巴拉：珀艾杰出版社，1992年。下划线为作者所加。

于是利息就成了一种对节俭、自我克制的奖励。按照这个观点，我们找到了一些更为深刻的、隐含在我们文明中的思想的共鸣，例如，人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进步，是通过战胜自然而得到：外部推动力是自然的力量，内部推动力是欲望、享乐、动物的欲求。禁欲成了一种美德，这种思想认为，若无禁欲，我们会与动物毫无二致。我们无法跻身于一个单独的、更好的、脱离自然的人类的疆界。卡尔•马克思如是说：

> 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产生了禁欲主义、自我否定、自我牺牲——精打细算和节俭，蔑视世俗的、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欲求；追逐永恒的宝藏。因此，英国清教，还有荷兰新教，就与赚钱产生了联系[39]。

这种心态遍布在我们的文化中。你必须延迟欲求的满足，你必须用未来会得到报偿的想法，约束自己的欲望。此时苦，彼时乐；要得高分，先做功课；要拿薪水，先去上班；要得健康，必先锻炼；要得苗条，必先节食。将你的生命投入到回报优渥的事情上，即使你对这些事毫无激情，你也会拥有愉快的退休生活。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我们用一种恩威并济的机制来克服我们的懒惰和自私。利息成了与自我作战的激励，用以克服我们反复无常的挥霍。

但这真的是人类的本性吗？消费、过度消费，不考虑其他人、其他生物，不考虑我们自己的未来，真的是我们的本性吗？不是的。古希腊人并没有用过于慈悲的态度看待人类本性，这是正确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说，在万事万物中——食、酒、性等——都是有餍足的。我们的需求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已经满足了这些需求，我们就会转向其他东西，变得慷慨。“但是，金钱并没有餍足之感。”这并不是说

39 卡尔•马克思，《大纲》，纽约州：企鹅经典系列，230页。

消费的倾向没有餍足感，与此相反，无限的欲望随金钱产生了。在消费过量之后，人们便开始贪图金钱本身，而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而这种欲求是没有尽头的。相比新古典经济学（及奥地利学派）的本末倒置，格塞尔和凯恩斯则试图剥离掉金钱的一部分特性，正是这一特性使得对金钱欲求无度。凯恩斯注意到——实际上他明确表示——随着时间流逝，流动性偏好占优于时间偏好，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他将之称为一条“心理规律”。

当然，对有些人而言——食瘾者、性瘾者、酒瘾者——在阿里斯托芬所列的物品中，确实有一些物品不会产生餍足感。这能否证明人类是贪婪的？其实，嗜瘾的例子指明了金钱究竟错在哪里。当我们使用替代品来替换我们真正需要的物品时，瘾就发作了，例如，食物是联系的替代品，性是亲密情感的替代品，等等。作为一种普世目的，货币成为很多东西的替代品，其中包括那些已经被货币经济摧毁了的东西：社群、与地方的联系、与自然的联系、休闲，等等。

当谈及货币的“流动性”时，我们只是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交换我们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在货币经济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用任何商品交换其他商品，只是不如用交换媒介（货币）那么容易。那么相对其他商品，为什么我们应该偏好货币呢？必须迅速满足需要的情形，的确证明，持有适量的交换媒介是合理的。除此之外，我们更偏好货币的原因是，货币并不会遭受储存的损失。货币的不朽使它不仅成了一种手段，也成了一种目的。通过去除货币的不朽，我们将它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如此，我们便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财富的概念。

你之增益，亦为我之增益

通过推出免费货币，货币的地位已经降低到了雨伞的地步，作为货币借贷的必然结果，朋友和熟人互相帮助。无人保留、也无人能够保存储备的货币。因为货币被强制流通。正是因为无人

可以形成货币储备，储备也就毫无必要了。因为货币的流通是有规律的、不间断的。

——西尔维奥·格塞尔

在现代经济学中，“普世手段”和“普世目标”的等价是“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负利率则将这两种功能分裂开来了。这是一个深刻的转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是货币的决定性功能。但将这两个功能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对象，则产生了麻烦，因为交换媒介需要流通才能起作用，而价值储藏则背离了流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矛盾造成了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之间的紧张关系。

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自我的原子观（the atom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elf），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概念俨然成为主导。解决了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紧张关系的货币系统，注定要对人类认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第1章里，我写道，“今天的货币体现了‘我之增益，你之减损’的原则。然而，在礼赠经济中，‘我之增益，亦为你之增益’，因为拥有者赠予了需求者。礼品巩固了这种神秘的参与，即参与到比个人更为重大、但未与自我分离的事情中。理性自利的公理发生了变化，因为自我已经扩展到了他者（the other）的范畴。”我们能够将礼物的这种特性灌输到金钱之中吗？

在以免费货币为基础的经济中，财富的定义与今天截然不同。事实上，它与原始社会、以礼物为基础的社会里的财富，具有许多相同的特性。在狩猎采集的社会里，人们以游牧方式生活，财产实际上是一种负担。除了金钱以外，说每件物品都有“携带成本”，恰如其分。在定栖的农业社会中，牛、存贮的谷物这些财产，虽然是人们所追求的，并没有给出相同程度的安全感，就像在赠予与接受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那样。粮食会腐烂，牛会死亡，但是，若你不吝惜将你的财富献给整个社群，那你无从担忧。

免费货币重新引入了狩猎采集者的经济思维。在今天的体制下，拥

有一万美元，比十个人欠你一百块钱要好得多。在负利息的体制下，除非你需要立即花钱，否则十个人每人欠你一百块钱，要比拥有一万美元好得多。由于货币随时间衰减，如果我有资金但无使用的需要，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借给你，就像我的面包多得吃不完，我会很乐意借一些给你一样。如果未来我需要资金，我可以收回我的债务，或向礼赠网络中的人借入新债，如果他拥有的钱比他需要立即花掉的更多的话。同样，原始社会的猎人在杀死了大型动物后，他会根据亲疏关系、个人情感和需求来分配兽肉。对于会衰减的货币，拥有一大堆“欠条”比拥有一大堆腐烂的兽肉更好，甚至比必须运输或安全存放的牛肉干更好。当你的社群慷慨地给予你，你也同样慷慨地对待你的社群时，你还需要什么呢？安全来自于分享。你邻居的好运气，也是你自己的好运气。如果你偶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财富来源，你会大宴宾客。皮拉罕（Pirahã）部落（生活在巴西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以狩猎采集为生——译者注）的一名成员在被问及食品储藏时，他回答说“我把肉保存在了我兄弟的肚子里。”[40]下面是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和!Kung族人!Xoma之间的对话（!Kung族人生活在卡拉哈里大沙漠中，以狩猎采集为生——译者注），请体会对话中的财富的概念。

我问!Xoma，“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 // kaiha[富人]——如果他的小屋里有许多袋//kai[珠子等贵重物品]？”

“持有//kai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kaiha”，!Xoma回答道。“只有当某个人制作了很多物品并分发开去，我们才叫他//kaiha。”

!Xoma的意思似乎是，你拥有的货品的数量并不构成你的财富，而你朋友的数量才是。衡量富人的标准是他或她的交易频

40　丹尼尔•L•埃弗雷特，“皮拉哈地区的语法与认知的文化约束：再看人类语言的设计特点”，《当代人类学》，卷46，第4期，2005年。

率，而不是他或她手头货物的存量[41]。

在免费货币体系中，财富具有了西北太平洋或美拉尼西亚（Melanesia）类似的特性。在这些地区，领导人“像个货物分拣站，货物在他自己的社群和其他类似的社群之间往来流动”[42]。社会地位与货币或者财产的积累无关，而与慷慨的责任的大小程度相关。在一个社会中，最高的威望、权力和领导权被授予给了最具给予倾向和能力的人，你能想象这样的社会吗？

古代社会便是如此。社会地位来自于慷慨，慷慨触发了感激和义务。要成为领主或国王，你必须主持奢靡的盛宴，将丰厚的礼物赠予同僚和属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尼伯龙根》（Nibelungen，用中世纪高地德语写成的史诗——译者注），中世纪德国伟大的先贤，从早期的素材汲取了灵感。大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遗孀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打算将她从夫君那里继承的财宝分发出去，国王受到了威胁，谋杀了她，并将珍宝倾入了莱茵河（这些珠宝在莱茵河里保留至今！）（作者所写与《尼伯龙根》的实际故事不符——译者注）。国王的权威靠礼物来维持，当其他人给出了更优厚的赏赐时，这个威权便削弱了。

在免费货币的经济中，零息贷款类似于往昔的礼物。虽然这种贷款看似违反了礼赠原则，即互赠的礼物不应被事先指定，它们仍然是礼物：礼物并不在于货币的形式，而在于使用的方式。在古代，礼物所产生的义务和期望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里亦然，社会决定采取的是契约、协定、法律等形式。这些具体形式背后的机制是等价的：拥有大过所需的人，应该给予他人。就是这么简单，就像我在第1章提出的，这是一种对于人类内在慷慨的表达。需要的只是鼓励，而不是阻

41 理查德·李，《多比·坤恩人》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84年，101页。

42 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9页。

止慷慨的货币体系。人类的本性并不需要奇迹般的改变。正如我在《人性的飞升》一书中写道的：

> 在一个以利息为基础的体系中，安全来自于资金的积累；在滞留金的系统中，安全来自于拥有生产性的渠道，并通过它来引导货币——也就是说，成为财富之流的联结，而不是成为财富积累的一个点。换句话说，重点在于关系，而不是“拥有”。它对应于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意识。对自我的认同并不是通过将世界圈围在“我”和“我的”的限制之下，而是通过发展、深化与他人的关系实现的。它鼓励互惠、共享以及财富的快速流动。

有时人们会问，负利息的货币，如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无法刺激消费的情形。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这只会发生在滞留金过高的情形下。作为价值手段，人们对货物的偏好要高于货币[43]，二者应该是等价的。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当我描述了代表富足的货币时，人们会驳斥说，“可是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稀缺的世界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几乎将它们耗尽了。问题是，我们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好像它们是取之不尽似的。”有人认为，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富足的态度，以及代表富足的货币。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首先想想，建立在稀缺性之上的货币，是否限制了稀缺资源的消耗呢？事实并非如此。货币的稀缺加剧了稀缺资源向货币的转换。导致了天然共有资源的枯竭的是稀缺性的态度，而非富足的态度。竞争、积累超过所需的量，是对资源稀缺之感的自然反应，这个社会中，令人作呕的过度消费和浪费起源于我们的贫困：一种存在的

43　如果滞留金费率过高，会发生投机性的资本投资，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繁荣–萧条周期。美联储或中央银行（想必）需要行使与今天相同的职能，通过加息（使滞留金接近于零）来平息经济过热，甚至将利率提高到正的水平。这样，无风险利率会低于经济增长率，从而避免了利息所导致的财富集中。不过我认为，当对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利用不再支持经济增长，当收回的社会资本缩小了有偿服务的疆域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缺失感，折磨着孤立的、离析的自我；以利息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货币的稀缺性；与社群和自然的联系被切断所造成的贫困；做任何事、谋生时承受的无情压力。相比之下，慷慨和分享是对富足环境做出的自然反应，这包括人类的疆域内的分享，以及人类疆域之外的分享。我们疯狂地将自然转换成商品，却连实际需求都满足不了。如果不是为了安全的话，这种狂热从何而来？

想想吧。有人购买了五十双鞋子，难道是出于稀缺或者富足的态度吗？买下第三辆车、买下一幢一万平方英尺的房子的人，究竟有没有安全感呢？这种拥有、主导、控制的冲动到底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个孤独的、贫乏的自我，来自于一个敌对、不给予的世界。

免费货币体现了富足的精神教义，体现了相互联系、短暂无常。然而，目前这些教义呈现给我们的真理，与我们通过信仰塑造出的世界有所冲突，特别是构成了“货币的故事”的这一套信仰。是时候适应一个新世界了，在新世界里，我们不再通过保存、窖藏、拥有而富有起来，在新世界里，我们因为给予而富有。我在第6章所批评的“新世纪”思维的“繁荣规划师们”，实际上宣布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确实需要采取一种富足的态度，并创造出一个体现这种态度的世界。

亲爱的读者，请仔细想想：说“我会借钱给你，除非你给我更多的回报”的人，真的是你吗？当金钱为生存所必须时，这难道不是奴役的公式吗？值得注意的是，使梭伦闻名于世的债务免除，是受了人口中籍没为债奴的比例不断增加的驱策。今天，年轻人感到被他们的大学贷款所奴役了，住户感到被抵押贷款所奴役了，整个第三世界国家感到被外债奴役了。利息即奴役。奴隶制的状态不仅是对奴隶的贬低，也是对奴隶主的贬低，因此我们不希望这种制度存在世上。

如果你把钱借给他人，你真的愿意看到这笔债务使此人无法自拔，直到永远吗？贷款的利息是一种偿还的压力，它是“若不还债，债务将越积越多”的威胁。而零利息或负利息的贷款则承载了一种自由，它们

不会带来终身债务奴役的威胁[44]。我认为负利率是很自然的。如果我借钱给一个朋友，她并未还钱给我，我想说的是，“算了吧，我不希望你陷入无法偿债的困难中。”我不想因循守旧，抓住旧债不放。负利息的货币系统强化了这种有益的、天生的倾向，它使我们放下过往，继续前行。

44 这并不意味着债权人不能得到抵押品，也不意味着法院不会强制收回债务人讫至到期日未偿清的债务。这意味着，等待的时间越长，可以收回的就越少。

第 13 章

Chapter 13

稳态与负增长经济

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物质消费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

——E•F•舒马赫

可持续发展的再思考

之前的两章，大略勾勒出了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体：它体现了地球的生态极限，它的蓬勃发展并不需要消费的无尽增长。但是，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终极愿望吗？

我对“可持续发展”早已失去耐心，仿佛它本身就是目的。思考我们要保护什么、创造什么，难道不是更重要吗？很多美丽的、必需的东西，都是不可持续的，例如，孕育生命的过程。最近，可持续的思想已经转变为了对转型的思考，我对此颇感欣慰。我们正在过渡的生活方式，远比当前的生活方式更具可持续性，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正如生命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活下去一样。

神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它是对生态环境的扩展，而不是生态环境的一个例外。因此我们要问，自然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和谐的吗？它是否具有我们偏好的一些社会特性？有人认为，“自然是和谐、平衡的”这种观点是虚妄的，转而强调自然的残酷、竞争、破坏性的方面。这种立场对意识形态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证明了“飞升”

（Ascent）的合理：通过科学和技术主导自然、驾驭自然。通常情况下，持这种看法的人，对原始社会和人类本性持有霍布斯式的观点。他们认为，相比野蛮、原始的时代，文明及它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各种方法，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这是“飞升的故事”的一部分——超越我们的动物本性，进入人类的专属疆域。

将自然视为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的观点，一种达尔文式的、个体生物之间生存竞争的观点，也贯穿到了经济理论中。在生物学上，这种范式已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但它在经济学上的对应，仍然统御着大多数专业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达尔文的“自私基因”被设想成最大化生殖自利，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则是寻求经济上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制定供需法则时的关键经济学假设。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生物学的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强调合作、共生，以及由单个有机体构成的复合体的内在平衡。此外，遗传完整性的概念已经饱受争议，因为新的发现表明，生物体之间的基因共享和物种界限具有重要意义。相互竞争的、离析的自我的范式在生物学中已经覆灭。这种覆灭对应着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中类似的进展。在任何领域，竞争与“优胜劣汰”将不再是公理。

这并不是说竞争是不重要的，也不是说自然是一成不变的。不可持续的过程在自然中确实发生过，它们也并非离经叛道，它们的目的是推动系统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反对我提出的回报的法则。他们注意到，自然系统有时的确会产生大量的废弃产品，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利用这种废料，因而对整个环境造成了污染。他可能想到了前寒武纪的氧气灾难。那时，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机体出现了，它们产生的废料——氧气，“污染”了大气。在经典观点中，自然的机能失常意味着地球上的生命的终结。所幸的是，好氧生物出现了，大气中的氧气被清除了。这并不是出于自然的和谐，而是千载难遇的突变。他们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依赖自然的和谐，我们一直都处在巨大灾难的边缘，必须使用技术

控制自然、控制身体、控制人类的天性，这便是飞升的思想，它与增长的经济思想相一致，与稳态经济的思想相悖。不过这位提问者并没有如此深刻，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要用自然法则来证明零增长经济的合理性。”

我想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讨论灾难现象。前寒武纪氧灾难那样的正向反馈循环，在自然中是存在的，它们发生在转型时期的特殊时刻。例如，一连串自我强化、自我扩展的荷尔蒙正向反馈，会触发分娩的过程，分娩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持续时间太长，母体会因筋疲力尽而死亡，然而一旦目的完成，母体便会重回动态平衡。正向反馈阶段使得生物体或生态系统从旧的稳态转换到新的稳态。

我们也可以用完全相同的视角来看待货币。货币与技术一道，是“人类元生命体”（human metaorganism）的关键“荷尔蒙”之一，它驱使我们踏上不可持续之路，朝着新的领域进发。在旧技术的基础上，新技术被创造出来，但新技术造成了新的问题，需要更多新技术才能解决。在旧资本的基础上，负息债券创造了新资本，但负息债务驱使更多资本以指数速度被创造出来，这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我们妄图使之死灰复燃，这个过程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正向反馈总会达到极限，到某一时点，地球的宫缩加剧——新生儿便娩出了。我们带着惶恐看到的指数增长曲线，实际上是一条“相变曲线”（phase transition curve）的一部分。

向稳态过渡：触顶还是崩溃

图2至图5说明了这一点。实线表示迄今为止货币、人口、能源消耗、资源利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统计量，这是一条指数曲线。虚线代表了未来的四种可能：图2表示飞升的故事所描述的技术乌托邦神话，随着我们征服星系、征服宇宙，指数增长将永远持续。当我们的增长超过了地球的极限时，我们就会殖民到别的星球，并将这些星球地球化。

如此，宇宙的无限就会限制我们无限的指数增长。

当前的经济政策仍然体现了图2所示的曲线。虽然很多人认识到，持续的指数级增长威胁到了地球上的生命的基础，但这种认识尚未渗透到主流经济话语中，增长仍是主流经济学的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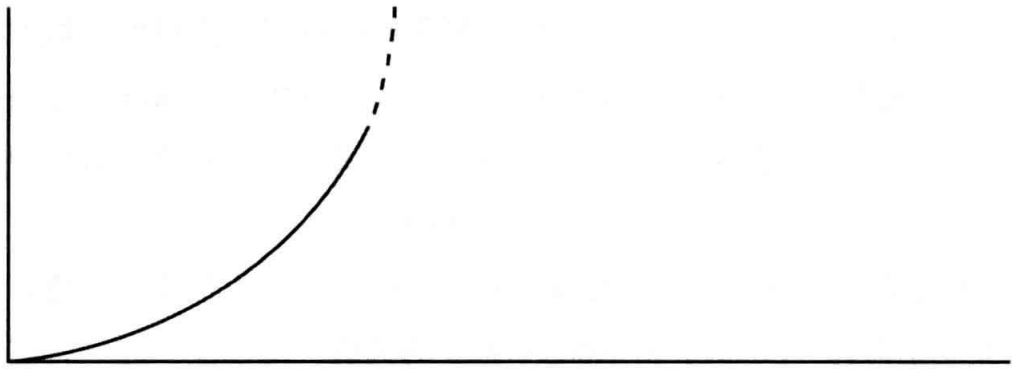

图2　持续的指数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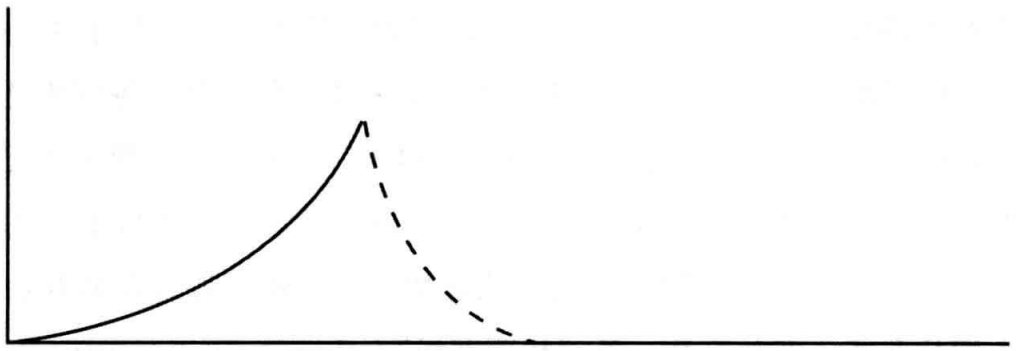

图3　峰顶与崩溃

悲观者的恐惧在于，指数增长曲线会达到图3所示的灾难性的、退回原点的崩溃。这正是激进主义运动和石油峰值运动中“崩溃主义”思想家们所预测的。他们将当前的情况与一些动物（如蝗虫）的统计资料进行了比较。在经历了种群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之后，种群数量会远远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不久便会发生种群崩溃。而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使地球不堪重负，因此崩溃主义者认为，人口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厄运和黑暗、崩溃主义的景象，如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2012年预言的流行，以及其他灾难性的世界末日期限，

都带有一定的情感诉求。我必须承认，我也不时感受到了这种诉求，我渴望流露心绪，我并非孤身一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对现代世界已经心生厌倦，厌倦它的暴力、异化、贫困、死寂，我们极度渴望不断变化，一个能够为我们改变世界的事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无论它是奇迹般的、拯救我们的技术，还是耶稣、不明飞行物，甚至是一些地质的、社会的或经济上的灾难。崩溃主义思想家们也被崩溃之后的时代深深吸引着：一个低技术含量的、公有制的社会，它与自然、精神、旧的方式相连。经济或环境崩溃的前景，取悦了我们的复仇心理。“我早告诉你会这样！”——我们希望看到邪恶受到惩罚。

不幸的是，崩溃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伤亡。此外，它们抹杀了整个文明的光辉大厦，无论好坏。如果技术和文化确实是一个错误，这没有问题，但我认为，与所有生命一样，我们的礼物皆是有目的的，只是我们尚未发现罢了。现在，我们从童年崛起，我们自制的危机提供了第一个机会，将我们的礼物用于其真正目的的机会。一股脑地拒绝我们的礼物，与把礼物放在高于自然的位置上，都是离析的思维定式，两者都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卓见主义。难道我们不能与自然重新融合为一个成熟的物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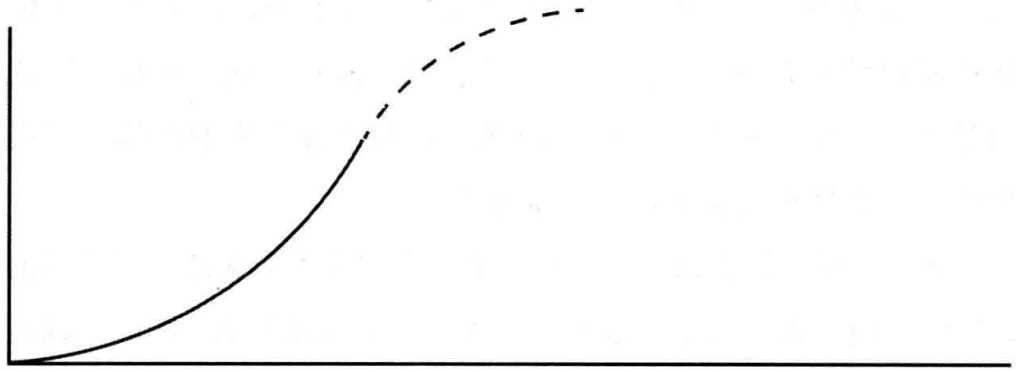

图4　趋于稳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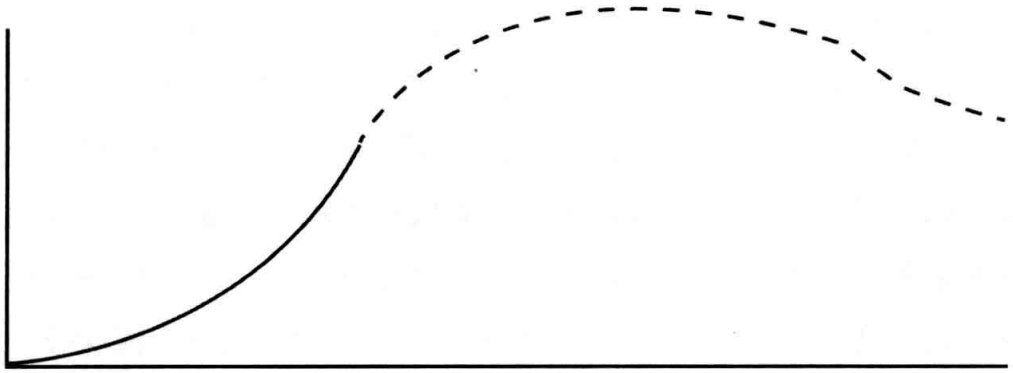

图5　达到峰值，随后达到稳态

我画出了两条曲线，它们都符合迄至今日的所有的数据点。图4是自然界中一条非常普遍的曲线：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增长最终减缓，进而接近稳定状态。这条曲线反映了的青少年的成长，反映了突然提供食物后贫瘠的土地上重新生长的植物总量，或者引入菌群后一只皮氏培养皿中菌群的增长。图5则是另一种常见模式：达到了长期可持续的水平之上的高峰之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态。

由竞争驱动的快速增长阶段过后，是过渡到稳定状态的阶段，这在自然界中是相当常见的。考虑一个不成熟的生态系统，杂草和小树苗争抢阳光。这只是更大的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的顶点是一个共生的、复杂的、非线性的、稳定的森林。我们的经济和生态环境与这种不成熟的生态环境相对应。沉浸于此，鲁莽的竞争被我们误认为是自然之道。也许人类正在迈向成熟，自发形成互惠的群体，而在这个群体中，竞争和增长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事实上，最近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人口并不会崩溃，但人口的增速减缓将加快。人口或是稳定下来，接近八十或九十亿（图4），或是达到峰值，然后下降到数十亿的稳定水平（图5）。用经济术语来解释这些曲线就是：生命被货币化的过程要么放缓（经济增长最终放缓，我们会达到稳态、零增长的状态），或者，经济首先收缩一些，然后在一个较先前更低的水平上稳定下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低）。图4解释了第一种情形，图5解释了第二种情形。我认为，人口与经济的情形应与后者

相一致。

人口统计支持这个猜想。随着一个国家接近完全工业化，其人口出生率会降低，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低于人口替换率（replacement rate）。这意味着人口会缓慢、自然地下降，而不是发生灾难性的集体死亡。若要治愈地球的创伤，那么在未来的三十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都将达到峰值，然后以每十年收缩数个百分点的速度，最终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1]。这个趋势已然开始：根据联合国2006年的预测，世界生育率已经下降，在过去十年中，每名妇女的生育率已从2.65下降到2.55。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其生育率急剧下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远低于2.1的人口替换率。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一个衡量幸福的指标，避免了GDP的很多缺陷）与生育率有负相关关系。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人类发展指数达到上界之后，生育率发生了逆转。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接近完成时，生育率会接近于人口替换率的水平[2]。

我并不打算用这些统计数据来暗示一种可能性。我不会去预测未来。但我认为，离析所造成的破坏，如将健康资本转化为货币，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将导致生育力极速下降，死亡率增加。2100年，世界人口规模会比今天略小。在经济上，我们将收回大量被货币化、私有化的公共领域和礼物。今天的大多数商品将不再是商品，新的合作型经济形式将纷纷涌现，以满足本地的需求。

图5中“触顶”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我们超出可持续的底线的程度。我认为，我们错过了20世纪60年代轻松过渡的机会（图4），它代表的是离析时代的自然峰值。我们确实瞥见了它！我们瞥见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它离我们如此之近。嬉皮士看到了它，并一度生活在它闪亮的光

1　与人口相比，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减会更迅速、更激烈，有可能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大约每代减少一半。这是就全球范围而言，某些国家的增长将较其他国家持续更长时间。

2　埃德·永，“最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回升”，2009年8月5日，ScienceBlogs。

辉中，但古老的故事太过强大，嬉皮士们并未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却将他们拖回了我们的世界。

离析的时代持续的时间越久，过渡的创伤就越痛彻，朝着可持续底线的坠落就越深远、越迅速。在极限情况下，它接近图3所示的灾难情形。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剩余的公共资源、限制经济增长、维护真正的财富、在“触顶”之后维系生命，是如此重要——“加速崩溃，并减轻其严重程度。”今天，距离20世纪60年代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已有四十多年。即便如此，实现软着陆，为时不晚。

货币缩减，财富增长

如今，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经济衰退面目可憎，他们甚至将经济衰退与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联系在一起。我已经解释过，即便是在一个萎缩的经济中，负利息的体制也可以使信贷循环，从而可以避免财富的贫富分化和通货紧缩的螺旋。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觉得经济的负增长是骇人听闻的，顾名思义，负增长意味着社会将更加贫穷，难道不是吗？顾名思义，负增长意味着可供公众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数量将下降，难道不是吗？

不会的。经济负增长根本不会导致财富下降，也不会导致可用的“商品和服务”下降。记住，目前的商品和服务被定义为可用金钱交换的东西。如果商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其他非货币性机制来提供，那么统计意义上的“经济”可能缩小，即便实体经济——人们为他人所生产和所做的事物——变得更加富裕了。

我并不讳言，在这本书中，我希求经济负增长、经济萎缩，希求经济衰退持续几十年甚或几百年。显然，“经济衰退”这个词在今天具有负面含义，但实际上，它只表示一段时间的后退。我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为了地球而牺牲一些生活质量，我们需要削弱货币的作用。如果

我们的未来具有人类分享模式多元化的成分，那么，经济增长的含义将与今天有所区别。我们并不需要变得更加利他、牺牲更多自我，为他人而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是如此固守金钱和自我利益的等式不放！不应该再如此了。让我通过一些例子，来阐明我们该如何通过缩减货币的疆界变得更加富有。

今天，庞大的软件产业已经形成，其运转只需花费少量的金钱。我使用了OpenOffice来写作本书，这是一个自愿捐助的软件，由一些程序员无偿编写。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程序员并未被“支付”金钱，但他们获得了同胞的尊重，得到了一种社会货币。我更愿意将他们的生产力视为一种礼赠经济，它会在社群成员之间产生尊重和感激之情。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它显然未被包含在GDP的统计范围之内。我们会得到一个萎缩的“经济”，这个经济会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类似的产品。这种产品越多，我们需要的金钱就越少；我们拥有的休闲越多，我们就越愿意为礼赠经济提供我们自己的产品。

许多商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几乎所有的数码产品，如软件、音乐、电影，等等，都是如此。第一单位的产品包含了相当大的成本，但在此之后，每单位的成本基本为零。因此，业界人士试图通过版权保护、数字版权管理机制等，制造人为的稀缺性。我们奖励数字内容创造者的唯一方法，竟然是把它给予更少的人，而不是使更多人受益！这是很不合理的。每个人都应该获取每一部影片、每一首歌曲、每一个软件程序，这并不会给生产者带来多高的成本。非稀缺的商品不应该用稀缺的货币来付款。事实上，很多非稀缺产品的生产者已经放弃了人为的稀缺性，转而采用自愿付款、出售广告位、对技术支持收费的方式，在音乐界，则是采用现场演唱的方式。时间、注意力、音乐会的场地等，都是稀缺资源，他们更容易进入货币的疆界。然而，最终的结果将是经济的负增长，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

> 其基本思想是伟大的，它是用免费的内容，捎带了货币化的

辅助服务：Linux的发行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客户定制，音乐公司在某个合适的地点出售认证的正版拷贝，钓鱼乐队（Phish）出售音乐会门票，等等。他们未能圆满解决的一件事是，从这些辅助服务中得到的现金总额，要比版权内容带来的数额少……微软的百科全书Encarta并不能弥补对大英百科全书的销售造成的损失。维基百科（Wikipedia）摧毁了Encarta和大英百科全书数十亿美元的净货币价值[3]。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它似乎正在蔓延，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始转战网络），我们将看到财富更多，（货币）经济规模更小的完美典范。

许多产品的边际成本都趋向于零。数字商品则是这一普遍现象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多数药品实际的边际生产成本只需几便士一粒。即使是螺丝这样的大宗工业商品，其成本也比过去少得多，不仅资金和人力劳动减少，能量投入也大大减少。这皆拜积累了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的创新所赐。它是我们神圣的遗产的另一个方面——就文化而非自然而言——所有人应同等受益。

神圣经济的演化是一个整体，它是更为一般化的文明变革的一部分。同时，医疗、教育、农业、政府、科学，以及我们文化中的所有制度，也会发生变化。每个领域的变化都强化了其他领域的变化。向自然医药的转变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也是如此。短短两个世纪前，只有极少数人为医疗服务付费，这种医疗服务由非正式的民间理疗师、草药师，甚至老祖母和邻居提供。草药知识被广泛地传播开去，通常无须付费。即使它变得完全专业化了，草药（以及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天然药物）的潜在利润仍然远低于高科技医学。与医药学中复杂、高技术含量的工艺相比，草药的生产相当廉价，许多好药材是近乎无处不在的杂草，草药、顺势疗法和各种身心调节法在今天遍地开花。它们都预示着经济的负增

3 凯文·卡隆，“富足创造了效用，但毁灭了交换价值”，2010年2月2日。

长，而我们的生活质量却不会降低[4]。

另一个经济负增长的领域是建筑和城市设计。两代人以来，广阔、稀松的郊区不仅将我们同社会、自然、地方割裂开来，还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现在，规划者和建设者重新发现了高密度城市设计、小规模住宅、易于公共交通的布局，以及无须驾车的、多用途住宅区的优点。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导致经济萎缩：对诸如道路、汽油、木材等“良品”的需求变少了。随着生气勃勃的公共空间的增加，人们对巨大私人空间的需求将会降低。生活在社群中的人们会降低对外部娱乐的依赖性，从而有更多机会彼此分享、彼此协助。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以货币为媒介的活动将会减少。

脱媒和点对点革命

经济萎缩的另一个来源是脱媒，而互联网使得脱媒成为可能。脱媒指的是中介媒介的消除：消除中介、经纪人、中间商等。想想Craigslist（美国最大的免费分类广告网站——译者注）的例子吧。根据一项估计，Craigslist每年毁掉价值10亿美元的分类广告收入，而将区区一亿美元收入囊中[5]。谷歌也使广告变得更为高效（更便宜），它不仅抢夺了既有媒体的收益，还使整个行业的广告支出大大削减（到2009年，整个媒体的总“广告支出”下降了9%）。当然，虽然做广告变得越来越便宜，广告也变得更加无处不在，但广告业的总规模已达到了顶峰。诚然，我们已经过了“峰值广告”，因为公众注意力这一共有资源已经饱和了。作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的广告，已经停止了增长。不过，不必太过伤心。与此同时，广告和营销的很多传统功能曾经需要付费，而现

4　可以肯定的是，科技医药在某些方面有过人之处。在治疗今天大部分折磨人的慢性疾病上，科技医药要逊色于草药，但在大多数急性情况，它是无可匹敌的。我并不主张终止科技医药，而是主张将它退到合适的界限内。这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主导着我们社会的臃肿机构。

5　杰夫·贾维斯，“创新产生效率”，Buzz Machine，2009年6月12日。

在，通过社交网络，它们已经变成免费的了。同样，博客圈夺走了传统新闻发布的功能，且成本更为低廉。对于旅行社、股票经纪亦然，许多其他行业甚至不再需要经纪人和代理人了。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经济的收缩。

脱媒和开源软件都是点对点（P2P）这一更为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旧的层级化、集权化的配送、流通和生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来管理。这些旧模式的本质是，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将人们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使得礼物的交换无法实现。

脱媒甚至对信用体系产生着影响，它颠覆了银行作为连接投资者和借款人的金融中介机构的传统。公司可以绕道银行，直接在货币市场上融资；而新的点对点（P2P）贷款网站，如LendingClub和Prosper.com，已允许个人之间直接借款。稍后将讨论的商业信用清算圈、互惠保理系统、商业易货贸易网络，都是信息技术削弱集权化中介机构的手段。这些新形式，都将通过降低“金融服务”的支出，减少国内生产总值。

这些越发越廉价的“信息经济”服务，几乎成了各行各业的生产要素。拜这些技术所赐，负增长将具有传染性，即使是我们公认的朝阳产业也是如此。例如，在2000年，用于电脑硬件（包括打印机、服务性活动和数据存储）上的金额约有3710亿美元。到2009年，这一数额已缩小到了3260亿美元。显然，这种下降并不是因为我们购买的计算机少了，而是因为成本大幅度下降了。

刊登广告是互联网上最常见的盈利模式，整个数字经济的规模基本上被限制在了实体经济能够支持的广告水平上。但是，互联网自身有如饕餮：提供免费的产品评论和价格比较搜索的网站，却使得赞助这些网站的广告变得过时了。

人类历史上成功运作的商业模式（在礼赠经济中，找到为自己生产某物的人，将此物从他们身上夺走，再卖还给他们），正在发生改变。网络使得人们能够再一次为自己和他人制作物品，而无须花费金钱。埃里克•雷因斯（Eric Reasons）评论道：

现在我们很难找到货币化诸如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这样的网络服务的办法了，其原因也许是它们不能被货币化……或者，它们至少不会立即替代它们正在替代的行业和服务。这也正是为何在转向网络商业模式的过程中，平面媒体得到了惨痛的经验[6]。

互联网是一个参与性的礼赠经济体，一个点对点的网络。在这个点对点网络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无区别。当我们用在线网络分享新闻、推荐产品和歌曲时，我们不对任何人收取“信息服务”的费用，大多数网站的内容是免费的，这是一个礼赠经济。雷因斯得出结论，

有人告诉我们，要相信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但没人想出如何靠它赚钱。那些靠它（Craigslist、谷歌）盈利的人，赚到的只是旧市场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而他们已经扰乱了旧市场，或者用创新消除了旧市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货币化方案，而是因为创新没有导致增长。而是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从而对臃肿的行业产生了紧缩的压力。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这些最终用户在空闲时间里造成的，因为我们想要创造和分享，而不只是消费。

重新朝着参与性的礼赠经济前进，是全新的。产能过剩和就业不足的威胁，已经困扰资本主义达数百年之久。这说明，我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努力工作。事实上，休闲时代早已到来，自从第一架工业机器投入使用，机器可以“替千人之役”以来，休闲时代便到来了，它隐含的承诺是，我们只需花千分之一的努力去工作。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

6 埃里克·雷因斯，“创新的通货紧缩”，2009年7月5日。

一承诺已经兑现。而在这里，我再次承诺它会到来。这一设想是否又是海市蜃楼？不会的。关键的区别是，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技术对于效率的改进来实现更多的休闲。负增长，而非效率的提高，是问题的关键。这似乎与直觉相悖：负增长——经济衰退——竟然会为大众带来真正的丰裕富饶。

在增长的经济体中，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又被重新投入以便生产更多产品。假设在1870年，为一个家庭制造必需品需要10个劳动工时，那么今天，生产等量的必需品只需要一个工时。若如此，那便意味着我们的体制沆瀣一气，让我们消费1870年10户人家所需的量。我们听到了有关美国消费者的讨论，说他们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它隐含的是一个财富的黄粱梦，消费的不断加速是它的标志：每月一台新电脑、每年一辆新车、每五年一幢大房子——更新、更多、更大、更好。这看似疯狂，但在经济上却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下，通货紧缩伺机潜伏，它近在咫尺，只等着消费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的那一天。

我并不认为经济会突然转到我所描述那种状态。让我们放任我们温和的秉性，容忍长期的奴役习惯吧，我们需要时间等待它们解体。我预见，负增长率会在2%左右，从现在开始，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我们所使用的原材料、我们对空气和水的污染、我们为了金钱而非兴趣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每代会下降一半左右，直至负增长的步伐放缓，经济稳定下来，达到与地球均衡共处的状态。

我所描述的系统则提供了一种替代模式，替代这个崇尚“更大、更好、更多”的未来，替代灾难性崩溃即将来临的未来。负利息使得生产性的投资继续进行，使得资金流通，即便资本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为零或为负。而以共有资源为支持的货币会将工作解放出来，导向非消费性的目的。接下来，我将介绍神圣经济学的第三个方面：社会红利，它使货币经济中工人的购买力从充分就业的需要中解放出来。

第 14 章

Chapter 14

社会的红利

如果有人雇你将石块掷过一堵墙，然后再掷回来，以此赚取工资，你可能会觉得受了侮辱。然而，现在很多人做的事并不比这更有价值。

——亨利•大卫•梭罗

显然，那些必须把同样的事情重复一遍又一遍，每分钟重复一次，或者每分钟重复二三十次的人是最不幸的。他们的工作时间理应最短，工资理应最高。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休闲的悖论

技术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节约型设备的历史。一台柴油挖土机相当于五百名拿着铁锹作业的男子；一台推土机相当于五百名拿着斧头的伐木工；一台计算机相当于五百名拿着纸和笔的会计师。经过几个世纪的技术进步，为何我们的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为什么大多数人每天仍有稀缺不足之感？几个世纪前，未来学家曾预言，休闲时代已迫在眉睫。为何这个时代仍未到来？

其原因是，我们一有机会就会选择生产更多的产品而不是选择更少的工作。

在现行制度下，若没有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的话，既休闲又增长是不可能的。试想一下，一种神奇的技术突然被发明出来，每名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于是生产相同数量的商品所花的劳动减半了。如果（在稳态或负增长经济中）经济需求没有增加，那么半数以上的工人便多余了。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必须解雇一半员工，让他们兼职，或支付更少的工资。工资总额将下降一半，因为支付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为雇主带来的收益。即使产品便宜了近一半，被解雇的工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产品。尽管更少的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并不在能够使用这些货币的人的手中。休闲看似增加了，但这种休闲被称为“失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财富迅速集中，通货紧缩，企业破产，正像第6章所描述的那样。

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灾难是可以避免的，途径有二：财富再分配或经济增长。要进行财富再分配，可以向就业人员收取一些钱给失业人士，资助企业保持冗员，或者为每个人支付社会工资而无论他们是否就业。这些再分配政策减少了资金持有人的相对财富和权力。而经济增长则是使需求增加，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就业。

一般来说，富人掌控着全局，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财富被重新分配。解决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的传统办法是刺激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必须不断增加。出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很明显，这一解决方案无法在整个地球上推广；另一种方式是增加需求，通过拓殖非货币的领域，迫使人们购买曾经免费的东西。最后，我们可以靠战争和浪费销毁过剩的产品。当自然需求饱和时，上述措施会驱使每个人卖命工作。

增长的意识形态（即飞升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自然的需求永远不会饱和，它具有无限的（向上）弹性。它假定新市场、新需求、新欲望延绵不绝。但是，唯一没有餍足感的欲求对象是金钱。无限欲望和无限需求的假设，驱使了我们今日的疯狂之举，以及能

够为其自圆其说的经济逻辑[1]。

在效率提高后，我们过去总是可以选择：工作更少或者消耗更多。然而，在高度依赖增长的货币体系的驱使下，我们不断地选择后者。我们并没有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满足既有需求，而是一直在创造新的需求。更多的时候，我们把对礼物的需求转移到货币的疆域，或者寻求用有限的物资满足无限的需求。这导致了我们的“飞升”，开发了我们的双手和头脑。虽然这种发展耗费了巨大的自然、文化、精神和人的成本，但这种发展确实有其正当性。随着自然和文化的共有资源被耗尽，我们做出选择的背景——工作更少或消耗更多——正在发生变化。飞升的年代即将结束，在与地球的新关系中，我们开始将我们的天分礼物引向其真正的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提出了这一划时代转变的观点：

> 一方面，劳动阶级接受了……这样一种情形，他们可以拿回蛋糕的一小块，而这块蛋糕是他们与大自然及资本家合作生产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被允许拿回最好的一块蛋糕，理论上他

1　需求的无限弹性说明休闲经济会永远延迟下去，其根据是所谓的“劳动合成谬误”（lump-of-labor fallacy）。
我将其重新命名为“劳动合成谬误之谬误”（lump-of-labor-fallacy fallacy），原因是，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论”是说，经济所需要的劳动量会一直增长；因此，技术的改进不会缩短工作时间，或者说，不会缩短投入生产的时间。
杰文斯悖论与之类似，依据的假设也基本相同。杰文斯悖论是说，提高效率并不会导致资源使用（包括劳动力）减少，而会导致资源使用增加。例如，当照明变得更便宜时，我们会使用更多照明。如果小型荧光灯泡的耗电量仅为原来的五分之一，那么我们会转而使用这种灯泡，安装数量是之前的5倍以上。由于灯泡非常便宜，我会在我家后院安装一些新的灯泡，用于夏天举办聚会。若考虑负增长的因素，那么杰文斯悖论是说，广告更便宜意味着广告会更多。然而，这再次假定了需求具有无限向上的弹性。它假设使用照明和广告的能力是无限的。说得更复杂一点：即使一个领域的需求完全饱和了，效率的提高所释放出来的金钱，也会被用到别的领域。因此，它假设整体需求是无限的。伴随着这种假设的是另一个假设：自然、文化等可以被转换为货币的疆域，其数量是无限的。早前，大自然的资源似乎取之不尽，但今天，其有限性已经显而易见了。
受过经济教育的读者，可以将类似的逻辑应用到其他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中，如萨伊定律、破窗谬论等。它们都体现了飞升的故事：我们对自然的统治将永远继续下去。

> 们可以免费享用它，他们依据的是一项心照不宣的条件，即他们实际只会消耗非常小的一部分。“节约”的责任，成为近乎完美的美德，蛋糕的增长则成了金科玉律。围绕着蛋糕未被消耗的部分，清教徒式的本能增长了。这种在其他时代表现为遁世的本能，对生产的艺术以及享受的艺术视而不见。如此，蛋糕增大了；但要为何增大，没有人清醒地思考过。个人会受到这样的劝诫，与其放弃安全和预期的乐趣，不如延迟、培养这种乐趣。储蓄是为了防老和子孙；但这仅是理论上的——蛋糕的优点在于它从未被消耗掉，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子孙[2]。

在集体层面上，选择不消耗蛋糕意味着增长胜过休闲。面对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我们要么选择更少的工作，要么同样努力地工作，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我们的经济体制要求并体现了后一种选择。尽管今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同财政刺激联系起来，凯恩斯本人却从未将财政刺激作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通过军费开支、公路建设、对加速开采、建筑、消费、帝国主义提供补贴，人为的需求刺激已经延续了七十年之久。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保持资本边际效率超过利率，我们已经在“生产更多”的模式中越陷越深，不管我们是否需要这些产品。这个陷阱、这种经济理论，用“欲望无限”的假设，佯称我们将始终“需要”，总是需要生产更多产品，即使行业甲不需要，行业乙也会需要。我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另一种描述：首先是耗尽自然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精神资本中的一个，然后耗尽另一个。因为生活在飞升的意识形态中，凯恩斯并未如此挑明，但从直觉上，他清楚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在上面这段话中，他明确使用了过去时态，对我而言这至少意味着这块蛋糕总有一天会被吃掉：选择较少的工作，而非更多的物资。

---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20页。下划线为作者所加，我在www.lump-of-labor.org注意到这段话。

正的无风险利率是在凯恩斯的“告诫”的经济层面，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安全和预期的乐趣”。或者，用我的话说就是“以当下换取未来，为安全（或类似之物）抛弃自由”。我的经济逻辑同样具有个人的层面。在过去的岁月里，利息承诺今天的钱能在未来购买更多的休闲，我们有了选择工作胜过休闲的激励，即使我们并不需要钱。通过放弃乐趣和休闲——事实上总是如此——我们甚至会到达经济的天堂：提前退休。但是，同宗教一样，天堂的承诺往往只是为了将我们锁在桎梏之下。我们受奴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地球目前的情势迫使我们把注意力从“增大蛋糕”转移开去。

“工作”的过时

自工业时代起我们就一直担心人类会被机器取代。事实上，随着机器接手了很多曾经由人类完成的功能，这一担忧已经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了。保持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是增长，但在这里，我呼吁结束经济增长、结束充分就业（金钱的充分利用）。考虑到长久以来的焦虑，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劳动被机器所取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要被机器所取代，人们的工作首先必须可以被机械化。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已变得愈发机械化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工作也带有了机器的特点：均一、循规蹈矩、标准化。当这些工作涉及机械操作，或者是机械主导的过程的一部分时，工作的机械性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不仅会像机器一样生活，还会像机器一样工作，这正是焦虑的深层来源。

19世纪初的鲁德分子（Luddite）运动是最为著名的反机器运动。研究员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认为，鲁德分子并不是盲目、迷信地仇恨机械，而是认为应使机械适得其所。他们被激怒，不仅是因为失去了生计，还因为劣质产品、工厂的麻木乏味、险情不断、失去人性。他们抗拒劳动的机械化，用有辱人格的、危险的工厂作业替代高技

能的自主生产，认为这简直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

因此，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经济，其目标绝非自由派政治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提供“工作”。一旦工作变成了机械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就病入膏肓了——非人的工作，还不如由机器来完成。那些旨在造出更多“工作”的、疯癫的经济方案，弄得我们好像需要更多产品和服务似的。我对此感叹不已。我们为什么要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呢？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有钱过活。为了这个目的，人们会掘地三尺，再填埋好，就像凯恩斯打趣的那样。目前的经济政策与此无异：美国正在努力重新刺激房地产建设，而空置的住房却多达1900万套[3]！付钱让人们将创新能量释放出来，满足世界的迫切需求，难道不是更好吗？

显然，我们已经拥有了增长更少、工作更少，将精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的手段，并且这样做也存在着相应的必要性。很久以前，工业界承诺，技术会令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我们将迎来“休闲时代”。现在到了兑现这一承诺的时候了。不幸的是，休闲一词含有轻浮和放浪的意味，它与转型时期的社会及大众的迫切需求相龃龉。大量重要的工作亟待完成，这些工作与负增长契合，因为它们并不一定会产生可供销售的产品。森林亟待补植，病人急需照顾，整个地球亟待医治。我认为，我们将会非常忙碌。我们将努力做一些意义深刻之事，不再需要与货币的洪流和迫切的增长逆战。我相信，我们会拥有更真实的休闲、比今天更加充裕的时间。时间的稀缺是我们过量消费的原因之一，我们试图用消费来弥补时间，而时间是所有财富中最至高无上的一种。时间即生命，真正的富有是充分占有我们自己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描述了这样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货币提供了维护、扩大生态系统和其他共有资源的激励，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资金会流向那些需要它的人。然而，终结“金钱属

3 此外，比人们所需居住面积大的住房多达上百万套。在某些国家，三十人其乐融融地挤在一起，其居住面积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面积。有趣的是，经济的衰退开始扭转孤立、核心化的家庭模式，成年的孩子被迫搬回家与父母同住。

于能够创造更多金钱的人”的原则，有更为激进的办法。现代银行制度就是根据这一原则创立的。为什么不把钱分给大众呢？为何不把钱分给每个人呢[4]？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信用运动的发起人梅杰•道格拉斯（Major Douglas）就倡导了这种“社会红利”或“社会工资”的思想。

这种想法兼具经济和道义上的理由。道格拉斯是一名英国工程师，与马克思一样，他发现，随着劳动密集程度的降低和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工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减少了——这导致了贫困和贫富悬殊加大，以及因需求下降而产生的经济衰退。他建议发行充足的法币作为补救措施，以按人头支付和销售返利的方式（即负的销售税）支付给所有公民，使他们都能购买到劳动产品。这项建议并未超出主流经济的范畴——2008年发放给所有美国家庭的刺激支票，就是社会红利的一种弱化形式，旨在达到道格拉斯所设想的效果：把钱交给那些可以花掉它的人，从而对抗经济衰退[5]。它们并不是专门提供给穷人的福利支票，而是发给每个人的刺激支票。

随着经济持续低迷，以休闲和再分配替代增长已经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例如，德国的“短时工作制”（Kurzarbeit）计划就旨在为更短的工作时间提供补贴以防止失业，它公然否认了所谓的“劳动合成谬误”（见本章脚注1）。公司并未裁员20%，而是将每个人的工时缩短了20%。雇员工资削减的部分由政府补偿。雇员可以保住他们的工作，虽

4　这不会带来永久的通货膨胀，除非货币供给总量增加。对于这里所描绘的系统而言，减少基础货币，促进“货币供给中性”的社会红利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税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这类传统方法，也可以通过赎回资源支持的货币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最后，通过滞留金的作用，衰减的货币、对银行储备收取负利息会使货币供应量减少。在当前的货币存量下，如果滞留金率（负利率）为5%，每个家庭每年将得到1,000美元的货币供给中性给付。为了拯救金融基础设施，使用债务工具是有必要的。如果在政府救市计划中，大量的债务工具被货币化，那么来自于滞留金的收益将是上述给付的十倍之多。

5　当然，与此同时，更大规模的公共资金被挥霍在金融机构上，而这些金融机构在危机之初沆瀣一气。

然工作时间缩短了20%，但减薪幅度只有4%～8%[6]。其效果令人印象深刻：在经济衰退期间，德国的失业率一直低于预期；到2009年上半年，在该政策实施最为严格的汽车行业，全职工作岗位一个也没有减少[7]。“短时工作”计划与有限范围内实行的社会红利相类似，二者具有类似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动机。

社会红利还有一个哲学或道义上的理由。十几岁时，我读到了菲利普•何塞•法默（Philip Jose Farmer）的小说《紫薪骑士》（Riders of the Purple Wage）。与道格拉斯一样，法默认为，工业技术使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任何人都不需要非常努力地工作，就能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地球的自然财富和技术使这种唾手可得的富足成为可能，这种富足是人类的集体财富，只是因为出生，每个人就有权享有其中的一份。当然，人们无权从集体财富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譬如，他们无权从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和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的发明中获得更多利益，更遑论使得博伊尔和爱迪生功成名就的文化背景了。你我拥有的文化禀赋的权利，并不比我们拥有的土地权或基因组的权利更多。这种权利来自于整个人类得到的礼物；这是来自于我们祖先的礼物，正如土地是自然、造物主所赠的礼物一样。

对于“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富足”这般巧舌如簧的说法，先别急于接受。这种说法采纳了飞升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永续增长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尽管节省劳动的技术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但与狩猎采集者、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中世纪的农民相比，我们拥有的休闲并不比他们多。这是因为技术可以生产的物品被过度生产、过度消费，而技术无法生产的物品则消费不足。通常，技术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恰恰是那些违背货币的均一性、去人格化特性的东西，即独特的、私人化的物品。稍后我将回到这个主题，就现在而言，你只需注意那些能够被量化的领

6 凯文•哈西特，《美国应该尝试德国的失业药方》，彭博社，2009年11月9日。
7 弗兰克•詹姆斯，“失业治疗或可采用德国式的工作共享”，NPR.org，2009年12月3日。

域。我们不需要工作太久便能获得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住所。当然，我们的工作不会超过20小时（1970年，在恶劣的沙漠环境里，运用石器时代工具的卡拉哈里原住民花在维持生计上的时间就是20个小时）。当然，我们的安全感不应降低，与圣节休假长达150天的中世纪的农民相比，我们不应有“维持生计”的压力。

工作的意愿

什么样的精神错乱让我们花时间建造无用的住房，而不是去拯救原油泄漏事故中的海龟蛋呢？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利可图的公共资源的枯竭，而恢复这些资源则是个利他主义的问题。本书的建议将扭转这种情形。将成本内部化，将资金和人类活动重新导向神圣，远离消费。负利息货币会使人们投资那些收益不抵投入的项目，从而结束用未来兑换金钱的做法。然而，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治愈地球创伤的很多工作都是不经济的[8]。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做有意义的工作，即便这些工作不能产生经济回报。与财富的再分配一样，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社会红利，刺激支票、税收抵免、福利金等都是其弱化形式。社会红利给了人们经济上的自由，人们会做无人会聘请他们做的事（因为这些事不会为雇主带来收入），这些事并不产生任何可以销售的商品。

促进非经济工作的第二个办法是，政府（或其他实体）付钱让人们做一些已经被重视的、美好的、必要的事情。在罗斯福新政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措施的前身：数百万失业者被重新雇用，他们不仅进行了基础

8　“不经济”的意思是，投资的财务回报为负，甚至比滞留金还要低。如果所有的成本都被内化，对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所有影响都可被量化，那么所有有益的活动都会变成“经济的”。然而，将一切量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好的做法是，让世界的一部分保持非量化的状态，让它处在赠礼的疆界之内。

设施的建设，终有一天会产生正向经济回报，也编译、保存了民间音乐，建立了娱乐场所。从本质上来说，将之进一步扩展，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构想。然而，中央计划通常会忽略重要的需求，导致极权主义的权力滥用，无法调动个人和草根组织的创造力。我们相信，采用社会红利，人们将摆脱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去选择好的、必要的工作。那些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择——不受约束的欲望的产物——将有助于确定哪些工作是神圣的。

这关涉到人类本性的两个相互抵触的愿景，因而关涉到社会如何运转的愿景。第一个愿景是说，“将人们从经济上的迫切性中解放出来，他们就会完成美妙的工作。”另一个愿景是说，“提供给人们美妙的工作，并用经济上的迫切性驱使人们去做这些工作。”第一个愿景对人创造的本能欲望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深信不疑；第二个愿景则是将“如何分配人类劳动”的决定权交到了决策者手中。我认为，二者都需要很长时间来实现，随着政治制度的包容性更强、更加平民化、更具自我组织性，这两种愿景将最终融为一体。

对社会红利或其等价权利的一种反对意见是，人们会缺乏工作的动机。我们认为，“如果人不在某种工作压力下，他们会什么也不干。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激励。”如不工作便可满足基本需求，那为何还要工作呢？按照这种观点，稀缺性，甚至是人为的稀缺性，是一种积极的有益品，因为它抵消了人类天生的懒惰，它利用了控制、支配、与自我作战的逻辑。不想做任何生产性的工作，真的是人类的本性吗？难道我们真的需要奖励来哄着我们劳动，真的需要用处罚来严惩懒惰吗？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类的本性真的是从不给予、一味索取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也许你会将我的想法同我本人的经验联系起来。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是我未能完成我的工作，是我未能将我的礼物引向我确信之目的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岁参加台湾一家软件公司的面试时，我应聘的工作是一名翻译和商业顾问。我们正在讨论3D音效或类似的某项新技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热切关注着他们产品

的影响力。我突然产生了怀疑："等一下，你认为你们的员工真的关心这个产品吗？反正我对这种产品或其他产品是否具有3D音效一点儿也都不感兴趣。"接下来是一阵戚戚然，因为我意识到，我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别人付钱让我来关心。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现实的选择。我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真正在乎的呢？""我何时能过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别人付钱让我过的生活呢？"

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人类有给予的自然愿望。我们出生在感激之中：我们明白要知恩图报，拥有回报的意愿。今天的经济，并不驱使不愿给予的人违背他们懒惰的冲动，而是向我们施压，否定我们天生的慷慨，将我们的礼物引向并不惠及任何人的系统，维持它永恒的运转。神圣的经济应该解放我们的工作欲望，解放我们给予的欲望。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予，大多数人感到他们不能给予，是因为他们无法从给予中获得金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礼物无人需要。还有很多美好的工作有待完成，只是金钱并未连接礼物和需求。可是，即便只花上人类劳动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轻松满足需求（无论是否因为技术），每个人仍然如此努力地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金钱的本质是诱发稀缺性。

在经济学中，人们厌恶工作的假设是如此根深蒂固，它有一个更深刻的来源：离析自我的故事。如果"你之增益"意味着"我之减损"，如果你的幸福与我的幸福无关，甚至相龃龉，那我为何会有给予他人的意愿呢？生物学中的"自私基因"寻求的是生殖上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与经济学中"理性行为"，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金钱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不想做任何能够让他人获取利益的事，除非我们能够借此获利。我们并不希望给予；我们的给予是被迫的、有偿的。

在谈到工作的"负效用"时，经济学教科书会假设，如果不靠工资来"补偿"，人们会偏好……偏好做什么呢？偏好消费？偏好什么也不做？偏好娱乐？以稀缺性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其前提假设包含了对人类本性的严重偏见，而这一前提却为其正当性提供了理由。本书则对人类

的本性进行了另一种假设：我们是神圣的、有创造力、慷慨的生物；给予和创造是我们最深切的愿望。为了将这一认识体现在货币体系中，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为回馈社会提供丰厚的奖励，而不是将这种奖励变成一种压迫或奴役的方式。

稀缺性的体验是我们货币体系的生造；不仅如此，我们将懒惰视为人类本性，也是对这种体制下的工作的有力回应。如果你发现自己懒惰、拖拉、工作漫不经心、迟到、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那么也许不是你性格的问题，也许是你的灵魂在反抗，抗拒你不想做的事情。它传递的信息是："是时候寻找真正的工作了，这样你就可以将你的天分之力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了"。若忽略这个信息，你的潜意识会通过抑郁、自我破坏、疾病或事故加强它，使你无法过一种与你的慷慨相适应的生活。

在神圣经济中，人们仍会努力工作——不是因为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努力工作。你有没有尝试，将你的时间和劳动交付给有益的事业，但却因为你无法"负担得起"而没有付诸实施？社会红利则会解放礼物，让礼物流向需求，使我们的劳动与我们的激情、慷慨、艺术相结合。

很多人选择支付薪水的工作，要么是为了补足社会红利（可能是仅能糊口的水平），要么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工作。不过，这只是选择，不是必需的。若没有了强迫性的"谋生"机制，有辱人格的或繁琐的工作不会什么有市场。为了吸引工人，雇主必须提供有意义的工作，提供尊重人格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工作会大量存在。因为它们靠以共有资源为基础的货币系统提供资金，因此，大多数工作会是有意义的（因为有金钱上的激励去保护、恢复共有资源）。

事实上，即使没有社会红利，人们也做了很多无偿工作。从开源服务器软件到免费内容，整个互联网主要是通过志愿劳动建立起来的。辛勤工作的志愿者构成了整个互联网组织。我们并不需要金钱上的激励措

施来工作，而事实上，当不考虑金钱时，我们甚至做得最好[9]。如果人们得到支持，去做美好的事，而这些事情是他们现在迫于经济压力所必须做的，那么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神圣经济设想了这样的世界，人们做事是出于爱，而非金钱。在这样的经济里，你会做什么呢？回收有毒废弃物？作为一个“知心大姐姐”帮助问题少年？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创建庇护所？将濒危动物放归野外？在市内街区开辟花园？进行公开演出？帮助退伍老兵适应平民生活？从货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你，会做些什么呢？你自己的生活、你真正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在我们为了金钱而活的虚伪生活之下，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你的生活。

充实地活着，即是接受“我为何来到世上”这一叩问的指引。今天的大多数工作却不是这样。很明显，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在流水线上工作，也不为了推销产品，或与他人共谋让人类陷入困顿、破坏生态。没有人希望做这样的工作，终有一天，没有人愿意如此。

谁来清除垃圾

这是一个现实的宣言吗？分享一下我在去年春天写下的思绪吧。

奴隶世界

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正身处一家大型机场。成千上万的人做着与机场相关的工作，但能够使个人受益的工作岗位少之又少。

我乘酒店班车前往机场。司机是一位秘鲁移民。在路上，我向司机讲述了我在周末所做的演讲，并通过举例的方式诉说我对美丽新世界

9　根据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循规蹈矩的、无意识的活动下，金钱才是有效的动力。对于需要创意和概念性思维的活动，金钱奖励反倒会起到阻碍作用。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因为金钱激励会使人们分心。有关这一论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丹·平克（Dan Pink）的著作。

的构想。我说，“你整天开车往返机场——有时你肯定会想，‘我活在世上，不是为了干这个的。’”

“是啊，那是肯定的”，他说。

我不禁回想起在机场的书报摊看到的一幕。收银员将购买的物品输入电脑，将零钱递过来，说：“谢谢您，先生，祝您愉快。”我想到从垃圾堆到垃圾堆，将垃圾倒到车里，换上塑料袋，沉闷、忧郁、僵硬的面庞。我们创建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人们整天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怎么了，竟然毫无愤怒之感！

售票窗口和计数闸门边的男男女女，其工作略具刺激。这份工作可能需要数天或数周才能学会，而不是几个小时。然而，与那些需要人类能力和创造力的工作相比，这些工作差得太远了（虽然它们在其他方面令人满意，如为他人服务、使人们开心、认识他人等）。空乘、飞行员、空中交通管制员、机械师所做的工作需要花数个月来学习，只有这些工作，才合理地用到了人脑的学习能力。

令我惊讶的、最糟糕且最残酷的是，上述的一些工作所得到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了解其中的经济道理，但是我的内心抗拒这种逻辑，我希望行李处理员、司机、收银员获得更高的、不低于飞行员的收入。

如果没有这些做着枯燥工作的人，这个机场，乃至这个社会，将无法按照目前的模式运转。我的旅行依赖于他们的劳动，而这些劳动仅能为他们带来勉强糊口的薪资。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工作呢？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将一生都投入在这件事上。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未感侮辱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糊口。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因此，我的旅行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在做他们不想做的工作。这就是“谋生”的意味。从本质上讲，生存的威胁如芒刺在背，如枪口顶头。如果在死亡的威胁下，我强迫你为我劳动，那么你便成了我的奴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的运转依

赖于很多人毫无尊严可言的工作，当然不只是机场的劳动，还有制造厂、血汗工厂、种植园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奴役的世界里，通过奴隶的苦役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承载着我们无法承受的灵魂成本：一种痛苦的空虚或者割裂，使我们羞于面对他人的目光。

我们能够对此不置一词，自暴自弃地生活在这奴役的世界里吗？我希望能够直面每个红尘男女的目光，因为我知道，我并未从他们所受的屈辱中受益。

我还有一个比较自私的动机，不想生活在一个奴役的世界里：奴隶的劳动产品体现了渗入他们骨髓的精神。除了这个沆瀣一气的世界，还有谁会生产蹩脚的、颓废的、有毒的、丑陋的、廉价的物品和建筑物？除了奴隶，还有谁会在提供服务时如此反感、不愉快[10]？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由那些见钱眼开的人们制造的，他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他们“必须”工作。我希望活在一个由美好事物组成的世界里，这些美好是由喜欢他们的工作的人创造的。

被灌输了“工作令人反感”这种偏见的人会觉得我太天真，竟然提出了无人被迫工作的系统。谁去种植粮食？谁去清除垃圾？谁去清扫街道？谁去工厂工作？我并不是说不愉快的工作会立马遭到淘汰，而是说这种工作会越来越少。尽管政客们竭尽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保持消费增长，“工作”却越来越少了。

谁来清除垃圾？我们是否应该将自己托付给这样的社会，最不幸的人得到最糟糕的工作？我们是否必须把自己托付给这样的世界，有些人必须做一些他们不齿的事情，因为他们受到了金钱上的生存压力？如果我们认同，一些有辱人格的工作是必要的，且我们的经济体必须迫使一些人做这些工作（否则他们将无家可归、忍饥挨饿），那么我们实际上是认同了奴隶制：“要么做，要么死。”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现代

10　即便在这样的工作下，人们也往往是友好和愉快的。这一事实证明，人类精神的高贵是无法抑制的。

化的经济，它以其精细的分工，使得擦洗厕所、收集垃圾这样的职业不再必要呢？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把对卑贱劳动的概述应用到垃圾收集上吧[11]。

为什么要把垃圾收集放在首位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垃圾需要收集呢？因为我们消耗了太多的一次性垃圾，因为我们没有把食物残渣制成堆肥，因为我们使用了如此多的包装却没有重复使用或回收。使用一次性产品和包装是因为它们廉价。大部分制作包装的资源开采成本和工业加工成本都被外部化了，垃圾填埋场、焚烧炉的处理费也是一样。正如第12章所提到的，这些成本如果被内部化，一次性用品的生产将为更为昂贵，类似于可重复灌装容器的措施将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加强其在环境上的合理性。食物残渣堆肥也是如此，一旦取消了对远距离大型农业的隐性补贴（交通、水利、化肥等），人们将得到激励从而进行家庭农业生产。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生产出这么多垃圾。[12]

较之于工厂作业、清洁服务、超市收银员的工作的变化，较之于必要的、不愉快的、有辱人格的职业的变化，垃圾收集的变化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这些工作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减少或消除——小型多作物农场会消除许多弯腰劳动的苦差事；小旅馆、面包早餐、沙发冲浪将减少对专业酒店服务员的需求；电子、机械、机器人技术将继续减少装配线上的劳动。为生产更少但更为耐用的商品提供激励，将减少生产，增加维护和修理，使得工作的循规蹈矩性更低。工业设计将有激励，将单调乏味降到最低，而不是将成本降到最低；工作被欲求填满，而不被必需性填满。

很少有人会心甘情愿在流水线上工作八个小时，挑拣无穷无尽的西红柿，整天打扫厕所，除非他们别无选择。我们将提供给大家另一种选

11 有辱人格只是我们的看法，任何不向他人施暴的工作都可以带着尊贵、快活、爱意来完成。

12 垃圾的现象最近才出现。我的前妻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农村。她不记得村庄里有垃圾车这回事。所有的一切都被重复使用、回收、堆肥或焚烧。即使到今天，在我所处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也没有太多用来支持回收和再生的基础设施。我们一家产生的生活垃圾只有邻居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期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需要收集的垃圾，只相当于今天的十分之一。

择，使得经济体逐渐消除这些单调乏味的角色。我们不需要完全消除这些工种，只有工作时间过长，洗碗、清扫厕所、弯腰劳动才是繁琐的、有辱人格的。我曾随着一路人马在我兄弟的有机小农场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工作毫无沉闷感，因为工作的规模小，任务多样。当然，也有琐碎的杂务，如挖出三排土豆，把两百根支杆切出凹槽，但这些工作持续的时间短，并且夹杂着戏谑和打趣。匀出三五个月，每日花几个小时收集垃圾，或洗碗，或烙牛肉饼，或打扫酒店客房，其实并不沉闷。事实上，总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利用日常的劳作来休息。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常规的体力劳动成了精神上的慰藉。

今天，虽然以“工作”为名的事情大量减少，但我们并不会闲着，并不会把时间耗在乏味的乐趣上。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确实有无限的需求。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需求，对爱、对发挥、对创造的需求，了解以及被了解的需求——都无法通过购买来满足。我们尝试通过积累越来越多的有限之物，满足对无限的需求。这与建起通往天堂之塔一样不切实际。

非货币的领域包含了所有不能被量化的东西。今天，我们生活在可量化之物丰裕、不可量化之物匮乏的世界里：庞大却丑陋的建筑，丰富但空泛的热量，无处不在却毫无价值的娱乐。货币领域的萎缩将会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你同意吗？

有限的需求，如卡路里、住房、服装等，属于可以量化的需求，因而可以很自然地进入商品领域乃至货币领域。这些需求很容易满足，事实上，随着技术的发展，满足这些需求变得越来越容易了[13]。按理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应该缩短，强度应该降低，为了满足有限的需求，人类投入到无限之物上的时间和精力所占的比例应该更高。这些无限之物包括艺术、爱情、知识、科学、美好之物。因此，人类投入在货币领域、

13　事实上，今天有数十亿人缺乏生活必需品，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是因为我们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见第2章）。原因是，经济系统产生了人为的稀缺性，误导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流动。

工作领域的比例理应越来越小。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努力使有限变成无限，并因此贬低艺术、爱情、知识、科学和美好之物。我们将它们全盘出售了。当商业应用成了科学的引导，我们拥有的已不再是科学，而是科学的赝品，是为利润服务的伪科学。当艺术臣服于金钱，我们得到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奇技淫巧”，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讽刺漫画。当知识屈服于权力，当美只是销售产品的工具，当我们用财富购买爱情，用爱情换取财富时，类似的曲解便产生了。但是，为了金钱出卖一切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货币化领域漫长的飞升已接近尾声，它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颠覆长期以来的直觉、恐惧和限制。从古希腊时代起，金钱已经、并越发成为一种普世手段和普世目的，它成为了无限欲望的对象。这种情形不会持续了。金钱的撤退已经开始，我们将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金钱无法企及的领域中去。休闲的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因爱而生的劳动，正与货币经济的负增长齐头并进。人类正在步入成年，步入一个身体发育结束的时期，步入一个把注意力转向给予的时期。

第15章

Chapter 15

地方货币与互补货币

我们同样应该记住，合宜的社群乃是一种共有财富：一种空间、一种资源、一种经济。它响应其成员的实际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其中包含相互依赖的需求。解决目前政治权力与财富勾结的办法，是恢复社群和经济的身份。

——温德尔•贝瑞

神圣的生活方式将我们与大众相连，与我们周围的空间相连。这意味着，神圣经济体必须是一种地方经济。在这个经济体中，我们与那些满足我们需要的土地和人民有多方面的、私人的联系；反过来，我们也满足他们的需要。若不然，社会关系会缺乏实质，经济关系会变得没有人情味，我们会感受到社会与物质之间的鸿沟。当我们从遥远国度的陌生人那里，购买通用的服务和标准化的产品时，这种感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会有一种丧失联系的失落感，一种异化感，一种可替换感，就像我们购买的东西那样。我们所提供的物品是标准的、毫无人情味的，就这点而言，我们确是可以替换的。

全国或全球性货币的同质化的后果之一，是文化的同质化。随着货币领域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物质和社会生活被包络在货币的疆界之中，我们的物质和关系也成了标准化的商品，货币所及之处，处处皆同。这种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在“景观的出口斜坡”上，同样的店、同样的

餐厅、同样的建筑占据各地。无论在哪个地点，我们都是同样的雇员、同样的消费者，生活在遥远经济势力的束缚之下。本地的独特性、自主性和经济机会消失了。商业利润被遥远的公司总部抽干，最终被华尔街悉数收入囊中。充满活力的、经济上多样化的、带有自主特色的社群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千城一面的单一文化。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描述的货币旨在消除地方经济主权的障碍，削弱迈向全球化的压力，其方式有三。

1. 只有靠隐性的社会补贴和生态补贴，大部分国际贸易才是经济的。如果将成本内部化，这种优势将消失。

2. 共有资源支持的货币将使经济势力重新地方化，因为很多共有资源都是地方性，或者具有生物地缘性。

3. 通过将独特的、地方的关系和其他自然财富转化为商品，负利息货币消除了经济增长的压力。最终，本地差异化会遏制商品化，进而遏制增长。

然而，当地经济的习惯和基础设施已经基本消失，重建以社区为基础、以地方为主的经济，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本章讨论了这些措施中的一种：货币本身的本地化。

我并不主张废除全球贸易。虽然食品等原本应属于本地的物品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仍有很多人类集体创造力方面的东西，需要全球性的协调劳动。此外，经济学家对规模效率和比较优势（某些地方和文化更适于生产某些类型的产品）的教条解说并非毫无依据[1]。但就一般而言，

1 然而，这有些夸张了。比较优势往往是补贴的幌子，规模效益往往是市场杠杆和谈判能力的幌子。比较优势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制糖业，它是政府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的受益者，补贴的间接形式是土壤和水源的枯竭。这使它能够与外国生产商削价竞争。间接的补贴尤其有害，因为它们本质上代表了更有效地消耗自然资本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本书所描述的措施否定了这样的补贴。将自然共有品的损耗成本内部化，否定了来自自然共有资源的补贴，终结了未来现金流的折现，阻碍生产者用未来收入贴补现在。这些措施会使本地生产在经济上更为可行。

神圣经济将导致许多跨洋、跨洲运输的商品变成本地采购。

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改变将使全球化经济变得更为不经济。我倾向于地方经济，但并非源于经济上“最大化可测度的福利指标”的考量，而是来自于对社群的向往。社群仿佛一幅织锦，它的纱线有两种类型：经纱和纬纱。简言之，一个强大的社群将社会和经济的联系交织在一起。我们依赖的人，依赖于我们的人，我们知道的人，知道我们的人，是同一群人。就是这么简单。对于所有生物构成的更广泛社群——土地及其生态系统也是一样。若缺了社群，我们遭受生命的亏蚀。我们是由多层次的联系所定义的，它使我们得以超越悲惨的、孤独的、离析的自我，超越“在肉身囹圄里的心理泡影”。我们渴望恢复失掉的联系，恢复失去的存在。

同质化的趋势已持续了千年之久，而地方经济将扭转这一趋势，将我们同每日目光所及的空间和人联系起来。除了实现对社群的向往之外，地方经济对社会和环境也颇为有益。它意味着能源消耗更少，不仅如此，它也使得经济决策更加难于忽视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的确，我们很容易佯装经济决策没有造成任何后果。我们很少想考虑到，那些我们不假思索就使用的产品，造成了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生缺陷，而西弗吉尼亚州的山野则因为露天开采，已从郁郁葱葱沃土变成了荒漠。这些影响如此遥远，只是电视屏幕上的像素罢了。我们一如既往地活着，仿佛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如果为你种粮的人，为你制造商品的人，生活在海地、中国、巴基斯坦，那么他们的幸福与痛苦是你看不见的。如果他们住在附近，你或许仍能剥削他们，但你会无可避免地知道内情。地方经济将我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呈现在我们面前，培养了为他人着想的自我意识。地方经济也因此与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精神转变相一致。

地方货币的悖论

地方货币的目的是振兴地方经济，使其免受全球市场冲击，重新创

建社群。目前，千万种地方货币遍布世界各地，它们都是由普通公民团体发行的非官方货币。从理论上讲，地方货币有五个经济上的优点。

1. 它鼓励人们在当地消费，因为只有当地商店愿意接受和使用地方货币。

2. 它增加了地方货币的供应量，从而增加了需求，刺激了当地的生产和就业。

3. 它使货币在社群内部流通，因为它不会被遥远的公司所攫取。

4. 它允许个人和企业绕过常规信贷渠道，从而提供了另一种资本来源，利息（如有的话）将流通回社群。

5. 它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即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本国货币，只要有时间和技能即可进行交易。

假设你要买一只汉堡包，并且拥有一些地方货币。你会去本地餐厅购买汉堡包，即使它的定价更高；你不会去麦当劳，因为它不接受地方货币。汉堡店与地方货币有什么关系呢？地方货币不能购买来自全国分销链的牛肉，但它可以从当地农民那里买到牛肉，支付员工的部分工资。到地方供应商那里购买吧，他们也是汉堡店的食客。这样，地方货币便加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不幸的是，地方货币的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通常的模式是，货币刚推出时大家热情似火，可是一旦其创始人不再为它造势，它就停止了流通。最终，这些地方货币遭到销毁，新鲜感消除之后，人们不再使用它们。根据一项研究，1991年以来发行的地方货币到了2005年约有80%已不复存在[2]。另一种常见的模式是，地方货币积聚在少数愿意接受它的本地零售商手中，但它们找不到花掉这些货币的途径。即使是相对较为

2 埃德·科洛姆（Ed Collom），《社群货币在美国：社群货币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的社会环境》，1576页。

成功的地方货币，它们占经济活动总量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3]。如果要把地方货币理论上的优势变为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今天并未起效，并且必须找出其中的原因。毕竟，在19世纪和20世纪，地方货币的效果非常之理想。在19世纪，由银行发行的“银行票券”（bank notes）构成了纸币，但只在发行银行所处的经济区域被接受。20世纪30年代，地方货币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中央政府要对之进行遏止。为何自那之后地方货币（除少数例外）成了一些社会理想主义者的玩物呢[4]？

一些因素发挥了作用。首先，经济已经脱离了本地，于是保证地方货币流通成了难事。基姆高尔（Chiemgauer）是最为成功的地方货币之一。谈及基姆高尔，用一名德国店主的话说，“我们接受它，但我们不知道能用它干什么。”他的接受是不情愿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少数供应商设在当地。地方货币的使用范围有限，即生产商的商品与服务仅供当地人消费，而这些消费者同样生产本地商品与服务。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仍然是高度本地化的，人们拥有可供交换的商品和服务，但是由于银行倒闭和货币窖藏，人们没有货币可用作媒介。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了。只有依靠庞大的、通常是全球性的协作劳动，大多数人提供的服务才有意义。对于涉及数万人、数千地的供应链和生产链而言，地方货币无能为力。

就其制造的本质而言，电子商品这类产品是全球性的。但是，很多产品是可以在本地生产的，虽然它们仍属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地方货币具有巨大潜力。不幸的是，本地生产和分销的很多基础设施已经消失了。地方货币是重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单凭地方货币

3　例如，根据一项研究（杰弗里·雅各布等，“社群货币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伊萨卡小时的案例研究”，《国际社群货币研究》，2004）称，伊萨卡小时是为最成功的地方货币之一，其使用者平均每年花费相当于350美元的地方货币，而这些使用者只占伊萨卡人口的一小部分。

4　同样的研究（杰弗里·雅各布等，“社群货币的社会和文化资本”）称，用户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渐进的、反文化的激进分子。时间银行和一些地方外汇交易系统（LETS）是这一推广的例外，前者尤其适用于医院、老年护理和其他贫困人口。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外是商业信贷货币，如WIR，见本章稍后的讨论。

本身仍是不够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地方货币的作用微乎其微，通常只会起到次要作用。就目前情况来看，地方货币对我们的用处不大，因为我们所使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从本地区以外的地方输入的。

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接受地方货币呢？理想主义是一个原因。可是，如果我们需要依靠理想主义，那么为何不把理想主义直接应用到现有的货币中，用它来“购买本地产品”呢？为什么用使用互补货币呢？我们希望理想更加切合实际，而不是强迫实际贴合理想。此外，互补货币的发展史表明，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当理想主义最初的热忱消退，互补货币也就停滞不前了。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地方货币与经济自利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在一个大的经济背景下审视地方货币。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自己的货币，但它融入全球商品经济如此之深，以至于该地区几乎所有产品都销往国外，人们消费的是从国外购买的商品，那么这一经济体连自己的货币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货币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因为全球市场既是经济流通的来源，也是其目的地）。这样，地方货币就成了全球记账单位（目前为美元）的一种代理货币，于是地方与殖民地别无二致。事实上，大多数地方已经如此，尤其在美国，城镇已经失去了地方特色，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中心。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言，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必须有强势的经济。如经济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言，建立强大货币的关键是“进口替代”，即从本地获得零部件和服务，发展与之相关的技能和基础设施。否则，一个地方会受制于全球金融的影响，完全受制于它无法控制的商品价格。

对于那些仍然具有强大本地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地方货币有助于维护这种基础设施，使它们免受全球金融的猎食。但是，在国家货币或超国家货币占主导地位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任何寻求建立地方货币的人，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局。要使地方货币起作用，除非当地有一套生产循环系统来调配交换。然而，要使这一系统增长壮

大、经受住全球商品经济的压力，就需要一个受保护的地方货币。如果当地的生产商必须与不受限制的、廉价的进口商品竞争，那么“进口替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作为一种受到“大众的故事”驱使的、有意识的选择，产生出共同的愿景、价值观、目标，这样的经济体才会出现。换句话说，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民主、民众诉讼，以及一个响应大众意志的当局，而不是一个响应国际银行、投资者、债券市场诉求的当局，这种情形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力量随时准备把陈旧的“大众的故事”——竞争、增长、离析、征服、飞升，重新呈现给世人。

历史上的一些例子印证了这一点。早期，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凭借关税和产业规划，通过限制本土货币的可兑换性，有意识地培植本地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比之下，近年来“打开市场”迎接“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参与翻译了与中国台湾地区中小型企业发展史有关的多部书籍，对那里的情况也最为熟悉[5]。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对外来的商业投资设置了严格的条件。为鼓励当地产业发展，外来商业投资的工厂必须购买相当高比例的本地零件。日本、韩国、新加坡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给予了本土企业特殊待遇[6]。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时实行了外币管制，限制外商将利润汇回本国。外来投资者可以将他们持有的当地货币自由转换成韩元、台币等，但将当地货币兑换成外币则颇受限制。尽管二战开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但如今，它们都拥有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世界一流的工业厂房和巨大的财富。

相比之下，墨西哥等国家则允许国外制造商在边境加工区建立工厂，厂商无须纳税，利润汇出也不加限制，也不要求从本地获得零部件。墨西哥等国提供的“自由贸易区”，仅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以及不受

5　C·J·李等，《台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6　非正式的机制包括对外国公司的商业禁忌，互相制约的董事会，偏好当地企业的家族关系，授予合约时非官方的政府偏袒主义。从表面看，这些机制类似于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但其目的是保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环境约束的自由，这实际上是在变卖本国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却不索取专业知识或基础设施上的回报。此举非但没有丰富经济，反而使经济伤痕累累。其结果是，工厂继续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他地区。从关贸总协定（GATT）开始，然后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世界贸易组织（WTO）、欧洲货币与经济同盟（EMU），这些协定摧毁了地方经济提供的保护，一个又一个国家因此沦为了商品出口和消费的殖民地。唯一的受益者是与地方经济相对独立的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不同的是，他们可以进口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条件太恶劣，他们会选择移民。

货币主权是政治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外部的公司可以榨干这个社会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如它的资源、技能、劳动，并将它们出口到全球市场，那么政治主权会最终丧失话语权。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巴西、泰国等国正在采取措施以保护本国经济免受因美联储量化宽松计划而导致的廉价美元的冲击。若任其发展，这些美元会导致外国人买光这些国家的股票、矿山、工厂、公共事业，等等。这些国家认识到，经济主权才是有意义的主权。

对国家如此，对地方亦然。与将利率挤压到零以下的做法相比，地方和地区政府发行货币的提议或许显得天真而不切实际。虽然不断受到钳制，发行地方货币确实是一种非常便利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单个州发行货币是违法的，但一旦有必要，人们总会想办法绕过法律。

2001—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最具启发意义。省级政府缺乏资金支付给员工和承包商，只好付给他们低面额的无记名债券（面值为1比索、5比索的债券）。由于这些债券可以支付地方税和费用，本地商家和市民欣然接受了它们，虽然没人想过这些债券可以兑换成硬通货。与所有的货币一样，价值和对价值的感知是等价的，而能够支付税款提高了社会对价值的感知。用通用单位计价的货币，其流通范围远远超出了其发行区域。因为危机而中断的经济活动因此得以恢复，毕竟人们仍然具

有生产其他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只是缺乏交易的手段。这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得益于阿根廷是一个富足的国家，它尚未完全转向出口商品生产。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拒绝偿还外债，暂时切断了进口，增进了地方的自力更生。就在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紧急贷款，使阿根廷继续偿还债务。

截至2011年，我们仍然生活在常态年代的惯性之中。因此，地方货币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战役，在没有政府的支持下举步维艰。更糟的是，政府通过税法设置了重重障碍。公民创造的货币不能用来缴纳税款，但是用这些货币进行的交易却要缴纳收入税和销售税。这意味着，即便使用了地方货币，即使赚到的不是美元，你也必须用美元纳税[7]！用纳税人并未使用的货币纳税是残暴的，这正是美国大革命的原因以及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请参阅第20章对“茅屋税”的讨论）。

在地方货币起效的地方，地方货币或者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或者是出现在战区和其他极端的情况下。在2001–2002年期间的阿根廷，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欧洲，地方政府实际上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在这时点和地点，仍然有大量的地方产出、勉强维持生计的耕作、地方的分销和供应网络以及地方资本存在。毋庸置疑，在这些地区，地方货币获得了真正发展机会，但也引起了中央的敌意。在阿根廷，国际国币基金组织要求政府废除这种货币，并将之作为援助的前提。

然而，地方货币活动分子在过去二十年里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创造了一个模型——事实上有多个模型——可在下一次危机爆发时投入使用，将不可思议之事变成常态。他们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模式，解决疑难，获取不可或缺的经验。所以，让我们看看今天正处于探索阶段的互补货币吧，它们将会在未来的神圣经济中发挥作用。

7　另一方面，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RS）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若没有这项措施，人们可以用代理货币来逃避税收。然而，税收制度使得地方货币和互补货币处于劣势地位。

地方货币的实验

代理货币

首先来看基姆高尔（Chiemgauer）、波克夏尔（BerkShare）等作为美元（或欧元）代理货币的地方货币吧。你可以用95美元购买到100波克夏尔，并按正常的美元价格购买商品；商人会用100波克夏尔去银行赎回95美元。因为波克夏尔兑换方便，商家也乐于接受，相对于额外增加的营业额，5%的折扣是物有所值的。然而，兑换方便也限制了这种货币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原则上，接收本地波克夏尔的商人有5%的激励购买本地商品，但由于缺乏地方经济基础设施，这种激励毫无作用。

代理货币对振兴当地经济、扩大地方货币供应量毫无效果。它们激发了人们购买当地产品的意愿，但没有提供多少经济上的激励。由于波克夏尔源于美元，并可兑换成美元，拥有波克夏尔的人也拥有了美元。这种国际等价物出现在采用货币发行局（currency board；国家以立法形式规定，本国货币与某一具有主导堤外的国际货币之间按照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译者注）制度的国家。我们称之为美元化经济体（dollarized economy），因为它们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虽然波克夏尔这样的代理货币提高了人们对互补货币思想的认知，但它们并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互补法定货币

诸如“伊萨卡小时”（Ithaca Hours）这样的法定货币更有前途，它实际上增加了地方货币的供应量。大萧条时代的各种借据（scrip）也属于这一类。其本质是，有人印制了货币，并宣布它具有价值（例如，一个伊萨卡小时等价于10美元）。为了让它变成货币，必须存在一个一致认可其价值的社群。对于伊萨卡小时，受到该货币的创始人保罗•格洛弗（Paul Glover）的启发，一些企业宣布，他们将接受这种货币，并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支持它。在大萧条时期，借据通常由一家支柱型

企业发行，借据能兑换煤炭或其他商品。在其他情况下，市政府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该货币作为地方税收和费用的支付手段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以用来支持货币发行。

法定货币的影响力要大于代理货币，因为法定货币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使用货币。只有当得到货币的人并不提供货物和服务时，法定货币才会引发通货膨胀[8]。在经济出现极端状况的时期，通常的情况是，虽然有很多人愿意工作、有大量的需求亟待满足，但却缺乏调解这些交易的货币。大萧条时期如此，当今也是如此。由于缺乏税收，世界各地的市政当局都面临着严重的预算削减，被迫削减重要的保养和维修工作，甚至裁掉警察和消防队员。同时，可以胜任这些工作的很多居民却处于失业状态，无所事事。虽然存在着发行货币的法律障碍，但城市可以发行凭证（voucher）作为城市税的支付手段，代替美元雇佣人们去做必要的工作。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反正很多税款已经拖欠了。当地方政府成为发行人，借据便承载了使其变身货币的“价值的故事”。

这种货币通常被称为互补的（complementary），因为它们与标准的交换媒介相独立，并与之互补。它们通常以美元（或欧元、英镑等）作为计价单位，但并无货币发行局制度来维持美元储备、保持汇率。因此，它们类似于标准的、浮动汇率的主权货币。

在缺乏当地政府支持的条件下，互补法定货币不易兑换成美元，因此，企业对它们的接受程度不如代理货币。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经济体系下，获取本地货源的途径并不多。与其他企业一样，所有的本地企业都融入了全球供应链之中。重振本地生产和分销的设施需要时日；受到成本内部化、增长压力消失、重新本地化的社会决策和政治决策的驱使，宏观经济条件也会发生变化。非经济因素会影响货币的社会认同。今天，使得少数人支持地方货币的理想主义将会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8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量的商品和服务（即不增加，将有更多的资金追逐较少的商品）。

时间银行

有一种资源始终是本地就有的，它始终是维持和充实生活所必需的，这种资源就是人们的劳动、精力和时间。刚才提到，只有当生产商所生产的商品 并且无须对经济基础设施做出重大的改变。

若有人通过时间银行提供服务，每一小时的服务，都会贷记入其账户，同时，等值的金额会借记入接受者的账户。通常情况下，电子公告板会发布供给和需求的帖子。那些聘请不起杂工、按摩治疗师、保姆服务的人会由此获得原本属于失业人士的帮助。时间银行会使人们“有闲无钱”的领域蓬勃发展起来。对于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的领域，每个人的时间都同等宝贵，时间银行也就格外具有吸引力。日本著名的“亲睦券”（fureai kippu）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花时间照顾老人的人可以得到它。在美国和英国，时间银行被广泛地应用在服务机构中。它同样适用于实物产品，通常的方式是用美元计算物料成本，用时间美元（time dollar）来计算时间成本。

在原子化的社会（atomized society）里，了解“谁提供了什么”的传统模式已经打破，只有用金钱才可以获得传播这些信息的商业手段（如广告）。时间银行则将原本无视每个人的需求和礼物的人连接起来。正如时间银行的一名用户所说的那样：

> 每个人都有一些让你大吃一惊的技能。一位长期卧病、不会开车的老人，可以做出漂亮的婚礼蛋糕；一名坐在轮椅上、需要找人粉刷房子的妇女，曾经训练过警犬，现在则提供幼犬训练服务；需要耙除落叶的学校退休教师拥有一个瓷窑，并教授制陶。当我们遇见彼此时，会问对方“你是做什么的？”“你需要什么？”或“我能为你做什么？”[9]

除了满足迫切需要外，你可以从这个描述中看到，时间银行具有恢

9 摘自“时间银行简介”（匿名帖子）。

复社群的力量。它产生了一种经济和社会上的弹性，在动荡时期维系着生命。随着货币解体，有必要找到满足人类需求的替代结构。

时间银行背后的基本思想是平等主义（Egalitarian）——每个人的时间价值都是相同的，每个人一开始拥有的时间也是相等的。若有一物是真正属于我们的话，那就是时间。与其他的财产不同，只要我们活着，我们的时间便与我们难解难分。如何度去时间，便是如何选择生活。无论一个人在金钱上多么富有，他都无法用金钱买到时间。金钱或能购买挽救生命、延年益寿的手术，但它并不能保证长寿，也无法购买每日超过二十四小时的体验。在时间上，我们都是平等的；认识到这种平等的货币系统在直观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当时间货币替代了货币化的交易时，它就成了一种伟大的社会均衡力量。但是，以礼物为基础的活动，也有可能因为时间货币而被转到可量化的领域之中。或许，非货币性的、不可量化的、连接礼品和需求的方式将在未来大行其道。不过，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弥合分崩离析的社群上，时间银行会发挥重要作用。

收回信贷共有资源

信贷系统是提高当地经济和金融自主权的另一种途径。当一个经济社群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限制信贷获得进而限制资金分配时，地方经济便可保持其独立性，就好像它实施了外汇管制一样。为了说明这一点，请考虑在互补性货币的讨论中常被提及的创新——互惠信贷体系，它包括商业易货贸易圈、信贷结算合作社、地方外汇交易系统（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s, LETS）。若交易发生在互惠信贷体系中，则借记买方的数额会以商定的销售价格贷记入卖方的账户，无论卖方的账户余额是否为正。例如，我替你割草坪，价格是20个信用点。如果我们的初始余额都是零，那么我账户现在的余额是+20，你的余额则为-20。接着，我用10个信用点在塞尔玛那儿买了些面包。于是我的账

户余额降到了10，而她的账户余额也是10。

这种系统有诸多应用。上述情景便是小规模的、以地方为基础的信贷体系的一例，它被称为LETS。1983年，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创立了LETS，自那之后，数百个LETS系统遍布世界各地。在商业层面上，互惠信贷同样有用。在商业网络中，若每家企业都能够满足其他企业的需求，那么它们可以形成商业易货交易所或信用卡结算合作社。与发行商业票据、寻求短期银行贷款不同的是，参与LETS的企业创造了自己的信贷。

在商业易货交易所中，公司会出售掉多余的库存和未使用的产能，因为没有直接的现货市场可以与其他人交换贸易信贷。买方可以节省现金，卖家则拥有了可以在日后的交易中使用的信贷。为了吸引商家加入，互补货币需要理想主义式的承诺，但商业易货交易并不需要，大多数交易所事实上还会收取高额的会员费。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商业易货交易所约有六百家，涉及约五十万家公司[10]。

互惠保理（mutual factoring）则是最近的创新，这一设想由马丁•布拉姆韦尔（绰号“哈桑”，Martin “Hasan” Bramwell）提出。通常情况下，企业收到的订单的日子要比得到订单付款的日子提早很多。为了获得履行订单所需的现金，它们通常将应收账款出售给银行这样的第三方（称为“保理”）。而互惠保理则绕过银行，将应收账款作为企业之间进行交易的流动性手段。

最负盛名的商业互惠信贷系统当属瑞士的WIR，其经营始于1934年，会员达十万之众，交易量逾10亿瑞士法郎。截至2005年，WIR的成交量更是超过了全球其他商业易货贸易圈的总和[11]。经济学家詹姆斯•施多德（James Stodder）认为，无论是WIR还是其他商业易货交易，它们都发挥着逆经济周期的效果，经济低迷时期的交易活动反而更多，这归

10 统计数据来自国际互惠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Reciprocal Trade Association）。
11 詹姆斯•史多德，“互惠交换网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2005），14页。

功于它们信贷创造的能力[12]。这说明，互补货币和信贷系统能够保护参与者免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能够维持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互惠信贷体系中，即使没有银行的参与，成员也可以获得信贷。在以利息为基础的信用体系中，人们为了使用货币，必须支付货币；在互惠信贷系统中，信贷是一种免费的社会有益品，只要赢得了社群的信任，任何人都可获得它。从本质上讲，今天的信贷体系是将共有资源私有化的一个例子。这里的共有资源是指“信贷共有资源”，即社会对每个成员的信用可信度的总体判断。通过发行协作性的信贷，互惠信贷系统将这种共有资源收归大众，而不以私人利润的目的。

与其说互惠信贷是一种货币，不如说它是发行货币的一种手段。在占主导地位的系统中，银行通过扩大信贷的方式提供资金。而在互惠信用体系中，这种权力属于使用者。

发展互惠信贷体系的意义重大，因为信贷基本上代表了一个社会对“谁获得金钱、获得多少”的选择。互惠信贷取代了银行的传统功能。信贷余额为负的人们会处于社会压力和自身良心的压力之下，迫于压力，他们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将账户余额恢复到正值水平。但我敢肯定，若这一系统被大规模地使用，可能会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如何防止参与者因索取过多却无可奉献而导致负余额越来越高？这种系统需要一种方法来防止并消除参与者的滥用。

若无负余额限制，仅凭交易的意愿，便可创造出无限量的互惠信贷货币。这看似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这种货币被用来交换稀缺商品，情况则不然[13]。货币代表了一种分配劳动力和原材料的社会协议。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信贷，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建造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购买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更为复杂的互惠信用体系，则会根据有“负责任的参与”

12　詹姆斯·史多德，“互惠交换网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2005），14页。

13　对于诸如数字内容这样的非稀缺性商品，它的效果很好。用户对YouTube视频和其他在线创作的评级就是一种非稀缺货币。

（responsible participation）对信贷施加灵活的限制。全球交换贸易系统（GETS，一个专有的信用结算系统）和社群交易系统（Community Exchange System，CES）使用复杂的公式来计算信贷额度。参与人参与的时间越长，表现越好，信用额度就越高。那些履行了过去还款义务的人，将获得更大的信用额度。它与传统的信用评级在功能上非常相似。

然而，现实世界并不总是与公式相符。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信贷需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临时增加信贷的必要。需要有一些机制来设置信贷限制、批准或拒绝信贷请求。这需要进行研究，需要对行业和市场有所了解，清楚借款人的信誉和经济状况。投资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可以纳入考量范围。无论执行此功能的是何种机构，无论是传统的银行、合作社，或是点对点的社群，都必须对行业有大致的了解，必须为其评估承担责任。

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点对点银行系统也遇到了信誉评估的问题。想象这样一个系统，其中的一个数据库与你相关，你希望借出五千美元给远方的某个人，借期半年。但你并不认识此人。你如何知道他可信呢？或许像eBay这样的用户评级制度可以给出部分答案，但这样的系统很容易被操纵。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机构，这个机构比你更了解贷款者，能够保证他是可信的。你将钱贷给这个机构，该机构再贷给借款人。似曾相识吗？这就是所谓的银行。

与货币一样，银行制度也都有神圣的层面：银行家是深谙资金使用之道的人。如果我拥有的钱比我能够花掉的多，我可以说，“银行家先生，请找到能够使用这笔钱的人，待我需要时再归还。”第12章中所描述的衰减的货币，将银行业的这一理念与自利结合了起来。即便“更好”不再意味着“增加我的个人财富”，这个功能仍是必要的。

无论是通过公式、社会共识，还是专家的决定，信贷必须按照某种方式进行分配。银行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会一直存在。如今，银行卡特尔垄断了这些功能，它具有将信贷分配给获利最高者的专长，并以此获利；同时，它也靠对信贷共有资源的垄断控

制权牟利。最终，新的银行系统会拔地而起，从小型互惠信贷合作社开始，形成交互式的交易协定。社群交易系统（CES）和“元货币倡议”（Metacurrency Initiative）是互惠信贷体系的典型[14]，而不同互惠信贷系统之间的可兑换性，是该领域的热门话题。在可兑换性和隔离性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挑战。可兑换性允许远距离贸易，而隔离性则使成员的内部经济免受外部力量的猎食，免受金融冲击的影响。今天的小型主权货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互惠信贷的银行系统将银行的功能收归地方社群、商业社群或具有合作性质的实体。与地方货币一样，它们培养、保护了其成员的内部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冲击和金融猎食。事实上，除非地方货币具有一套信用机制防止投机性挤兑，否则它将永远无法摆脱边缘的地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都发生了投机性挤兑。许多国家和地区为了发展经济而采用了进口替代的方式；类似地，地方和区域性的信贷结算组织也可以对资本实施管制。最有名的互惠信贷体系是瑞士的WIR，它是一个极端的模型，体现了“一旦购买，便不可兑换现金”这一原则。在地方层面，这一原则将迫使外来投资者采购本地零部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采取了类似但略为温和的措施，以限制境外公司将利润汇回本土。

地方和地区级行政部门可以取代的“进口品”之一就是信贷本身。通过当局的政策以及非正式的文化障碍，上述亚洲国家和地区也实施了这一举措，禁止外来银行进入本地。在区域或地方一级，即便没有地方货币，当地行政部门也可以经营自己的公有银行以代替外源性信贷[15]。如果我们要支付信贷，为何不把支付的款额留在地方经济中呢？今天，当地行政部门将税收收入存入跨国银行，这些银行可以把存款借给获利最

14　请参阅《社群货币杂志》了解与地方货币和信贷的问题相关的前沿讨论。

15　有关公有银行优点的详细讨论，请参阅埃伦·布朗（Ellen Brown,《债务网络》的作者）的作品。埃伦·布朗题为《提出货币新理论正当时》的文章注意到了公有银行和互惠信贷货币，网络链接为www.commondreams.org/view/2010/10/29-3

高的人。事实上，在银行业大整合的时代，政府几乎别无选择，因为本地银行已经被更大的银行兼并了。国有银行，例如北达科他州的银行，可以在本地放款，资助本地的项目，而无需在债券市场上发行高息债。在信贷危机期间，它可以通过贷款产生逆周期的效果，将利润留在本地，而不是交给华尔街。公有银行不必受到利润的驱使，它们产生的任何利润都可以返给它们的主人——大众，从而恢复信贷作为公共资源的属性。这些优点同样适用于当前的货币制度。

在国家层面上，公有银行制度与货币发行权稍有不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放弃了货币发行权，而将其授予了一个私人机构——美联储。在理论上，美联储可以成立自己的银行，借钱给它自己，这在本质上等于是以零利息或负利息印制钞票。或者，依据南北战争期间生效的宪法的授权[16]，它可以绕过银行体系直接创造货币。在第11章所描述的货币体系中，地方政府也能够发行货币，这种货币由政府所管理的生物区域中的公有资源所“支持”。最终，政治上的分歧将弥合，并与生物区域和文化区域相适应。与今天相比，当区域性的政府能够发行自己的货币时，他们就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如何大规模地分配资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决策，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决策。即使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规模最大的投资决策也并不总是依据商业利润的考量[17]。将人类送上月球、建立公路系统和保持军队都属于公共投资，但其目的并不是寻求正的资本回报。然而，在私有部门，银行利润决定了资本的分配，即决定了人类劳动、创造力、地球资源的分配。在这世上，人类应该做些什么呢？集体选择已经变成了一种私有化的共有资源，在神圣经济中，应该将它归还给我们了。这并不是私营部门应对投资决策置之不理，而是要改变信贷的性质，使得那些服

16 最近，在美国众议院 6550号法案（即2010年国家的紧急就业保护法）中，丹尼斯·库西尼奇（Dennis Kucinich）重提了这一思想。（这一法案在2011年9月21日被重新提出——译者注）

17 这些政治决定越来越多地按照企业的利益来制定。

务于社会、对生态有益的人能够获得资金。

收回信贷共有资源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点对点贷款（参见上一章）、互惠信贷体系、信用社和其他合作银行、公有银行，以及瑞典的J.A.K.银行这样的创新。虽然方式各异，但不论是通过互惠信贷系统中草根性质的点对点结构，还是经由政治委任设立公有银行这样的机构，这些系统都是将货币和信贷的权利换还给了大众。若无货币主权，政治主权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重新确立地方、区域和国家对信贷的控制是使经济、文化、生活重归本地化的重要途径。

第 16 章

Chapter 16

迈向礼物经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群人剥削另一群人。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恰好相反，另一群人剥削一群人。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我们正在探索新的交换系统，模糊了货币领域和非货币领域的界限，因而也模糊了“经济体”的标准定义。那么，经济体是什么呢？在货币短暂时效的背后——小纸片，计算机中的比特位——在经济增长或收缩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如果没有通用的度量单位，我们如何度量它呢？归根结底，在货币的幌子下，经济学试图测度的是人类制造的物品以及为他人所做之事的总和。

奇怪的是，我们却试图度量这一总和。对于经济学中的货币等式，我已经提出了审慎的批评。然而，经济发展的其他措施，比如“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和“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然，这些指标是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改进，因为监狱和军队的不再被算入有益品，而休闲时间这样的指标则被算入了经济福利。尽管如此，这些指标仍然假设我们可以、并且应该量化有益品。为此，一切事物都应该用标准的计量单位表示出来。

金钱与度量的确是密切相关的。货币之肇始，便是作为一种度量：

首先是标准数量的商品，而后是标准数量的金属。简化主义和客观性试图借助科学达到掌握世界的目的，而货币时代则与之完全吻合。能被衡量的，必可被掌控。正如我们“打量”一个人时隐含的那样。不可测度之物被排除在了科学之外——如休谟所言，应“将它投入火焰”——也被排除在了经济学之外。因此，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发生了偏离。生活水平是一个可量化的标准，生活质量则不能量化。

在人类为他人而做的所有事情中，对人类福祉最为有益的事情都是无法量化的。例如，你可以量化闲暇时间，按照一定的美元价值计算出社会福利水平，但是，休闲时光是如何被花掉的呢？可以沉溺于嗜瘾中无法自拔，可以漫不经心地娱乐，可以与他人缠绵，可以给孩子们讲故事。即使考虑到了这些区别，我们能够量化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他人的愉悦程度吗？我们能够量化工作时的焦虑吗？如果公共政策是由数量最大化所引导的，那么无论用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别的度量，最重要的事情定会被排除在外。

可量化的需求同样是有限的，这是对货币系统提出质疑的另一个原因，而这个货币系统建立在有限需求的无限增长上。定性的需求则不同：他们既不是可量化的，也不是有限的。正是在这一领域，“飞升”的思想找到了真实的精神动力。货币化领域的增长和我们对自然盘剥的增长或许会结束，但另一种形式的发展将继续：人类精神、美、爱、联系、知识的增长。零增长的未来并不是停滞不前的未来，正如16岁的少年，虽然个头不再长高，但他的生命并未因此停滞。

货币有助于满足我们的量化需求。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它仍会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的作用会有所削弱，正如我在第13章提到的那样。到现在，沉湎于满足和过度满足我们有限的需求，已经到了过度膨胀、不堪入目的地步。与此相反，我们会将能量转到那些尚未满足的、定性的需求上，而正是这些需求，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贫困。

为了满足无法量化的需求，我们需要非货币性的流通。当定性之物对应了定量之物，无限之物对应了有限之物时，前者会显得恶劣下贱。

用美好交换金钱、用亲密交换金钱、用关怀交换金钱都透着娼寮的味道。艺术家对商业的厌恶，不仅是出于自恃清高的自我中心主义。若用金钱购买美、爱、知识、联系，等等，要么买者会得到赝品，要么卖者受了利用，以区区数钱贱卖了价值连城之物，正如披头士乐队所唱的“钱买不来你的爱人”。

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其他方式使礼物流通。这件事颇为复杂，因为可量化之物通常是无法量化之物的载体。我并不认为货币和礼物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应该组成一个混合系统，其中，金钱将获得更多的礼物属性，调配礼赠的机制则将取代货币的角色。

无论是否涉及金钱，经济体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人们为他人所生产之物、所做之事，其中包括：（1）如何将赠礼者与那些需要礼物的人连接起来；（2）如何确认、表彰那些慷慨赠予礼物的人；（3）如何跨越时空，协调众人的礼赠，创造出超越个体需求、超越个体礼赠的东西。虽然不甚明显，但这些目标大致对应于货币的三个主要功能：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

当下，实现这三个目标的准货币和非货币方式不断涌现。例如在开源软件领域，点对点（P2P）技术使程序员社群能够在不花任何资金的情况下规划项目、协调人才，并认可其成员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对成员的尊重是一种“货币”，它依据的是成员贡献的质量和数量。与集体决策相比，它使某些成员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这种尊重并不是可量化的，若不损失一些本质的东西，它也无法被量化。我们将自尊和声名简化为一个数字，但这种简化实际上是一种减损（简化与减损是同一单词reduce——译者注）。正如将模拟录音转化为数字格式时，原始音轨中蕴含的温暖、人性都丢失掉了。

许多网络系统确实将声誉和贡献化为了一个数字。亚马逊和eBay等网站的用户评分系统，就是这样一种“准货币”（quasi-currency）。用户不仅可以给产品评分并发表评论，也可为其他人的评分打分，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礼物经济（撰写评论没有任何直接的奖励）的

本质是发展出与货币的调节功能类似的机制。

医生、哲学家及和礼赠经济活动家蒂莫西•威尔肯（Timothy Wilken）在他的GIFTegrity系统中，将这个想法推进了一步。目前，这个系统正处于测试阶段，它要求各成员提供一个名单，列出他或她希望给予和接受的物品。收到礼物的人对交易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决定了礼物的潜在接受者的排名顺序。如果你已经送出了很多礼物，当有人寻找礼物的接受者时，你的名字将出现在最上方。如果你接受了一份礼物，你的排名会下降，从而使得给予和接受的数量趋于平衡。这些评分点的作用与货币非常类似。

在传统的社群中，评级制度并无必要，因为每个成员的给予和需求是众人皆知的“共同信息”（common knowledge，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指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信息，其他人也知道每个人知道他的信息，等等——译者注）。GIFTegrity这样的系统有可能会将礼赠关系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它并未逃避对货币的需求，而是在重塑货币，将它塑造成更接近其最初本质的、作为答谢的象征的东西。GIFTegrity的评价系统以及与之类似的系统都是货币。你会因为给予而得到积分点，因为取得而失去积分点。与货币一样，这样的系统也具有一个局限性，即定性的礼物无法被线性的度量所量化。当然，它们要优于以高利贷为基础的货币；不过，无论这种技术统治的选择有多么精巧，它并未告诉我们，在将世界变成可量化之物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想要恢复无限之物。评价和得分并未满足我们深层次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对人类关系、感恩的需求，对文化中流传的、多层次的故事的需求。

说“货币是作为一种感恩的象征而产生的”，又说“货币最初是作为一种度量产生的”，我是否有些自相矛盾呢？从一开始，货币便具有了双重灵魂。它既是礼赠经济向大众社会领域的延伸（礼赠经济一度是无处不在的），也是用测度、计数、簿记、控制对原始开发的礼赠心态的入侵。然而，在将货币称为一种感激之象征的同时，我用到了“起源”一词。因为缺少合适的语汇，这里的“起源”一词并非其通常含

义，它指的并不是时间上的起源，而是上帝的意旨。我指的是货币的“目的论起源”（teleological origin），即货币出现在这世上的目的。

在礼赠经济中，货币的度量功能存在着一个对应。即使人们在赠礼时并没有期望特定的回报，回报还是会在社群内产生。今天，匿名的给予被擢升为了最高层次的慷慨，但在礼赠经济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匿名给予的意义都甚为有限。社群会觉察到社群成员的需求、礼赠以及慷慨程度。货币则代替了这种觉察：至少在理论上，货币将社会认可所带来的益处授予给做出贡献的个体。在实践中，这种认可的范围被限制在人类的“飞升”上，即以人类疆域的增长为限。即使货币具有负增长的性质，更深层次的问题始终是：就本质而言，货币只能在可量化的领域内运转。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促进未被量化的事物在庞大的社会中流通。这是人类存在千万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从头开始，重建礼赠经济。如今，即便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货币也占了上风。但在较小的范围内，非正式的共识、社会对慷慨的见证，可以促进上面提到的三种功能：连接礼物、尊重礼物、协调礼物。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将关系转换成货币，是造成了贫困的原因。随着货币系统自身的解体，人们会想方设法重塑上述三种功能。阿尔法•罗（Alpha Lo）创造的礼品圈（Gift Circle）是我最喜欢的方式，它现已遍及美国各地。礼品圈每周举行一次聚会，参与者说出他们想要给予或得到的一件或多件物品。通常情况下，欲望和需求神奇地合拍了。“你需要土豆捣碎器吗？我们有三个呢。”“周五你要去机场吗？我丈夫那天要去乘飞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见证了他人的慷慨后，参与者会很自然地向礼物圈里的人索取并给予回馈，帮忙只是一个电话的事。一周内，如果有人帮助另一个人修理汽车，那么在下周的礼品圈聚会上，后者会将这一礼赠告诉其他人，于是这份礼物就广为人知了。如果你有赠予行为，你将被认定为赠予者，人们也希望回报你。了解到这点之后，一种社群的归属感便油然而生。

类似的方式是，使用网站来提供礼物、提出要求，并记录下礼品的

信息。当这种方式被大规模实施时，实现这些功能的手段，就越发类似于货币了。由于无人知悉给予了什么，收到了什么，因此有必要采用一些标准化的手段。但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无论是直接观察还是通过故事为媒介，见证到礼物的流转便足够了。在未经见证的情况下，礼物创造社群的能力会大大减弱，这也是Freecycling和Craigslist这类系统的缺陷（虽然人们使用它们，证明了我们的慷慨是与生俱来的）。而Giftflow、Neighborgoods、Shareable、GIFTegrity等新系统，则认识到并弥补了这一缺陷。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所描述的系统都会使经济的负增长程度加剧。当我们让他人搭便车去机场而不是乘坐出租车，当我们分享电动工具而不是购买新的，当我们送出备用的土豆捣碎器，我们就减少了消费需求，削减了经济增长。货币领域的缩减，加速了旧制度的覆亡，加速了向稳态经济的过渡。这也使得转变不那么可怕了。当我们置身于以回馈慷慨为荣的礼物社群中时，我们就降低了货币的依存，它对我们的生存关系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社群的层面上，人们直接了解他人，或通过熟人间接地相互了解。那么，礼物圈的概念能够超出社群的范围吗？长期中，我们或许能够设想到一个没有货币的礼赠经济体，它以“圈子的圈子”（circles of circles）的模式为基础。在劳动的全球协作中，货币似乎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种全球性的协作，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与之有交往的人的数目并不是特别多。当数百人合作生产某件产品时，整个社群很自然地被分解成了子社群和子社群之子社群，降到了礼赠经济可以起效的规模。圈子内的每个人都互相给予，作为一个整体，每个圈子又隶属于更大的圈子，而这个更大的圈子又隶属于其他的圈子之圈子。这一构想包含了对社会的根本性重组：自下而上，点对点、自创的（autopoietic）、自我组织的。

在被我们称之为社会的“元人类体”（metahuman body）中，货币就像是一个信号分子，引导资源去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它调节着我们体

内相距甚远的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货币是定义和协调的诸多“器官”的符号系统之一。这些“器官”包括了政府、机构和各类组织。不幸的是，货币只传达了某些类型的信息（主要是可量化的礼物、需求和欲望）。为了健康，我们需要用其他方式来“组织”（器官化）、协调人类活动（这里用到一个双关语：英文中的“组织”一词的前半部分是“器官”的意思——译者注）。

今天，分散化、无等级的合作和所有制模式的创新达到了井喷的程度。这些都是“圈子之圈子”式的、礼赠经济的一种子结构。较为保守的类型是由员工持股的、采用传统管理结构的公司。在美国，这类企业的规模从中等到巨型，有数百种之多。更激进的类型则采用民主或合作的方式来管理公司：各种团体和合作社。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位于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Mondragon Cooperative），它包含了250多家企业，涉及大约90,000名雇员或业主，是西班牙最大的公司之一。虽然蒙德拉贡成立于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Franco）执政时期，但它设法明确拥护并体现了“劳动主权”和其他参与性民主的价值观。它是参与性管理和协作所有权的先驱，对此，读者可自行查证。

这种新的组织模式将无法量化之物包纳其中。对于这种新模式，我们才刚刚进入实验阶段。许多实验惨遭失败或将要失败，例如共产主义阵营的强制集体化和官僚集权管理。毫无疑问，随着我们不断吸取过去和当前的教训，新的合作形式会不断涌现出来[1]。

本书所提出货币性建议，将鼓励非传统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的发

1　Better Means（www.bettermeans.com）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模式，它称自己是“开放式企业模型”。战略决策、工作项目、补偿、权益，都是通过自我纠正的评价和表决程序来决定的。贡献的价值由员工自己、项目组的工友，以及对该项目投票表决的人首先决定。贡献最大的人会得到可以兑换成货币的积分。在赚取积分和赎回积分这段时间内，员工可以得到公司的临时股权。如此，所有权被授予给了那些做出了贡献的人，如果贡献停止，所有权则不再授予。目前，许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在使用Better Means模型。该模型也在不断改进：它将开源、点对点的很多关键理念融入进来，如“懒惰共识”（lazy consensus）、“快捷项目管理”（agile project management）、“同行评价”（peer evaluation）、“信誉反馈”（reputation feedback）等。

展。它们不仅会消除拥有货币、土地和其他共有资源的而取得的被动得利，还会消除拥有公司而产生的被动得利。而在今天，所有权是控制上述资产的载体。

协作性礼物结构的出现，将从根本上改变雇佣的体验。今天，工人和雇主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有者希望工人尽可能多地工作，支付他们尽可能少的薪资。对工人而言，尽可能少干活，尽可能多拿工资才是合意的。好的管理通过“绩效”薪酬，呼吁职业荣誉感、忠诚度、团队精神，缓和了这一基本对立，但是，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潜在矛盾仍然存在。通常，员工获得奖励并不是因为真正的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在办公室政治中取得了成功，而内部公关（internal PR）所认识到的“团队精神”才是真正的贡献。“若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的”，他们惊叹，“那么，为何我可以被随时解雇，雇主们却不会呢？我产生的价值都归了他们啊。”在这个世界上，与雇主感同身受的员工都是被愚弄的。当公司裁员或精简时，这再明显不过。“我为你忠诚服务了二十年，你怎能将我赶走呢？”正如一名保险执行官向雇员解释的那样，“如果要忠诚，还不如雇一条狗。”当然，大多数雇主并没有这般铁石心肠，怎奈市场规律之下，柔肠变铁石。

市场规律是会改变的。随着货币与社会和生态相适应，奖励对共有财富所做贡献的新结构的出现，与工作相关的关系将不再是相互剥削的了。商业组织存在的理由将发生变化。对社会和地球的良性发展做出的、可量化的贡献，会得到货币化的奖励；而不可被量化的贡献则会通过今天出现的、新的社会和符号性结构，获得社会地位、感恩、声誉等形式的奖励。

这种创新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所有的领域，因为拥有而获得财富的模式，将让位于因给予而拥有财富的模式。对拥有、控制的渴望，是“离析的自我”的渴望，而这个“离析的自我”通过操纵他人为自己获益，从自然和大众等“他者”那里攫取财富。而“联系的自我”则通过给予，通过充分发挥作用以丰富自我的延伸，变得富有。随着我们步

入联系的自我，组织性的结构就会应运而生，与“联系的自我”融为一体。这些组织性结构将个体的自利和组织的自利结合起来，将组织的利益同社会和地球的利益结合起来。与经典的集体主义模式不同的是，个人的非凡之礼不仅可以生气勃勃地展现出来，也会用于造福大众之目的。

扩展的礼赠经济将具有开放、合作的结构，它将超越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对立。当我说“个人的非凡之礼会使所有人受益”时，一些读者可能会抗议，“个人的卓越难道不应该得到回报吗？”保守的朋友尤其容易立即怀疑我的想法，认为我的观点意味着“个体的包摄”（subsumption of the individual；这一词语来自于美国教育家哈里斯的名言“一百个学生中有九十九个像自动机器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循着既定的路径，小心翼翼地循着既定的惯例。”这并非意外，而是“包摄教育”的结果，按照科学的定义，就是“个体的包摄”——译者注）。他们认为，一个不鼓励积累、不让大众从非凡中受益的系统，不会产生对伟大的激励或奖励。传统的左派的基本前提与之相同，不同的是，左派认为“个体的包摄”是好的、必要的。他们认为，有德之人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自我，摒弃任何回报或奖励。

这些观点都来源于离析的思维定式，即“你之增益，我之减损”。集体得到的更多，个人得到的就更少。但在礼赠文化中，则完全不是如此。珍贵礼物的赠予人可以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享受人类能力范围所及的馈赠。这就是感恩的本质和力量。不幸的是，我们对礼赠文化是如此陌生，虽然“于我心有戚戚焉”，但我们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中却没有它们的存在。本书的下一部分将介绍，如何从个人层面上开始，还原的礼物文化的直觉与实践。

离析自我的经济学已经破产，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允许个人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我们未曾有过热情洋溢地表达我们的礼物的体验，而是感受到了它的镇压、奴役，感受到了以攫取和控制为目的的变态行为，因为当前的货币系统驱使并奖励这些活动。更糟糕的是，这些表面

上的回报，只是一种幻象：货币、货币购买到的东西和货币的积累，代替了联系、爱、美、乐、意义和目的。资本主义之外的世界也并未带来更好的生活。无论自我克制（self-abnegation）来源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宗教的教谕，它都是对生命的否定；不变的是，被否定的生命将自身用阴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导致的后果与“离析的自我”的膨胀大同小异。

无论如何，离析的时代行将结束。我们也开始重新学习，如何在联系的真相中生活。至此，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所有内容都假设了（并促进了）我们的意识将会发生转变，若无此假设，神圣经济学将寸步难行。我并不是在强索这样的转变，我只是在认识它、见证它，并希望为它做出贡献。你在阅读这些文字后，也会发生同样的转变。随着离析时代所孕育的多种危机的交汇，这种转变将迅速发生。世界在变，我们亦随之而变。我们必须创造出“联系的自我”的经济结构，与地球形成同创的伴侣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们便可以学习如何在这种状态下思考和生活了。

第 17 章

Chapter 17

结语与展望

首先他们忽视你，接着他们嘲笑你，然后他们打你，那么赢的是你。

——莫罕达斯•甘地

个人经济思想和实践的转变，是神圣经济学的一部分。在深入讨论这一转变之前，我会总结一下它的主要宏观经济要素。有些要素已经就位，其他要素仍然在可接受的政治话语之外，只待危机深化，使不可思议之事变为常识。

我规划的过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财产没收或者对当前制度的通盘破坏，而是它们的转型。这一转变正在进行，或者已在现有的制度下萌生了。

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些转变的大部分倾向于政治上的左派，原因是它们使得财富逐渐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有钱阶层希望利率更高，而劳动阶层希望利率更低，本书则预测利率为负。自由主义者偏爱社会福利计划，本书则预见社会红利的普遍存在。公司利益集团主张消除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本书则预见共有资源会被收回。唯一例外的是，本文主张取消收入税，而这只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受益。这些富人的财富来自于企业的生产力，而不是对资金的控制或者因产权而产生的经济租。

1. 负息货币

动机：对储备收取负利率，让货币的价值随着时间而减少，会扭转利息的影响。它使得无增长的繁荣成为可能，它鼓励财富的公平分配，结束了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使得我们不再为了短期回报而抵押未来。此外，它体现了“万物枯朽，回归本源”的普世真理。货币不再是自然法则的一个虚幻的例外。千百年以来的技术发展所积累的权力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货币代表了这种权利，因此，像今天的无风险利率为正的系统这般，靠拥有货币而获利是不公平的。

转型与对策：2009年，随着央行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推向零，不断试图打破零息界限，我们已处在向衰减的货币过渡的边缘。今天的经济复苏乏力，潜在的滞涨问题和债务问题依然顽固。每一场新危机、每一个新救市计划都提供了机会，用衰减的货币去购买无法偿还的债务，从而在不加剧财富集中的情况下拯救金融基础设施。毫无疑问，传统的货币刺激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都失败了。与日本的情况一样，很明显，央行的下一步是将利率降至零以下。为了防止货币战争，各个主权国家应该共商对策，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体系。

目前，美联储并不具有对储备收取负利率的权力，也不具有发行不断贬值的纸币的权威。这种权力属于国家立法机构。既然央行行长担心货币政策工具不够有力，负息货币的想法进入经济和政治话语的时机已然成熟。正如货币流通速度停滞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在经济增长前景明朗的情况下，将利率降低到零才会刺激贷款。随着超额准备金的增加，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只会进一步印证这一点。在经济并未增长的情况下，银行更愿意以零利率持有资金而不是贷出资金。但是，当利率变为-2%或-5%呢？它们还会愿意持有现金吗？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除了投资者阶层，人们使用货币的日常体验都是相同的。富人很难想象，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是月光族，很少能积攒下

超过数月薪水的钱。对于更富裕的阶层，储蓄仍是可能的，但是除非进行风险投资，否则储蓄的价值会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无风险的投资不会使货币增长，无法让“金钱为你效力”。即使是政府债券，支付的利息也为零甚至为负。对于大宗购买，低利息或零利息的贷款而非储蓄，将成为主要的融资工具（这正在发生）。企业将会获得投资的资本，但不需要将未来现金流的大部分用来偿还债务。这消除了统御当今经济生活的“不增长，即死亡”的驱策。

2. 消除经济租，对共有品的消耗进行补偿

动机：若人们仅仅因为拥有某物而获得利润，并未生产产品，未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那么财富的两极分化便是必然的了。这种利润被称为经济租金。拥有土地、电磁频谱、采矿权、石油储备、专利和许多其他形式的财产的人因此得利。这些形式的财产，要么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要么是人类文化的集体产物。因此，只要其拥有者不是处于公众和地球的利益使用它们，那它们就不应该属于任何个人。

此外，在今天，通过消耗共有财富而获利是可行的。这些共有财富包括生物多样性、地下水、土壤、海洋渔业等。它们应当属于所有人，只有得到共同协议认可，并且其使用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时，人们才能消耗它们。

转型与对策：一些州和国家已经开始征收土地价值税，另一些则将石油和矿产收归国有。例如，玻利维亚和阿拉斯加州坚持石油开采权公有制，石油公司只能通过开采石油的服务赚钱，而不能通过拥有石油盈利。既然工薪一族的境遇每况愈下，将税负从劳动转向产权会越发具有吸引力。最后，对水权的管制之争愈演愈烈，这说明，将资源保护直接融入货币体系的时机已到。

乔治主义的土地价值税、采矿权出租，使用经济租作为货币支持的举措，都是将经济租还诸民众的途径。私人只能通过使用产权获利，而

不能通过拥有产权获利。对于来自于共有品的获利，应对其收取费用或税款。知识产权应该被还原为共有资源，通过缩短版权和专利的有效时限，承认文化是孕育思想的母体。新的财富来源，如基因组、电磁频谱，以及新型共有品——“互联网”，应该留在公共领域中，只有那些用它们造福社会、造福地球的人才有权使用。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课税对象从财产转移到了资源上，销售税和所得税将减少甚至消除，从而产生了保护资源的经济激励。经济租已使财产的所有者富甲一方，消除经济租可以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在知识产权领域，由于艺术和知识创新的“原材料”不再受到版权费和私有财产的限制，公共领域的扩大将鼓励非利润导向的文化创作。

3. 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

动机：今天，因为无需向社会缴费，耗尽含水层是有可能的。同样，耗尽地球吸收和处理污物的能力，耗尽岩石圈回收碳的能力，耗尽人体处理有毒废物的能力，都是有可能的。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成本，通常由社会和子孙后代承担，污染者则无需担责。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还会导致进一步的污染和环境退化。

转型与对策：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处罚，是扭转污染的经济激励的主要手段。然而，无论是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它都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它提供了达标的激励，但是没有提供超越标准的激励。对于某一特定污物的排放或者天然资源的消耗，它不允许我们设定一个总体的上限。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cap-and-trade）、环保税等举措应运而生。许多此类计划已被提出，并已经在某些地方付诸实施。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针对二氧化硫）在减少酸雨上已经初见成效，但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仍不尽人意。这些措施

在方向上是正确的，最终，所有形式的污染和消耗都必须支付费用。

我们必须弄清，地球及其生物圈能够维持的每种类型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多少，每种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是多少。分配污染物排放权或资源使用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通过中央计划确定谁有权使用、使用什么：农夫甲可从含水层抽取10万加仑水，农民乙可抽取12万加仑，工厂丙可抽取20万加仑，等等，但是这会产生经济效益低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保护环境并为减排提供经济回报，我们会使用污染和资源税或“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的拍卖系统。更好的办法是，用地球的资源及其吸收废物的能力来支持货币，从而将货币系统建立在地球之礼的基础上。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些措施终结了生态和经济之间的对立。它们将最佳商业决策和最佳环境决策结合起来，使商业创新的力量服务于地球。巨大的新兴产业将出现，它将致力于环境保护、污染控制和有毒废物的整治。零污染的制造业将成为常态，原料成本高会激励企业向小型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通过对一次性物品设置经济障碍，制造品将变得更昂贵、更耐用、更易于修复。我们会更加珍视我们的物品，维修、保存它们。街区或社群将共享诸如汽车、机械、特殊工具和设备这样的大型资源密集型产品（resource-intensive products）。住宅区将变得更加紧凑，房子将变得更小，大家庭以及核心家庭之外的其他家庭将居住在大房子中。

随着经济租金的消除，这些措施会将课税对象从收入转移到资源上，我们不再因为贡献而纳税，而是按照索取纳税。最终，收入无须缴纳税收，将我们从繁重的簿记责任和政府监管中解脱出来。

4. 经济和货币本地化

动机：世界各地的社群已经解体，人们向往回归地方经济。在地方经济中，我们了解我们所依赖的大众。我们希望与人和土地相连，

而不是浮沉于千人一面的全球单一文化之中。此外，商品的全球化生产使得地方群体相互竞争，在工资和环境法规上“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也译作“竞次”）。若生产和经济交流成了地方性的，我们的行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从而强化我们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

转型与对策：转向地方经济的发展势头已初现端倪。能源成本的急剧上升和生态意识的高涨促使企业在本地采购，消费者们意识到了当地种植的新鲜食物对健康的好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重新与社群建立联系的愿望，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政府发起了“购买当地产品”的活动。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社群都推出了本地货币，虽然它们在总量上无足轻重，但却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由本地政府支持的、未来地方货币的模式。

神圣经济学中的其他要素与本地化相得益彰。成本的内部化消除了远距离运输所支持的规模经济的幻象，经济租的消除将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工资差距[1]。这两个因素都将逆转过去两百年里的经济全球化。同时，很多自然、社会、文化的共有资源本质上是属于当地的，一个由这些共有资源所支持的货币系统，会很自然地强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主权。

最近的金融危机表明，只要本国货币失效，地方政府会通过创造本地货币迅速介入。2007年，阿根廷上演了这一幕；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几乎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或将解体，若如此，欧洲的货币主权将重归各国。随着目前危机的逐步加深，地方政府和小国将有机会重新获得经济主权，通过发行货币、资本管制、设置外汇交易税等措施，使国家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在分配同时，政府也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优惠待遇。最后，地方和地

1 这是因为，未被非货币化的共有资源实际上补贴了低工资。如果人们可以免费获得来自于土地和社群的诸多共有资源，那么生活的成本将降低，进而工资也会降低。

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的建立，从国际金融机构手中收回其信用主权。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虽然许多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全球性的，但是，隐性补贴和几十年以来的政策，将许多本地商品推到了全球经济的大潮中。在未来，这些商品将复归当地生产。我们吃的大多数食物都会种植于当地的生态区，房屋和产品制造将使用当地的物料，通常来源于回收品，并在较小的规模下生产。小城镇的经济将会复苏，真正的本地企业会重新遍布“主要街道”（major street）。

5. 社会红利

动机：成千上万年的技术进步，使得可量化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变得非常容易。这些进步是我们祖先的礼物，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所有人都应该得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对于并非由人创造的自然资源也是如此。然而，当前的经济体制却迫使我们为已经属于我们的东西而工作。更公平的做法是，将经济租补贴、污染税等（见上面的第2点和第3点）的收入作为社会红利补偿给所有人。这有助于缓和财富集中，防止通货紧缩危机。理想情况下，社会红利恰好能够支付生活必需品，此外，人们可以为自己赚取额外的收入。工作会从压力中解放出来，人们仍然会工作，原因是他们希望工作，而不是必须工作。

转型与对策：阿拉斯加已经有了社会红利，每位阿拉斯加公民都能享受到该州的石油收益，他们每年都能得到价值约数千美元的支票。最近的经济刺激支票则将是未来社会红利的另一前兆。福利体系是现有的社会红利模型的另一个例子，它常被戏称为“应得权益”（entitlement）。也许我们应该接受这一戏称，将这种“资格”延伸到每个公民身上，毕竟，我们都拥有地球和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不是吗？

人们已经拥有的应得权利包括：食品票、公共医疗保险、有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社会福利、失业救济金、刺激支票等。我们可以将之普及，覆盖到更多的人。这些措施与当前政治上的“紧缩”趋势背道而驰，紧缩政策带来的痛苦会迅速加剧，导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届时将会出现重新分配财富的政治意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不应该对富人征收惩罚性的税款，应该给予所有公民他们应得之物。社会红利是一种隐性的财富再分配，虽然每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一份，但富人会支付更多的税款为它融资[2]。本书预见，社会红利的资金来源是滞留金、污染费，以及使用共有品的费用（参见本章前述的1、2、3点）。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虽然穷人和富人仍会存在，但贫困将不再产生极端的焦虑。那些创造出他人所需产品的人会赚到更多的钱；那些崇尚简朴、回归自然、用艺术表达自我的人必须靠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过活。经济生活的重点将不再是“谋生”。从压力中解脱出来之后，我们会将我们礼物赠予那些启发了我的人。如此，社会和地球遭受离析的创痛便能弥合了（如果你仍然认为从生存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会带来懒散与怠惰，请重读第14章的“工作的意愿”部分）。

6. 经济的负增长

动机：在过去数百年里，我们发明了很多节省劳力的设备，从珍妮纺纱机到数字计算机，每一次我们都选择消费更多，而不是工作更少。这种选择是受了货币系统的驱使，伴之而来的是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加速攫取。今天，加速消费的选择对我们而言已经不再可能。就促进资金流动而言，若没有了正的无风险利率的驱策，经济增长将不再必要，

2 为社会红利融资的另一种方式是使用政府发行的法币，并将之交付给所有公民。这是一种隐蔽的财富再分配，除非通过税收从经济中移除与社会红利等价的资金，否则将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削弱债券阶层的相对财富。

负增长的经济将成为可行。科技将继续发展，我们只剩下第二个选项：工作更少，更准确地说，缩短为金钱而工作的时间。

转型与对策：负增长已然发生了。工业国家的失业率（近20%，若将那些没有积极寻找工作的人，或者长期失业仍未找到工作的人也包括在内的话——译者注）居高不下，加上产能过剩，这些国家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因为没有那么多支付全薪的工作岗位。可以肯定的是，总有些必要且美好的工作亟待完成，但是大部分这样的工作并不能产生经济回报。失业被认为是邪恶的。如果有了遍及整个经济的社会红利的支持，那么失业将不再是邪恶的。如果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20%，而不是20%的人失业，情况会如何呢？这种经济状况与意识的转变不谋而合。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是将生活分成了工作和休闲两个互斥的领域。而越来越多的人会拒绝这样的工作。

衰减的货币、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见上面的第2点和第3点）、社会红利，都支持负增长的经济。我们必须摒弃指导今天公共政策的“增长即是好”的箴言。在2009年的刺激计划中，建设道路、桥梁和其他项目的理论基础是它们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是，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道路和桥梁并不是个明智的决定。作为增长标志的新房开工是非常受欢迎的，但它并不表示我们需要更多宅地和杂乱无章的街区。负利息货币和社会红利是货币刺激和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新形式，它们必须被重新定义：它们并不是要使经济再度增长，它们的目的在于让货币流入那些有资金需求的人之手。一般来说，若共有资源未被货币化，那么不会导致经济的增长；相反，它会使资源分配和经济活动的重心发生转移。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穷人和中产阶级会体验到更大的富足，仿佛经济增长发生了一般。工资更高、就业更易的好处通常只发生在商业投资驱动增长的背景下。而现在，在稳态或负增长经济体中，也会有这些好处。因为货币的疆域缩减了，礼物、志愿行为、休闲和其他无法量化的

疆域统统扩张了，人们会花更多时间在非货币的经济活动上。图像、音乐、视频、新闻、书籍等数字内容的成本将继续趋向于零。以资源为基础的生产将变得更加昂贵，人力投入将受益于持续的技术积累。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将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人们将分享更多，消费更少；借出更多，租出更少；给予更多，卖出更少，这些都将反映并导致经济的负增长。

7. 礼赠文化和点对点经济

动机：货币领域的扩张，再一次以其他形式的经济流通，特别是礼物的流通为代价。经济关系成了一种有偿服务，我们不依赖于我们熟识的人，反倒依赖于匿名的远程服务供应商。这是现代社会中社群衰落的主要原因，异化、孤独和心理上的痛苦随之而来。货币不适于让不可量化的、真正丰富生命的物品流通起来。

转型与对策：幸运的是，货币的疆域已经开始萎缩，而负增长则为礼赠经济提供了新的空间。在某些方面，互联网就是一个礼物的网络，它使得一度非常昂贵的信息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了。网络推动了广告（想想Craigslist）、旅行社、新闻、出版、音乐等向着礼物的疆域演进。这也促进了以礼赠模式为基础的开源代码的产生。曾经需要通过有偿中介和集权化管理开展的活动，现在也可直截了当地进行了。通过互惠信贷体系，企业甚至可以创造信贷而无须银行的参与。同时，在地方一级，对“联系的自我”的向往、对社群的渴望，以及纯粹的、经济上的急迫感，正引领人们恢复以礼赠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政府可以放宽税收和银行法规，赋予新的经济循环系统以充分自由。这些系统中存在的共有资源，特别是因特网，必须保持其公有属性。政府还可以为企业和行业建立互惠信贷体系，使国内或地区经济免受国际资本的猎食。

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人们会满足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对商品、服务还是金钱本身的需求，其方式都将是丰富多彩的。在没有货币的条件下，面对面的礼赠圈、礼赠与需求的在线协调都会使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对社群的归属感将更加强烈。互补性的、由用户创建的信用体系会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点对点借贷一道，打破依赖银行的传统。在地方层面，通过全球网络的协调，不可量化的新型的“货币”将应运而生。它以认可和感激为基础，连接并奖励对社会和地球做出的贡献。

以上七个要素紧密相连，相得益彰。事实上，它们不能单独存在。例如，如果对经济租的其他来源投资仍然可行，那么负利息的货币制度便无法运转。隐性补贴使得国际贸易变得经济。而本地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性补贴的消除。即使经济收缩，礼赠经济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总之，我在本书第二部分描述的神圣经济的各条支流正在汇聚成河流。新经济的源头，并不是重头来过，并不是对旧事物的摒弃，它是一个逐步的转换过程，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

神圣组成任一部分都无法单独存在，它的任一部分都依赖于其他部分。但是，如果非要说有一个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它便是增长的终结。人类与地球将过渡到一个全新的伴侣关系中，步入到一个新的“人类的故事”之中。最终成为地球的爱侣是我们新愿望。我们的独特性和所有生命的联系性在心灵上的实现，构成了被我称为“神圣经济学”的基础。

第三部分/PART 3

新经济生活

向神圣经济过渡是我们思考、联系、存在方式的重大转变的一部分。经济逻辑本身并不足以维持礼物经济。很多经济先哲发明了数学上有说服力的货币与产权的革命，但是，即便是为数不多的、付诸实施了的革命也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本书最后将花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叙述我所描述的新货币体系的转变，以及与之对应的意识的和实践的转变。当我们弥合了精神与物质的裂痕之后，我们发现，经济学和精神性是分不开的。在个人层面上，经济学讲的是如何送出我们的礼物，如何满足我们的要求。它讲述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改变我们的日常经济思想和实践，我们不仅为迎接未来的巨大变化做好了准备，也为它的出现布置好了舞台。熟悉了神圣经济学的理念，我们就增进了大众对它的接受程度，人们便乐于接受它的到来了。

第 18 章

Chapter 18

重习礼赠文化

恋人不会像高利贷者那样，为他们自己而活。
他们终将停止冷眼相向，
转而回归社群。

——温德尔•贝瑞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创造了货币交易与礼物之间的区别。货币交易属于理性自利的范畴，礼物则至少是部分利他或无私的。经济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域，这反映了我们文明的二分法：人与自然的分离，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善与恶的分离，神圣与亵渎的分离，灵与肉的分离。然而，这些区分都经受不住考验，随着离析时代行将终结，所有的二分法都将失效。因此，我们能够像消除物质与精神的区别那样，使所有问题重新归于神圣，正如我们放弃了超越自然的努力，认识到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那样。同样，我们应该重拾礼物的精神，将它赋给人类经济的各个层面，不论金钱是否牵涉其中。

本书所描绘的货币演化的各个层面，都将礼物的特性灌输给了货币。

1. 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予和接受必须是平衡的。生态成本的内部化会确保我们从自然索取的不会超过我们能够给予的。

2. 礼物的来源是获得承认。恢复共有资源意味着使用属于所

有人的东西，都必须用支付给所有人的费用来获得承认。

3. 礼物流通而不积累，衰减的货币确保了财富的功能在于流通而非持有。

4. 哪里最需要，礼物就流向哪里。社会红利确保了每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能够得到满足。

神圣经济的基础是礼物意识。本书的剩余部分将讨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恢复礼赠的心态，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做好准备。

我并不是让你放弃自私、成为圣人。礼赠文化并没有那么简单。在将曾经属于精神的品质灌输到物质之中的同时，物质的杂乱也被灌注到了精神之中。我们的精神领域不再是一个拥有完美秩序、和谐、善良、正义的场所。类似地，当把礼物文化的很多特质灌注到货币中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礼物的领域从来都不是、并且永远都不会是纯粹公正无私的领域。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自由礼物的理想型进行了描述："要使礼物称其为礼物，它必须无互惠、无回报、无交换、无返礼、无债务。"这将赠礼者的得利，如社会地位、赞美、感激之情的表达、行善之后的欣然统统排除在外了。在现实生活中，最接近这一定义的是匿名的善行或是赠给耆那教（Jain）修道者的救济。修道者不会道谢，也不会称赞食物[1]。这种观点将纯粹、灵性、非世俗同自由礼物联系起来。而耆那教的宗教信仰与这种观点有着密切联系，耆那教试图通过禁欲主义抵消因果报应，但并不创造与世界的新关系。因此，耆那教的教徒们小心翼翼，从不踏入一间房子两次，从不回应邀请。他们朝着不速之客的理想奋斗，只接收未受世俗联系玷污的、纯粹的仁慈。

耆那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其他世俗宗教也存在类似的理想。例如，基督徒禁止私下进行斋戒、祈祷、施舍。遵循菩萨道的佛教徒理应

1 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自由礼物交友难"，46~47页。

献出自己的生命，普度众生，先人后己。在犹太教中，“真正的善意”（chesed shel emet，英文为true kindness）的原则是最高形式的善意，是不求回报和感激的给予。而最高层次的慈善，则是捐赠人或接收者均不知谁予谁受。匿名的善行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大的伊斯兰慈善机构都依赖于匿名善款的捐助。我无须列举太多的例子来说服读者，告诉他们利他主义的匿名善行与宗教是有关联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宗教中的“自由礼物”（free gift）并不能产生社会联系。这与货币交易何其相似！自由礼物不会产生责任，不会产生纽带，交钱拿货一旦完成，双方互不相欠。除了上面所描述的理想化、真正的礼物之外，一般的礼物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送我某样东西，我会感到感激，并希望报答你或者社会习俗所约定的其他人。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一项义务就此建立，这种义务是礼赠社群中经济流通的保证。匿名的礼物则不会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不会强化社群。收礼人或许会有感激之情，但这种感激之情是普遍的、抽象的。

感激并不仅仅源于接受礼物，还源自对接受礼物的见证。他人的慷慨也促进了我们的慷慨。对于慷慨之人，我们希望给予。我们被他们的诚恳、不设防、信任所感动，我们想要照顾他们。匿名的慈善机构或许是个例外，因为礼物不会发生在社会的真空之中。礼物扩大了自我的圈子，将我们的自利与一些人联系起来。当这些人拥有的东西足以满足需求时，他们会赠予我们所需之物。“礼物不产生联系”的宗教理想，将因礼而生的感激之情扩散到了普世的层面。只要我们希望与社群发生联系，它便会占有具有一席之地。但我并不认为离析时代解体后，我们会处于一种普世一元的状态；相反，我们将步入一个多层次的自我，不仅与所有生物发生关联，也会与人类、人类文化、生态区域、社会、家庭、自我发生联系。因此，在即将到来的经济中，匿名的、不产生联系和牵挂的礼物，其作用虽然重要，但会非常有限。

原始的礼赠文化即是如此。虽然确实存在普世的、不求回报的礼物的等价物，大多数的礼物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写于1924年的经典著作《礼物》一书中，莫斯对原始社会存在自由礼物提出了强烈反对。莫斯说，一般而言，合适的礼物和回礼是强制的，通过社会表彰、辱骂、身份、驱逐等形式的社会压力来执行。理想的状态是：因为礼物而产生的责任、承诺、预期回报是将社会结合在一起的黏合剂。

今天，我们可以感受社会黏合剂的缺失。在“我”和“我的”的逻辑中，任何责任、任何依赖关系都是一种威胁。礼物很自然地创造了义务。因此，在离析时代里，人们害怕给予，甚至害怕接受。我们不希望收礼，因为我们不愿意对任何人负有义务。我们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们不想依赖于任何礼物或慈善——“我可以自己付款，谢谢你。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于是，我们将匿名慈善行为上升到了崇高道德的地位。无附加条件、不求回报的给予理应是伟大的美德。

礼赠中生活的一部分是承认并遵守接受和给予的义务。莫斯列举了达雅人（Dayak）的实例。达雅人“甚至发明了一整套法律和道德体系，其依据是当一个人出席饭局或者被看到正在准备饭菜，那么他有分享食物的责任。”[2] 我曾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中国台湾地区的老一辈人仍然保有农耕时代以礼赠为基础的文化遗风。当有人造访你家时，若你没有留他吃饭或者他粗鲁地拒绝，都是严重的失礼。如果晚饭尚在准备中，即便在开饭前非常客套地离开（托词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话），也不一定是礼貌的。拒绝礼物即是断交。如果礼物能建立联系，能扩大自我的圈子，那么拒绝给予或者拒绝接受礼物则意味着“我拒绝与你发生联系。你只是我生命里的一个‘外人’。”诚如莫斯所说，“拒绝给予或者邀请失败，与拒绝接受一样，无异于宣战；这是对联盟和共性的拒绝。”[3]

拒绝这种联系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马克•道伊（Mark Dowie）提到了一个阿拉斯加部落。他参加了部落的长老会议，讨论某个部落人在

2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礼物的形式及其交换原因》，W•D•赫尔译，纽约：诺顿出版社，13页。

3 同上。

分享问题上所犯的严重过失。此人不顾部落的礼物习俗，囤积了他的狩猎成果。在长老看来，他的行为（历时已久）有多严重呢？长老会的目的竟是决定是否要处死他[4]。

在许多情况下，会发生一种隐性的谈判。双方轮流提出借口、进行反驳，直到他们在礼物问题上达成一致，而这件礼物则合理地反映了将要建立的关系的程度[5]。“哦，我不能在这儿吃饭了，我刚吃过了（谎言）。喝杯茶吧。”茶端上来了，一并呈上的还有一只华美的大浅盘，里面摆满了绿豆糕、李干、瓜子。我拘谨地吃了些瓜子。主人送了些糕点给我带走。给予和接受是很微妙的，且在我们的商品经济中是没有的。

即使是在美国，即便从礼物文化中异化了出来，我们仍能体会到礼赠的逻辑。你或许有这样的经历，你接受了他人的恩惠，却发现需要付钱，一种失望和疏远的感受便随之而来。为礼物付钱，礼物便不再是礼物，建立的联系于是被打破了。

对责任义务的厌恶提高了货币交易的吸引力。正如理查德•希福德所言，“商业交易让与的，是和让与人完全、永久的分离。”[6] 为我们得到的东西支付金钱，我们就保持了独立、疏离、无责任、无牵挂。没有人能够索回恩惠，也没有人能够利用我们。在礼赠经济中，如果有人向你寻求帮助，你没法拒绝：无论明言与否，此人和整个社会说：“嘿，记得我们帮你做的事情吧？记得我们帮你照料小孩吧？记得我们救过你的牛吧？你家谷仓着火后，记得我们帮你重建了吧？你欠我们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付保姆费了。我付你帮我铲挖人行道的钱了。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付过钱了。我什么也不欠你的！”

收礼创造了感激之情或义务，于是愿意收下礼物本身就是慷慨的

4　KWMR电台采访，“对话与查尔斯•爱森斯坦和马克•道伊”，2009年4月4日。

5　我在中国台湾地区曾经直观地感受当地的礼仪，有一次，我拜访一位老人练习中文，在上午的课程中，老人端上来一盘牛肉片和一瓶新开的威士忌给我。这般盛情让我无法拒绝。

6　理查德•希福德，《货币和早期希腊精神：荷马，哲学与悲剧》，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203页。

一种。它意味着“我愿意欠你一个人情”，或者在更为复杂的礼物文化中，它意味着“我很愿意欠整个社群的债”。将这一原则进一步扩展，完全接受赠给我们的礼物则意味着“我愿意欠下上帝和宇宙的债”。同样，拒绝礼物，我们便逃避了源于感激的责任。出租车司机斯图尔特•米勒德（Stewart Millard）发现：

> 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金钱使得我们在处理真正的人际关系时显得如此笨拙无能。如果我刚才从我的朋友格雷格的轮胎店里得到了一套新的轮胎（事实上，我正坐在他的停车场思考这个！），但我没有钱购买，我该如何报答格雷格呢？而且，一个更加微妙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不接受格雷格的轮胎报价（礼品），该怎么办？
>
> 接受轮胎这份礼物但不付钱，会产生一系列自发的行为和考虑。我该如何回报呢？我可以等他提出要求，或者我可以选择更费力的方法去了解格雷格，使得交易显得自然些。金钱意味着我可以支付费用，而无须注意柜台后面的我的朋友。我不需要了解他，不需要同他交流生活从而使依赖和欣赏自然交融。我们对彼此如此宽容，只是因为我们拥有金钱。如果对方不高兴，我们就把钱花在其他地方——原来的那个人，则任他零落在风中。

完全接受别人的礼物是你能够送出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今天，我们有很多方式拒绝或接受部分礼物。为了减轻礼物所带来的责任而做的任何事都是一种隐性的拒绝，例如，提醒你去年的收礼人送你礼物，暗示你值得或者应该得到礼物，无论你收到什么，你都假装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礼物，或者提出或者坚持为某物付钱。当有人恭维我时，我也许会拒绝，否认其真实性，表现出假惺惺的谦逊，用“哦，每个人都这样做，没什么特别的”来贬低它。当有人说“谢谢你”时，我也会拒绝，回应“这没什么”。有人会说“你的著作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会回应

“你内心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我的文字不过起了触媒的作用罢了。同样一席话，对某些人是毫无影响的。”这种回应带着几分真实，但我不时用它来否定的赞扬或感谢的礼物，因为我不敢完全接受这份礼物。拒绝恭维礼物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对方的恭维生效之前，回以过度欣然的恭维，将注意力从这次恭维上转移开去。当感激激发回礼时，我们不能太快地接受它，否则它就变成了纯粹的交易，就与购买无异了。它无法将赠礼者和受礼者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反而消除了义务。

充分接受礼物是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承担义务，无论这义务是对送礼者的还是对社会大众的。感激与责任相伴而生，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义务是什么呢？义务是无“偿”的给予。感激是什么呢？它是由收礼产生的、无偿给予的愿望。在“离析的自我”的时代，我们将原本一体的东西一分为二：义务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只是在外表的执行上处于从属地位[7]。很明显，不愿接受，实际上是不愿给予。我们认为，如果偏好给予而不是偏好接受，那我们就是高尚的、自我牺牲的、无私的。但我们并非如此。慷慨的人对于给予和接受同样放得开。不要害怕承担义务、接受感谢。我们害怕义务是因为我们对“必须之事”保持着警觉，我们对咄咄逼人的强制保持着警觉，警惕着各种社会制度之下的胁迫。但当我们把“必须之事”转换成“想做之事”时，我们便自由了。当我们意识到生活本身是一份礼物，我们活着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我们就获得了自由。毕竟，你从生命中得到的，会随着你的死亡而消亡。唯有你的礼物不朽。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拒绝礼物是何等的普遍，需要再度学习的东西何其多。很多以谦虚或谦卑为名之事，实际上只是拒绝联

7　礼品社会使义务和感激紧密结合，密不可分。在美拉尼西亚和太平洋西北地区，在冬季赠礼节中，给予是一种近乎于侵略的社会支配行为。但是，即使排除这种极端情形，义务和感激的结合一般也是成立的。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说：“在全球范围内，在我们可以探寻到的人类历史文明中，货币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强制性礼物回赠的循环”。所以，当我们表达何为真正的礼物时，让我们牢牢记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数不尽的礼赠文化中，礼物在心理和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几乎全然活在商品文化中，那么，能指望谁来了解礼物的真谛呢？

系、远离他人、拒绝接受。我们不敢接受，因为我们不敢给予，事实上，没有了他人，我们寸步难行。我们可以将自己想象成无私、善良的，因为比起接受，我们更愿意给予，但是这种状态与“比起给予，更愿接受”一样吝啬。若不接受，礼物的源泉将会干涸。这不仅是吝啬，更是傲慢自大：给予的源泉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吗？当然不是。生命本身就是一份礼物，生命和培养生命的一切，从父母到整个生态系统都是礼物。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创造的。体力上和脑力上的创新能力也是一样，体现了这一真理的某些创新能力，可被冠之以天赋（God-given）。

当然，拒绝礼物有时是完全适当的，特别是当你不想创造礼物带来的那种联系时。所有礼品都带有“附加条件”，但我们不愿接受礼物，往往并不是因为我们厌恶某个特定的联系，而是厌恶普遍的联系。

“新世纪”精神里“张开双臂迎接富足”的陈词滥调令我反胃。然而与其他陈词滥调一样，它的背后隐藏着真理。我们害怕接受，并非源自自身价值的卑下，或一种不配、不敢当的感觉。正如某位自救大师让我们相信的：害怕接受，归根结底是害怕给予，二者密不可分，而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一种对生活和联系的恐惧，它们是一种沉默。给予与接受，亏欠人与被亏欠，依赖他人与被依赖——这才是充实的生活。不给予、不接受，但为一切付出金钱；从来不依赖于任何人，在金钱上独立；不被缚于任何社群或地区，保持流动……这是孤立、离析的自我所幻想的天堂罢了。与精神上无牵无挂的幻想相对应的是宗教非世俗的妄想，以及科学上掌握自然、超越自然的野心，得来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

从了无牵挂（nonattachment）、独立、超然的妄想中清醒过来后，我们转而寻求与真正的、扩展的自我相融合。我们渴求社群。独立和无牵无挂从来都只是幻想。实际情况是，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我们终将无可救药地依赖于彼此，依赖于自然。依赖、给予、爱是唯一的选

择，这是永恒不变的，失去它们就等同于不再活下去。

可以肯定的是，了无牵挂之下也蕴含着礼赠文化的真谛，它让我们不再紧攥拥有之物。这种无牵无挂存在的背景是牵挂和联系，而非独立与分离。事实上，礼物有助于释放自我的牵挂，因为他们将“自我”（self）扩展到了“自我”（ego）之外，将自利与更广大的、相互联系着的生命联系起来。礼物服务于自我的扩张，并超越了自我的扩张，礼物既是自我扩张的结果，也是它的起因。有了与他人相互联系之感，我们便会有给予的欲望。我们给予的越多，联系之感就愈强烈。礼物是潜在的存在同一性的社会心理表现。

若脱离了世界，一个人无法为善，也无法作恶了。沉浸在世界中，如何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财富是我们面临的挑战[8]。完全投身到关系和义务的社会领域中，是一种慷慨。用一种与宗教理想相反的、公共的方式给予礼物，可能会带来回报。这样，我们便通过自身增加了礼物的吞吐量，放大了我们的能力，放大了给予的需求。其思想是，要满足需求、建立联系，不要强索回礼或设法取得回礼，因为强索或设法取得的根本不是礼物。

礼物与故事一道，都是关系、社群的线索，二者紧密相连。故事可以是一种礼物，伴随故事的礼物亦然，它提升了礼物的独一无二的、私人的层面。讲述礼物的故事，几乎是无法抑制的冲动。我记得我的祖母说：“嗯，首先我拜访梅西一家，但他们并没有那件东西，所以我后来去了J•C•潘尼一家……”无论如何，“谁给了谁什么”是一种社会见证，它激起了慷慨之心和社群归属之感。

送礼人的态度触动心弦，“我免费赠予你，我相信我会收到合适的礼物，无论是从你那儿，还是我们礼物圈子里的其他人”。在感激和

8　按照这个思路，只有当人们诚实地践行“我还没有准备好使用财富（所有形式的财富），所以我会放弃财富，直到我准备好为止”，苦行之道才是正道。我见过的、能够很好地使用财富的人少之又少。这并不奇怪，因为财富是一种恩赐，就像我们的天赋、能源和时间都是礼物一样，要很好地使用它，我们必须有奉献精神。

慷慨的精神之下，有一些永恒、真正的东西，不期回报、不索义务[9]。因此，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礼物具有产生义务的功能，这种功能创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群；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寻求不建立义务、不求取回报的礼物，那些不求回报之人的慷慨令我们触动。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吗？有。义务的来源不必是撬动孤立、离析自我自利之心的社会压力。相反，作为感激之情的结果，义务会自然而然、非受迫地产生。在接受礼物、目睹慷慨行为发生时，会自发地产生对联系（connection）的体悟。义务是这种状态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愿望。

孤立、离析的自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无论是生物学的自私基因，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皆认为“你之增益，我之减损”。因此，社会必须运用各种威胁和激励机制，让个人的自私行为与社会的利益相匹配。今天，新的生物学范式正在替代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统观点，

9 因此，我认为莫斯对礼物社会的机制持有偏见，他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功利主义将人类贬低为一种社会生物，并且强调个人主义。莫斯虽然从哲学上反对这一点，但他还是认可了功利主义教条中的某些假设，尤其认同人们主要是受了利益的驱使。在《礼物》一书开头，他叩问：“在落后或过时的社会中，什么样的法律和自利法则，迫使收到礼物的人有义务回报？”（见本章脚注3）。这一问题排除了自利和义务以外的机制，而这些机制可以解释他问题的后半部分：“被赠之物有何种权力，使得收礼人必须回报它？”

如果莫斯对礼赠机制的考查是完整的，那么我们会问：在当前以货币充当媒介的系统中，有什么不一样呢？通过将货币作为媒介，我们同样施加了社会压力，充分利用了自利，保证礼物有来有往。货币债务与莫斯提到的“古老社会”中由礼物产生的义务类似。此外，在莫斯引述的这些社会中，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回礼必须比收到的礼物更为丰厚，高利贷也有了与之匹敌之物。由这些类比，我们可以得到“一切都没有改变”的结论：今天只是古老的礼赠经济延伸到了机器时代罢了。但是，另一个结论也同样符合莫斯所列举的事实，即莫斯将今人的心态和动机投射在了过去的人身上。后一结论有它自己的证据，例如，许多旅客见证了土著们开放、孩子般的慷慨。即使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也为之动容（虽然不足以避免他对土著的屠戮和奴役）：“[阿拉瓦克人]是如此天真无邪，对他们拥有的东西是如此大方，若非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对于他们拥有的一切，若问他们要，他们从不拒绝；相反，他们会请你分享，并展现出爱意，仿佛把心都交出来。”他的描述意有所指。土著人的天真无邪表明，他们的慷慨带着些童稚和原始。他们的仁爱表明，其动机与莫斯所谓的社会强制的自利是截然不同的。

而精神、经济和心理的运动，正在挑战笛卡儿式的自我概念。新的自我是相互依存的，甚至通过与它相系的一切生命来体现它的存在。这是联系的自我、更广大的自我，它一点点延伸到了礼物圈中的一切人和一切物那里。在礼物圈中，“你之增益，我之减损”不再成立。礼品是流通的，因此，他人的好运气也是你的好运气。沉浸在这种扩展的自我（expansive self）之中，人们需要的并不是强制共享的执行机制。礼赠的社会结构，仍然服务于一个目的——提醒其成员，他们是相互联系着的，钳制那些已经忘却这一点的人，调配礼物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谁给了谁什么？正确答案因不同的文化而不同，并取决于该文化的环境、宗法制度、宗教信仰，等等。礼赠的社会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按照与文化相适应的方式引导资源分配。

在本质上，这也正是我们对货币经济的期望：将人类（和非人类）的需求与那些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男男女女同自然连接在一起。本书提出的所有经济和货币方面的建议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旧的经济体制则与之相反，财富集中将那些无法支付者（如穷人、其他物种、地球）排除在礼物的流通之外，匿名性和去人格化则使社群和联系支离破碎，它否定了循环流通和回报的法则，却倡导金钱和财富的积累。神圣经济则与之相反：它是平等的、包容的、个人的、创造联系的、可持续的、非积累的。这样的经济要来了！旧的经济已难以为继，是时候按照礼赠经济的原则生活了。

第19章

Chapter 19

非积累性

若财富的积累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道德准则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伪道德原则已烦扰我们达两百年之久，我们将许多最令人作呕的人类品质摆到了至上美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能够摆脱这些伪原则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在财富使你变贪婪之前，要学会行善。

——托马斯•布朗爵士

在这本书里，我阐明了财富是一种流量的概念，而不是积累性的存量概念。这并不是个标新立异的想法，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财富的积累便开始了。除了极少数例外，狩猎采集者是游牧性质的，财产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负担。但农人是静态的，他们的生计有赖于食物的储藏，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狩猎采集者的人口水平要低于原始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水平，在干旱或洪涝的年景里，他们就迁徙而去，随遇而安。农人则不然，对于农人，几个差年景过后，很可能又是几个好年景。囤积大量食物是最安全的做法。积累和储存是最佳形式的保险，财富由此诞生，并且产生了一些今天为人所称道的美德：节俭、牺牲、未雨绸缪、良好的工作习惯、勤奋和敬业。

虽然没有食物储备，狩猎采集者的劳作程度仅以满足眼前的需求为限，他们享受的是长时间的休闲。农人的休闲则带着点内疚，他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多储备一点食物，以备万一。农场里总有农活需要完成。今天，我们将农人的态度，包括农业社会对财富的定义，继承并发挥到极致[1]。农业社会过后的机器时代里，这些态度（工作伦理、为未来牺牲现在、积累、控制）的表现上了一个新台阶[2]，财富积累到了最富有的法老也无法想象的程度。

现今，我们处在所谓的信息时代中，同样的态度又一次加强了。这个时代已经目睹了财富的积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贫困，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同自然世界的异化。观察家指出，每一个这样的“时代”都以指数速度远超（实际上是压倒了）前代。粗略地说，农业时代持续了三千年，工业时代持续了三百年，信息时代持续了三十年[3]。很多人感到，我们处在一个奇点的边缘：一系列新的时代纷至沓来，缩短为年、月、日，然后便过渡到一个全新的、不可知的时代，它与之前时代的性质截然不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同时代”，我们对它不甚了解，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人类不再假装不受自然法则的制约。

当然，积累违反了自然法则，它与新人类、人类与自然的新关系相悖。虽然自然界也有资源囤积超出个人消费能力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极为罕见，许多形式的食品存储（如松鼠偷藏坚果）有其他解释[4]。一般来

1 请注意，采集者和农人之间的区别颇有生造之嫌。二者逐渐合并，且采集者的态度消亡得十分缓慢。事实上，很多人至今仍然保留着采集者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刀耕火种的农民、中世纪的农民、班图族（Bantu）的牧民，他们悠闲的生活节奏与狩猎采集者几乎一样。

2 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机器时代与农业时代并无不同，它只是对农业时代的掩盖罢了。其起点可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建筑者协会。现代工厂制度以劳动分工、标准化的产品、流程和人类功能为特点，而古代社会的金字塔、纪念碑同样有这些要求。他们同样造成了人类的苦难、辛劳和贫困。

3 我会将这些置于三万年之久的符号文化（最早的抽象艺术发生的时期——有观点认为，这也是最早的抽象符号产生的时期）、三十万年的火种时代，以及三百万年的石器时代之前。

4 例如，松鼠实际上在植树，成为树木繁殖的代理者。树哺育了松鼠，松鼠有助于树的繁殖，就像黄蜂和无花果树之间的关系，以及无数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样。了解到了这种关系，便不难理解为何早期人类将自然视作一种礼物了。

说，自然系统的特点是资源的流动，而不是资源的积累。动物细胞不会存储超出数秒钟消耗的糖分，而是相信身体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进化生物学家从基因决定论的角度给出了人类囤积资源的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囤积资源提供了安全感，对生存有利。这种论点认为，狩猎采集者和其他生物也会囤积资源，但是他们普遍缺乏储存的手段。第二种解释是，明目张胆地积累和消耗资源乃是一种交配的夸饰。正如生物学家沃尔特•K•多茨（Walter K. Dodds）所说的那样：

> 男性和女性对资源控制的夸饰和消费不断升级（导致了奢侈品狂热），因为对资源的过量占有是一种性选择特征（sexually selected characteristic）。在生活水平较高的社会，如果控制的资源仅能确保你的生存、你的伴侣和你的后代的生存，是不够的。要对配偶做出有吸引力的夸饰，你必须比你的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更多的资源[5]。

在姑且承认传统遗传理论的前提下（对它的批判已超出本书范围），上述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微妙的是，上述论断依据的是循环推理，它将当前的稀缺性、焦虑和竞争的环境投射到了自然之中。只有在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里，积累和过度消耗资源，才是一种生殖上的优势。在以礼赠为基础的文化中，你的子女和伴侣的福利，与你是否是伟大的猎人、生产力高的采集者，并没有什么关系。此外，人类学的证据也与多兹的观点相矛盾。狩猎采集者和原始的农人生产不足，对于积累和对资源的控制，他们更偏好休闲[6]。由基因驱动的财富夸饰竞争并不存在，与此相反，囤积并不会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反而会带来耻辱。此外，广泛的资源共享使生产能力变得没有太大意义。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是基因选择的话，那么它是分享、为部落的福祉做出贡献的意愿。略微

5　沃尔特•肯尼迪•多兹，《人类的足迹：动量、影响和全球环境》，123页。
6　有关生产不足的多个证据，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

夸张地说，在礼品社群中，理性自利等同于利他主义。

孤立、离析自我的错误直觉对我们的侵害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经常将之设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在叩问“何谓人性”时，我们投射回了一个虚构的、“人人为己”或者“人人为自家”的时期，并且假设社群是稍后才有的，是对原始自然状态的一种改善。哲学家霍布斯和卢梭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于处于自然状态的生命，虽然他们持有相反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所见略同。对霍布斯而言，生活是“孤独、贫穷、肮脏、粗野、短暂的”（下划线为本书作者所加）；对卢梭而言，生命亦是孤独的：

> 在这种原始的状态下，人们没有房子，没有棚屋，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财产；每个人都随遇而安，居无定所；性的结合毫无计划，意外、机缘或意向使他们结合，他们无需用言辞表达他们对彼此的企图；他们的分离也带着同样的漠然。母亲给孩子喂奶，完全是为了她自己；之后，当习惯使他们更亲近，哺育的目的便是为了她和孩子：一旦孩子大到可以自己觅食，他们会为了自己抛弃母亲；除了不留在视野范围之内，他们想不出离弃彼此的其他办法。不久，即便他们偶然遇见彼此，也会形同陌路[7]。

无论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可以肯定的是，积累至少增加了一些安全感，甚至增加了我们在性事上的吸引力。但这不能持久，积累的心态与“离析的飞升”（ascent of separation）是一致的，它将随着离析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对于礼物经济中“扩展的自我”而言，积累是毫无意义的。

将狩猎采集者的态度整合到技术社会中，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是对过去的补足，而非升华。在本书中，我提出了非积累性的货币等价物（衰减的货币）、非所有权的货币等价物值（经济租的消

7 让·雅克·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第1部分。

除），以及生产不足的货币等价物（休闲和负增长）。事实上，在个人层面上，很多人会被这些价值观所牵引，一如在“自愿从简”运动中，在对工作的本质的质疑中那样。他们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开创了一种既新潮又古老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将很快成为一种常态。

比尔•考思（Bill Kauth）是“神圣勇士”（Sacred Warriors）等组织的创办者，他是一名国际知名的社会发明家，他富甲一方，但这种富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他拥有的并不多：一辆旧汽车、一些个人财产，据我所知，并无金融资产。很多年前，他告诉我，他立下了被他称之为“收入封顶”（income topping）的个人誓言，承诺永不赚得超过24,000美元的年收入。尽管如此，他说，“我光顾过世界上的一些顶级餐厅，到过地球上许多美丽的地方，我的生活无比丰富。”

在离析自我的时代，我们带着些许犬儒主义和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扭曲了我们对其他人或其他组织的看法。当我们听到鼓舞人心的发言时，当我们参与变革性的研讨会时，我们会悄悄地（或不那么秘密地）怀疑，“这家伙是如何从中牟利的？他有什么图谋？”我们一眼就能识别出伪善，识别出强制性的“捐赠”。我们的猜疑往往是有道理的，太多的宗教迷信、精神运动、多层次的营销组织都以上层人物的暴富收场。我们惊叹，“自始至终皆是如此吗？”比尔•考思试图找到一种方式，在利用多层次的营销的动态机制的同时，消除“贪婪的因素”。他认为收入封顶是唯一有希望的方式。

对任何善事都产生“有人要从我身上渔利”的怀疑，有一个内心的对应之物，若我们叩问自己的动机的话。有时候，这种自我怀疑是成立的。有时我感到，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一些下流的动机，我的礼赠都是蓄意的，是为了给某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者讨好某人，我的慷慨是为了获得赞许的可悲尝试，我的每个关系都是受了利润的驱使。在我的生命中，我似乎从未做出什么真正慷慨的事情，我总是包藏追名逐利之心。这种自我厌恶，在神话和宗教中有代表性的印证：它是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所谓的“落在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它

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称的“完全堕落的人”的教义，它是佛教中意识到“业因我而作”的羞愧难当，特别是试图超越自我的企图！

我赞同比尔的观点，收入封顶能有力地消除怀疑，而这种怀疑败坏了能够改变生活的组织和思想。在内心层面，收入封顶消除了我们对动机的怀疑，让我们的话语充满力量。它肯定了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动机的真诚，使人们能够敞开胸怀接受礼物。比尔的誓言是非常私密的，他从未与他人分享过，但他允许几十年后我将它写出来。一开始，我认为分享这个誓言会让他变得更具影响力，但深思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无论他是否把这誓言告诉他人，这誓言的能量都将从他那里辐射开去。此外，公开分享这一誓言会被（自己和他人）怀疑，真正的动机是虚荣：为了保持好形象，为了赢得好感。比尔表示，某些时候，他确实有运用收入封顶的理念建立社群的打算，以便加强相互信任和互相依赖。

收入封顶会对心理和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促使我在神圣经济的背景下思考它的过去和未来。我读到的近代文化著作表明，一种类似于“资产封顶”的做法被广泛推行，我将之称为“非积累性”（nonaccumulation）。请回忆我在第18章提到的阿拉斯加部落：令人反感的并不是猎人太过成功，而是他不分享他狩猎得到的兽肉。

非积累性仿效的是狩猎采集者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资虽然充裕但却不存在积累，给予最多的人，获得的声誉也最高。无论是得之于自然还其他人，尽我所取，必先尽我所予。伟大的猎人，技艺一流的艺术家或音乐家，充满活力的人、健康的人、幸运的人，都有更多可以给予的东西。任何时候，这种声誉对所有人都有益。只有当高收入意味着积累、琐碎的消费，或者对社会有破坏性的消费时，才需要对高收入进行限制。换言之，高收入并不是问题；只有当收入在流通中产生了阻滞，产生了积累和停滞，才是有问题的。

非积累性是有意识地不去积累过量的资产。它的出发点并非是良善的愿望，而是认识到给予优于积累，由积累得到的安全只是幻象，过量

的货币和财产反倒会增加我们的负担。非积累性与礼赠精神深刻一致。而礼赠精神的核心原则是，礼物必须是流通的。莫斯说："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已经接受的礼物、已经拥有的财产——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由个人占有，除非它对个人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若有需要，就使用它；若无需要，就把它传递出去。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原则。为什么要留存你用不上的东西呢？正是"要是我有用怎么办"，导致了我们的留存与囤积：如果未来我没有足够的可用怎么办？在礼赠文化中，总会有人予你所需。在囤积的文化中，"要是我有用怎么办"的恐惧是自实现的，它造成的结果恰恰是它所假设的脆弱性和稀缺性。

你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生活在囤积文化和由稀缺性诱导的货币体系中，那么非积累性应该是不切实际的。你或许会略带惆怅地认为，如果其他人都不积累该有多好，但是他们并未这样做，那么你最好保护你自己。这挺合乎逻辑。我找不出合理的论据来反驳它，我所能做的是提请你注意，在阅读本章时，是否有什么牵动了你的心灵。想想理性、务实、保障安全带给了我们什么吧。或许是时候换换思路了。

通常，我并不崇尚英雄般的、极速的转变。如果你很富有，或许应该温和地采用非积累性，将滞留金的思想应用到你现在积累的财富中，每年按照5%水平使其贬值。在神圣经济中，这迟早会变成现实——为何不从现在开始呢？

当然，穷人一直生活在非积累性中。越来越多的人靠信贷而非储蓄购买物品，而经济形势会迫使中产阶级也如此过活。计息债务将不再主导未来的经济生活，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储蓄已经过时，而这是非积累经济的先导。

大量的资本积累仍然有作用，总有人会将金钱用作创造神圣的媒介，将其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护符，协调人类活动、汇聚人类的意志。明天，五千人是否会建立起一个摩天楼，是否会清理有毒垃圾场，是否会制作一部高科技电影，都由金钱来决定。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仪式来协调人类活动，其中一些甚至需要调动货币创生之前的故事和权

力。但是，金钱始终是一个有力的工具，这便是下一章节的主题——“神圣投资”的本质。对财富的持有者而言，请你思考一下，通过人类集体的努力，你能够创造什么？或者说，你打算如何用最美好的方式花掉金钱？

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物体、体内的每个细胞，它们能够处理的能量吞吐都是有限的，我们也不例外。若通过某一渠道的流量太大，会导致渠道破裂，积累太多，无异于肿瘤。购买你从未去过的城堡，购买第十五辆劳斯莱斯，都是收入过多的表现。生物体拼命消耗能量流，在释放能量的同时，也保存能量。挥金如土的富人的真实想法是送出金钱，平衡给予和接受；然而，富人只是购买物品并保有它们。是怎样的恐惧使他一面持有、一面放弃？这恐惧统治着宇宙中孤零零的、离析的自我。积累是扩大渺小的、离析的自我的一种方式。然而这种扩大，终究是个弥天大谎。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亦将赤裸裸地离开。

富人拥有的大多数廉价的小玩意，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的替代品——运动型汽车是自由的替代品，豪宅是失去与他人联系的、萎缩的自我的替代品，社会地位是自尊和他人的尊重的替代品。财富的把戏，不过是悲伤的游戏。甚至财富理应带来的安全感也只是谎言，生活的艰辛总有办法渗入财富的堡垒，相同的社会痼疾困扰着所有人，富人也不例外。当然，你可以想象各种医疗突发事件，财富或许可以挽救生命，可那又如何呢？我们都将死去，不管你能活多久。在某个时刻，当你回顾你走过的岁月，它们短暂得好似黑夜里的一道闪电；你会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并非求取最大限度的安全和舒适；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给予，为了创造美丽的东西。

你肯定会认为，我在参与非积累的过程中做了何等高尚的事情。为避免误解，请允许我向你保证，当我开始这样生活时，我并没有任何自我牺牲的意识，而是有轻松和自由之感。我是个慷慨之心颇为平庸的人，与圣人差得很远。我提出的并不是个高尚的想法，相反，它非常实际。首先，它使我的心灵轻松、自由；第二，我知道我的给予会带来回

报；第三，我将活在源源不断的联系交往中，礼物会扩大自我的圈子；第四，即便是在物质层面，我也相信我会活得很精彩。例如，我爱大海，多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能够临海而居。这梦想如此生动，我甚至能听到海鸥的鸣叫，闻到咸涩的空气。我曾经以为，要实现这个梦想，我必须赚够很多钱。现在我相信，虽然我永远不会“拥有”海边的房子，但会有人邀请我“随便何时”去海边小住，房子的主人会衷心对我说，“把这儿当作自己家哦”。

若世人热情接受我的作品，那么我会收到很多礼物，它们会远远超过我的所需。积累大量资财、股票和债券、投资及投资组合，地下室和阁楼塞满财产，是何等的浪费！这世上可供分享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为何还要积累呢？我们此生可以在衰减的货币和礼赠经济中生活，我们现在就可以过这种生活。用格塞尔的话说，我们可以将货币贬低到雨伞的地位，将它随意转借，或交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当然，并不能保证我总能得到所需要的钱或其他礼物。有时候我可能会身无分文，但这丝毫不会使我产生焦虑。另一方面，我可能会挨饿，后悔没有攒下私房钱。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对我而言，不再担忧和焦虑，放手之后的开怀、飘然、轻松的体验远胜于风险。如果你想要保障，那么埋头积累财富吧。你终会发现，承诺的安全感只是海市蜃楼，生活的沧桑仍能渗入财富的壁垒。

从更深的意义上讲，积累和非积累的区别是错误的，稀缺性和离析的概念偷藏了这种错误的区分。礼物的思维定式，将个人的富足体验的世界的富足体验融为一体，它有着与这一思维定式相一致的生命体验。离析的思维定式，则是将礼物、贷款和储蓄认为是三种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果真如此吗？如果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得到的比我能够花掉的多，那么我有三种选择。我可以将花不完的送出，从而激发感激之情；我可以将花不完的贷给他人，依赖于责任而非感激；我可以将花不完的攒下来，不依赖任何人。这三种选择的区别，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首先，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感激和义务之间的界限模糊，而且在礼

赠文化中，二者相互加强。感激之情触动人们去给予那些乐善好施之人，而社会契约最终依据的也是感激原则（给予那些乐善好施之人的正确性）。无论是感激之情，还是社会契约，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在以信贷为基础的货币系统中，储蓄与投资、与借贷没有差异。对于银行而言，储蓄账户是即时贷款。与贷款一样，货币性的储蓄意味着“过去我给予了他人，未来我可以让他们给予我。”即使是股票或实物商品，积累取决于所有权的社会习俗。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礼人是不可能进行积累的。只要社会见证了我的给予，我就可以建立起未来的富足之源（即使没有社会见证，我也相信宇宙会报答我们的给予，或许以其他的形式，或许滴水之恩会得涌泉相报）。最终，给予、出借、储蓄金钱的意图，才是非积累的本质所在。本着礼赠的精神，我们专注于目的，而把回报看作次要的、事后的。本着积累的精神，我们力求确保最大的回报，让礼物、贷款、投资服务于这一目的。礼赠的精神是一种自由、富足和信任的状态。积累的精神则是在焦虑、稀缺性和控制的状态。按后一种方式生活的人是贫穷的，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

在未来，当社会机制能够消除经济租金（即因为拥有土地、金钱而获得的利润）时，我所描述的生活不仅会符合经济逻辑，还将符合精神上的逻辑。若货币随时间衰减，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以零利率借给他人，而不是持有多于所需的货币。此外，人们将普遍拥有富足的心态，贷款、礼物和投资之间的区别将变得模糊。无论偿还礼物的正式的协议是否存在，责任已然产生，即便责任的对象并非特定的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甚至整个宇宙。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产生安全感。这种认识是新的“自我的故事”的自然结果，这个新的“自我的故事”是联系着的自我，它潜藏在我们将要过渡到的神圣经济之中。从精神的角度来看，“你之增益，亦为我之增益”这话不假，即使是在离析时代的顶峰。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在昔日的礼赠文化中亦是事实。我们将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在现代背景下重新创建礼物经济，“你之增益，亦为我之增

益”将再次成真。

与礼赠相融合的新经济制度，既是大众态度变化的原因，也是其后果。当有足够的人按照非积累的方式生活时，他们会建立起一个心理的基础，在这个心理基础上，新的经济制度就能建立起来了。从实用的角度讲，人们会认识到，新型货币反映的是他们的价值和精神直觉。他们会“了解它”，会踊跃地使用它。这已经发生了：尽管在使用上，互补货币（complementary currencies）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不利因素，但它仍令人兴奋，甚是诱人。即便使用互补货币并无太多经济上的原因，人们仍然希望能够从直观上认识到，这种货币与新的“自我的故事”是一致的。我们的精神直觉已经提前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真理：财产是一种负担，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共享，将惠己之心推之于人。

第 20 章

Chapter 20

生活之道与神圣的投资

一直以来，我们都按照“对我们有好处的，对世界亦有好处”的假设活着。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使得相反的假设——“对世界有好处的，对我们亦有好处”成为可能。这需要我们努力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什么对它有利。

——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

财富富余是一种神圣的信托，财富富余的持有人在他的一生中必须为了社群的利益好好管理财富。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

财富的达摩

（达摩是指佛教中支配个人行为的自然法规和道德法规——译者注）

我们要清楚，非积累（nonaccumulation）的目的，并不是为以货币为基础的文明脱罪，那仅仅是为自我脱罪。你不会因为贫困而拥有美德，积累既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它自身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享受真正的财富，享受联系和流动的财富，而不是享受拥有（having），拥有只是伪财富。但是，如果你拥有的财富比你在生命长河中能够分享还要多，该怎么办呢？

对于有良心的人而言，与其说这种财富是一种礼物，不如说它是一种负担。我们必须恰当地使用赠予我们的东西。财富也不例外。拥有了大量财富的人没有道理推卸职责，而其他人也没有道理唾弃与生俱来的礼物、责任和机会。

无论是来自家族继承还是来自于早年的生活，过量的财富承载了“好好使用它”的愿望。这是一种达摩，是一种使命的召唤。将财富浪费在不中用的物品上，无谓地将它捐出去，穷其一生为积累财富而奋斗，都是在拒绝响应这一召唤。如何合理地使用富余财富是个挑战，这或许需要几年或几十年，需要长远规划，建立起一整套组织架构；或者只需要慷慨的举动，便能将它用得恰到好处。无论用哪种方式，这都是一种与未来经济相适的投资。在未来的经济中，社会地位来源于给予而非拥有，安全感来源于与他人的互动而非积累。传统的投资思维将投资等同于财富的增加，而在未来的经济中则不然。

一开始我认为，我们应该全盘放弃投资其词及其概念。之后，我考虑了其词源：投资意味着将赤裸裸的金钱裹进新衣，裹进物质或社会领域中的某种物质的、真实之物。而货币是赤裸裸的人类潜力——尚未被“裹上”物质或社会结构的创造性力量。

投资之道则是将金钱裹在神圣的法衣之下：用金钱来创建、保护和维持神圣之物。这些正是未来经济的支柱。因此，投资之道是对未来世界的实践，不仅是心理上的实践，也是在为实际做好准备。它使人们习惯于对待财富的新心态——寻找生产性的给予渠道，并且建立、巩固这些渠道，即便目前的货币系统崩溃，这些渠道也不会消亡。我们所了解的货币终将消失，但是感激和义务的关系却岿然不动。

如果你沉湎于略带诗意的臆测，那么我在前面段落中提及的内容，对其他“未来世界”，即死后的来生，也是一样的。要理解这一点，你并不需要了解来生。在你临终之际，你会意识到，自己什么也带不走。金融投资无法撑过经济崩溃，同样，生命的结束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积累也告一段落了。在那一刻，什么能带给你快乐？你所有关于给予的记

忆。我们离世时，也带走了给予我们的一切。在礼赠文化中，我们所给予的就是我们的财富。通过给予，我们富与天齐。与他人融为一体，我们也就得到了我们给予的一切。

对于并不富有的人，最为合理的、使用资金的方式是，尽可能喂饱自己、喂饱小孩，满足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不过，除了将钱用在自己和亲人身上，要合理地使用金钱，需要进行所谓的“投资”。神圣经济对投资的意义与今天截然相反。今天，人们投资的目的是保持其财富；而在神圣经济中，投资的目的是分享财富。

与非积累性的概念一样，投资的概念也是妇孺皆知。投资意味着“我拥有的资金多于所需，因此我可以让他人来使用它”，这就是投资或贷款。银行或其他投资中介则善于发现能够使用这些资金的人。银行业的神圣之处在于“我会帮你找到能够合理使用你的资金的人”。有一次，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一名银行家，他是我在一次会议上结识的。听完这句话，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泪水是对他的职业精神的实质的认可。

一千年之后的货币会与今天大不相同，我们甚至不再把它当作货币了。然而投资的基本思路仍将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宇宙的丰盈和人类创造力的无限，我们会接触到远远超出我们迫切所需的礼物。我们总会得到所需的资金，这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通过集体人类努力，在与地球的伴侣关系中创造奇迹。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神圣的投资是将这种极度的丰盈引向创新目标的渠道。它始于需求的满足，臻于美丽的创造。

厚此薄彼

投资之道体现了礼赠的精神。不幸的是，当前的投资精神与之相悖：要么是出于攫取财富而非恩赐的目的，要么事先指定礼物或者事后强索回礼，或二者兼而有之。它意味着“只有你能给我更多回报，我才

让你使用这笔资金”。不管是股权投资还是贷款，通过对稀缺资源的独占而获利，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稀缺资源。换个角度看，回礼的驱策并不是感激。尽管董事会在年报中传达了感谢股东的信息，但董事会支付红利给千百万匿名投资者，并不是出于感恩。

假使经济尚未具体实现礼物的核心原则，我们也可以按此原则生活。投资之道——按照礼赠的精神和逻辑进行投资，现在便可开始。在过渡到新经济之后，我所提出的想法会更加显而易见，而统领这一经济的故事——“联系的自我”和“地球”爱人，将为这些思想提供支持。今天，应用这些想法需要信心、远见和勇气。对于沉湎在旧故事中的人和机构，你不会得到他们的肯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提出的观点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接下来的观点将比“有社会意识的投资”或“伦理投资”更为激进。虽然这些想法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它们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通过寻求正的财务回报，他们使世界向金钱的转变得以永续。

传统的投资旨在促进货币领域的增长，得到一部分货币作为回报。在“飞升”的背景下，这是情有可原的。风险资本家识别出有高增长潜力的机会，为其提供资金，使它们成功。在稳态或负增长经济中，这种模式不再适用。对于投资阶层而言，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到这种模式不再适用，投资目标会发生转变：恢复自然和社会公有资源，而不是更有效地利用它们。

让我重申：在恢复自然和社会共有资源的过程中，投资者无法获得利益。任何“有社会意识的投资”计划，只要承诺正常的回报率，都是在撒谎。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在一次演讲结束后，我遇到了一名非常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女士。她致力于有社会意识的投资，她反驳道，“当然，并不是所有有利可图的投资，都会有助于共同财富的清盘。如果我投资的公司取得了一项伟大的新发明，比如，发明了廉价的便携式太阳能充电器，那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资本化这一公司，这样他们卖掉了很多件产品，也

能让所有人都赚钱，地球也能受益。”话是不错，但是如果该公司降低销售价格（例如，只在研发和资本再投资之上加一个利差），那么能够买到这一产品的人会更多，这对地球岂不是更有益吗？向投资者支付利息或股息，给他们一个正的回报率，与使公司在社会和环境上更加“有意识”，这二者是有冲突的。

容我澄清一下：我并不是建议企业家在损益平衡点上进行销售，将自己置于亏损的境地。我所说的是投资而非收入。好好工作领取奖励固然不错；但是，因为拥有货币而使钱生钱，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上面的例子中，设定一个最优价格，使企业得以生存，给员工好的待遇，为企业的扩张、研发等融资，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除此之外，企业必须赚取额外的钱，以利息或股息的形式付给投资者。这额外的资金从何而来？这些资金的来源与今天一切资金的来源相同：它们来自计息债务，来自于将世界转换成金钱的行为。如果你真的想为世界做出贡献，就不应要求投资回报。不要一面给予，一面索取。如果你想要索取（你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索取），那么索取好了，但不要假装你在给予。

第二个例子将会进一步阐明这一点。想想最为鼓舞人心的“有社会意识的投资”——南亚妇女的小额贷款。显然，这项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妇女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且违约率极低。如果要举“行善者诸事顺”的例子，这便是一例。假设你借给了一名印度妇女500美元购买奶牛。她将牛奶卖给村民们，赚取足够的收入养活她的家人，还清贷款的利息和本金。这听起来不错，但略微思考一下：还款的钱从何而来？来自村民。他们去哪里弄到那么多钱呢？他们通过销售其他商品或服务得到这些钱。换言之，将他们的那部分社会或自然公共资源转换成金钱，正如第4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殖民地时代，为了摧毁自给自足的非洲本土经济，英国（和其他殖民地的权力）采用了臭名昭著的“茅屋税”。而上述措施与茅屋税的效果是一样的[1]。茅屋税

1　参见托马斯·帕肯汉姆（Thomas Pakenham），《对非洲的掠夺》（The Scramble for Africa），伦敦：阿巴克斯出版社，497~498页。

只是一个小额的年度税，只能用国家货币支付。这迫使土著人出卖劳动力，用当地的商品交换国家货币。本土经济迅速解体，并沦为英国商品的市场，成为英国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来源。

那名妇女养的牛所产的奶比她一家人能够消耗的量还要多。她会把喝不完的牛奶给谁呢？她必须支付货币贷款，因此，不管她喜欢与否，她会把牛奶给那些愿意付费的人。如果牛是免费的，她并无挣钱的驱策，她或许会通过传统的礼品网络将牛奶分发出去。当肩负着财务负担

便是受了这种驱策。在货币化的经济中，原始的礼赠网络已经崩溃，你需要金钱才能生存。为了获得金钱，你会卖掉任何能卖之物——你的劳动、你的时间、你的环境。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只要当地经济的增速比奶牛贷款的利息高（或者比发放给村庄的总贷款额的利息高），村庄就能够还清本金和利息，变得更加富裕。换句话说，如果与买牛妇女一样，整个村庄都以高于利息的速度销售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他们都能够偿还贷款，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些钱是从何而来呢？在全球层面上，以利息为基础的投资导致了竞争，导致了社会、自然、文化和精神的共有资源的枯竭——礼赠经济，于是变成了货币经济[2]。

神圣的投资与盈利几乎毫不相干，这再明显不过。如果你想帮助村子，那么送给那名妇女一头牛吧。或者，为着她的尊严着想，以零利率贷款给她吧（金钱的使用是一种礼物）。如果你更关心的是你的货币财富的增加，那么收取利息，并忘掉这个托词吧。“你不能身奉二主”，这个谚语没错。在我给出的两个例子中，在特定的时刻某些冲突终会显露出来。人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侍奉上帝，要么侍奉玛门（玛门即财神——译者注）。但是，在神圣经济中，这一选择无关紧要。它们将合二为一——这是更为一般化的、对立面相融合的一部分，未来的时代因此名曰“大同时代”。

承诺优厚回报率的、有社会意识的投资，无异于“劫此济彼”——在交易中为自己收取佣金。我希望，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上述解释是多余的。毕竟，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优秀作品系受利益驱使”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在偶然的情况下，利润确实会产生，但是强迫索取回礼的礼物，根本不是礼物，而是阴谋诡计或掠夺。

2　一个小警告：从理论上讲，如果利率小于与或等于违约风险溢价，那么经济增长和共有资源的货币化是毫无必要的。与真实利率相关的成分包括流动性溢价和货币的市场利率，它们由供需和政府的货币政策所决定。根据第4章和第5章的论断，“它们代表了仅靠拥有货币而取得的利润”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将企业与人类关系冷酷无情地剥离开去，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吗？如果你投资的目的是索取利息，你是在间接地告诉一些可怜的家伙："我不在乎你为了赚钱干了些什么——把钱给我就行！"你得到了存款凭证，或许威胁到了他人的抵押品赎取权。你或许没有像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译者注）那样一毛不拔，但是，你付钱让他人变成了守财奴。

孳息的投资促进了对自然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掠夺。如果从根本上讲这是不道德的，那么很明显，我们不应进行孳息的投资。对于导致了商品和服务领域的扩展的投资，也是一样。作为有社会意识的投资者，你不会希望为生命和大自然的货币化出力。

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原则。有时候，我会收到来自金融界人士的电子邮件，在读过我的作品后，他们发表了对有意识的社会投资或环境投资的看法。随后，我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建立一个投资基金，以零投资回报作为明确目标。出于某种原因，在我提出这项建议后，再没有一位金融界人士联系我了！然而，在利息为负的货币经济下，零回报率投资也可算是相当优厚的了。

我并不主张实现利他主义的时代，即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相反，我预见的是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融合。举例而言，当我把资金交给社群里的人时，我便激发了感激之情，这感激之情或许会诱发回礼，或者将礼物散播开去。无论是哪种方式，我都强化了我赖以生存的社群。当我们被包含进礼物的社群之中时，我们会很自然而然地将感激之情倾注到送礼人身上，并间接地倾注到整个社群上，我们会照顾最穷困的成员（礼物会寻找需求）。我们会赠礼给社群里某个未曾赠礼给我们的成员，而我们给予的欲望，以这种形式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将礼物看作是"投资"的一种形式，即便我们并不期望它能带来直接的回报。如果这个投资上佳，我们便是将赤裸裸的金钱裹进了美丽的外衣之中。若这个投资很糟糕，我们就是将金钱裹进了丑陋的外衣之中。如此而已。

未来的负利息货币，则将礼赠精神与经济上的自利结合起来，零息贷款则不再有作践之感。毕竟，持有货币带来的回报小于零。在这样的系统付诸实施实行之前，仍有些许时间。在这期间，以零利息贷款或者将资金赠予他人，显然违背了理性自利的原则。然而，这种自利是非常短视的，因为目前的货币制度可能会在未来数年瓦解，但礼物产生的感激之情的纽带，将在社会动荡中永生。如果你对“石油峰值”或其他崩溃之情形忧心忡忡，那么最安全的办法是置身于礼物的网络之中。现在就成为给予者吧。未来数年内，一万美元可能只是废纸一张。这是实现“‘今世’之所予，来世之所取”的另一途径。

如果你想创造一个丰饶、感恩、礼赠的世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用资金在这世上创造出更多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们得到的感激之情如海洋一样浩瀚，那么我们的社会便能承受任何冲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丰饶的世界中，却通过信仰和习惯，将它改造成了糟糕的世界。地球和精神已经满目疮痍，我们需要倾尽所有的礼物来治愈它，倾泻而出的礼物来自于感激。因此，产生于感激之情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你是否被认定为赠予者，无关紧要。最终，感恩的对象是我们自己的礼物、我们的世界、我们生命的给予者。

准备好迎接这个经济体，按照它的精神生活吧。不要带着获得更多金钱的目的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应该是将积累的货币作为一种礼物、一种旧世界传承给新世界的礼物、一种祖先传给后世的礼物。它类似于生命、母亲的乳汁、食物和感官刺激这样的礼物，以及所有将我们塑造为成年人的礼物，我们得到的、让我们成长和能够流传的礼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礼物的意识来使用金钱。如果你并不是一名投资者，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按照礼赠的精神正确地生活。

旧积累，新用途

富人会用他们的那堆钱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引出了更一般的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如何处置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呢？如果这些财富不是、或不再是“延迟的消费”，那它们会是什么呢？

让我们重新审视货币的本质。积聚于庞大的资金积累中的，到底是什么呢？货币包含了仪式性的护符，我们靠它来协调人类的意图和活动。拥有了积累的资金，就拥有了集中并组织社会劳动的能力。只有以非货币的领域为代价，货币才能够增长。但是，只要支出的目的不是寻求将社会和自然共有资源进一步地货币化，那么，货币支出就能够恢复非货币化的领域。金钱可以买来伐木设备，伐光一片森林，也可以用来保持和养护这片森林。购买伐木设备创造了货币，保持和养护森林则破坏了货币（因为它不会进一步产生货物和服务）。无论用哪种方式，积累的资金都赋予了协调大规模人类活动的能力。

几个世纪以来，对资源的利用产生了巨大的财富。置身于财富之巅，对于婴儿潮一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是出生于文明顶峰的最后一代人。他们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界。在旧世界里，他们（很多人）能够接触到旧世界的财富，他们也足够年轻，以至于他们的意识已经与新世界相融合了。我这一代一度被称作“X世代”（Generation X），却大不相同。即便是所受的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也从未涉足过旧世界。我们成年之时，旧世界已经如此颓败，我们已经不能在旧世界里大赚一笔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成年期的人，他们仍然可以相信“飞升”，完全参与到“人类的故事”中去仍是可能的：征服太空、征服原子、主宰宇宙，勇往直前。如果我出生在1957年，而不是1967年（或者，如果我的父亲没有让十几岁的我读到《寂静的春天》《1984》《美国大众史》），如果按部就班，今天的我肯定是某个大学的数学教授了。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我步入成年之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大众的故事”已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千百万我的同龄人，基本上已经远离了这个故事。当然，我有些以偏概全了，但这种说法却蕴含着真实。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已经成为了微软公司年薪百万的程序员时，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正在玩Linux呢。这不是将道德败坏归咎于微软公司的百万富翁

们！在他们的时代，生气勃勃、颇具远见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会为商业软件行业的发展而兴奋不已。对主流的政治、学术、艺术、科学、医药机构也是如此。当然，即使在那时候，对于有远见的人而言，“飞升的故事”的必然结局已经昭然若揭，正如千百年来，神秘主义者对之洞若观火一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危机太过遥远，人类至上的思想太过根深蒂固，使他们无法完全参与到“飞升”中来。

我所提及的社会动态，虽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象，但我认为，它们可被推广到一触即发的新世界中。与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们一样，世界坐拥海量财富，这些财富是千万年来文化和技术的最终产品。我们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设施，我们拥有道路和飞机，我们拥有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的庞大体制，它一直致力于人类疆域的扩张，自然疆域的征服。是时候将利息、支配和控制的工具用作“大同”和治愈世界的工具了。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富有的人们，财富的继承人们，大可以把自己的财富用在合适的地方，而不用担心财富会被其本源玷污。类似地，我们也有机会和责任，将统御地球而积累下的财富用在合适的地方。即使是基因工程和核裂变这样最令人发指的、最具剥削性的技术——它将掌控发挥到了极致，即便如此，它也可以被妥善地使用。利息的时代即增长的时代，它为自然或社会财富向货币的转换开疆扩土，它是所有新技术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基因工程使基因变成了可利用的天然资源，正如蒸汽机使深煤层开采成为可能，正如铁犁使得捣碎厚土块成为可能。若技术被用于相反的目的——恢复地球的健康，这样的技术会是怎样的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他们被从宫腔中赶了出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相同的、意识的转变，谁会知道，若技术不以盈利为目的，那它的使命是什么呢？若人类不再被迫扩张货币的疆域，我们会改变集体智慧，改变所积累的知识、信息和技术，使之与生态意识、联系性，以及愈合的目的相一致。这并不是说技术不会改变，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技术将被边缘化，退回为普通的应用，而边缘化

的技术，包括今天被驳回、被嘲笑的技术将脱颖而出。

对于累积的技术和累积的资金，我们希望不再以旧的模式使用它们。旧的模式将它们作为一种工具，实现与自然界的分离，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了“以钱毁钱”（using money to destroy money）的概念。我的意思是，用金钱恢复和保护自然、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公共资源，将它们恢复到金钱创生时原始状态。这会加速旧世界的崩溃，并减轻其崩溃带来的严重后果。“要么增长，要么灭亡”的原则制约着高利贷货币。任何过度商品化的社会或自然资本，都将加速高利贷货币的死亡；它“饿坏了政府巨兽”（starve the beast；指的是通过削减税收迫使政府减少支出——译者注）。可供（货币化的）商品和服务领域扩张的领域将进一步缩小。我们保护的、免受变成木材之祸的每一片森林，我们不再开发的每一块土地，我教授群其医治自身和他人之道的每一个人，我们拯救的、免受文化殖民的每一种土著文化，都使得可供货币入侵的疆域又减少了一块。虽然无法阻止机器前进的脚步，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的努力并未白费。举例而言，污染限制至少保证了一部分天空不被转化为货币的疆域，劳动标准至少部分阻止了工人福利的货币化，反战运动降低了战争业务的得利。右翼人士对保护环保、改善劳工待遇、反战政策的批评是对的，它们确实损害了经济增长。如果我探访土著部落，说服其民众，自给型农业是有辱人格、原始落后的，并诱导他们去工厂上班，加入市场经济，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将上升（我还创建了一个“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我激励人们放弃高薪工作，回到土地，那么国内生产总值会下降。如果我创建一个社群，我们不再支付托儿费用，而是照顾彼此的孩子，那么国内生产总值会下降。如果我们能成功保护阿拉斯加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使之免遭石油钻探，那么几十亿美元将永远消失。这就是我所说的“以钱毁钱”。有些时候，解铃还需系铃人。

审视它的另一种方式是，这些保护共有资源的努力，提高了我们在新世界尘埃落定之前必须跌落到的“谷底”。我有意使用了“上瘾恢

复”（addiction recovery）的语言。高利贷货币的机理与成瘾的机理类似，它要求不断加大剂量（共有资源）以保持正常状态。为了注射一剂毒品，需要将更多的福利基础转换成金钱。如果你的朋友吸毒成瘾，那么通常的“帮助”——给他资金，给他一辆汽车替换掉他撞坏的那辆，给他一份工作代替他失掉的那份，将毫无益处。这些资源只会被毒瘾的黑洞吞噬掉。政客们妄图延续增长年代的努力，与之无异。

经过几代行善者的努力，我们仍然保有一部分神圣的遗产。土壤中仍然留有良善（源自英文The roots of all goodness lie in the soil of appreciation for goodness. 对善的欣赏，是培植一切善根的土壤——译者注），四处仍有茁壮的森林，海洋的某些区域里仍有鱼，仍有尚未完全出卖健康和创造力的人民和文化。剩下的自然、社会和精神资本会助我们渡过转型期，形成治愈世界的基础。

如果你是一名投资者，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创建联系、产生感激、收复并保护共同财富上了。财富保值的思维定式已经过时。财富保值使我想起一大群老鼠，为了爬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只的桅杆，竞相爬到其他老鼠的头上。其实，它们可以齐心协力，将船只的碎片收集起来，建造一只木筏过海。对我们而言，前面的旅程还长着呢。

生活之道

适用于投资之道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生活。事实上，投资之道与生活之道是同一事物的正反面。如果投资之道是将金钱作为一种礼物，支持更美好世界的创建，那么生存之道便是接受这份礼物，创建美好的世界。

传统的职业之所以得到货币报酬，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扩大货币化的疆界。我们发现，为了赚钱，我们必须参与转换，将真、善、美之物转化为金钱。这些皆拜货币系统所赐——信贷最终属于那些能够有效创造新产品和服务的人（或者从创造者那里取得新产品和服务的人）。以货

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产生了一种系统性的压力，它使共有财富被转换成了金钱。能够以最高效率进行转换的人，将获得最高的薪酬。想要发财吗？那么发明一种方法，让伐木更加高效吧；创造一场广告宣传活动，说服其他国家放弃本土饮料，改喝可乐吧。在了解到了全球经济的运作之后，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决定对其敬而远之。我每时每刻都会收到他们的来信。“我不想与这有任何瓜葛，我只想用我喜欢的方式做事，不伤害任何人。但这无法给我带来金钱。我该如何生存呢？”在这个世界里，毁掉你希望创造的事情会得到奖励。你连生存都成问题，谈何用更多的钱去做伟大的事呢？

幸运的是，有一些人会给你资金，让你去做一些没有酬劳的事情。这些人（或组织、政府）遵循着“投资之道”的精神。当然，如果为了对你行善，这些好心人必须更努力工作（做着毁灭的事情）赚取金钱，那么靠着他们的善心过活绝不是解决办法。人类的巨大财富是以多种形式存在的。几百年来剥削压榨所积累的财富，现在可以被用于其他目的了，例如保护和恢复自然、社会、文化和精神的资本。这样做并不会创造出更多的钱，因此，无论为这些事情支付费用的人是谁，他都是在赠送一件礼物。

换言之，“生活之道”的关键是以礼赠为生。礼赠是形式是十分微妙的。举例来说，假设你销售公平贸易产品（fair-trade products），若有人买下一件产品，出价是血汗工厂产品价格的数倍，那么这种成本上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一份礼物[3]。他们并不需要支付那么高的价钱。如果你的工作是安装太阳能热水器，或为无家可归者建立避难所，那么你的工作也是一份礼物。许多传统的社会服务工作（如社工、教学等）都体现了礼物的能量，当然，前提是它们对吞噬地球的机制毫无用处。例如，它们不会将孩子们培养成高效的生产商和盲目的消费者。货币的来源可能是买家、基金，甚至政府。使礼物成为礼物的，是它的动机——它的

3 “公平贸易”在许多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掩盖了通常的劳动剥削和对文化的商品化，但这一原则仍然适用。

目的并不是得到最实惠的价格，也不是产生更多的货币回报。而传统的职业与之相反：我付给你工资，并从你的生产力（可销售的商品和服务）中获利，而且获得的利润要超过你的工资。传统的职业成为了将世界化为金钱的帮凶。

任何缩减货币疆域的努力，都可以通过礼物来实现。如果你提供再培训课程，培训整体医疗的医师，讲授永续农业，那么你终将缩减商品和服务的疆域。对于你因此得到的货币收入，若追根溯源，那么在这线索的某处，或许某个人的“投资不利”，违反了货币创造的原则：“资金属于那些能够使其增值的人。”扭转将生命和世界货币化的局面，并不能创造出金钱，这一点也不意外。

如果你对上述原则持有偏见，你可能会说，生存之道应该二者兼具。它将你的时间、精力引向可以提高、保存或恢复共有财富的方面，作为回礼的货币（或其他形式的回礼），则不再危害自然和人类。简言之，货币有利于其他生命，不会伤害众生。但是，我并不墨守原则，也不推崇墨守原则。我会计算出印刷这本书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吗？一方面，它用掉了木浆；另一方面，它或许会启发大众，创造出令地球持续发展的系统。人们善于做出与他们的原则相一致的选择；但是，如果所做的选择与原则差异太大，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原则，并假装他们一直秉持原则。

因此，对于生活之道，感觉好、感觉对，就行。你可能会问，如果售卖牙膏、在对冲基金工作、设计核武器，感觉都好、感觉都对，那该如何？我会说，那就放手去做吧。首先，随着你对世界的认识增长，这样的工作可能不再让你感觉好、感觉对。第二，你会让自己适应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会指引你，在恰当的时候辞掉那份工作，去做一些勇敢的事情。第三，为了原则而压抑内心的渴望是“飞升的故事”和征服自然的一部分。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欲望是邪恶的，为了高尚的目的，我们必须战胜欲望。这种观点正是“飞升”在我们内心的体现。因为负担不起而压抑慷慨的思维定式，与之如出一辙。我所支持的自我信任（self-trust）与第1章所

提到的本书的基本前提是密不可分的。这一基本前提是：我们在感恩中出生，在给予的需要和给予的欲望中出生。

换言之，请相信，将世界转换成金钱，并不是你的真实愿望。请相信，你希望用你的生命去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对于生活之道，我们应该着眼于我们的需要以及给予的意愿。我们应该用“我应该在什么场合下给予呢”以及“怎样送出礼物才最合适呢”这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将这个念头留在心中，机会便会不期而至。很快，一旦你没有将生命之礼用在对你有益的地方，你会觉得难以忍受。

如果仅让家人温饱便让你“感觉良好”，那么没有关系。服务的态度才是关键。如果你为了尝试生活之道而心存愧疚，你很可能会以虚假的生活之道而告终。一些非政府组织（NGOs）只是庞大的面子工程，它们只是挖空心思让人们认可自己罢了。这全是自我惹的祸。生活之道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得到正面的自我形象。人们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保守、伪善、自以为是。生活之道的目的是给予你之所能，追求你之所爱。这个概念应带给你自由之感，而不是道德负担，它并不是为了得道而行善。

为了更深入了解生活之道，每一天都躬亲服务吧。相信你给予的欲望，记住给予的乐趣，抓住给予的机会，尤其你只差一点勇气的时候。如果你的勇气不足，不要折磨自己。阻止你给予的恐惧，并不是敌人。它们会形成一个安全的小茧。一旦我们长大，曾经具有保护作用的恐惧就会变成束缚；我们开始躁动，试图挣脱它，这种躁动会带来新的勇气。今天，这一成长过程发生在了整个人类身上。曾经让我们“感觉良好”的飞升的计划——推进科学前沿、征服宇宙、战胜自然——不再正当，因为野心带来的苦痛后果已经难以承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时刻，旧世界已无法容忍，而新世界尚未显现（尚未成为共同的愿景，尽管它已经存在于许多人心中）。

所以，就生活之道与投资之道而言，让我们温和些吧。对于自己

也好，对他人也好，让我们相信给予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们相信推动我们给予的自然成长过程吧。不要让自己和他人带着负疚感去生活、去投资（从而产生对伪善的抵制），我们可以提供给予的机会和鼓励，在得到他人的礼物时，不要吝惜我们的感激和赞美。他人并不是“不明白这一点”的、自私、贪婪、无知、懒惰的人，而是希望对世界做出贡献的神圣的生命，若我们能够如此真切地看到这点、提及这点、了解这点，那么我们的认识会成为一封请柬，邀请我们自己和他人了解这一真相。

第21章

Chapter 21

礼赠中的工作

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是如此诡异。每个人都不明缘由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短暂停留，有时看似是为了神圣的目的。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有一件事是我们明了的：我们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信任的感恩

在当今的货币经济中，在分享礼物的同时，如何维持生计？这问题反复浮现。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艺术家、术士、激进分子，他们为了找到一种能为所做之事“获得报酬”的办法而绝望不已。已经在商业和职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士，已经开始感到，他们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颇为不妥。

事实上，对服务甚至物质产品收取一定的费用，都违背了礼赠的精神。以礼赠的心态来看，我们应将我们的创造作为礼物，赠予他人或者献给世界。事先指定回礼违反了礼赠的本质，它不再是给予，而是一种以物易物、一种销售。此外，许多人，特别是艺术家、治疗师和音乐家，他们认为其工作是神圣的，其灵感来自于神赐的来源，承载着无限的价值。为它定价，感觉像是一种贬低、一种亵渎。但可以肯定的是，艺术家应该因为他的工作而获得补偿，难道不是吗？

“补偿”背后的思想是工作牺牲了你的时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本可以花在你想做的事情上。另一个使用“补偿”的场合是在法律诉讼中，例如，有些人寻求对伤病、痛苦、苦难的补偿。

在一个值得被冠以“神圣”之名的经济体中，工作将不再是对时间和生活的损害，也不再是痛苦与折磨。神圣经济能够识别出人类对工作的渴望：人们希望将生命的能量用来表达礼赠。在这里，“补偿”毫无意义。“工作是快乐和感恩的缘由，最好的工作是无价之宝。”因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的绘画而补偿他，或者，因莫扎特谱写了安魂曲而补偿他，对你而言，难道不是种亵渎吗？任何有限数量的金钱，都不足以交换神圣之物。提供最卓越作品的唯一合适的手段，就是将他们赠送掉。即使我们没有莫扎特那样的天分，我们也能够胜任神圣的工作。通过我们的技能，我们能够传播比自身更伟大的东西。有些东西经由我们成形，将我们作为它们在地球上表现的工具。对这样的工作而言，你能体会到“补偿”的概念是何等不相干吗？将神圣的创新卖掉，你会有耻辱感吗？不管是以什么价格，你都卖空了自己，卖空了礼物的源头。我喜欢这样说：“良品，沽之则贱，赠之则宜。”

读者问立刻产生疑惑。尽管有上面的讨论，你仍然会想，“艺术家因为其作品而得到补偿，难道不应该吗？”可见离析是如此根深蒂固！换种方式表述，就是：“伟大礼物的赠予者，难道不应得到伟大的礼物作为回报吗？”只要“应得”有所指的话，那么赠予者就应该得到回报。在神圣经济中，通过感激而非强迫的机制，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出售者的态度是“只有你付钱给我，或者你给我让我认为值得之物，我才会给你这份礼物。”（然而，无论价格多高，卖方总会嫌少。）送礼者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认为，“我会送出一件厚礼，我相信你会给我你认为适当之物。”如果你送出了一份大礼却没有得到感激，或许是你送错了对象。礼赠的精神会应需求的召唤。礼赠的目的并非激起感激之情，它只是“礼物送给了应得之人”的标志和指标。某些精神的教谕认为，真正慷慨的人会不求回报，甚至不求感激。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让我们现实些吧。在我纠结于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虽然我并不情愿对作品收费，但接受于因我的作品而心存感激的人，是不错的。每个人的感恩程度都是独一无二的。我无法事先知道这本书对你有多宝贵，甚至你事先也无从知晓。因此，为事先并不了解的东西支付费用，与礼物的精神背道而驰。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 我之前为何会说，服务费会切断感恩的力量呢？现在这点更清楚了。原因是，在一般意义上，这种转换不能提前结清。我们无法预料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甚至无从知道，我们是否会得到劳动果实。感恩则需要一种未偿还的债务，只要这种负债感存在，我们就会继续感恩下去。如果负债感终止，我们便不再感恩，这并无不妥。出售有感化力的礼物（transformative gift）是对这种关系的伪造，它意味着回礼已经送出，但实际上只有当转换完成时才能送出回礼。预付的费用终止了礼物的影响力，弱化了它作为变革媒介的影响力。通过市场提供的治疗与精神体系（spiritual system），会从对痛苦的厌恶而非从更高境界的吸引力那里，汲取转化所需要的能量[1]。

因此，我尽力使我的工作与礼赠的精神相一致。例如，我尽量将我的作品、录音和录像免费发布在网络上，并邀请读者给出能够反映他们感激程度的回礼，这回礼不一定要赠给我个人。如果他们感谢的是使我的作品能够成文的宇宙，或许“通过传播来支付”（pay it forward），是更为恰当的方式。

在我的公开演讲中，我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当被问及我的出场费用时，我便回答，我不收取费用。一般而言，我只要求能够抵补差旅

1　刘易斯•海德，《礼物》，66页。

费，除此之外，我会说，“这取决于你。无论数量多寡，或分文不予，请保证你付出的钱让你有清偿、平衡、适宜的感觉，保证它反映了因我的到来而产生的感激之情。”这并无特定的模式，而是一种适应于各种特殊情况的精神。如果他们已有演讲者的酬劳标准，我也不会要求被特殊对待。有时，对方会直接与我沟通他们希望付我多少酬劳。哪里有需要，我就把我的礼物送到哪里。货币只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方式之一。

重要的是，不要让“生活在礼赠中”成一件圣物，或者将它变成一种美德的标准，不要为了行善而赠礼，不要为了感觉良好而赠礼。如果你发现自己（像我一样）对一笔数额巨大的支票开心不已，没关系！人们在收到厚礼时，都会开心不已。即使你发现自己吝啬、心怀怨恨、贪婪（我有时也会如此），注意就好。复归礼赠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离开它已经太远、太久。我把自己看作崭新（也是老旧的）疆土上的众多探险家之一，从他人和自己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我在开办隐居所时，只收取食宿和其他自付费用，并且请求人们赠送礼物[2]。这种模式实际“运转”起来花了一些时日。对于那些丝毫不予的人，我可以阐述冠冕堂皇的原则，使用强迫或操纵的手段，使这些人的捐赠超出有感而发的赠予；或者，我可以巧妙地让这些人“负疚”，暗示我遭受了疾苦、做出了牺牲，或因为贫困而导致了权利丧失。若如此，那么我并未按照礼赠精神来生活，而是在以一种稀缺的心态或者乞丐心态活着，这好比礼赠的源流瞬间枯竭了一般。人们不仅不会给予，连我自身礼物的源泉也会枯竭。

只要礼赠的目的是真实的，那么礼物的流入一定与礼物的流出相等，甚至超过它。有时候，回礼的载体是神秘的，它只能间接溯及所赠之物，甚至完全无迹可寻。然而，它承载了最初的赠礼所表达的精神。在我收到的礼物和送出的礼物之间，也只是偶尔存在细微的同步性

2 为什么我要收取费用抵补成本？这是因为，我将这件事视为“同创之作”（cocreations）。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这并不属于感恩的范畴，它属于同创的范畴，即为了实现一个目的而将资源汇聚起来。

（synchronicity，卡尔•荣格将有意义的偶合性或同时性称为同步性——译者注）和符号。理性的头脑认为，回礼与赠礼毫不相干——“无论如何，我总会收到礼物的”，但是心里则不这么想。

当我们踏上以礼赠为基础的谋生之道，由于回礼的到来要略迟于送礼，一段时间里，我们会生活在信仰之中。因为回报并无保证，我们会了解到我们是否是认真的。自我缠斗着、挣扎着，试图找到有保障的利益。若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或许我可以做广告宣传我的慷慨以博得赞美。也许我可以暗自庆幸，与那些给予少于我的人相比，我是多么出众。以我的经验，迈向礼物的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我们必须真真切切地放手，否则绝无回头之路。

礼赠中的商业

现在，让我们把礼赠模式应用到其他商业模式中。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在以创造性的方式实践礼赠经济。我并不妄称我的模式是最好的或唯一的途径。我们正在开拓一种全新的经济，通过试错找到正确的途径。在稍后的例子中，人们将按照一或两个关键的礼赠原则经商：（1）确定“价格”（回礼）的是收礼人而不是送礼人；（2）回礼是在最初的礼物收到之后确定的，而非之前。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羯磨诊所（Karma Clinic）一直在使用整体医学的方法治疗患者，这种治疗以礼赠为基础，持续两年。在会诊或治疗后，患者会收到一份“账单”，上面写着：

> “您的会诊是某个人送出的一份厚礼。如果您想以礼赠的精神继续将它传递下去，您可自行选择传递的方式。请您将钱物等礼物放入羯磨诊所办公室的礼品盒中，或者邮寄给……”

在俄勒冈州阿什兰，建立了另一家名曰礼赠树（Gifting Tree）的、以礼物为基础的诊所。类似的诊所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它们经营状况也相当不错。例如，在维多利亚协调中心（The Victoria Attunement Center），据其创始人威尔金森（Will Wilkinson）所说，从1982年到1988年，中心完全靠捐款支持并完全实现了资金自给，每月有超过300名患者就诊。

礼赠模型也被应用到了餐厅的经营中。例如，2003年于盐湖城开业的“同一个世界”餐厅，2008年于丹佛开业的SAME 咖啡馆（So All May Eat），2009年于新泽西州年开业的“更美好的世界”咖啡馆，伯克利的“羯磨厨房”等，都靠捐款来维持经营，很多店家还售卖有机食品。

最近，这一想法被纳入主流。全国餐饮连锁店“帕纳拉面包”（Panera Bread）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开设了一家“随便付”（pay-as-you-want）的分店。这家店的菜单与其他分店完全相同，只是菜单上的价格仅作参考之用。顾客被要求支付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柜台上的指示牌写着，“取你所需，付你应付。”若这个实验成功，该公司计划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全国各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开创的不仅是一个公民道德的模式，更是未来的业务模式。

在互联网上，巨大的礼物经济体正在蓬勃发展。各种主要软件都有免费版本。办公软件OpenOffice由数百名志愿程序员协同开发，不收取任何费用。这里，使用“免费”一词令我很是犹豫，因为它意味着拒收回礼。而OpenOffice组织接受捐赠，并鼓励那些已经下载了软件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

很多乐队都提供“免费的”在线音乐。礼赠商业模式的先驱当属Radiohead，它以“随你付”的方式提供2007年的专辑《彩虹里》。虽然近三分之二的下载者未选择支付任何费用，仍有成千上万的下载者支付了费用。通过iTunes、CD和其他渠道卖出的拷贝多达几百万份。评论家认为销售的成功只是特殊情况，它有赖于Radiohead的偶像地位。尽

管如此，这一模式正在不断扩散，尤其是在音乐行业。因为对于大多数乐队而言，使用传统的分销渠道变得愈发不切实际。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已有律师事务所将“随你付”融入了业务之中。“从价税法律集团”（Valorem Law Group）是一家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实验性律师事务所，它在其账单中增加了一个“价值调整线”。在账单底部的“欠费总额”空白框上方有一个“价值调整”框。客户填入一个正数或负数，然后据此调整最终费用。我对这家公司充满了敬佩，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大胆的：有人可以填入负的金额，对全部费用进行“调整”，然后分文不付，而这家公司甚至没有追索权。

我们可以将这些例子概括成一个广泛适用的商业模式。它的基本原理非常简单。第一个指导原则是，收取能够抵补直接成本的费用。它包括边际成本、分摊的固定费用，但不应包括沉没成本。举例而言，如果为某人铺设管道，你会收取材料费（成本加价为零）、到达现场的燃料费、使用资本设备一半天的补偿（如你的卡车贷款、商业贷款等）。你会清楚地告知收礼人，你的时间、人力和专业知识是一份礼物。账单应该包括总成本，外加一个标有“礼物”的空行，下面才是“总计”。

这种模式的一个变体是，按照“从价税法律事务所”的做法，同时列出一个反映市场价格的费用。这个价格下方有一条“价值调整”线或“感激调整”线。大多数人只会支付市场价格，但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对服务特别满意或特别不满意，他们可以对费用进行调整。

另一种变体是，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应列明各个类目，如“材料成本”、“经营费用的分摊成本”、“劳动时间”、“服务的市场价格”，等等。收礼人可以选择一文不付，或仅支付材料费，但至少他掌握了这些信息。与前文提到的、羯磨诊所中的注意事项一样，这些信息是一份“礼物”。传统上，礼物与故事往往相伴而生，故事有助于收礼人了解礼物的价值。

礼赠商业模式与标准的商业惯例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区别。今天，说“你看，这是我的成本，我的价格不能比它低了”是一种通用的谈判策

略[3]。改口说，“这是我的成本，您可以根据您认为您得到的价值支付费用。”这种转变并不大。通常，客户对你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有较为准确的估计，如果业务关系中包含了真正的博爱之情，那么他们支付的价格会与真实的价格接近。如果他们在基本费用之外又支付了额外的费用，多出来的这部分费用可以被认为是感激之情的表示。如果有人因你的给予而感恩，你会希望给予更多。如果有人忘恩负义，你便会了解到，礼物并未被完全接受，你也不会再送礼给那个人了。

在商业关系上，这意味着，对于那些除成本之外一毛不拔的人，你不会再同他们有商业往来了，你会优先同那些用货币来表达感激之情的人做生意，这是理所应当的。有些人比他人更需要我们的礼物。如果你有面包，你会把它分给饥饿的人。对方表现出来的感激，会让我们以最佳的方式表达我们的礼物。今天，企业会与那些肯付最高价钱的公司做生意（虽然用非货币性的方式表达感激之情也可以发挥作用），但是，这同与支付最优价格的人做生意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是问题的关键。为与礼赠精神保持一致，价格并不事先报出。首先要送出礼物，只有接受礼物之后，才赠送回礼。

我不禁注意到，这种方法与对利他主义和重复囚徒困境问题的博弈论研究相类似。相关背景知识可查阅维基百科有关“针锋相对”（tit-for-tat）的内容。孤立实体之间重复互动，因为对背叛和合作的选择而得到不同的支付（payoff）。最佳的策略是首先合作，然后报复那些上一次未合作的实体。按照类似的推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所概括的商业模式会比标准的模式在财务上更为成功[4]。

今天的我们对礼赠的心态是如此陌生，按照礼赠精神经商，有时需

3 当然，真实成本会比人们宣称的低。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就会产生其他成本（如闲置设备、闲置员工产生的固定成本）。

4 仅当商业关系在社群中发生时，这些原则才适用。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一次性交易中，礼品模型就不那么可行了。在古老的礼赠文化中，情况大致如此，以货易货时通常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不过，我发现，即使交易是一次性的，大多数人仍尊崇礼赠的精神。我们觉得自己是无所不包的社群的一部分，即便我们的礼物是匿名的，也在社群的见证下发生的——会是如此吗？

要一点启发。我发现，如果我刊登广告，将某件事称为“捐赠”，人们有时会将礼物作为一种一次性的即用即抛之物。人们会认为：“既然不收费，那么这东西的价值肯定不高，也不是很重要。”人们会迟迟不领取礼物，或者对礼物全然无视，即便领取了礼物，也只是抱着很低的期望。支付费用是一种仪式，它发出的信号是“这是个有价值的东西”或“我是动真格的”。为了找到更好的方法，既能产生支付带来的好处，同时坚守的精神的礼物，我和许多人仍在试验。我们处在新时代的开端，因而需要多实践、多试验。

显然，在写作本书之时，大多数企业主和公司老板并不打算采用以礼赠为基础的商业模式。这没什么——你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单方面实施这种商业模式吧！你可以“偷取”他们的产品，如非法下载或复制音乐、电影、软件这样的数字内容。如果你对它们的创造者心存感激，寄给他们一些钱吧。如果你也如此对待本书，我会非常欣喜。我并未主张标准的版权（我敢打赌，你并未仔细阅读版权声明页，不过它并不是普通的空话），对网络上的内容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不存在非法下载和复制的问题。然而，如果你设法“偷取”了这本书，若我能收到一笔钱，它反映了你的感激之情，我会非常高兴。虽然我或出版商设定了一个反映它对你价值的价格，然而这笔费用有所不同。每个人的阅读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阅读它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浪费时间，但它却会改变另一些人的生活。对所有人索取相同的回礼，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神圣的职业

对于那些提供无形价值的职业，采用礼赠的模式是自然而然的。音乐家、艺术家、性工作者、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教师都提供礼物，一旦对这些礼物定价，这些礼物便会贬值。在提供神圣之物时，将它以礼

物的形式送出是唯一高尚的做法[5]，再高的价格也不足以反映出无限的神圣性。询问一名演讲者出场费的数额，礼物的价值就会降低。如果你是上述行业的从业者，你或许会尝试礼赠的商业模式——但请记住，这个模式并不是个更聪明的“赚取费用”的方式。人们会察觉到虚假的礼物，而虚假的礼物并不是礼物，只是获利的幌子罢了。

对于上述职业，有形之物是无形之物的载体，无形之物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必须处于礼物的疆域之中，这对任何行业皆然。总有些事物无法被量化，它超越了商品，超越了价格。因此，每个行业都有神圣的潜力。想想农业的例子吧，是什么使得有形的粮食变成了神圣的载体呢？

- ◆ 粮食由那些密切关注它的生长和美学特性的人所种植。
- ◆ 它的生长使得生态环境、土壤、水、生命更加丰富。
- ◆ 它的粮食的生产和加工增进了社会的健康。

换言之，神圣的食物被包裹在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它在人类和地球之爱的沐浴下成长，这种爱并非抽象的爱，而是对这片土地和这些人的爱。在接收到匿名、不能产生人情联系的善款时，我总有点冷冰冰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法匿名去爱。居然有人为我种植神圣的食物！

若认为我们的工作是神圣的，我们就会努力把它做好，而不是为了某些外部的东西把它做得“足够好”。这些外部的东西包括市场、建筑规范、等级。一名做着神圣工作的建筑工，他所使用的材料以及采用的方法或许会隐藏在墙壁之中，几个世纪无人察觉。他从中得不到任何合理的利益，只是这样做能够产生满足感罢了。对于支付高于市场工资

5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上，有些职业的运作方式介于付费和礼品之间。艺术家和音乐家会得到赞助人的支持。赞助人付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可以工作。这使得在著作版权产生之前，莫扎特这样的人也能够生存下去。长期以来，名妓们也在类似的模式中工作，她们从固定主顾那儿得到礼物。

的企业所有者，以及设定远超环境标准的制造商而言，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获利，他们并无理性的预期，但他们仍然获利，这种获利有时完全出乎意料。意外的收益与礼物的本质完全吻合，正如海德•刘易斯（Lewis Hyde）所说的那样，一件礼物“消失在拐角处”，“去到神秘的所在”，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何种方式回报我们。

对于来源于玄妙的意外收获，领悟它的另一种方式是：当我们按照礼赠精神生活时，会发生奇妙的事情。礼赠的心态是一种信仰、一种放任，它是奇迹的先决条件。因为礼赠，我们变得无所不能。

在俄勒冈州，我遇到了一名男子，他拥有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专门从事低收入老人的护理。他说，“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业务。”这项业务受到医疗机构、保险公司、政府管制、居民贫困状况、金融动荡等各种互相冲突的压力的制约，他的公司一度岌岌可危。在我拜访他的那一周里，他的两个最大竞争对手恳求他接受他们赔本的服务。然而不知何故，这名男子的业务已经开始盈利，并不断增长。他建立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工作场所和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为整个行业树立了典范。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说，“每一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都会面对一堆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我无法想出任何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只做我唯一能做的：躬亲服务。然后，像变戏法一般，解决方案就落在我头上了。”

躬亲服务的人是艺术家，视工作为神圣便是躬亲服务，成为它的工具。更具体地说，甚至有些矛盾的是，我们成了我们所创造之物的工具。无论是材料、人，还是社会创造，我们把自己谦卑地置于已经存在、尚未显现的服务之中，只有艺术家才会对他的创作产生敬畏。当我大声朗读《人性的飞升》时，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本是写不出这本书的。”这本书是经由我而出生的、独立的实体。与其说是我创造了它，不如说是像父母创造婴孩那般，或者像农人种植菠菜一般。父母和农人传递着生命的脉动，他们为它提供了生长的场所，但他们并不了解、也无需了解细胞分化的细节。我为我的书籍提供了可能得到的资

源，历尽万难将它从我脑海的宫腔中娩出，使它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命。我熟悉它的每个细微之处，然而我始终感觉，它早已存在，它早已超越了我的巧思。父母能够合法地将孩子的成就归功于自己吗？不能，那是一种盗窃。我也不会将我们作品的美好归为己有。我听从他们的吩咐，为他们服务。

基督教作家托马斯•潘恩、亨利•乔治应用于土地的逻辑，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劳动成果。人类果实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我们自身——我们是听候其差遣的管家，就像我们是土地的管家，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一样。土地赠予我们果实，我们将果实赠予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礼赠的精神深深吸引了。我们怡然自得，因为我们与真理同在。它打开了超出我们巧思之外的财富之源流。这就是伟大的想法或发明的由来："它向我走来。"我们又怎能拥有它，又怎能推定我们拥有它呢？我们只能将它赠送出去，保持礼物流通渠道的畅通。通过这个渠道，我们会从他人和"一切万有"（all that is）那里收到各种神圣的礼物。

对于很多神圣的职业，旧的模式已不再适用了。这是向礼赠商业模式转变的一个激励。宾夕法尼亚州的小城哈里斯堡绝不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地方。尽管如此，仍有数以百计的整体医学、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的从业者在当地的"整体医学健康网"（Holistic Health NetWorker）上做广告。数百人或者至少一半的人正在开展中草药研究项目、瑜伽治疗方案、自然疗法、催眠治疗、天使疗法、水晶治疗、极化疗法、灵气、颅骶骨疗法、整体营养、按摩疗法，等等。他们最初对于未来职业的想象是，坐在办公室里或者整体医疗健康中心里，对每个前来治疗的"客户"收取85元到120元的费用。只有少数人会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学校和培训项目还是在不断地培养从业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迟早会放弃"客户进程模式"（client-and-session model），转而以礼赠的方式提供他们的技能[6]。

6 这个趋势朝着医学普及方向发展，将愈合从货币领域移回到社会共有资源上。

这些行业的情况同样见诸于其他行业。我们可将之归为产能过剩、债务负担沉重、“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或其他经济因素。事实上，旧的盈利模式已经岌岌可危。与整体疗法的从业者一样，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即将别无选择，只能全盘采用另一种模式。

在旧的经济中，人们工作、选择职业的目的是谋生。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太过神圣而不能出售的物品，太过神圣而不能收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如果是为了生存而工作，例如在中国的铅矿工作，那么为了获得最优劳动报酬而讨价还价并无不妥。换言之，只有自己的生存和亲人的生存才是神圣的追求。

我想在讨论中穿插一些温和、现实主义的论调。请不要以为我主张利他主义或自我牺牲的圣人标准。你并不会因为接受减薪而获得上天的恩赐。如果生存或安全是你关心的主要问题，那么对你而言，“工作”或许并不是表达礼物的途径。那么你的工作不过尔尔，只是一份“工作”——你做这份工作主要是为了钱。若你毫无经济上的压力，你会辞掉这份工作或者跳槽。甚至你会有被欺骗之感，觉得你是在为钱过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就像被迫工作到死的奴隶一样，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战胜恐惧并辞掉工作。以礼赠的精神生活，对于成为好人而言，并不是另辟蹊径。在我们与个人的持久缠斗中，恐惧并不是新的敌人，它也不是罪恶的妖怪与自我（ego）的继承者。神圣经济是人类生命波澜壮阔变革的一部分：在内心层面上，它是与自我斗争的终结；在外部层面上，它是与自然征战的结束。这是新时代的经济层面，是大同的时代。

如果你发现自己累死累活地工作，为了金钱操劳，做到了“足够好”而不是“尽善尽美”，我建议你换掉这份工作。但当且仅当你已经做好准备，我才建议你换掉这份工作。就现在而言，你或许会将你的工作视为一份礼物，它给你安全感，只要这份工作成了你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尽管很多精神导师将恐惧称作敌人，但实则不然。有人说，“恐惧是爱的对立面”，也有人说，“恐惧是冷若冰霜的喜悦”。事

实上，恐惧是使我们在安全空间中成长的监护人。你甚至可以说，恐惧是一份礼物。随着我们不断成长，曾经具有保护性的恐惧终将成为束缚，我们将渴求新生。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相信你自己。当你的愿望战胜了旧的恐惧，进入一个更宽敞、更明亮的疆界时，你会继续相信自己。当新生的那刻来临的时候，你将不能自已。

结束行善的纠结同样意味着，给予并不会带来牺牲或克己之感。我们给予，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予，而不是因为我们应该给予。感恩是对接受的认同，是回报的愿望，是希望付出的愿望，是我们天生的默认状态。生命、呼吸和世界都是礼物，难道不是吗？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也超越了我们的巧思，难道不是吗？在礼赠中生活，是对我们真正本质的重新回归。

当你拥有礼赠的心态时，让你的感觉引导你吧。让给予因感恩而生，不要希冀用某些美德的标准来度量。或许第一步是微不足道的：多送赠品，不图报酬地帮点小忙。或许当你开办公司时，你会将公司的一小部分转换为礼赠模式。无论采取何种步骤，你应该清楚，你是在为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

第 22 章

Chapter 22

社群和不可量化之物

经济学最有用的地方，在于它让经济学家有事可做。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在本书的前述章节中，我描述了社会中的疏离与孤独。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商业的雇佣关系所取代，远方的陌生人生产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物料；我们总是可以“雇佣别人为我们做事”；心照不宣的“我不需要你”弥漫在社交之中，使聚会变得空洞、次要。这就是文明的巅峰，数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的强弩之末：人们居住在小盒子一样的房子里，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里，依赖货币生活，受着债务的奴役。维持这样的生活需要不断消耗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我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群，因为社群需要靠赠予来维系。当我们用金钱购买一切所需之物的时候，又怎能奢望社群的出现呢？

建立社群并不是我们的另一种需求，也不是食物、音乐、爱抚、智慧之外的另一种生理或精神的养料。社群产生于对这些需求的满足。如果一群人并不相互依赖，那么社群就不会产生。因此，不依赖他人而满足需求的生活，是无法产生社群的生活。

缔造了社群的礼赠并不是肤浅的虚饰，它们必须满足真实的需求。只有当礼赠激发出了感激之情和责任意识时，才会让大家休戚与共。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建立起社群是如此困难，因为我们习惯于用金钱

来满足所有的需要，我们已经没什么可以给予的了。如果你送给他人一件别处可以买到的产品，那么你要么给了他钱（你帮他节省了他自己购买所需的钱），要么送了一件他不需要的东西（他可能已经买过了）。这两种情况都无益于社区的建立，除非在第一种情况下，你的这位朋友的确很需要钱。所以，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容易建立起稳固的社群。其原因是，穷人有许多未被满足的需求，这是我在穷困潦倒时发现的最重要经验之一。那是在我所著的《人性的飞升》刚刚出版之后。出于必要，我接受了许多人的馈赠，却不用担心会债务缠身。我所接受的帮助唤起了我原始的、孩童般的感激之情，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依赖于周围的礼赠网络了。这张礼赠之网也让我变得更加慷慨，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历破产、流离失所，沦落到要和我的孩子们一同寄人篱下的地步。实际上，接受他人的帮助并无不可。经济低迷吞噬了我们对正常时期的幻梦。而经济低迷的一个优点是，它会唤起更多人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接受了他人免费的帮助。与在幼年时一样，在无助的岁月里，礼赠原则将我们重新联系在了一起。我还了解到，那些曾经疾病缠身、茫然无助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感悟。

当我意识到，正是金钱取代了馈赠网络的功能而让社群分崩离析时，我认为，恢复社群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货币经济，甚至应该放弃经济和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我认为，重建社群的唯一办法是继续采用以前看似“困难”的方法来做事，也就是万事亲力亲为，不依赖机械。既然社群瓦解的原因是因为陌生人的生产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那么我认为，要复原社群就必须回归看似低级的生产，回归那些不需要全球劳动分工的生产。

当然，为了重建社群而放弃今天的所有，是愚蠢的。这样做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体会出其中的虚伪。被满足的需求不再是真实的需求，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需求。比如说，若在一个小时之内便能用桌锯锯好一块板材，却非要人用普通双人锯花两天来完成，还美其名曰“促进人际交往”，岂不是一大骗局。人为的

依赖并不能消除人为的隔阂。降低做事效率让大家彼此更加依赖，满足已被满足的需求并不是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乃是要满足我们被未实现的需求。

恢复传统的手工艺和低技术的生产，并不是社群的目的。停止对能源密集型生产的隐性补贴，会鼓励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但不会强迫这种复兴发生。出于改善生活、满足需求的意愿，我们会回归到地方性的生产之中——这是变得更为富有的意愿。有人说，我们最好重新学习如何使用手工工具，因为石油价格日渐攀升，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种人显然太过沉迷于一种宿命论。他们认为，我们会被迫回归到正确的生活方式上来。我倒认为，我们会主动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由离析所带来的危机会不断地驱使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人类非要选择丑陋的、大规模生产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也许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耗尽生物圈的基础为止。石油峰值（Peak Oil）无法拯救我们！相反，我们应该选择复兴地方性的、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将之作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唯一途径。这是丰富我们的生活的唯一途径，是实现我在下一章提到的新物质主义的唯一途径。

“我并不需要你”的感觉，实际建立在一种幻觉之上。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彼此。尽管金钱可以购买所有的必需品，但是我们并未感到满足，我们并不觉得金钱已经满足了我们所有的需要。相反，我们觉得空虚、饥渴。既然富人和穷人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饥渴，那他们一定是渴求一些无法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即便是在货币化的社会中，建立社群仍然是有希望的。也许，重建社区的希望在于那些金钱无法购买的需要。也许，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恰恰是那些不能够被大规模制造出来的商品，恰恰是不能够被量化、不能够被商业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游离于货币体系之外。

经济独立的人之所以失去社群，并不是因为金钱可以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他之所以失去社群，是因为除非用金钱，否则他的需求无法满足。更准确地说，他企图用金钱来满足那些金钱无法满足的需求。货币

具有非人格性和通用性，它只能满足类型相同的需求。它能满足对热量的需求，买来*x*克蛋白质，*y*克维生素C等任何能够被标准化、被量化的物品，对于某个人关心你的人所制作的可口食物这类需求是金钱无法满足的。金钱能够买来容身之所，但是买不来家庭，因为家庭是自我的有机延伸。金钱几乎可以买来所有物品，却不能买来让你睹物思人的小玩意儿。金钱可以买来歌曲，却无法买来只为你一人吟唱的歌。即便支付再多的金钱，请乐队到你家为你演奏，你也无法保证他们唱的是真情实意而非虚情假意。如果你还记得母亲为你哼唱的摇篮曲，如果你还能记起情人为你低吟的小夜曲，你定能知晓我所指何物，你也定能感受到那份深情。当一支乐队不只是在完成演出，而是真心实意地为那些听众演奏时，你会体会到这种感觉，这样的演出是独一无二的，它的特别和魔力，却无法被唱片所记录，你必须身临其境。我们的确需要为音乐会的门票付钱，如果乐队倾情演出，那么我们所得到的，将远远超出门票的价格。我们不会觉得商品交易已经完成，所有的义务都相互抵消，就像纯粹的货币交易那样。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持久的联系，因为一种赠予行为发生了，若缺少了这样的体验，生命将暗淡无光。货币交易虽然可以作为这种体验的载体，但任何数额的金钱都无法保证这种体验。

美国——这个有史以来货币化程度最高的社会，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的某些需求被过分满足了，而另外一些需求则被忽视了。我们生活在最富有的社会，我们吸收了太多的热量，却找不到美好而新鲜的食物；我们住在超大的豪宅里，却缺少真正体现个性和联系的场所；媒体无处不在，我们却找不到真正的交流；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收看到娱乐节目，但却找不到嬉玩的机会。处处都是货币的疆域，在此我们不断追寻所有亲密的、私人的、独特的事物。相比我们的邻居，我们更了解迈克尔•杰克逊、戴安娜王妃和林赛•罗翰的逸事。结果是，我们不曾真正了解过任何人，也不曾真正被任何人了解。

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我们所惧怕的，比如冒险、密友和真正的交流。我们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我们看重隐私、尊崇谨慎，这样，

没人会看到我们要洗的脏衣服——甚至是干净衣服：我们认为内衣是不能给别人看到的，禁止任何人在户外晾晒衣物的传统，体现了这种奇怪的观念。生活变成了私密的事情。与他人保持亲密和联系会让我们感到不自在，而这恰恰是我们当今最需要的。被人看到、被人听到、被人了解，是人类深层次的需要。我们对这些的渴求随处可见，这已成为我们生活体验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对缺少了什么毫无感觉，就如同鱼儿对潮湿毫无知觉一样。我们需要超出正常范围之外的亲密感。虽然我们渴求亲密，寻找的却是安慰与食物的替代品：电视、购物、色情电影、炫耀性的消费品等，这些物品能够缓解伤害，使我感受到联系，或者它们树立起形象，使我们被关注、被了解，至少它们让我们看清并了解我们自己。

显然，向神圣经济的转变，会伴随着我们心理的转变。用今天的话来讲，社群通常意味着距离上的比邻，抑或只是简单的网络，实际上，它蕴含着更深层的交互联系：它是个人生命的分享、自我的延伸。参与社群意味着与他人建立私人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其代价是：我们必须放弃独立的幻想，放弃责任的免除。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如果你想要加入社群，那么你必须对他人负责、倚靠他人、与他人休戚与共。你会给予并得到那些无法用金钱购买的礼物，你无法轻易地得到其他资源。你们需要彼此。

在这一章里，我一直在追问，什么样的需求是货币化的世界所不能满足的呢？对于这种深层次的需求，我已经列举了很多例子：只为我们而吟唱的歌曲，作为自我的延伸的家庭、用爱烹饪的食物。但是，更一般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无论是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如爱抚、歌剧、故事、音乐或舞蹈），这些都无法完全脱离货币的疆域。我们能够雇人按摩，我们能买来故事（例如，我们可以去看电影），我们可以购买音乐和视频游戏，我们甚至可以买来性爱。但是，无论我们购买的是什么，总有一些是不能被量化的东西（因而不能被货币化所侵蚀），它们有的需要用金钱作为载体，有的不需要。少了它们，我们会感到

空虚，欲求无法满足。有了它们，即便购买了它们的载体，我们也会觉得，所支付的远不及我们从中得到的万分之一。换句话说，我们收获的是一份礼物。大厨专心烹饪出的别致的菜肴，乐师竭力表现他的真情实感，工程师不断设计产品只是为了把它做好。额外的努力不会为他们带来直接的奖赏。他们懂得礼物的含义，我们也心领神会——因而愿意“赞美那个大厨”。他们的行为并非缘于经济上的考量，但以竞争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却弃之如草芥。如果你在这样的体制内工作过，你一定懂得我所指为何，我指的是那种让人只求过关、不求卓越的无尽压力。

那些不能被量化，有时需要用金钱作为载体，能够被转化为礼物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些在现代社会未被满足的需求又是什么呢？简言之，那些形式千变万化、尚未被满足的基本需求，是对神圣之物的需求，是我在绪论中描述的、对独特性和联系性的体验。

环保人士经常宣称，资源密集型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不堪重负；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负担得起，我们可以一直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对于这点，我不敢苟同。我们必须主动过渡到有利于生态保护的生活方式中。舍弃大房子并不是“因为耗能太多而不得不放弃郊区的大房子”，而是在联系紧密的社群中，我们会识别出我们对私人的、有人情味的神圣居所的需求。对于现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它的空虚和丑陋让我们无法继续忍受，我们渴求精神的滋养，我们渴求一种私人的、联系着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竭尽所能。一旦我们开始努力，社群就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因为精神上的滋养只能作为礼物出现。这礼物在馈赠的网络里流通，我们参与其中，既是礼物的赠予者，也是接受者。无论礼物是否需要商品作为载体，它的私人性和独特性都丝毫不减。

这里的精神一词，并不与物质相对立。我不能容忍任何寻求超越物质的哲学和宗教。实际上，正是精神和物质的分裂，才导致了我们对待物质世界的可耻行径。神圣经济学则将世界视作神圣的，它的物质性并

不亚于当前的文化，它的物质性体现在对这个世界刻骨的挚爱上。因此，“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并不是一边大量制造廉价的、普遍的、伤害地球的物品，一边冥想、祷告，空谈天使、圣灵、上帝。神圣经济要求我们把关系、流通和物质生活都视作神圣的，因为它们本来如此。

第23章

Chapter 23

新物质主义

生命在空间中的出现，可以与某种觉醒相比较，几乎如同它回复生机时，空间本身惊觉、醒来一般。正是空间不同程度的苏醒事实上这种程度是无限的，才使我们辨认出了在空间中看到的生命，在建筑中看到的生命，在山间看到的生命，在画作中看到的生命，在人们的笑容中看到的生命。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

货币是今天的“经济学”的惯常主题，而本书的大部分也都在探讨货币。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应该研究物品，特别是人类创造的物品，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它们，谁来使用这些物品，以及这些物品是如何流通的。

当我驱车经过美国的郊区时，我看到了快餐店、无数的方形的商店，以及切割得像饼干一样的土地，仰望现代都市中的商用办公楼和高层住宅，我不禁感叹，它们是何等丑陋。原先的老物件和老建筑是那么有魅力和生命力，与之相比，现在的世界是何等的贫乏。我的感叹近乎愤慨，拥有上千年物质技术的我们，居然能够忍受如此丑陋的世界。难道我们贫弱到无法负担更好的生活了吗？如果我们生活的精致程度还比不上一个中世纪的农民，那我们所做的牺牲、所带来的破坏、所追求的美丽和独特意义何在？凝望着旧时的工艺品，我总是会

被它们所蕴含的活力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气息所打动。可是，我们今天所使用所有物品，即便非常昂贵，也粗鄙不堪，处处体现着虚伪、冷漠和推销术的气息。

首先以建筑为例，再将此例推及其他人造事物吧。我们的建筑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无疑是纯功能性的，如仓库、超市、零售店等，它们都尽可能花最少的钱来实现某项功能，美观并不是它们的考量；第二种建筑的确融入了美学元素，但是，这些元素要么是在功能效率之上附加了无关紧要的小装饰，比如乡村小屋的拱形门就没有任何结构上的功能，要么以妨碍实用功能为代价。

这两种建筑对应着对美的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美只是在追求实用和效率过程中的副产品。著名建筑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即持此观点：

> 因为20世纪的观念仍然被普遍接受，学生们也就相信“美”来自于对实际效率的追求。换句话说，如果你造得既实用又有效率，那么可以推断它是美的。形式服从功能！……往往是那些最理性最聪慧的学生们，愿意以近乎道学家般的热情去证明，纯粹功能性的思考必将产生美丽的事物[1]。

现代建筑业有太多例子告诉我们，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美并不必然是追求效率的产物。认为美与功能毫不相关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当代建筑看似虚假的装饰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对美的第二种误解：美是额外的、与功能不相干的东西。于是，我们区别了美观和实用，却别了高雅艺术和实用艺术。如同思想、精神一般，艺术变成了阳春白雪的领域，不容被任何实用性的考量所玷污。艺术的世界便与商业脱节，特别是与世俗的代表——货币，渐行渐远了。

---

1 亚历山大，《自然的秩序》，423页。

对美的第一种误解源于笛卡儿的科学世界观，第二种则源于笛卡儿的宗教世界观。第一种观点认为，美、生命、灵魂是事物的第二属性，是顿悟（epiphemema），他们无法测量，因此也就不是真实的。当你取出器官，你得到的只是一堆物质、一堆元素、一些碳、一些氮、一些磷……被你称作生命和灵魂的东西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宗教的思维方式看似与科学背道而驰，它宣称灵魂是生命的真实元素，而科学却对此视而不见。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又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灵魂并不在物质内部，而是存在于单独的、非物质的领域。科学和宗教都认为，如果生命有灵魂，那么它一定是与物质分离的，是一种额外的元素，与之类似的思维模式使得美成了附加在功能之上的东西。

即便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美观、实用，它们却透着一种虚伪。这种美观显得俗气、花里胡哨，它并无多少深意。我将真正的美称之为生命或灵魂，它应触及事物的本源，与事物的功能密不可分，它与功能的完善同等重要。它唤起了一种矛盾的感受："它比应有的更美，然而它也只能如此。"当我思索细胞之美、夕阳之美或芒德勃罗集（Mandelbrot set）的数学之美时，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慨。这样的美、这种混沌中的秩序毫无缘由，它是令人讶异却又无故免费的礼物。即便夕阳丑陋不堪，覆盆子不那么美味可啖，世界依旧运转如昨，不是吗？只得如此，别无他法。

对功能的执迷也无法产生美观，产生出美观的，是创造性的原则和创造性的精神，它们同样产生了功能，它们源于人们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在这里，我将使用完美一词。完美具有精密、恒久规律性（undeviating regularity）的含义，但它们与美丽、生命、灵魂毫无瓜葛，事实上，精密和恒久的规则性会让事物失掉灵魂。成为创造的忠实仆人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对实用和美观的同时追求，表明二者的原理是共通的。克里斯多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秩序的本质》（The Nature of

Order）一书中列出了十五条原理。这十五条原理既适用于自然系统，也适用于建筑和艺术一类的精神作品。这些基本特性包括规模水平、强重心、主体空间、局部对称、相连和融合、边界、粗糙度、梯度等。但在有关整体、秩序和生命的概念中，最重要的是中心的观念。中心由元素那样的实体加总而来，但是与元素不同的是，中心是由整体创造出来的。“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被整体创造。”[2] 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由中心的中心的中心组成，都是由整体中的整体所构成的，它们相互创造。

人类也是如此。就像社会是由个体所组成一样，个体也是社会的产物。联系的自我的真相是：我们即我们的关系。扪心而言，我们与体内器官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就是生命普世本质。一个鲜活的、神圣的、作为生态延伸的经济体，也必然包含这样的特性。这个经济体中的每一个物件，被人创造出来的、流通的物件，也必须体现出围绕着它的联系。今天的经济是一个离析的经济：标准化的商品与单个使用者毫无关系，建筑与它脚下的土地毫无关系，零售店与地方特产毫无关系，产品的生产毫不考虑对人和自然的影响。这些都不能被称为是美丽的、鲜活的或健康的。

虽然我们可以描述出神圣经济的众多属性，但是诸如美、生命、灵魂这样的特性，却无法用方程式来表达。神圣经济可以体现在简约之中，例如夏克家具（Shaker）也可以体现在装饰中，例如伊朗的皇家清真寺（Masjid-i-Shah）或土耳其的梅夫拉那陵（the Tomb of Mevlana，是精神导师拉鲁丁•鲁米之墓——译者注）。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些办法来识别它们。在比较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它们中的哪些蕴含了更多的生命？”“哪一个更像是我自己的一面镜子？”“这件东西让我觉得我的人性是延伸了，还是

2 物理元素远非构成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虽然它们创造了整体，但它们本身也是由整体构成的。电子只存在于关联中（意为电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译者注）。这是一条普世原则，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丑恶便产生了。

缩减了？”

想要创造出有灵魂的物件来丰富这美丽的世界，我们必须要投入生命、自我和人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投入自我。不论是怎样的货币体系，如果它不能够引导和容忍这种创新过程，那么，我们就不能生活在神圣经济之中。神圣性是物质性所固有的，同样，在我们心中培养这种对神圣性的认识，并让我们的工作与这种神圣性相称，我们便为神圣经济奠定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在这样的经济里，我们制造出的产品和我们为彼此所做之事，会愈发变得美丽、私密、鲜活、有灵性。

几千年来，对这种财富的追求，未曾被任何意识形态所重视。例如，在21世纪，社会主义者对不能增进可度量的物质福利的矫饰和嗜好横加阻拦，在他们的宏伟计划里，以理性效率著称的功利主义备受推崇，而这些计划旨在最大化生产，为社会大众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社会主义同志身上的艰苦朴素作风，在今天的激进人士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远离精致华美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利他主义的理想。当权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如此：它重新创造并完备了那些令人痛苦不堪的丑恶之物、功能性的建筑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小时候我常常听到有关苏联人民恐怖生活的描述，那里只有一种商店，一间无窗的药房，无精打采又傲慢的售货员在柜台里售卖粗制滥造、毫无特点的商品。这听起来与沃尔玛别无二致。父母必须把孩子送到国营儿童看护所，哪怕孩子只有两岁。这样，父母亲的监护权也被剥夺了。我们今天的情形也是如此，不过是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代替了政府的强制罢了。我们创造了一个缺乏灵魂的物质世界，它缺乏生气，甚至扼杀生命。创造出这样的世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追求效率，为了扩大商品生产的宏大工程，为了征服和控制生命。这个物质世界一度被认为是技术进步创造出的世间乐土，但是最终，我们揭开面纱，看到了它的本来面目：狭长的购物广场、机器人般的收银员、没有尽头的停车场，野生环境、生机、凌而不乱、神圣统统消失不见了。

神圣的事物往往体现了永恒，它与商品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商品可被若干可度量的特点所界定。货币的同质性使它所触及的所有物品变得毫无差异，并把它们拖入商品的领域。第14章讲述了货币领域的萎缩，这使事物有了从商品链条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以及规模效率导致了制造品的过量，庞大的产能过剩表明，我们不再需要如此的高效，也不需要如此多的大宗生产。我们陷入了货币经济的疯狂增长之中，被迫生产更多粗鄙丑陋又非必需的商品，却又极度缺乏美丽、独特、专属和鲜活的事物。这种缺乏又反过来推动了人们的进一步消费。他们在失掉了与其他人的关联之后，绝望地试图用物质去填补空虚。

本书的第2章已经涉及了这个话题。我写道，“我们生产的东西太过廉价，是它们贬值的一部分原因，它将我们置于一个廉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普通的、消耗性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物品越发漠不关心。我们生活在最富有的社会，甚至不愿意去修理坏掉的东西，因为新的更加便宜。这样的低价是一种幻觉，因为它来自成本的外部化。当我们要为消耗大自然的馈赠而支付真实成本时，物品就变得弥足珍贵；当我们得到自然的馈赠时，经济上的逻辑性就会强化我们对世界的敬畏之情。

神圣经济终将弥合横亘在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艺术和工艺之间的鸿沟，这些鸿沟恰恰定义了我们数千年的文明。在朝着离析前行的旅程中，我们发明了令人惊叹的技术和文化。若固守最初的天人合一，则不可能做到如此。现在我们须做之事，是要恢复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将它带入全新的领域。前人用扁斧和山歌创造了生机、美丽和灵魂，我们现在则要用纳米技术和大众传媒来完成。坚守这样的传承吧，若不能创造出美丽的新世界，我们祖先的牺牲岂不徒劳？

我们是天生的创造者，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尽情释放我们天分之礼。美观与功能之间的联系说明，生存和天分之礼的表达可以共存。谋

生和从艺长久以来的区分将消失，也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会否定这样的区分。没有什么比创造力更值得关注，更值得尊崇，更值得实现。我们将会追求，且正在追求万物的健康发展。本书提到的所有变革，均旨在将我们带入一个美丽新世界。社会红利、成本的内部化、负增长、丰饶富足、礼赠经济，都力求使我们远离缠斗和求生的心态，远离功利主义效率，迈向真正感恩的状态：尊重我们所得的馈赠和我们给予的意愿的心态，甚至捐出我们的资财。我们希望这世界越来越美丽。

生命何其美丽，我们岂敢妄加揣测！我第一次邂逅这种美丽是在十九岁那年。那时，我正在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展品若非亲眼所见，我无法想象它们的存在。一只茶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只御用茶壶，它的美和至善让人感觉，一位神灵隐匿其中。真正的富裕社会是让所有的人都被这样的事物所包围，这些事物皆出自工艺大师的匠心独运。我不信这样的才华仅限于少数人，实际上，正是因为大部分人的天分被压抑了，大师才显得凤毛麟角。所幸的是，过往的记载告诉我们，人类可以企及何等的高度。每当看到与那只茶壶一样的伟大作品时，我都在想：“造它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这样的作品超越了这个堕落年代里所有人的能力。然而，这种可能性仍然留存在我们的人性之中，我们正走在恢复的道路上。

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曾讲述了他在日本东福寺（Tofukuji Temple）游历的故事。东福寺的建筑可谓经典之作。他拾级而上，石阶夹在两旁的树篱之间，愈来愈狭窄，直至戛然而止。他别无选择，只能坐在最高的台阶上小憩。那里的高度恰到好处，让人在漫长的攀登过后，享受宁谧与清风，一只蓝蜻蜓停在他身边。他写道：

> 我突然意识到，建造这座寺庙的人是有意为之。尽管这听起来离奇而又不可思议，但我确信，他们建造此处，定然知道那只蓝色的蜻蜓会飞来停在我身边。无论这听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在它发生的那刻，当我坐在石阶上的时候，我确信无疑地认为，那

> 些建筑师们拥有我从未体验过的高超技艺。我清晰地记得我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时的战栗。我感受到了超出我想象的高深技艺和知识。

这种超乎想象的技艺，却潜藏在今天的每个人身上。人类的伟大任务就是要恢复它，以之为基础，建造一个新的世界。

结　语

美丽新世界

当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工作；当我们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时，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旅程。未生疑惑的头脑，是未曾思考的头脑。受阻的溪流，恰是潺潺吟唱的溪流。

——温德尔•贝瑞

在导言中，当我将拙作献给“我们心中的那个美丽新世界”时，我提到，对于一个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的心灵会对它产生抵触。千百万年来，不平等、暴力、丑恶、斗争不断加剧。我们对此逆来顺受，以至于忘了还有别样的世界存在。有时候，未受破坏的大自然、传统文化，以及贫弱的现代背后所隐藏的丰富感官，会让我们怅然若失，这种感觉，无异于在离析的伤口上撒盐。这样的经历至少告诉我们何谓可能，何物已经存在，何物可能存在。但是，这些经历却不曾告诉我们，如何创造出这样的世界。面临着维持现状的巨大阻力，我们的心灵在痛苦中退缩了。在自然、特殊聚会、音乐节、仪式、爱、比赛之中，我们或许会捕捉到美丽世界的惊鸿一瞥。当我们相信，在这个灵魂残缺破碎、受到金钱驱策的世界里，它们不过是短暂的喘息时，就显得更加令人伤怀。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思维的逻辑与心灵的认识结合起来：不仅要阐明何谓可能，还要阐明如何实现。“可能”一词的意思并不是“如果我

们够幸运的话，它将发生”所隐含的“或许”之意。我指的是一种自我决断之感：我们必会创造的、更加美丽的世界。对于这种可能性，我给出了大量例证：依赖指数增长的货币系统必然覆亡，与地球同创关系的意识会朝着“联系的自我”这一方向转变，神圣经济所必需的、已经出现的一些举措，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创建的东西，我们可以创建，并且正在创建它们。既然金钱是世间邪恶与丑陋的根源，那么金钱被改造之后，你能想象那时的世界吗？

我无法想象那时的世界，哪怕一丝一毫，即便有时候我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前景。或许并不是我无法想象它，或许只是我不敢去想象。一个真正神圣的世界、一个神圣的经济体的愿景，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所有患难。但是，我会分享我愿景中的所见，哪怕是最属臆测的部分，最为天真、不切实际、梦境般的部分。我希望这种分享不会削弱它的可信程度，因为我是按照条理和逻辑来阐述神圣经济学的概念的。

在本书中，我将用大量案例说明，神圣经济不仅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出现。虽然旧的方式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它们正在加速瓦解。写作本书之时，正值大分解（The Great Unraveling）的第一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认为大分解的第二阶段会在未来一两年出现。没有人能够预测旧世界将如何解体。由于地缘政治事件甚至自然灾害，旧政权依旧如常的假象或许会维持若干年，但高利贷时代已成强弩之末，“飞升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Ascent）和“离析时代”（The Age of Separation）亦行将就木。新时代的诞生和人类即将面临的考验，可能会让人应接不暇。经济崩溃通常会伴随法西斯主义、内乱和战争，但我认为，这种黑暗的时代将更加短暂，人们有理由相信，其情势将更加温和。

我认为如此，因为我遇见的所有开悟之人也是如此认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学到了很多，我们意识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

临界点。同样，个人层面的转型也到达了临界点。在向新的生存方式过渡的过程中，我们甚至进行了一两次尝试，尝试重新适应旧的宫腔；但是当我们如此而为时，却发现宫腔无法再容纳我们，曾经经年习惯的存在状态，过了数周或数天就已无法忍受。对整个人类而言，一般会有数年的短暂黑暗和动荡。工具时代持续了数百万年，火种时代持续数十万年，符号文化时代持续了数万年，农业时代持续了数千年，机器时代持续了数百年，信息时代持续了数十年。或许如我猜测的那样，次时代（miniages）的迅速更迭将会终结上述过程。奇点已近，随后的转变将比之前的转变更加深刻。

如果让我来预测的话，我认为，神圣经济会在未来两个世纪内逐步实现。我想对它的几个方面进行描述。本书讨论的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或许在未来的五年内，我们能够取得的进展。那么，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一直保持谨慎——也许我应该放眼展望！）

礼物的非窖藏性及其赠予的社会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在礼赠文化中，财富往往是公开透明的。每个人都知道谁赠给了谁，谁拥有多少，谁在囤积礼物，谁比较慷慨。在现代货币机制下，这意味着货币持有量和货币交易也应该是公开透明的。随着货币的出现，财富具有了一种新的保密性，这在以往是不可能的。当财富是土地、牛、羊时，人们无法隐藏自己的财富，因此财产带来的责任也就无法推卸。但是，货币可以被囤积在地下室里、埋在地下，藏匿在编好号码的银行账户中，保持隐秘、私密的状态。要撤销货币带来的负面影响，金钱的这一属性必须被勾销掉。

从物理现金向电子货币的过渡，使得这一转变变得可行，但它也引发了对极权主义式控制的恐惧。难道我们希望政府调查每一笔交易，将其作为“总量信息识别”（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美国“9•11”恐怖袭击后，美国设立的一个反恐信息甄别计划——译者注）的一部分吗？或许不会，除非政府花掉的每一分钱也能供公众查

阅。公开一部分个人和机构的金融行为，而将其他个人和机构的行为作为秘密并无多大用处。货币交易必须是普遍透明的。

显然，如果每一笔交易和每一个账户的余额都可供公众查阅，那么它会从根本上改变商业实践。如果你经曾从商，想象一下，如果每一位顾客、每一个供应商、每一个竞争者都知道你的真实成本，会有什么后果！然而，货币透明非常适合我在第21章探讨过的尚礼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需要你诚实地透露你的成本，不仅如此，还要吸引礼赠。依靠他人缺乏信息、隐瞒成本而获利的办法不再行得通了。

很多人会觉得，没有金融隐私的想法十分骇人。今天，由于货币与自我相捆绑，我们会感到暴露、脆弱——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暴露在嫉妒与判断中，容易受到犯罪勒索，被亲属们的要求纠缠不休。换一种情境，财务透明是一种开放的、易使人信任的、无防备的、慷慨的生存方式——做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舒适地活在社会中。此外，财务透明会使很多犯罪活动难以进行。

至于神圣经济体的发展，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神圣经济不仅包含货币的数字化，还包含在线评估系统所构成的、新的“社会货币”，公开是它们的本质。最终，货币会成为社会对个人天分之礼的一种感激的象征；因此，作为象征本身的货币具有公共性是合宜的。

货币的另一基本特征是均质性：任何一美元都是一样的。因此，货币没有历史，没有与之相依附的故事。货币将它所涉之物变得均一化，还将这些物品同物质和社会世界割裂开。在过去，礼物是带有故事的、独一无二的客体。在授予礼物的仪式中，礼物所涉及的整个历史会被重新叙述（今天我们仍旧这么做，遵循一种原始的冲动，我们希望陈述我们在何处买到它，或者它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祖母的）。金钱的同质性和匿名性（我的美元和你的美元一样），使它不符合礼物的原则，不符合神圣性的两个特点：独特性和连通性。在导论部分，我

已经对这两个特点做了描述。

因此，我预言，货币会失去均一性，获得承载历史的能力。使用电子化的、透明的货币，可以将一笔交易以及它涉及的、特定的一美元与电子数据库联系起来。在进行购买时，你可以决定究竟是使用工资里的钱，还是使用来自朋友的钱，即使这些钱被放在同一银行账户中，它们仍是不同的钱。孩子们直觉上认为，银行保管了“你的钱”，你支取的物理钞票就是你存入的那一沓钞票。而这一直觉将变为现实。（这种货币系统与信用创造并不冲突——金钱仍旧可以诞生，循环一段时间，然后消亡掉。）

文明的历史，离析愈发加大的历史，以及即将到来的、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愈发壮大的、大同的历史，同样是一个以富足开始、归于极端稀缺，再演化到更为复杂的富足的过程。前面我写道，由于脱媒（disintermediation）以及“内容”（content）生产的边际生产成本接近于零，数字媒体打造出了富足经济体（the abundance economy）。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富足经济体的内容仍然有限，但从长远来看，它却会成为富的新领域的范本。富足的新领域之一将是能源，它会实现原子时代梦想家们对于能源“廉价到计量不出”的梦想。

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却似乎与之相反：石油供应萎缩，地球吸收化石燃料排放物的能力也减弱了。在短期内，能源的富足可能会出现在公认环保的资源上，如太阳能、风节能技术。但我认为，当人类达到了真正的、精神上的富足时，海量的、超出当前常规科学范畴的新能源才会出现。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也将带来观念的转变。事实上，“免费能源”技术可追溯到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的工作，它已经存在了至少一个世纪。[1] 今天，已经有5到10种不同的能源技术看似违

1　很明显，当J•P•摩根切断了特斯拉无线能源传输项目（特斯拉称，这能够提供无限的能源）的融资时，他并没有质疑相应的科学研究。对于这种发明是否能够运作起来，他甚至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怀疑。他拒绝这一发明仅仅因为他认为无法从中渔利。他说：“如果我无法度量它，那我肯定卖不掉它。”特斯拉早期的发明（如AC电源）很好地迎合了稀缺经济和一种控制的心态，于是热情高涨的金融大亨们采纳了它们。

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对一个领域进行研究时，你会发现一段肮脏的历史：研究成果被没收，职业生涯被摧毁，甚至研究者神秘死亡。无论过去及当下是否存在维持能源紧缺的阴谋，除非我们深入、全面地领悟到礼物的精神，否则在一定程度上，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能源的丰饶之礼，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几十年。与最近的唱片及电影业一样，J·P·摩根毁掉特斯拉的职业生涯，有可能是企图维持人为的稀缺性以赚取利润。或许更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或许摩根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类还没有准备好迎接特斯拉的礼物。植根于离析和稀缺之中管治范式，无法将免费的能源技术纳入其中，因为这被认为是虚妄的、欺诈性的，甚至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如果外部经验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我们的心理，或许未来有一位发明家，能为人类带来能源上的富足。他对从发明专利中获利毫不关心，而是将这些发明公之于众。这将避免他被责为江湖术士，也将避免国防部对发明的攫取。对于本质上属于宇宙所馈赠的免费礼物，个人能够独占它吗？

我不相信技术会拯救人类。许多读者问我是否了解“维纳斯计划”（The Venus Project），维纳斯计划沿袭了对当今货币体系诸多问题的思考。虽然我与维纳斯系统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但我觉得它过分沉迷于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这种乌托邦主义与自煤炭时代即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希望如出一辙。事实上，如我在第2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一直拥有富足，产生稀缺性的是我们对稀缺性的感知，而非我们的手段。

让我用诗意的语言表述这种观点吧。在第11章的结尾，我写道：

> 从贯穿精神传统的脉络来说，我们也同样报答了太阳；正是在我们的感激之情中，太阳才继续照耀。古时祭日的仪式不仅是表达对太阳的感激，这些仪式还希望太阳永放光辉。太阳能是反射回来照耀我们的尘世之爱的光芒。礼物圈运行的方式亦然。

那么，若我们拥有富足的心态，拥有“联系的自我”的慷慨，拥有用爱来连接你我的自我，太阳会否更加明亮？这轮新的“太阳”——宇宙的无限慷慨的新资源——会否为我们所有，反映出我们的爱？我们出生于感恩之中，这是我们对生命之礼的本能反应。我们生活在这种感激之下，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礼赠之中。随着我们打开更为广泛的慷慨之渠，礼物向内心不断涌流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能源，还有什么领域能够表达宇宙的固有的富足呢？物质？时间？意识？我所知道的是，人类才刚刚开始发现我们的礼物，才刚刚开始将它们引向美好的目的。我们有能力创造奇迹——这是好的，今天地球的境况需要这些奇迹。

我无法预测“大同时代”将如何在线性时间中展开。我知道的是，在我们一生的终点，我这代人将生活在一个比我们出生的年代更加美好的世界里。这将是一个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时代。我们将在已经无林木覆盖达两千年的希腊小岛上造林，我们将恢复撒哈拉大沙漠原本丰茂的草原。监狱将不复存在，暴力将变为罕有。工作将会是“我怎样送出我最好的礼物”，而非“我如何维持生计”。跨越国家边境将变成受追捧的经验，边境检查将不复存在。矿山和采石场几乎不存在，因为工业时代积累的大量材料会被重复使用。我们仍然住在属于自我之扩展的住宅中，吃着我们熟悉的人们所种植的食品，使用人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制成的上佳物品。我们将生活在其乐融融之中，生活在一个今天几乎不存在的社群中，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心中有渴望，美梦必能变成真。大多数时候，天籁般的孩童的笑声，将是我们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

这是痴人说梦吗？人们总是不敢奢望太过美好之事。若这种描述唤起了愤怒、绝望、悲伤，说明它触动了我们共同的创口，离析的创口。然而，对于可能之物的感知，深藏于每个人的心中，无法抑制。让我们相信这种认知，彼此深信不疑，围绕它来组织我们的生活吧。旧世界分崩离析，难道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我们能够安于一个不够神圣的世界吗？

附　录

量子货币与储备问题

什么是货币？在这本书里，我把玩了不同的定义：货币是交换媒介、价值储藏、计价单位，货币是一个故事或者协议，货币是感激的象征，货币是指引人类创造力方向之仪式的辟邪物。这些定义都是有用的，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货币。有观点深信，货币是某种物品，是宇宙中由其他客体组成的某种客观、抽象之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是即将终结的离析的故事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何我认同以一种更灵活、“多观的”（multi-jective）方法来理解货币。理解事物的公理化方法，从定义和推理开始，便注定是不完整的。虽然这种公理化方法产生了一个内在一致的、理智上令人欣慰的系统，但却将真理排除在外。这种情形与原教旨主义如出一辙，只是从宗教上的变为了经济上的。

对于“什么是货币”，从广义来讲，货币是如何创造的，该怎样被创造？在接受任何权威式的论断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我屡屡认为我终于了解了货币，但却遇到了新的矛盾，有时是微妙的，有时是明显的。这表明，如哥德尔的逻辑（Gödelian logic）一样，真相的疆域远比我理解的要广袤。

诸多关于“货币到底是什么”的启示都没有错，只是它们都是片面的，只对特定的推理有用。即便是对货币最新的、胜过先锋意识的理解，也不例外。这种新观点认为，今天的货币纯粹是一种信用，而信用的依据是虚无——仅是一个记账的项目——开具贷款时银行记录的项目。细究起来，这个定义是不成立的。之所以要探讨金钱和信用的微妙

之处，是为了让我对神圣经济体的洞察，不带有潜藏在货币原旨教主义之下的漏洞。于我而言，一些中间性的、令人惊讶的结论，与银行准备金要求问题相关。究竟是部分准备金？百分之百准备金？还是零准备金？每种观点背后，都有着聪明的支持者。然而，争论的大部分内容依据的都是虚假的（或者只在一定条件下为真的）前提。

首先考虑货币的信用等式。从电影《时代精神》（Zeitgeist）到马滕森（Martenson）的“崩溃之路”（Crash Course，也有“速成班”之意；副标题为“我们经济、能源和环境不可持续的未来”），再到美联储的手册《现代货币机制》（Modern Money Mechanics），这个等式已被教过无数遍。只需敲击几下键盘，银行（银行A）就创造了对约翰的一百万美金借款，这是新创造的货币。现在，约翰希望使用这一百万美元，于是他取走了这笔借款，银行A的账户因而不再存有这笔钱了。约翰可能会花掉它，比如买下玛丽的一幢房子，于是这一百万美元就存到了另一家银行（银行B）的账户上。系统中仍然有一百万美元，只是这笔钱现在到了玛丽而非约翰的账户上。

当玛丽将约翰支票上的钱存入账户时，除上述事件外，别的事件同时发生了。这张支票必须是“可兑现的”，这意味着银行A在美联储那里的账户（或者在一个中间性的清算机构那里的账户，这里暂且考虑简单情形）应借记一百万美元，银行B的账户则应贷记一百万美元。典型的情形是，银行A会得到来自银行B或者其他银行的支票，因此，在一天结束时，所有的交易都清算完毕，银行A可能不需要借记其储备账户。也有可能，特别是当银行A开具了一些大额贷款时，它的储备金会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这没有什么问题——支票并不会跳票。它可以（在美联储市场上）从其他银行或从美联储（在折现窗口）借入必要的准备金。这些都是银行准备金的短期借款。为了弥补长期赤字，银行A必须吸引更多的存款，或者从其他银行借入长期贷款，或者在回购市场（repo market）中卖出贷款。如果能证明借款是安全的，那么它能够以比较优惠的费率获得必要的资金。这种借款与信用创造有本质不同。当

一家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借款时，没有新货币被创造出来。一家银行的准备金增加，意味着另一家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但是，如果借得的是准备金，那么只有中央银行（美联储）能够创造新的货币。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形式的货币，储备货币和信用货币，分别对应于统计口径中的M0（或“基础货币”）、M1、M2等。

当以银行为中心的信用被用作交易媒介时，另一幕上演了。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段落里，考察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请记住这一点。很多改革者都支持全额准备金制度，认为它是安全货币制度的关键。全额准备金制度虽然出身正统，但支持它的思想家们却意见不一。其支持者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20世纪30年代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以及当今的很多改革者，如罗恩•保罗（Ron Paul）、斯蒂芬•赞林嘉（Stephen Zarlenga）、丹尼斯•库钦奇（Dennis Kucinich），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很多经济学家。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消除了信用和储备之间的区别。银行只能借出自有资金或储户的钱（在储户同意的情况下），但是这些钱会消失掉，直到它们被偿还。活期存款（demand deposits）不能够被借出。

乍一看，这种系统似乎与我们今天的系统截然不同。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一个银行可以“借进空头，借出多头”，也就是说，它可以持有可共随时支取的活期存款，并将活期存款中的一部分资金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借出。在全额准备金制度下，这是不允许的。银行仍然可以借出资金，但只有当这些资金是以定期储蓄的形式存放在银行中，方才可行。例如，如果一名储户购买了一张六月期的储蓄存单（certificate of deposit, CD），那么这些资金可被借出六个月。

对全额准备金制度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使金融中介活动（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相联系）更加难于开展了。银行不再根据信用可靠度来贷款，而是必须找到愿意借出存款的储户人，并且借款的时长要与贷款的期限相同。但是，仔细考虑这种批评你会发现，这种批评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全额准备金制度下的银行业务与今天的银行业务没有什么

区别。

让我们首先考虑银行存款。在全额准备金制度下，持有活期存款是不能取得利息的（事实上，还需缴费）。银行只对定期存款付息，并且以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的水平将其借出——期限越长，利息越高。储户会根据他们的流动性需求，选择尽可能长的存款期限。储户会将一部分钱放在30天定期存单上，因为他需要在每月末支付账单；他还会将一部分钱放在六月期的定期存单上，预期那时他会花费一大笔钱购物；他将剩下的钱用来购买十年期的定期存单，计划积攒大学学费。遍历所有的储户后，银行最后得到可贷资金取值范围大、期限分布近乎于连续。可用于低息短期借款的资金较多，可用于长期借款的资金较少。

全额准备金与部分准备金制度主要的差别是，银行在进行长期借贷时会受到限制。今天，长期借款的对象主要是房地产和大型资本项目。人们仍然需要借入二十或三十年的贷款来购买房屋，但是很少有储户愿意把钱借出这么久。这个问题很容易避免，只需发行短期贷款，例如一年期贷款，然后每年对其进行再融资即可。这与浮动利率按揭（adjustable-rate mortgage）基本等价。假定再融资利率可以通过合约固定，那么它可以模拟定期贷款。

原则上，所有的贷款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从而避免了对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的需求。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全额准备金制度中，需要对借款加上什么限制呢？”与今天一样，银行可以借出任何数量的资金（不超过其全部准备金）。假设一个诱人的借款机会摆在银行面前，银行想要借出超过其当前储备的数额，银行该怎么做呢？银行的行为将与今天无异——它会从其他银行或金融市场上借入必要的准备金。

当然，我们必须面对银行挤兑的问题。也正是这个问题催生了全额储备银行制度。虽然在理论上，短期存款的全部价值会被期限更短的贷款所涵盖，但在实践中，短期贷款的目的通常是为了进行周期性的再融资，因此，短期贷款基础资产的流动性并不高。与今天一样，如果银行

用短期存款创造了太多（实际上的）长期存款，那么银行将面临流动性危机。银行可以遵循解决流动性危机的现有办法，例如，如果贷款的长短期组合的流动性较差，那么它可以找其他银行借入流动性。如果交付周期（lead time）足够长，它可以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债券。一般而言，流动性不会再像今天这样成为借款的一个约束。储蓄水平的随机波动每天都有发生，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银行可以在联邦基金市场（Fed Funds market）或者通过美联储自身的透支服务，借入资金以弥补准备金的不足。全额准备金制度也可采用与此等价的机制。

除了金融媒介之外，这两种制度另一个区别是，在完全准备金制度中，银行似乎没有能力改变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依赖于货币当局。但是，这种区别也是一种表象。在当前的制度下，当银行借出更多资金时（例如，在经济扩张时，安全的借款机会增多时），货币供给就会增加。在全额准备金制度下，银行在经济扩张时期会贷出更多的资金。美元的总量并不会增加，但是那些愿意花钱的人们手中的资金增加了。在萧条时期，银行并不想贷出资金，美元会滞留在那些不愿花钱者的储蓄账户中。这样，经济中的资金总量就减少了。这与现在的情形相同。

信贷过度扩张会产生繁荣与萧条的周期，而全额准备金制度的支持者称，全额准备金制度会避免这一问题。先前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一论断并不成立。有效的货币需求并不取决于美元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被用作货币、被用作交换媒介的美元的数量。无论部分准备金制度是否被允许，如果不希望花掉美元的人手头上有太多的钱，那么总需求将崩溃，通货紧缩螺旋（deflationary spiral）就产生了。

在完全准备金制度下，当银行贷出资金时，你可能会说，“货币供给根本没有增加——只是同一批钱倒了手。”但是货币是什么呢？同一件物品，在某个人手里并不成其为钱，但在另一人那里却变成了钱。这可能吗？若货币在永不花掉它的人之手，那么货币还是货币吗？这个谜自古有之。吝啬者窖藏在苹果树下的硬币，是货币吗？美联储通过出售债券减少货币供给，与一个银行保有过量的储备，有什么区别吗？其效

果是等价的；而物理的现实——电脑中的比特位——也是一样的。理查•希福德重提了马克思的观点，他留意到了以下的悖论："虽然只是在支付和交换时才有价值，自相矛盾的是，它（金钱）可以被占有……通过在支付和交易中被支取，犹如'真实财富的幻影'。"

标准的经济学通过将货币供给与货币流通速度区分开来，试图解决这个悖论。货币供给是指货币的量，货币流通速度则是指金钱周转得有多快。这两个因素相乘，共同决定了方程中的价格水平。从数学上看，这个公式是奏效的，但这些数学公式真的能够模拟现实吗？我们常常通过符号表述的透镜来看世界。数学上，货币供给与货币流速的区别依赖并反映了这样的一种认知，即货币是一种孤立的、客观的东西，它的存在独立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但是，还有一种后笛卡儿式的看待货币的方式：货币是一种方式，而非一种东西。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想到了我的前妻帕媞，她的美德并不包括节俭。她的座右铭是："你不花钱，钱就不是你的。"从整个经济体的角度看，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货币不能被用于交易的话，那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银行并未产生新的货币，只是允许已经存在的货币可同时存在于两地。货币既在储户的储蓄账户里，也在债务人的支票账户里。同样的基础货币（储备）每一次都可用在这两个地方之一：一个交易发生了，一个账户结清了，储备就从美联储的一个账户转移到了的另一个账户里。若与这笔数额的货币对应的需求特别大，若需求同时发生在多个地点时，利率会就上升，除非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供更多的货币。

如果货币存在于储蓄账户中，这可能意味着，有些人现在并不需要使用这笔钱。银行的功能是将这笔钱放在某个需要使用这笔钱的人的手中。只有这时，才能够从经济意义上说，货币是"存在"的；只有这时，才能够说货币产生了经济效果（例如，刺激生产）。与储蓄者相反，贷款者是希望立即使用货币的人。因此，货币从储蓄者到贷款者的转移，不论是在全额准备金制度下还是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都会增加

货币的有效供给。这将增加确确实实被使用的货币的数量。

我不禁要说，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货币与量子粒子（quantum particle）各个状态的叠加非常类似。这比同一笔、同时存在于多个地方的资金要微妙得多。这种描述意识到，货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货币同时存在、又不存在于这些地点；到交易发生之前，货币的存在都只是一种可能性。假设有十个人，每个人的储蓄账户都有100美元，每个账户均以100美元基础货币为基础。任何时刻，每个人都可以同时支取100美元，但在他们支取之前，这100美元并不存在于任何储蓄账户中。正如量子测度一样，货币是虚拟的，只是通过交互活动、交易而存在。你从自动柜员机取了100美元，看！看这笔现金！它自始至终在那里，不是吗？不是的。只是通过支取的行为，或者开具支票的行为，这笔钱才出现了。储蓄账户里的货币“真的在那里”还是不在呢？这个问题虽然困扰了“真实货币”的支持者，但却并无多大意义。无论货币是否在那里，仅当交易完成时它才出现，正如只有与观察者相互作用时电子才存在一样。货币与物质一样，存在即是关系。

在笛卡儿的时代，存在并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种“一元谓词逻辑”（monadic predicate）。而“真实货币”的支持者似乎希望将我们带回到笛卡儿的时代。人类存在性的革命方兴未艾，它是要把孤立的、离析的自我，扩张为一个更大的、联系的自我。而上述希望与这种革命是不一致的。即使是在物理学上，存在也不再是一种客观性质；至少，“存在”指的是“占据空间和时间的一个可量化的点”。然而物理的地点并非是一个客观的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货币存在呢？

如果追随时代大潮，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基础货币，迈向纯粹的信用系统。在这个信用体制下，所有的货币通过交易生成，无交易时货币便灭失。准备金真的有必要吗？自相矛盾的是，全额准备金制度意味着准备金并不是必须的，因为全额准备金系统与无准备金的系统一样。在这两种系统下，只有一种货币，而不是两种。而且规模更小的、无准备金的系统已经被预见并付诸实施了——地方交易贸易系统（LETS）和其

他互惠信用制度（mutual credit system）都是无准备金的、以信用为基础的系统。

当前的货币系统能够脱离准备金吗？假设银行A在约翰的账户中创造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当约翰向玛丽付款的时候，银行借记约翰的账户一百万美元，而玛丽在银行B的账户会增加一百万美元。这些都与准备金无关。银行A为何不能如法炮制呢？当然，银行A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们会面临与所有互惠信用相同的问题：如何规范那些能够创造信用的人及其信用数量，限制负的余额。准备金系统为银行借贷设定下了限制。没有了准备金系统，银行家可以向他的密友借出无限制的数量，然后宣布破产，将货币与对社会做贡献的功能脱钩，降低为社会做出贡献者的货币价值。当然，也可采用其他限制机制，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法令决定谁获得信贷，或者我们可以用某些公式或者带分级和评分的社会反馈系统来决定。让我们回到量子货币的隐喻中来。在量子系统中，一种测度检测出的量子状态的范围是有限的。正如概率波函数描述了粒子的分布，我们同样需要某种社会函数来影响货币的分布。在单狭口实验（single-slit experiment）中，大多数光子最终会落在特定的小区域中。在信用系统中，大多数信用会归于那些能够妥善使用信用的人。我所描述的“社会函数”并未指明货币将往谁处去，它仅是设定了条件，使货币局限在一个特定区域，这个区域代表了社会所一致认同的妥善使用。正如小孔狭缝（pinhole slit）可大可小一样，社会函数也可以进行调整，使得货币创造能够“衍射”（diffract）到更大或更小的区域上。

在这些函数中，准备金系统提供了一些特定的好处。它具有系统性和自我规范性，它允许风险承担，它容忍自发的草根企业家，容忍资本朝着集体决定的方向流动。最后，一个以信用和衰减货币为基础的系统，体现了新世界的两个基本原则：相互依赖性和非永久性（interdependency and impermanence）。

最重要的是，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系统，可以容纳本书的所有提议，我们不需要为了重建一个新的结构去革命性地毁灭掉现有的金融基

础设施。虽然负利率货币、经济租金的消除、本地化、社会红利确实都是革命性的，但实现它们的手段却并不是革命性的。事实上，这些手段已经初具雏形。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希望摒弃过往重新来过，我有时也是如此。然而，这样的革命却有使人气恼的趋向，它会再次将陈旧的东西注入到新事物中。这种对彻底的改革孤注一掷的希求，可能会使世界变得了无生机、瘫软无力，因为这种彻底的改革意味着渐进、可行的变化是毫无意义的。今天，自吹自擂的革命家们坐在会谈室中无所事事，只是冷嘲热讽地告知每个人，世之将覆，每个人最终都会为他们的错误埋单。

我认为，犬儒主义者们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在他们认为行将崩溃之处，我却看到了转型的危机（transformational crisis）。在这个危机中，旧的未被摒弃，却将更为庞大之物纳入其中。联系的自我并不是要否认作为现代事物的、离析的自我，而是要将离析的自我纳入进来，作为组成更大自我的途径之一。对我们文明的结构，道理也一样。所有的结构最终会从我们的自我意识中产生，文明贡献了自我意识，并对应着自我意识。可以说，今天汇聚在我们身上的诸多危机是一种身份的危机。崩溃主义人群的错误在于指望靠危机来拯救我们，指望危机能够摒弃过往重新来过，靠我们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从2012末日理论家到末日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的基督教笃信者，其潜在的思想形式是相同的。虽然“事物不会一成不变”的直觉是对的，但其结论是错误的。崩溃并不能越俎代庖替我们行事，危机会引发我们去做我们应做之事。正如前文所写，对于我们已经集体成瘾的文明，任何“起底”（raise bottom）的努力——任何我们用以保护或者重新收回社会、自然、文化和精神资本的努力，都会加速并缓和危机。诚然，使得本书的提议开花结果的条件尚未成熟。然而，在这些提议开花结果之前，必须备好土壤，必须育好幼苗。这就是我写作本书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久，在既有制度肥沃的朽土之中，这些幼苗将茁壮成长，它们终将开花结果。